最早的帝国

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The First Empire

许宏 著

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再到殷墟
揭示数百年间中原王朝文明的兴替流变
与被称为『帝国』的全球其他早期文明相比
二里岗文明毫不逊色
堪称中国乃至东亚第一个帝国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早的帝國

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許宏

The First Empire

最早的帝国

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许宏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 许宏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2023. 7
ISBN 978-7-5711-1745-0

Ⅰ. ①最… Ⅱ. ①许… Ⅲ. ①青铜时代文化-文化遗址-研究-郑州 Ⅳ. ①K878. 0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14290 号

ZUI ZAO DE DIGUO
最早的帝国
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许　宏　著

出 版 人　汪林中
选题策划　张前进　李建平
责任编辑　杨　兰
责任校对　牛志远　万冬辉　安德华
装帧设计　王莉娟
营销编辑　单明宇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 450016)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 daxiang. 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　9. 5
字　　数　179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7 月第 1 版　202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 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目　录

壹 | 发现篇

一　小地名　大时代
从公园中的铜像说起 ---- 003
韩维周与二里岗 ---- 006
大都填补大时代空白 ---- 011
郑州与二里头的兴替 ---- 014

二　城圈与“王畿”
不敢置信的大城圈 ---- 022
半弧形外城＝防护堤？ ---- 027
一方水土与因势利导 ---- 030
大首都圈与“王畿” ---- 036
郊外大邑小双桥 ---- 039

三　家当大盘点
大都格局的形成 ---- 045
内城区的城建工程 ---- 047
“龙头企业”铸铜作坊 ---- 053
随葬铜器的礼制密码 ---- 056
甲骨文之前的卜辞 ---- 060
窖藏重器看王权 ---- 063

四 细说最新发现

如此"富"墓，不在都内？ 071
殷墟之前无王陵 074
是"金覆面"吗？ 081
东亚早期金器扫描 085

五 辅都现伊洛

电厂给古城让了路 090
城建规划看偃师 094
不比无以窥高下 100
偃师商城的独特价值 102

贰 | 争鸣篇

一 说"原史"道争鸣

上古探索　贵在争鸣 109
"原史时代"的特质 111
"原史"终结在武丁 114

二 何以称"商"？

先"殷"后"商"为哪般？ 119
商人自称商　周人称殷商 124
甲骨文中的"商"究竟何指？ 126
"殷""商"难以论短长 129

三 "亳都"还是"隞都"？

"隞都说"一统天下 132
扑朔迷离汤都亳 135
"郑亳说"引起大震荡 137
究竟是"亳"还是"亭"？ 139
夏商分界问题的胶着 142

四 三大文化，几大集团？

器用与人群 147
二分法 vs 一分法 152
"商"之内的再分 156
也有三分的可能性？ 159

叁 | 别解篇

一 郑州、安阳间的变局

被淡化的差异 165
洹北商城与殷墟之别 167
洹北：二里岗基因存续者 172
扩张与"收缩"的反差 174

二 难解的殷墟"新生事物"

生而早熟的甲骨文 178
马车的突然出现 179
多墓道大墓的现身 186
大规模的人牲祭祀 190
北方因素大汇聚 193
北迁"河内"的疑问 200
驯马民族，入主殷墟？ 203

三 高度集权　强势辐射

史上空前冲击波 209
"畿内""畿外"的城邑群 211
殖民城市盘龙城 218
盘龙城的青铜工业 223
绿松石器的中原基因 229

青铜礼容器大扩散 ------------------233
礼容器散布的背景 ------------------238
陶器的"体制美学" ------------------243

四 何以"帝国"？

"二里岗帝国"说的提出 --------------249
何为"帝国"：概念辨析 --------------254
那些被称为"帝国"的古国 ------------257
东亚超级大国的体量 ----------------264

注释 ------------------------------272
后记 ------------------------------295

壹

发现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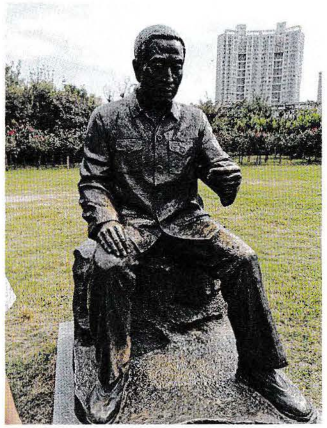
韩维周、安金槐、邹衡这三位考古学家，分别发现了"二里岗"这处小遗址点，由此命名了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又由此出发揭开了这个文化的最高结晶——庞大的"郑州商城"都邑，而这座大都支撑起了一个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大时代——"二里岗时代"。

一 小地名 大时代

从公园中的铜像说起

2015年盛夏，“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在绿城郑州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在郑州商都遗址的公园中，举行了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著名考古学家的铜像揭幕仪式。（郑文2015）

这三位先生中，安金槐以“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著称，邹衡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著称，他们二位在郑州商城（该遗址命名中的“商”已进入阐释层面，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类似命名还有“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相关问题将在“争鸣篇”中讨论。为行文方便，本书仍沿用这些约定俗成的提法）的发掘与研究中，功绩卓著。唯独在研讨会所列三位先生中名列第一的韩维周，却是连我们考古圈内的好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按圈内严谨的说法：“韩维周先生，是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者。”但媒体则浓墨重彩地赞誉道：“上世纪50年代，以时任小学教师韩维周在郑州二里岗发现大量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为开端，一座沉寂3000多年的商代早期王都的神秘面纱被最终揭开。”有人评价其为“郑州商城发现第一人”。







三位考古学家分别发现了“二里岗”这处小遗址点，由此命名了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又由此出发揭开了这个文化的最高结晶——庞大的“郑州商城”都邑的面纱，而这座大都支撑起了一个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大时代——“二里岗时代”。中国是个文献资源丰厚且有重史传统的国度，“二里岗时代”也被自然地推导为早于殷墟时代的“殷代”“商代”“殷商王朝”的早期，这座大都则分别被推定为第一任商王汤和第十一任商王仲(中)丁所都，一旦进入了传世文献和考古遗存整合研究的层面，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可想而知的（详后）。上述引号中的这些概念，恰是本书的关键词。

关于“二里岗”这个小地名，还有稍咬文嚼字的必要。

上图：韩维周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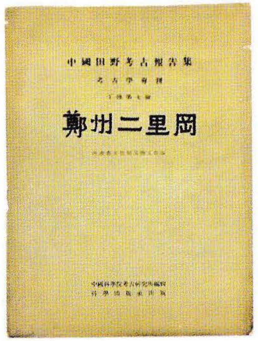
中图：安金槐铜像

下图：邹衡铜像

在考古学这个讲究规范、比较较真儿的学科里，常有遗址名、文化名写法不一的情况，譬如这“二里岗”，就有写作“二里冈”的，究竟哪个对呢？追根寻源，考古遗址定名习用当地小地名，由口耳相传到“文字化”，就带来了问题，写什么的都有。考古人或出版者如果只录一种，即便错了，也就将错就错，至少纸面上没有矛盾。问题是纸面上也往往不一样。

郑州二里岗就是其中一例。查最初的考古报告《郑州二里冈》（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封面和版权页，乃至目录、页眉都是“二里冈”。按说该定论了，但偏偏正文及插图文字又都是“二里岗”。合理推测，后者才应是出自发掘者之手，且据说当地百姓就是叫“二里岗”（在北方，第三声的场合的确更多）。

这使得有“学术洁癖”的笔者产生了深深的顿挫感。2002 年，应《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主编杨锡璋和高炜先生的恳请，我







上图：《郑州二里冈》（1959）

下图：《二里岗街道志》（2006）

作为“自家人”给他们的书稿“挑错”通校。为两位主编高度的责任心和诚意所感，我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间隙，通读了数十万字的书稿。在向二位前辈谈我的意见时，就专门指出了“冈”和“岗”的不同，坚决认为遗址名用字应以经典报告的版权页为准。已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考古所2003）采用“二里冈”，也许和我的这种坚持有关？

但有了上面的梳理，我们却没有一种轻松感，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无所适从。现在，我反过来坚持以“二里岗”为确，一个重要旁证，是作为官方行政区划的现地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本书一律统一为“二里岗”，包括参考文献和引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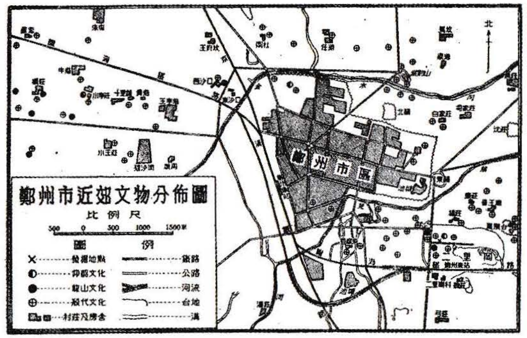
话题回转，上文这三位考古学家会不断出现于本书的叙述中，引领我们回望那些大发现与推理假说层出不穷的火热年代。我们先回到上引媒体的报道，其中还透露了韩维周曾任小学教师的细节。一位小学教师，何以能跻身于“著名考古学家”之列，而又有铸像缅怀的身后哀荣？

让我们回到七十多年前的郑州。

韩维周与二里岗

二里岗，是位于当时郑州市的东南郊、陇海铁路附近的一处长条形的小土岗，因距郑州旧城2里而得名，现在已位于车水马





韩维周与《郑州二里岗》报告附图中的二里岗

龙的郑州市内，属于管城回族区。1950年秋，时任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的韩维周，在这一带的建筑工程区发现了“类似殷代的陶片和遗址”（赵全嘏1953）。

依考古学的惯例，新发现的遗址一般以当地的小地名命名，二里岗遗址成了郑州市区一带发现的第一处先秦时代的遗址。韩维周的发现，直接促成了后来的大规模发掘；再后来，考古学上著名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二里岗文化”，又是以这处最早发现的遗址来命名的。由此还引申出了更大范畴的“二里岗时代”和作为青铜时代广域王权国家典范的“二里岗文明”的概念（详后）。要之，韩维周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机遇属于有准备者，韩维周对文物古迹工作的敏锐度可不是一位“小学教员”“普通教师”“业余考古爱好者”所能具备的。他的身世，说起来令人唏嘘感叹。

韩维周，1908年出生，河南巩义人。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录用，开始从事考古工作，曾多次参加安阳殷墟和其他遗址的发掘。可以说，韩维周是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第一代先驱中的一员宿将。1938年，日军攻占河南省会开封，古迹研究会自动解散，韩维周回到巩县（今巩义市）老家，曾任县督学、县参议会议员和代秘书等（河南省局文工队第一队通讯组等 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调任郑州市南学街小学任教，职业习惯使他时常愿意出去“散步”，留意地下的出土物，这才有了1950年秋二里岗等三处遗址的发现。

职业的敏感性让他意识到二里岗遗址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于是上报开封的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当年12月，该会派出赵全嘏、安金槐和省博物馆裴明相三位赴郑州复查（赵全嘏 1951），以二里岗为首的郑州一带古代遗址群开始进入考古人的视域。那时的安金槐，不过是当年刚进入文物管理部门的小伙子，比韩维周小十几岁。由于韩维周的首功，他得以进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彼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阶段，考古队伍急需韩维周这样的专业人才，他也的确在郑州商城的早期考古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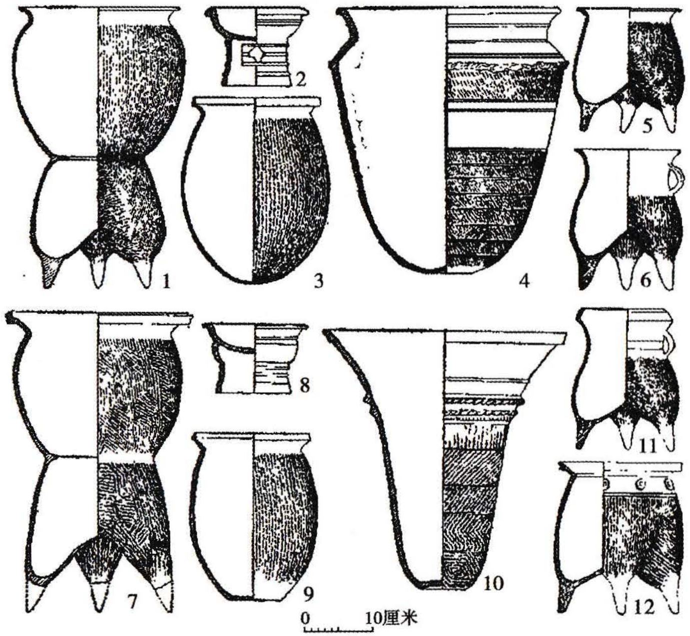
1954年发表的考古报告在记述1950年的发现时，已称其为“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韩维周同志”（安志敏 1954）。在1959年

正式发掘报告《郑州二里岗》中，他又变回了“郑州市一位小学教员”（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据说这还是很不容易才留下的一点印记：韩维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与韩维周一起工作的裴明相在负责执笔《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时，坚持尊重事实要写上韩的名字，但又恐其“右派”身份不妥，最后只能提及“小学教员”，韩维周的功绩才得以记录下来。韩维周以“右派”“冒牌考古学家”的身份被遣返回乡劳动改造，1961年1月在困苦窘迫中饥病而死。两个月之后，郑州商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韩维周的“右派”帽子被摘掉，而“小学教师”的名分却越坐越实，直至今日。（舒可文 2005）

韩维周在二里岗遗址发现的以灰陶绳纹和空三足炊器——鬲为主要特征和典型代表的一群器物，后来就依考古学的惯例，命名为“二里岗文化”。二里岗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以郑州为中心，后来向四外大范围地扩散，这背后当然是因为人群的活动。这类遗存又被考古学者从二里岗遗址文化堆积的角度划分为“下层”和“上层”，地层上的叠压关系意味着时间的先后次序，于是，不甚规范但又很著名的“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就分别成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的代名词。后来学者又把早、晚期各细分为偏早和偏晚两小段。（安金槐 1988，河南省所 2001）这样，大体存续了200年左右的二里岗文化，就被细分为四个小的阶段。因书中要不时出现这些概念，所以这里先做一个交代。

二里岗文化期段定名对照

	《郑州二里岗》报告	《郑州商城》报告	本书
二里岗文化	上层（晚期）	二期（二上二，白家庄期）	晚期晚段
		一期（二上一）	晚期早段
	下层（早期）	二期（二下二）	早期晚段
		一期（二下一）	早期早段（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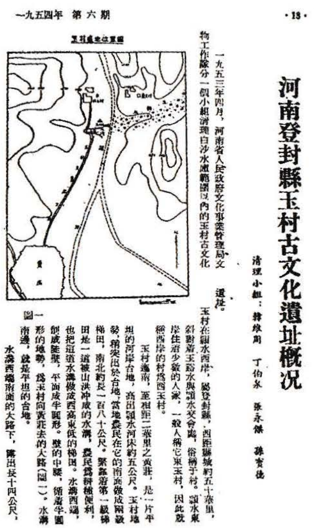


二里岗文化早（1—6）、晚（7—12）期陶器（北大商周组 1979）

大都填补大时代空白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上古时期文化发展脉络的认知，还仅限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墟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尚属“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文版见梁思永 1954），而殷墟文化则因甲骨文的发现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被确认为商代后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兴盛期。历史学家曾一度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推断为传世文献中夏王朝的遗存。史载商汤灭夏，灭夏后的商代前期文化何在？限于材料，这段历史仍扑朔迷离。而 20 世纪 50 年代相继发现的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填补了从龙山文化到殷墟文化这数百年的历史空白。这数百年，也是从无文字的史前时代，经文字虽萌生而尚未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史时代”（详后），步入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标志的历史时代的关键期；更是以青铜文化遗存为载体、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独特的东方文明形成的关键期。

说起二里头文化的最初发现，还是不能不提到韩维周。他在省文物部门工作期间，又作为文物工作队的小组负责人，在率队发掘登封玉村遗址时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遗存。他敏锐地意识到“下层文化中所出之物，从型式与作风上看，都比较陌生，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因而得出“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一九五四年 第六期 ·13·

河南登封縣玉村古文化遺址概況

清理小組：韓維周 丁伯泉 張永傑 孫寶德

一九五三年四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文物工作隊分一個小組清理白沙水庫範圍以內的玉村古文化遺址。

玉村在潁水西岸，屬登封縣，西距縣城約五十華里，斜對着玉路水與潁水交會處，俗稱于村。潁水東岸住着少數的人家，一般人稱它東玉村，因此就稱西岸的村為西玉村。

玉村迤南，至相距二華里之黄莊，是一片平坦的河岸台地，高出潁水河床約五公尺。玉村地勢，稍突出於台地，當地農民在它的南面做成兩級梯田，南北約長一百八十公尺。緊靠着第一級梯田是一道被山洪冲成的水溝，農民為耕種便利，也把這道水溝做成西高東低的梯田。水溝西端，削成陡壁，平面成半圓形。壁的中腰，循着半圓形的地勢，為玉村向黄莊去的大路（圖二）。水溝南邊，就是平坦的台地。

水溝西端附近的大路下，露出長十四公尺，

圖一

登封玉村遗址发掘简讯

的结论。至于在玉村遗址下层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应列入我国历史中的那（哪）一阶段，颇值研究”（韩维周等 1954）。这就给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类文化遗存，后来在郑州和洛阳地区陆续被发现。1956 年郑州洛达庙遗址的发掘，大致确认了其早于二里岗商代文化、晚于当地龙山文化的年代序列。这类遗存后来曾被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考古所 1961）。因洛阳偃师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较洛达庙遗址更为丰富和典型，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将其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后改称“二里头文化”。（夏鼐 1962、1977）可以说，玉村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发现地，韩维周在其中也是立有首功的。

现在我们知道，“二里岗下层”最早的一段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二里岗上层”最晚的一段又接续上了殷墟文化。这二里岗文化及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基本情况比较（之一）

	绝对年代（约公元前）	主都	都邑面积（平方千米）	共有要素	特有要素
殷墟文化	1300—1050	安阳殷墟	36	大型建筑、青铜礼器群、铸铜作坊等	无外郭城
二里岗文化	1500—1350	郑州	13？		内城＋外郭城?
二里头文化	1750—1500	洛阳二里头	3		无外郭城
龙山时代	2300—1750	无	王城岗 0.5	礼容器残片	—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基本情况比较（之二）

	三都青铜礼容器数量	三都人口规模[4]	青铜礼容器最大数值[长 × 宽（径）-高]	青铜礼容器扩散范围
殷墟文化	975 件，24 种（2004 年前）[1]	逾 14.6 万人	司（后）母戊方鼎 116x79-133 厘米 重 832.8 千克	有所收缩
二里岗文化	外城以内 140 件，13 种。近畿 93 件，周边 331 件（2020 年前）[2]	内城即约 8 万人	方鼎（杜岭 1 号）62.5x61-100 厘米 重 86.4 千克	大范围扩散
二里头文化	15 件，3 种（2008 年前）[3]	逾 3.1 万人	斝（84VIM9：1）17 ~ 18-30.5 厘米	大致限于二里头都邑

注：1.（岳洪彬 2006）2.（司媛 2020）3.（陈国梁 2008）4.（宋镇豪 2005）

由上表可知，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二里头最先崛起于中原，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文明的历史进程（许宏 2016、2021）。但就延续了千余年的中原王朝文明而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只不过是一个先导，紧随其后的郑州商城与二里岗文化才揭开了中国青铜时代兴盛期的大幕，真正进入中原中心碾压周边的时代。随后的殷墟时代虽然在都邑规模和青铜工业上续有进展提升，但其空间扩展的张力反而不如二里岗时代，都邑聚落形态也迥异于郑州商城，而回归到与二里头相近的“大都无城”的模式。要之，郑州商城与其前的二里头，其后的殷墟，既有密切关联和延续性，又有其个性与特质。那么，郑州商城的特质何在？又该如何看待这些特质？这是我们要在本书中加以推衍探索的。

郑州与二里头的兴替

二里岗文化及其典型遗址郑州商城，与殷墟文化及其典型遗址殷墟都邑的关系，且待后文分解。这里，我们先看看其与先行的二里头文化及其典型遗址二里头都邑的兴替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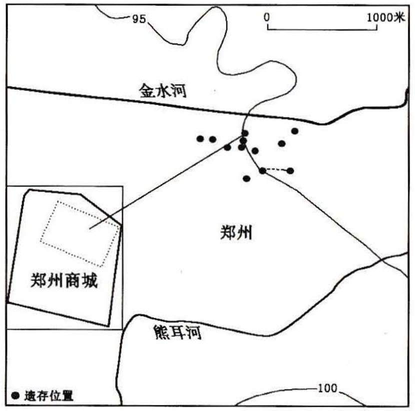
（一）郑州崛起的聚落基础

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更替的细节，目前还无法做确切的辨析，对相关遗存的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笔者倾向于认为，二者在年代上有共存关系，至少部分时段重合。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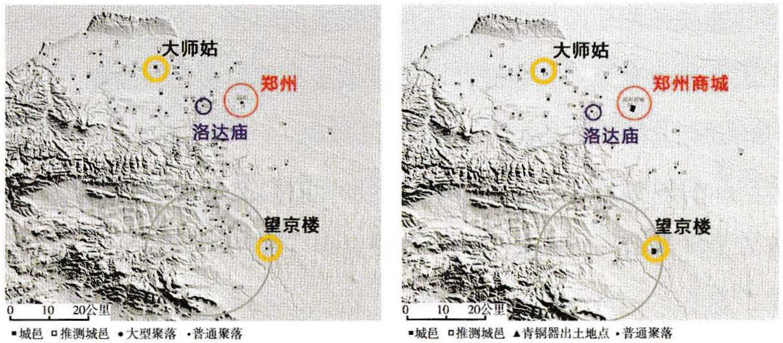
里头文化末期（四期晚段）已进入二里岗时代，应属于二里岗文化的范畴。这是二里岗文化因素肇始于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以及郑州商城开始崛起的时期（许宏 2021）。

从聚落形态上看，庞大的郑州商城并不是平地起建的。大体在二里头文化末期，或可称“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郑州一带既已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群），据《郑州商城》报告公布的地点统计，该聚落或聚落群的面积可达 80 万平方米，且较集中地分布于后来内城东北部的宫殿区一带（河南省所 2001）。与郑州旧城出现较大型聚落大体同时，郑州周边地区已有若干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城邑分布。具体而言，郑州旧城以南 33 千米左右有新郑望京楼城邑（郑州市院 2016），以西 16 千米左右有郑州东赵城邑（张家强 2015），其西北 22 千米左右有荥阳大师姑城邑（郑州市所 2004），西北 32 千米左右有荥阳西史村城邑（郑州市院等 2016）等。

如以当时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二里头都邑为中心观之，郑州一带是东出盆地、拱卫二里头都邑的东方



郑州商城营建前夕本地遗存分布示意（依侯卫东 2018 改绘）



郑州商城营建前夕与肇始阶段的聚落分布（依侯卫东 2018 改绘）

门户，连通和控制华北大平原地带的重要基地。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看，这里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东部边缘地带，因而具有防御色彩的城邑分布较密集。无论是在二里头都邑人口集聚和资源整合的过程中，还是在二里头都邑代表的国家向外辐射的过程中，郑州商城所在的区域从地理位置上都是一个必经之地和资源集散地。可见，在此地营建大型都邑郑州商城，是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背景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早的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建筑群组间可能的界墙等城建工程和铜器墓出现于后来的宫殿区（详后），时间上约当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这可以看作是二里岗文化形成的开端或起始阶段。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一批城建工程和铜器墓的出现相对应，郑州周边此前二里头时代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在二里岗文化早期重新修建或改造，如望京楼城邑的布局更加规整，与郑州商城的规划理念一致，大师姑城邑则趋于衰落，东赵城邑的中城（另有不同时段的小城和大城）废弃。在望京楼城邑、西史村城邑和荥阳高村寺遗址都发现有铜器墓。（郑州市博物馆 1981，陈立信等 1991）

这反映了郑州商城代表的国家和社会控制了此前二里头文化的若干重要城邑和整个周边区域。同时，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王畿区域基层聚落明显减少，反映了社会重组过程中人群和资源向高层级聚落集聚的趋势。郑州商城最终成为唯一的区域中心聚落和顶层社会组织，成为主导中原腹心地区乃至更广阔地域的中心性都邑。而这些城邑和铜器墓的出土地构成了后来郑州商城都邑的“王畿”地区。（侯卫东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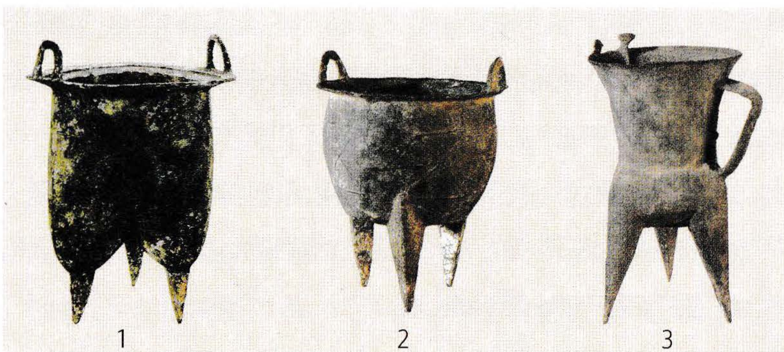
（二）礼制遗存的二里头基因

如果将二里岗文化视为商代早期文化的话，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属于“先商文化”，即商王成汤灭夏以前，以商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邹衡 1980，李伯谦 1989）。但没有人否认二里岗文化继承自下七垣文化的文化要素限于以陶器为主的日用品，均属民间文化范畴，至于与统治者和贵族相关的大型建筑的营建和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显然来自于彼时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

与最早的一批城建工程大体同时出现于郑州商城宫殿区的，还有一座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T166M6）。该墓合葬三人，其

中二人为殉葬人，随葬铜鬲、铜盉及铜戈。发掘者推断其年代为洛达庙类型晚期晚段（即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河南省所 2003A）这座墓葬出土的铜鬲，是现知最早的青铜鬲。而与此同时，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一改以爵、盉等陶礼器为原型的铜礼器使用规制，开始铸造鼎、斝等铜礼器（陈国梁 2008），这又是现知最早的青铜鼎和青铜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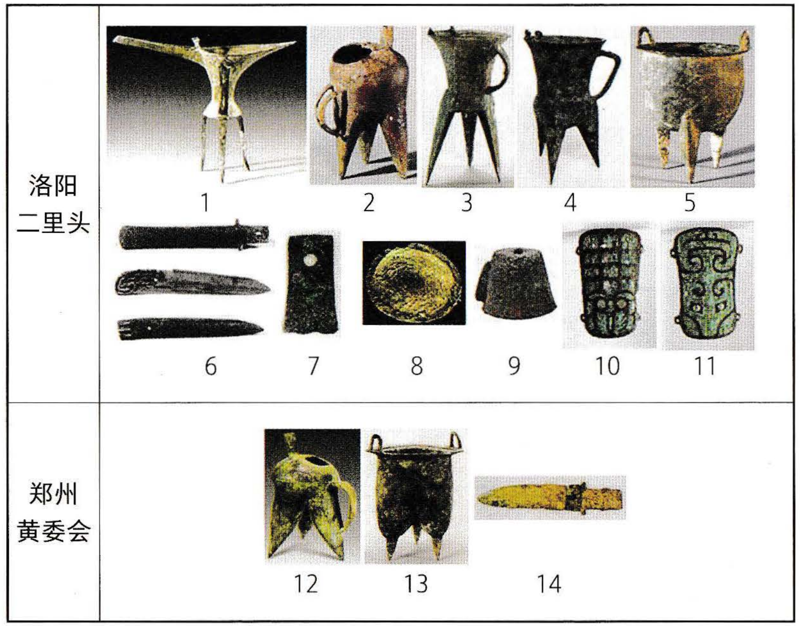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铜质鬲、鼎、斝原型的陶鬲、陶鼎与陶斝，在二里头文化中都属于普通炊器而非礼器，一般不作为随葬品下葬。但这三种器物在“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或当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已跻身于青铜礼容器的行列，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其背后暗寓的礼制上的重大变化颇令人瞩目，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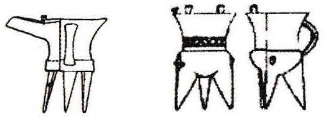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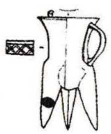


“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新出铜礼容器

1. 鬲（郑州 T166M6） 2. 鼎（二里头 87VM1） 3. 斝（二里头 87VM1）

已有研究表明，“从铸铜技术和青铜器风格看，郑州商城显现出源自二里头遗址的极强的连续性”（朱凤瀚 2009），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青铜文明是一脉相承的。甚而，在二里头都邑衰微后，这处在当时唯一能够制作礼器的铸铜作坊应被迁于郑州商城，在其后的二里岗时代，当时国家的统治者仍然保持着对青铜礼器的独占。这种对关涉国家命脉的礼器生产与消费的绝对占有，显示了早期国家对礼制的一元化管理，以及权力中心的唯一性。（许宏 2021A）



新郑望京楼	 15 16 17
荥阳西史村	 18 19
荥阳高村寺	 20
肥西大墩孜	 21 22 23
武汉盘龙城	 24

“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青铜礼器群

1. 爵 2. 盉 3、4. 斝 5. 鼎 6. 上为战斧，中、下为戈 7. 钺 8. 圆牌饰 9. 铃 10、11. 兽面牌饰 12. 盉 13. 鬲 14. 戈 15. 爵 16、17. 斝 18. 爵 19—22. 斝 23. 铃 24. 斝

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末期的二里头都邑墓葬随葬鼎、圜底斝、觚（已佚）和郑州商城初期墓葬鬲、盉组合的铜器群，是连接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青铜容器生产与使用的重要环节，在器物组合和形制等方面开启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风格的先河。发端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铜爵、铜斝组合，后来成为二里岗文化青铜酒礼器的核心组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戈、钺等青铜礼兵器，在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武器。

二　城圈与“王畿”

不敢置信的大城圈

位于洛阳、开封两大古都之间的郑州，最初的行政区划仅是郑县，由于近代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在此纵横交会，地理位置益显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有将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郑的呼声和动议。“一五”计划期间，郑州就被确定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和中南区 9 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在郑州“千树万树梨花开”。1954 年，河南省省会正式迁至郑州。

郑州迎来了大建设的时代，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在以二里岗和老城区为中心的广大地域陆续发现了众多的商代文化遗存。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已发现了刻字卜骨、出土青铜器的墓葬、铸铜作坊、祭祀遗迹等高规格的遗迹遗物，确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早于殷墟期商文化。其中卜骨上的刻字是在殷墟之外首次发现的甲骨文。至此，郑州旧城内外发现商代文化遗存的面积达 25 平方千米。（安志敏 1954，邹衡 1956）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商代遗址”榜上有名。

最令人瞩目且最引起争议的，是商代遗址大规模的城墙遗迹。



郑州商城城墙发掘现场（20 世纪 5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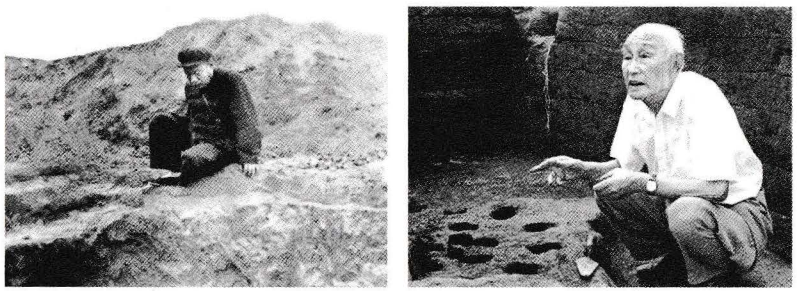
早在 1953 年，在商代遗址东南部的二里岗及周边地带的发掘中，即已发现了宽约 25 米的条状夯土，钻探确认其长达 2100 米（后来确认这是郑州商城外城墙的南墙东段），但当时的发掘者囿于证据和认识的限制，未能提出其属于商代城墙的明确意见。（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鉴于已知的安阳殷墟都邑遗址尚无城墙环绕，人们还不敢相信早于殷墟的郑州会有城垣遗迹。

1955 年，在商代遗址中部（后来确认为内城的北墙东段）又发现条状夯土遗迹，最初推测为大墓内的夯土或堤坝，通过追探发现条状夯土延伸较长且有拐折，才考虑其属于夯土城垣的可能性。从 1956 年下半年开始，考古工作者沿着夯土走向进行了系统钻探和横截城墙剖面的重点发掘工作，初步了解到条状夯土闭合为一个庞大的夯土城圈。这个城圈略呈南北纵长方形，除北城

墙东段略呈东南至西北向的抹角外，基本方正，城圈周长近 7 千米，其南部为郑州旧城所利用。最初在北墙东部发现夯土时，鉴于夯土带以南地势较高、以北则地势较低洼的地形特点，发掘者曾推测可能是夯土堤坝的建筑设施遗存。（河南省所 2001）又有学者认为，东北部城垣建成抹角而非直角，正是受了附近湖沼分布的影响。（刘亦方 2019A）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副队长的安金槐。他坚持认为新发现的城圈属于商代二里岗期，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包括他的同事。他们甚至担心此结论不保险，而建议安金槐整理好的发掘报告最好不用单位的名义发表。无奈，安金槐只好在个人署名的论文中披露了这批重要材料。（安金槐 1961，张立东等 2001）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发现的城墙属于商代的认识在学



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1953）、安金槐（1999）在郑州商城发掘现场

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曾参加过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刘启益等先后撰文提出质疑。（安志敏 1961，刘启益 1961）关于郑州商城的年代问题遂被搁置，长时间未得到学界的认可。

1972 年，按当时国务院图博口（“文革”时期的建制，即后



残存于地表的郑州商代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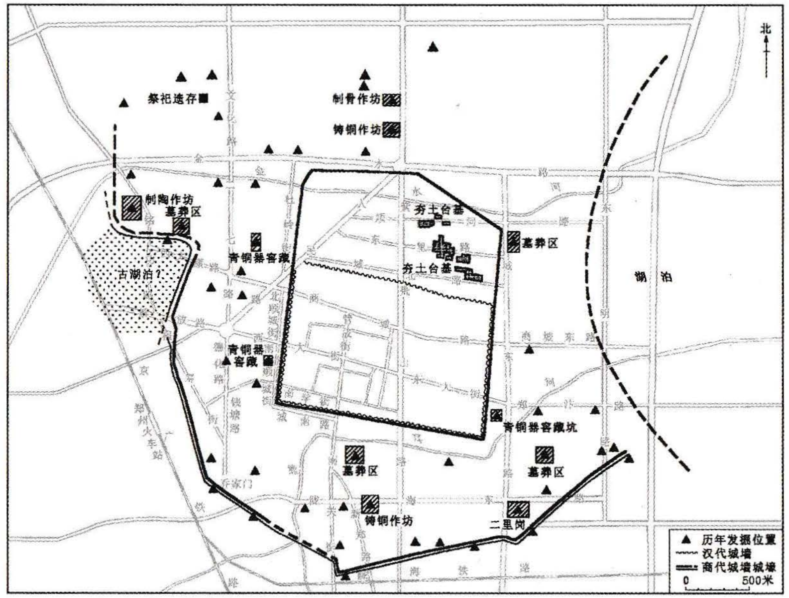
上：原貌

下：复原状况

来的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王冶秋的指示，新成立的郑州商城遗址工作组对郑州商城四面城垣做了进一步的钻探复查和重点发掘工作。发掘提供了新的证据，确认 20 世纪 50 年代的考古资料可信，明确了城墙基础槽的结构和城墙版筑方法（河南省博等 1977）。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曾邀请省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现场观摩座谈，考古工作成果得到了一致的认可。此后，郑州商城逐渐为学界和社会所熟知。除了个别学者坚持认为其为隋唐时期的荥阳郡城（荆三林 1980），学界普遍认为郑州商城是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大型都邑。

最终确认的这个大城圈，东西跨度约 1700 米，南北跨度在 1700—1870 米之间，圈围面积约 3 平方千米。夯土城墙内坡较缓，外坡陡直，平均底部宽约 20 米，顶部宽约 5 米，高约 10 米。城外还开挖有护城壕。学者们曾计算过修筑城墙的用工量，以全部城墙的长、宽、高计算，这个城圈共有夯土量约 87 万立方米。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若按起土、运土夯筑 1 立方米需要 15 个劳动日计算，大概总共需要 1300 万个劳动日。即使每天有上万人参加筑城劳动，也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北大商周组 1979）

整个城圈大致位于现郑州市区的金水路以南、城东路以西、杜岭街和顺城街以东、城南路和熊耳河以北的区域，金水河流经城的北部。这个城圈的南部约三分之二的城垣，又被战国和汉代



郑州商城布局示意（依许宏 2017、袁广阔 2018 改绘）

人所利用，而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年间的城垣，则又利用了汉代的城垣而加以修筑。郑州商城遗址所在的金水区、二七区和管城回族区，恰好就是后来成为省会的郑州市的中心区域。现代大都会与三千多年前的大都邑高度重叠，喜忧参半。

半弧形外城＝防护堤?

令考古工作者没有想到的是，在上述城圈的外面，居然还有一道外城墙。上文提到 1953 年就发现了外城的夯土城墙，但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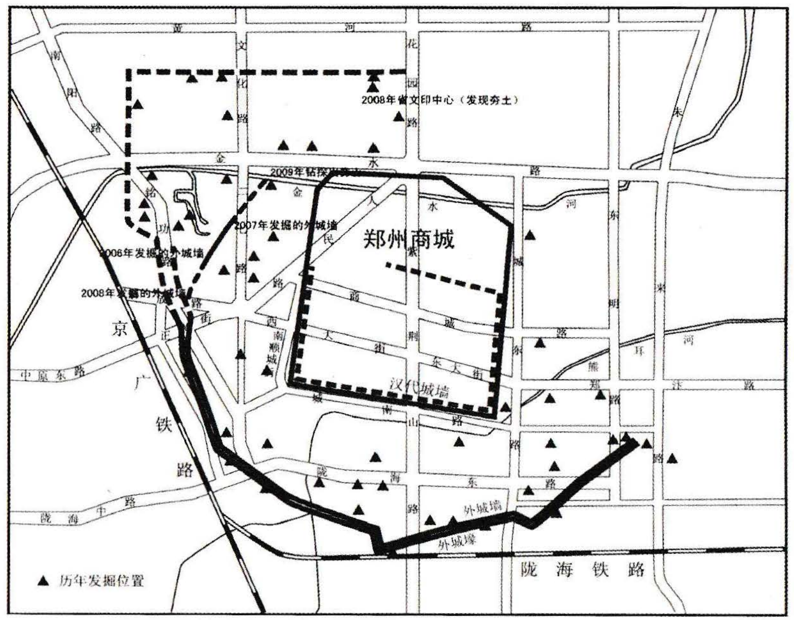
时人们还不敢相信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会有城墙，且这段夯土呈东北—西南向，考古报告对其时代和用途都没有明确的判定。1955—1956 年虽发现了内城城圈，但一直受质疑而无法确认，这段外城墙也同样被搁置了下来。

1974 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成立郑州商城工作站，负责配合基本建设，对郑州商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该站先后发掘确认了数段夯土城墙，这些城墙分布于郑州商城内城南城墙与西城墙以外约 600—1100 米处，最初被称为“外夯土墙基”，后称外郭城城墙（河南省所 2001）。此后直至 21 世纪之初，经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探索，知其总长度已达 6000 余米，连续分布于郑州商城内城以外的东南、南至西南方向。城墙平面形状不规则，有数处拐折，总体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大敞口，对内城形成环抱之势。城墙大多只剩基槽部分，宽度在 14 米左右，槽深 1 米余，应在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即已建好。城墙之外是 10 余米的过渡地带，再向外有宽 40 余米的护城壕。在已发现的外城西墙以北区域钻探发现了断续的护城壕遗迹（河南省所 2004），但由于这一带地处城市中心区，地下遗存的确切状况难以究明，护城壕在西北呈直角拐折，方向与现郑州市区的道路近同，令人生疑（见下图左上部分）。勘探发掘者推测北部、西部都应该有外城墙，兴建外城的年代可能略晚于内城，“郑州商城的防御体系是通过城墙和护城河与东部湖泊

内的大面积水域构成的，我们推测其面积约 13 平方公里”（袁广阔等 20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后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对此有所校正。他们的钻探发掘工作提示西墙北段向东北方向倾斜，接近内城北城墙一线，且所发掘的几段城墙之外均未发现护城壕。（刘彦锋等 2010）这就把此前圈在外城以内的一些遗址点隔在了城外。

系统披露这一夯土外城墙的第一篇简报，就提出该夯土墙基“可能是防护堤的遗迹”（河南省所 1991）。尽管勘探发掘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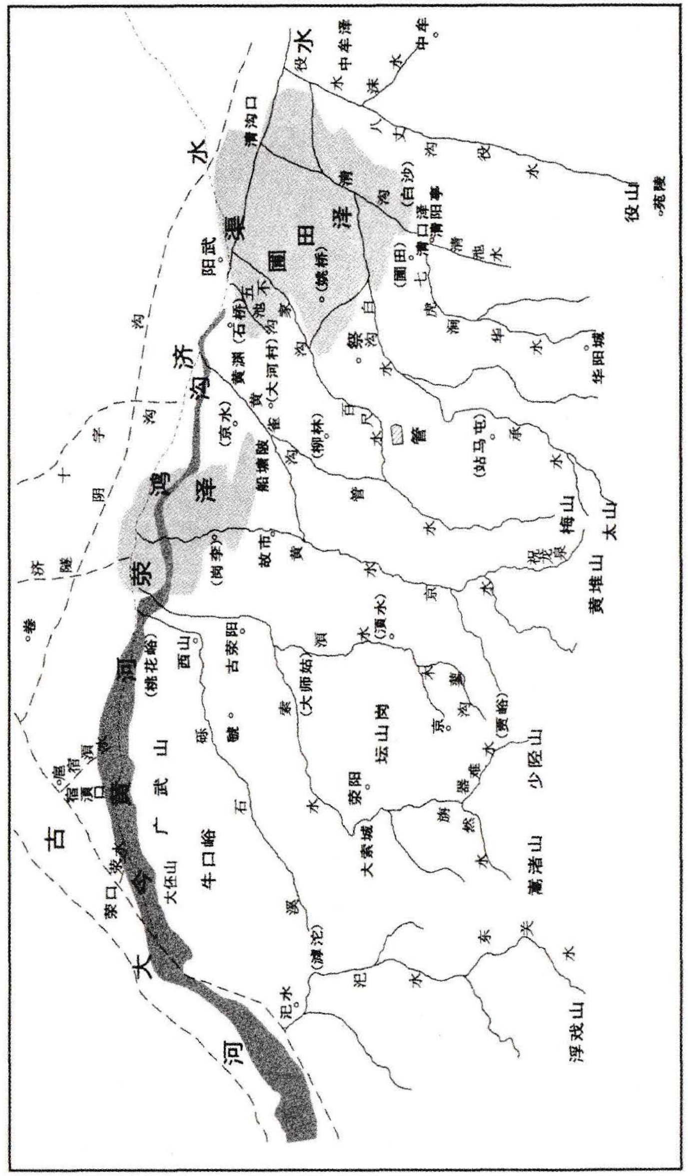
郑州商城城壕分布示意（刘彦锋等 2010）

意到这个“半拉子”城墙仅位于郑州市地势稍高的西南部，但仍认为“依自然地理形势修筑的第二道外夯土城墙，主要是为了扼守郑州商城的南部与西部地区，免遭来敌的攻击，这种方向不甚规整的第二道夯土外城墙属于防御设施”（安金槐 1993）。于是，郑州商城拥有内城和外郭城双重城垣的意见成为主流观点。

一方水土与因势利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的人类文化，不过是适应自然、因地制宜的产物。2021 年夏季郑州水灾引人注目，而郑州商城外城可能为“防护堤”的提法，也不能不让我们关注郑州所在的这方“水土”。

郑州跨中国第二级和第三级地貌台阶，连接西南部的嵩山和东部的黄淮平原。其西、南部是嵩山延伸而来的余脉所形成的丘陵高地，因而郑州旧城区域的地势也是西南高，东北低，而市区的东、北部则属于相对低洼的地带，所以郑州今城区的河流大多是流向东北的。“在京广（陇海）铁路的东侧（北侧），存在一个属于类冲积扇前缘的低洼带，史前一直是积水、渚水之区。”“商城偏于低洼的郑州东北冲积平原区的西南隅，在泛水威胁和湖沼包围下，它似乎处在一个较为宁静的‘海湾区’——相对稳定之地区。……冲积平原的商城，恰好处在西南山水冲洪积扇前缘，有着稳定的基座和避开黄泛的优势。”（徐海亮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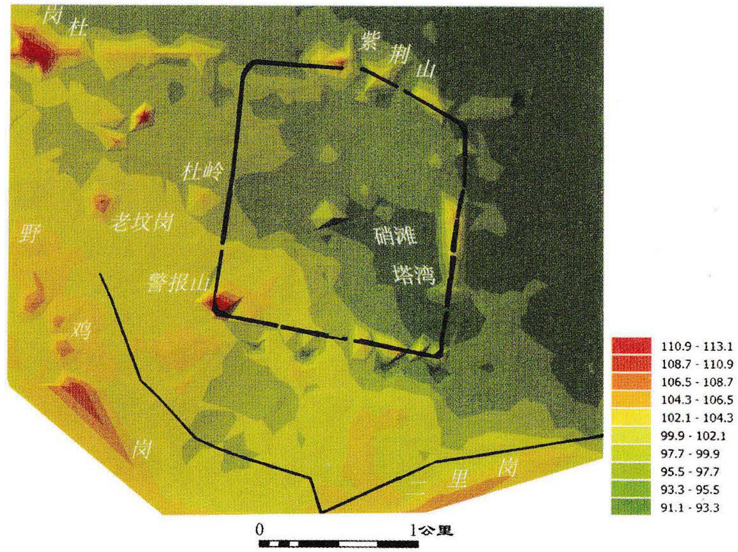
《水经注》时代的郑州主要水系示意（徐海亮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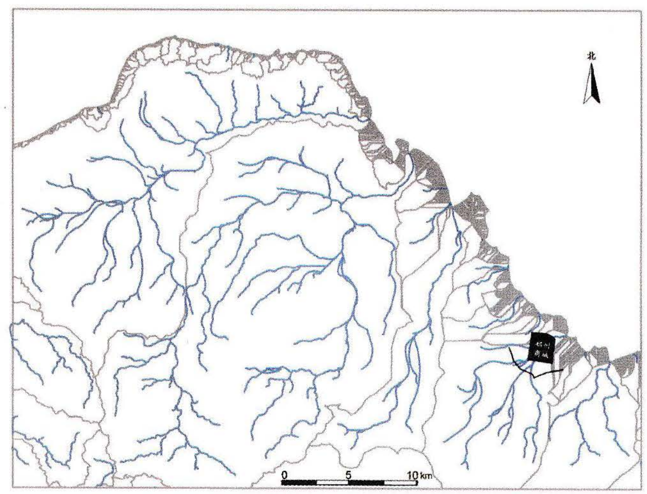
结合文献资料，史念海认为现古荥镇之东，“愈东则愈低，荥泽的旧地当在这高崖之下的平滩上求之”（史念海 1988）。圃田泽最早见于《诗经·车攻》，此后诸文献续有记述，是中原地区较有影响的大泽。东周至汉代以后的圃田故城位于今郑州和中牟交界处，附近仍有以圃田为名之地。圃田泽的地理位置大致应位于以今中牟县城之西北的贾鲁河两岸为中心的区域。（陈隆文 2011）

与东、北部的低洼地势形成对比，郑州市西部及南部存在一系列的岗阜，从现存的一些地名如“二里岗”“老坟岗”“杜岭”“胜岗”“岗杜”等，也可看出郑州市的整体地势。穿流市区的金水河与熊耳河也都源自西南方，大体自西南而东北穿过郑州旧城。熊耳河恰经过郑州商城和此后的旧城南墙之外，与城墙平行流淌一段距离后，在城墙东南拐角处折向东北方向。金水河河道则位于旧城以北，横穿郑州商城城垣而东流。

青年学者刘亦方对古代郑州城垣形态及相关河道的变迁做了系统研究。她指出，郑州商城“外郭城垣及城壕形态为不规则弧形，关键的一点原因应该是为了抵御洪水对城区的威胁，起到了对水流进行阻、导的作用”（刘亦方 2019A）。她具体分析道：

> 1.将城墙建成弧形的做法一般在北方平原地区并不多见，但在南方地区，聚落形态为圆弧状的城址及普通居址自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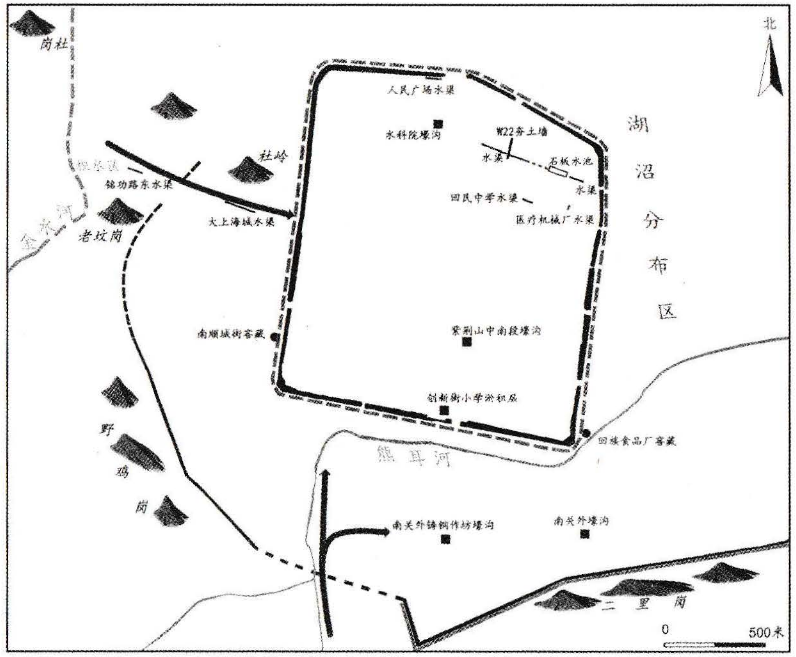


郑州及所处区域地貌及水系（刘亦方等 2022）

器以来乃至近代都较为普遍，这一方面是受到当地地形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防水和排水的考虑——弧形城垣及相应的城壕有助于水流从两侧绕开，比方形直角城垣更能够抵抗洪水的冲击，不易造成垮塌。而已发现的郑州商城的外郭城基本正对着现今的熊耳河，其形态为不规则的半弧形应该也是与防洪功能有关。

……郑州商城采集植物孢粉和植硅体的分析表明，早商时期当地气候应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且降雨量大；而作为早商时期的都城，人类活动频繁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也较多。因此，当河流暴发洪水，其对城址的威胁很可能比近代更为严重，在面对洪水来临的方向上修建弧形的外郭城墙和城壕，其防洪及排水的作用显然不能忽视，城墙的东半部城垣上还较平均分布有两处拐角，可能是和减缓水势有关。同时，在外郭城垣外侧均不见有同时期的居住遗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墙体外侧为泄洪区的缘故。

2. 由已发现的外郭城墙的西北端再向北，发现有几段断续的夯土城墙，但这几段夯土城墙并不在同一直线上且曲度也不一样。这样一来，外郭城自西北端延伸就发生了分叉。最近有学者指出分叉的外郭城墙可能存在误判，但商城外郭城墙的确在此存在变化，地点就在“老坟岗”一带。这一区域是汉唐至近代，金水河改道并被引入护城河的关键地段，



郑州商城城市水利系统示意（刘亦方等 2022）

现今金水河基本也是在这一附近发生拐折的。由此可见，这些不同曲度的夯土墙及相应城壕的设置，应该与后代对城址西侧河流（现今金水河）的利用有明显的关联。

3. 除了防洪的功能外，在外郭南城墙上还发现有引水入城的通道，并有相应的沟渠与之相连。引入城内的水流则与内城所发现的沟渠设施一并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给排水系统……

现今熊耳河流经城址南部地区的河道则是在这一时期城南部的沟渠系统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二里岗早商时期人们对于金水河的开发则充分利用了城址西侧的岗地形势，现今的“老坟岗”一带在当时乃至后来一直都是人们将河流引入城区的关键地点。在郑州商城郭城以及内城应存在相应的供水设施与引入内城区的水流以及城东部的湖沼区共同形成一个完善的给排水系统。目前在内城已经发现有沟渠、水池、输水涵洞等遗迹，即为这一阶段商城给排水系统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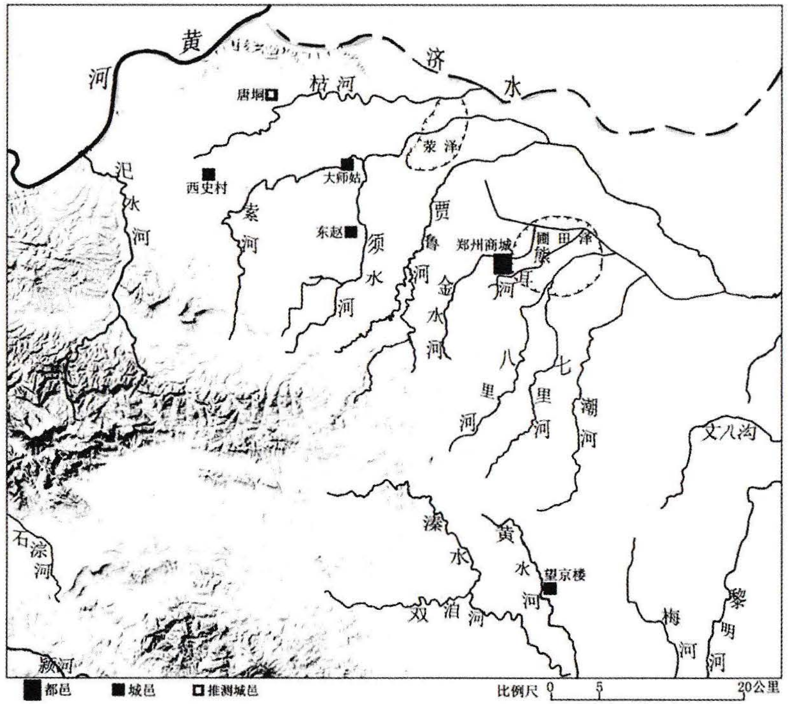
在城市外围修筑封闭的环形护城堤是古代城市防治水患的重要措施之一，普遍见于宋、金以后的黄泛平原。环形护城堤作为单纯的防洪设施，虽然在平面形态、建造方法上与城墙有相似之处，却与城郭存在本质区别。（刘天歌 2022）而郑州恰处于黄泛平原大三角洲的顶端，郑州商城的半弧形“外城”，或许就是这类环形护城堤的前身。

大首都圈与“王畿”

地处西南部、具有防洪分流功能的半弧形外城，与东北部连片的巨型湖沼，共同拱卫起了面积 10 余平方千米的郑州商城中心区（河南省所 2001），或说超过 13 平方千米（秦文生等 2015），或测定外郭城及手工业作坊、墓葬区等重要遗存的分布

范围达 15 平方千米（李维明 2012）。但当时的“卫星”聚落的分布并不限于这个区域，而是向外做更大范围的铺展，形成庞大的“首都圈”。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考古界一般的提法是，郑州旧城内外发现商代文化遗存的面积达 25 平方千米。（安志敏 1954，邹衡 1956，河南省所 2001）李维明在系统梳理相关考古发现和数据的基础上指出，经验算，所述区域约 11—19 平方千米，不



郑州商城附近的水系与城邑（侯卫东 2020）

足 25 平方千米。他进而将郑州商文化遗址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划分为 4 个小区域：东南方向，东自大燕庄一线，西、北至弓庄东一线，南在曹古寺一线，分布范围约 24.5 平方千米；郑州商城内外，东起凤凰台一线，西至西陈庄，南近陇海铁路，北至任砦，分布范围约 17.8 平方千米；西部，东自碧沙岗一线，西至宋庄一线，南在齐礼阎，北至董寨，分布范围约 25 平方千米；西北部，东在关庄一线，西至岗崔一线，南在宋庄一线，北至小双桥，分布范围约 92.8 平方千米。4 个小区域商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之和，可得郑州商文化遗址相对集中分布范围约 160 平方千米。（李维明 2012）

郑州商城周围半径约 40 千米的范围内，同时期的聚落非常密集，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最为集中，相当于后世所谓的“王畿”，主要包括郑州市区及西方的荥阳地区、南方的新郑北部、东方的中牟西部。（侯卫东 2018）二里岗文化时期，前述新郑望京楼城邑、荥阳大师姑城邑、荥阳西史村城邑还都存在并续有增建或改造，此外还有新出现的荥阳唐垌城邑（郑州市院等 2016）、郑州梁湖城邑（信应君 2016）。其中，望京楼城邑、西史村城邑和荥阳高村寺、中牟黄店（赵新来 1980）等地或发现了最早的一批随葬青铜礼容器的高规格墓葬，或有青铜礼容器出土。

郊外大邑小双桥

这里要着重提及的是郑州西北郊的小双桥遗址。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北 20 千米的索须河畔，地处邙山向南延伸的余脉尽头，东北部有古荥泽。发掘报告曾推定其面积“不少于 144 万平方米”。该聚落延续时间较短，遗存主要属二里岗文化的最后阶段（也称白家庄期）。（河南省所 2012）关于小双桥遗址的面积估定，较新的提法有 300 万平方米（李素婷 2016）、400—500 万平方米（袁广阔 2023）、近 600 万平方米（张家强 2012）和至少有 600 万平方米（宋国定 2022）诸说。但多次发掘表明，“小双桥商代遗址中应该存在商文化的空白地带”（河南省院等 2019）。

小双桥遗址中心区域东部有一座被称为“周勃墓”的高台，近年经钻探调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末期的夯土台基，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其原高至少应在 9 米以上。在夯土台基的顶部，发现了大量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夯土结构和“木骨”柱网结构等，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三层高台建筑，如是，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高台建筑之一。（李标标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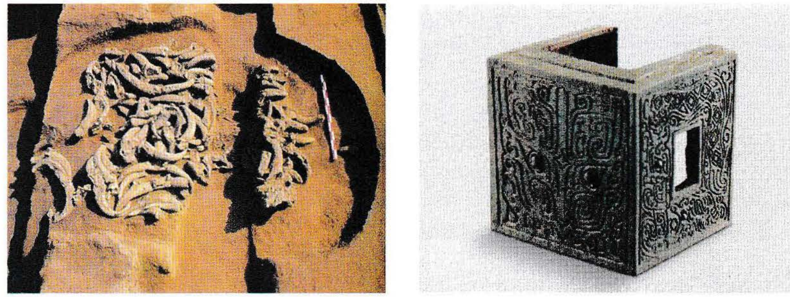
在遗址的中心区，已揭露数处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包括牲祭坑、人祭坑在内的 20 余处祭祀遗存及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存。祭祀坑可分为综合祭祀坑、牛头坑、牛角坑、牛头（角）器物坑和器物坑等多种。遗址中还发现了较多的与冶铸有关的灰坑，



鸟瞰小双桥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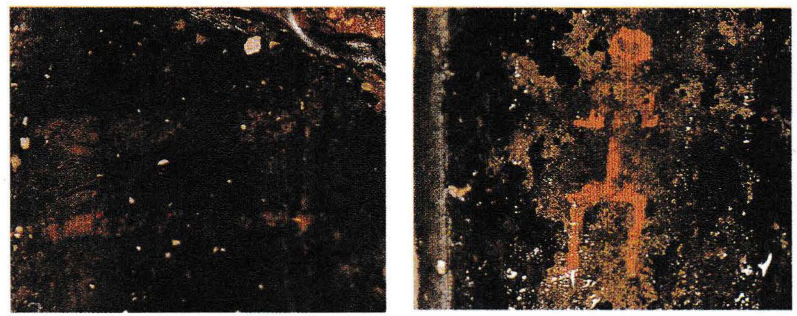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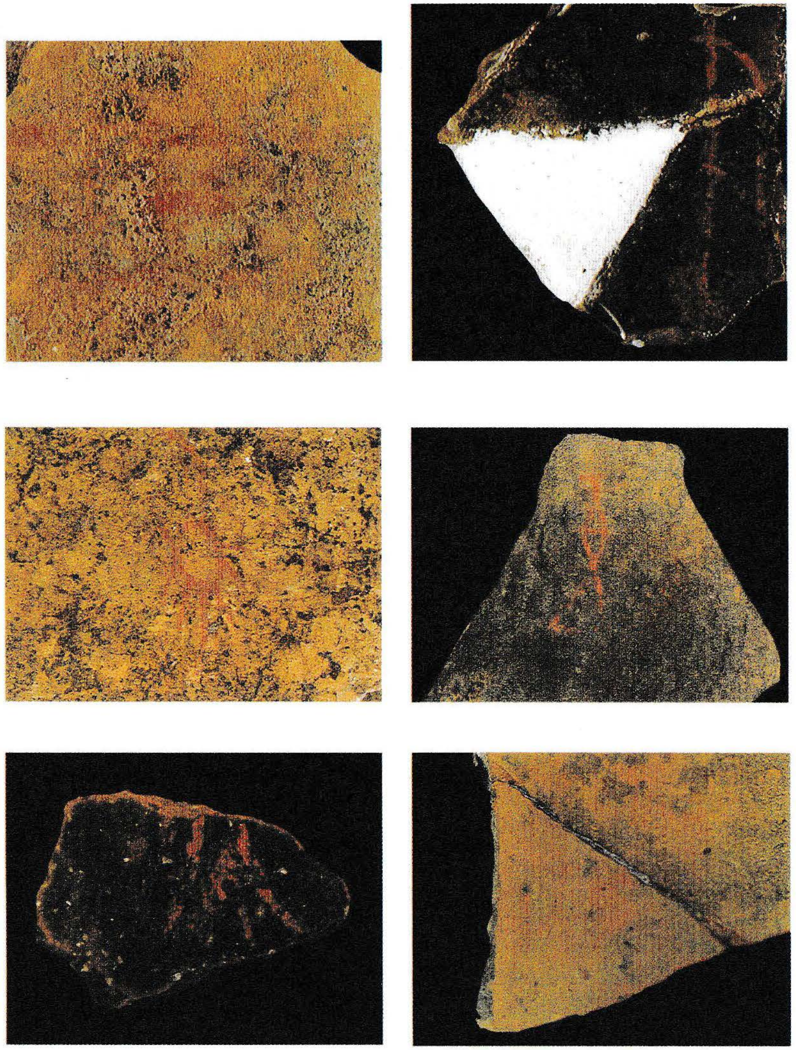
“周勃墓”夯土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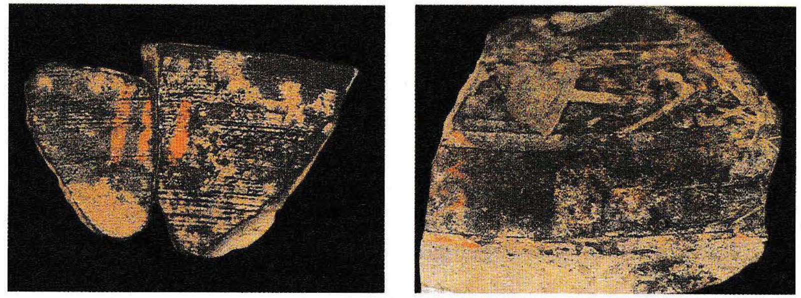


小双桥遗址祭祀坑、青铜建筑构件

其中有黏附铜汁的熔炉壁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烧土颗粒和陶外范残块等。大型夯土台基西侧附近的壕沟内曾发现大型青铜建筑饰件，显示出不凡的规格。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铜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金箔、卜骨等珍品。铜器除建筑饰件外，还有爵、斝等容器和镞等兵器。石器有磬和方孔器等，后者可能与山东及其附近地区的岳石文化有关。出土遗物中与殷墟朱书文字和甲骨文一脉相承的朱书陶文尤为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宋国定 2003）







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宋国定 2003）

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问题，有的学者鉴于该遗址范围较大，规格较高，内涵丰富，在年代上与郑州商城的衰落年代相当且早于安阳殷墟，认为它应是商王仲（中）丁所迁隞都。（陈旭 1991、1995，邹衡 1998）此后多有学者认可这一推断。也有学者认为，小双桥遗址距郑州颇近，存在大量的祭祀坑和祭祀用品，但缺乏王都所应有的其他生活遗存；且白家庄期郑州商城仍有宫殿建筑等重要遗存，它和小双桥遗址之间并无明显的替代关系，应属郑州商城的离宫别馆、宗庙遗址或郑州商城使用期后段商王室的祭祀场所。（张国硕 1992，裴明相 1996，杨育彬等 1998）有学者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论定若指认小双桥遗址为隞都，与古文献所载隞山、隞都的地理位置不相吻合。（陈隆文 2021）就现有材料而言，小双桥遗址面积较郑州商城显然尚小，郑州商城在其存在时期也并未完全废弃（如三座青铜器

窖藏坑和内城新发现的出土“金面罩”等器物的高等级墓葬，详后），因而是否可确认其为商王朝的都邑，尚难遽断。对小双桥遗址性质的最终确认，尚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的进展。

三 家当大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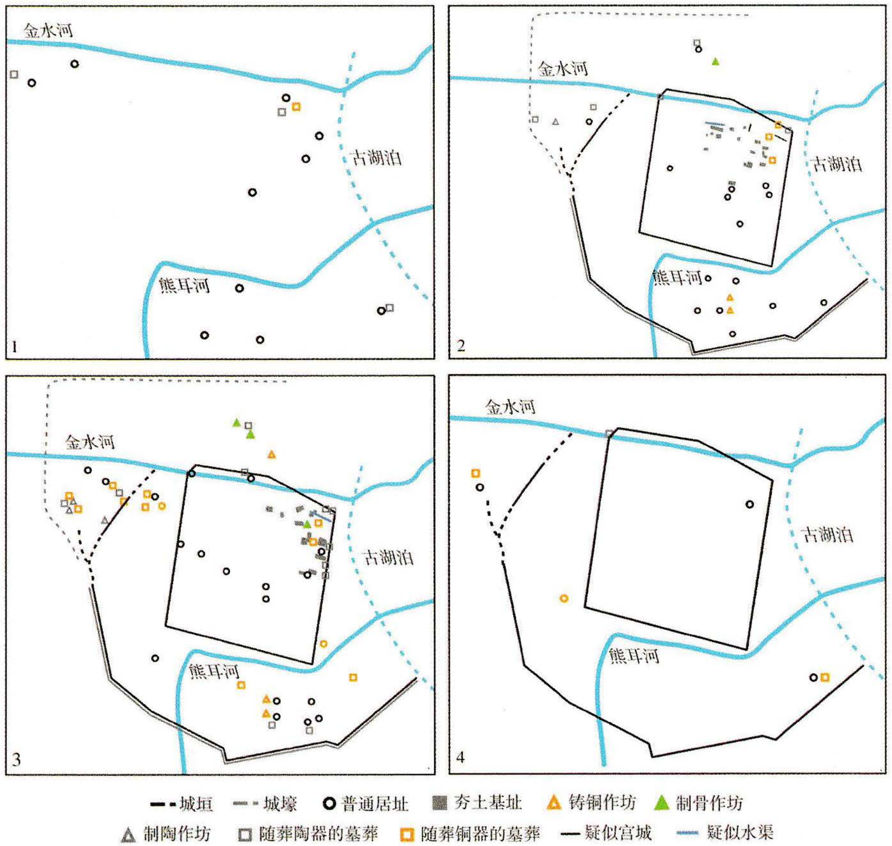
大都格局的形成

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之末，郑州商城内城的四面城垣及外城城垣的多处地段均已开始建筑；在内城的东北部出现少量夯土基址、夯土墙基和随葬青铜器的墓，表明这一带应是当时统治者或贵族的活动区域。城内东部、城北的紫荆山北、城西的铭功路西侧、人民公园和城南的二里岗一带均发现有此期的小型房址、墓葬等遗存。这一时期是郑州商城的始建期，已经初步具备若干高等级聚落的要素。

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内城和外城均已筑好投入使用，并形成了若干功能分区。城内东北部的宫殿区夯土台基增多，出现多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周边还发现了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位于内城以南、内外城之间的南关外铸铜作坊、内城以北的紫荆山北制骨作坊，以及内城以西的铭功路制陶作坊也已开始使用；这一时期续有铜器墓存在。遗存的分布遍布内城和内、外城之间，表明此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开始进入兴盛期，大型都邑的格局初步形成。

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内、外城垣和早期的夯土建筑仍在继

续使用，在城内东北部又新建、改建了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宫殿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其内还建有大型石砌蓄水池、石砌供水管道、木结构框架的水井等，形成完备的供水系统。原有的铸铜、



郑州都邑的布局演变（孙卓 2018A）

1. 二里岗下层第一期　2. 二里岗下层第二期　3. 二里岗上层第一期　4. 二里岗上层第二期

制陶和制骨作坊继续使用，并在北城垣外的紫荆山新建了一座铸铜作坊；同时，在内城的内外多个地点发现铜器墓。此期应是郑州商城的鼎盛期。

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内城的宫殿区还有夯土建筑遗存，已揭露出的一段东西向的夯土墙，长度逾百米。在内城西垣北段外的张寨南街、西垣南段外侧的南顺城街和东南城角外的原向阳回族食品厂基建工地（现东大街与城东路交叉口西南）均发现有此期的铜器窖藏坑，内城外的白家庄（现顺河路与城东路交叉口东南一带）、铭功路、北二七路等地则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铜器墓。可知此期的聚落仍作为都邑存在，有商王室和贵族在此活动，但已开始趋于衰落。两处铸铜作坊至迟在此期偏晚阶段废弃。与此同时，郑州商城西北郊的小双桥一带，开始出现规格较高的超大型遗址。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阶段，郑州商城已人烟稀少，人民公园等处曾发现有小型聚落遗址。（许宏 2021B）

从普通聚落群迅速转变为功能区划较严整的中心城市，再到核心区域废弃、遗存分布零散，复又回归到一般聚落，这就是郑州商城城市格局演变的大致经纬。

内城区的城建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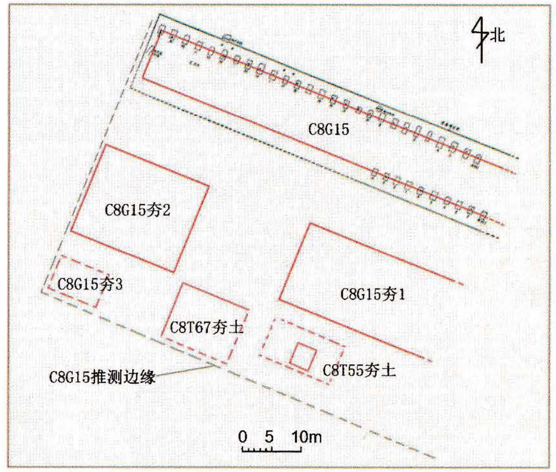
除内、外城壕形成的防御、排水等大型城建工程外，我们还可以从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墙基沟壕和给排水设施等侧面来窥

知郑州商城城建规划的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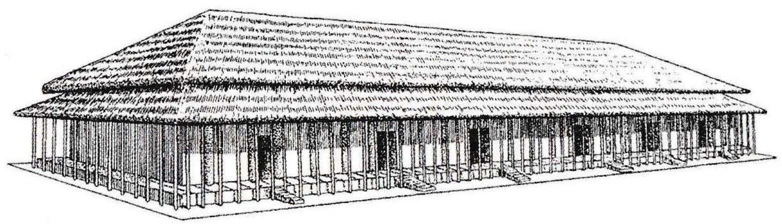
内城东北部一带，在东西约 800 米，南北约 500 米，总计约 40 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集中发现了数十座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不乏规模较大和形制结构较为复杂者，发掘者推断这一带应属宫殿区（河南省所 2001）。由于该区域被其后的历代遗存破坏严重，又被现郑州市区压占，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其具体布局情况难以确认。就现有材料可知，该区域最早的建筑可上溯至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此后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持续使用，并有重建、新建的现象。

建筑基址规模宏大。例如，位于东里路的夯土基址 C8F15，应属大型建筑的主殿基址，基址东西长 65 米以上（东端未发掘），南北宽 13.6 米，其上残留两排南北对称、东西成行的柱础坑共 37 个，推测应有数个房间。柱坑的外侧还有较小的柱洞，应为回廊廊柱的残迹。在其南侧还有若干规模稍小的建筑基址，或属与其有直接关联的一个建筑组群，是郑州商城形成阶段的最早一批建筑。从残存遗迹可知，有些夯土基址属于四合院式建筑。（河南省所 2001，侯卫东 2014）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该区域内发现一段长度为 80 米、基槽宽 7—8 米的“夯土墙基”（W22），发掘者推测“可能是郑州商城宫墙的一部分”（河南省所 1993A）；90 年代发掘了同一道墙的另外一段，由是，该墙的已知长度达 100 余米，



大型建筑 C8G15 及相关建筑平面布局复原（侯卫东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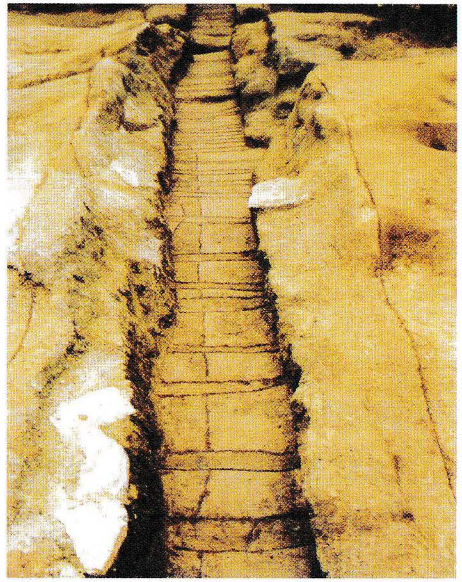
C8G15 复原示意

后来的发掘者认为“它不大可能是宫城的护卫墙”，提示是否为大城建成前一座小城的城墙（河南省所 2000）。另有学者推断“它可能为一段早期城墙基础或大型夯土基址的回廊部分”，始建年代早于二里岗文化（袁广阔 2003）。鉴于这段墙基位于宫殿区夯土基址群内，不能排除属于“宫殿区内建筑群组之间的界墙”（河南省所 1993B）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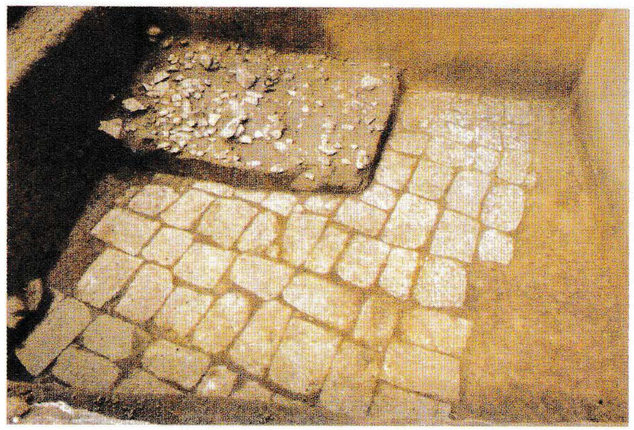
该区域中部一带，发现石砌水池和水渠遗迹。水池为长方形，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20米，池壁及底用料姜石铺垫，池壁用卵石加固，水池底部铺设较规整的石板，应属蓄水设施。（河南省所1993B）水池的东南侧，发现一段由石板垒砌的暗渠，已发掘的部分长30余米，暗渠剖面近方形，宽、高均约1.5米。水渠与上述水池"似在西北至东南的一条直线上"，可能属同一组水利设施。该遗迹由水道与汲水井两部分构成，水井以8米的间距均匀分布在水道上，井的下口与水道相通。（河南省所2001）蓄水池、水道与水井，共同构成了完善的供水系统。

在该区域西北部，还发掘出一段东西向的大壕沟。已探明的部分长80余米，壕沟开挖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延续使用到晚期早段。发掘者推断"很可能与商代宫殿区西北角北部边沿处的防御设施有关"（河南省所2001）。类似的沟渠应同时具有排水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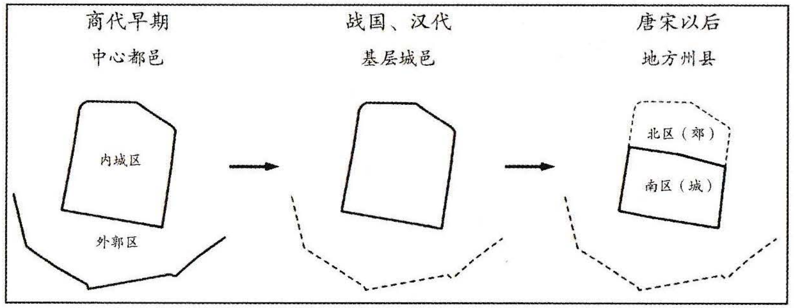
有学者从郑州历代城市形态沿革的视角出发，指出受不同阶段城市营建行为的影响，郑州商城内城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内城北区属于晚期城市的郊区，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建筑遗存反而得以保留，也因此被认为是宫殿区或宫城所在。内城南区是晚期郑州城市反复营建的区域，二里岗文化时期遗存残损严重，其中北部一带作为唐宋以后的衙署选址区，改建程度最高，该区域发现有二里岗文化时期夯土层，表明其在郑州商城中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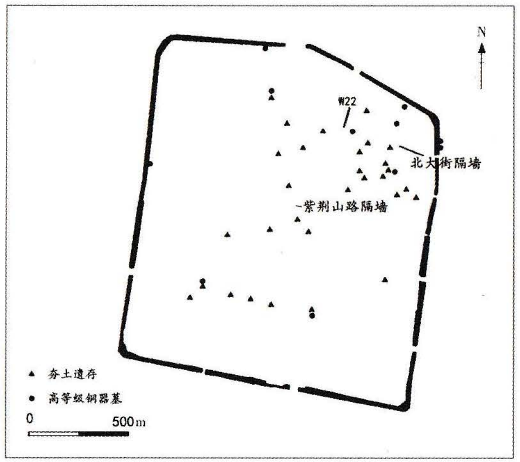
石砌输水管道



石板蓄水池（局部）



郑州古代城市范围变迁（刘亦方等 2021）



郑州商城内城居葬遗存分布示意（刘亦方等 2021）

要性。通过与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的布局比较，他们认为当时的宫城选址应位于城内相对居中的位置，与墓地代表的礼仪空间相分离。因此认为郑州商城内城东北部已揭示的“宫殿区”作为高等级贵族居住区，并非宫殿区的全部。内城中部一带没有墓葬发现的区域，应更符合此期的宫城规划。（刘亦方等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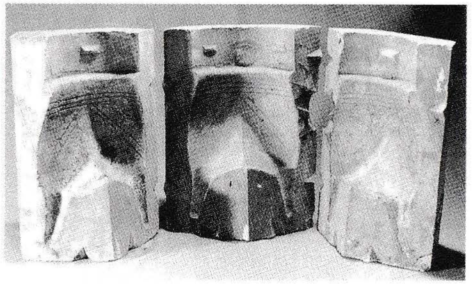
“龙头企业”铸铜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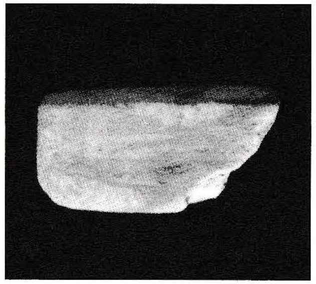
前已述及，约当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位于内城以南、内外城之间的南关外铸铜作坊已开始使用，沿用到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该作坊遗址位于内城南城墙中部以外约 700 米处的微高地上，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应是二里岗国家最大的铸铜工业生产基地。

南关外铸铜遗址分为南、北两个铸造区，其外都应有壕沟环绕。已知与铸铜有关的遗迹遗物，计有白灰面地坪残片、铜锈地面残片、铸铜土台、壕沟、储沙坑、水井和各类遗迹、地层堆填遗物中夹杂的铜矿石、炼渣、熔铜炉残壁、炼铜陶坩埚碎块、铸造铜器的各种残陶范、残铜器片（块）、铜锈块、黏结有铜渣的红烧土块、木炭、砺石等。

在数百件各种陶范和范芯中，能够看出所铸青铜器的器类，计有容器类的鬲、鼎、斝、爵、觚、罍、盆；生产工具类的镢、斧、刀、凿、锥、铚；武器类的镞、戈；杂器类的圆泡形器和棍（或簪）等。从中可推知铜器的制作工艺，都是先用陶泥制作成陶模，然后再用陶模翻制成陶范。铸造各种青铜器所用陶范块的数量多少是依据所铸青铜器的形制而定的。此外，还发现有鬲、斝、镢、凿、刀、镞、锥等残铜器。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的投入使用，与二里头都邑铸铜作坊的废止大致前后相继。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





南关外铸铜作坊出土的鬲范模型（左）和戈范（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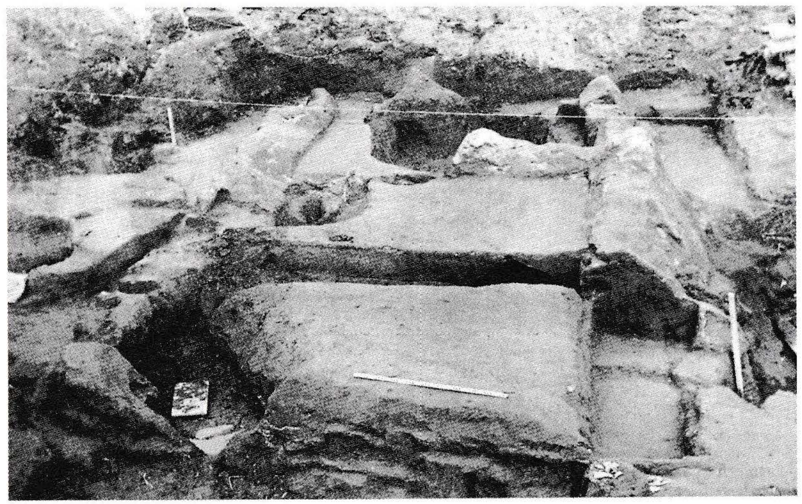
的铸铜作坊中，即发现用于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表明青铜容器是在都邑内铸造的。这是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惯常做法，高精尖的青铜礼容器铸造技术为王权所独占。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不能排除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是有计划地由二里头都邑迁移而来的可能性。研究表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青铜器器类、形制和铸造技术都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朱凤瀚 2009）

与此同时，位于内城北城墙中部之外约 200 米处，又新兴建了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这里发掘出了与铸铜有关的铸造场地、房基、灰坑等遗迹和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如铜矿石、铅块、熔铜陶坩埚、铜炼渣、绿锈土、陶范、残铜器、木炭、砺石等。发掘出的 100 余块陶范中，以刀范的数量最多，镞范次之，另有车轴头范和铸造容器的花纹残范，以及无法识别的范芯等。铜器有钺、镞、钩、簪等。但这处作坊主要制作小型工具和武器类，这显示了两处作坊在铸铜生产上一定的分

工和层级。

总体而言，两处铸铜作坊的铸铜技术已达到相当熟练的水平。到了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率先投入生产的南关外铸铜作坊和新建的紫荆山北铸铜作坊使得生产能力达到极盛。从陶范所铸铜器的品种看，工具范最多，容器范次之，兵器范再次之。（河南省所 2001）

就两处作坊遗址的性质看，它们都是进行熔铜浇铸和成品处理环节的工作场所，而不承担陶范等生产环节的工作。这类面积超大、地位重要的核心生产作坊，可以视为当时的“国企”或“龙头企业”。此外，郑州商城还有其他 3 处可能与铸铜生产活



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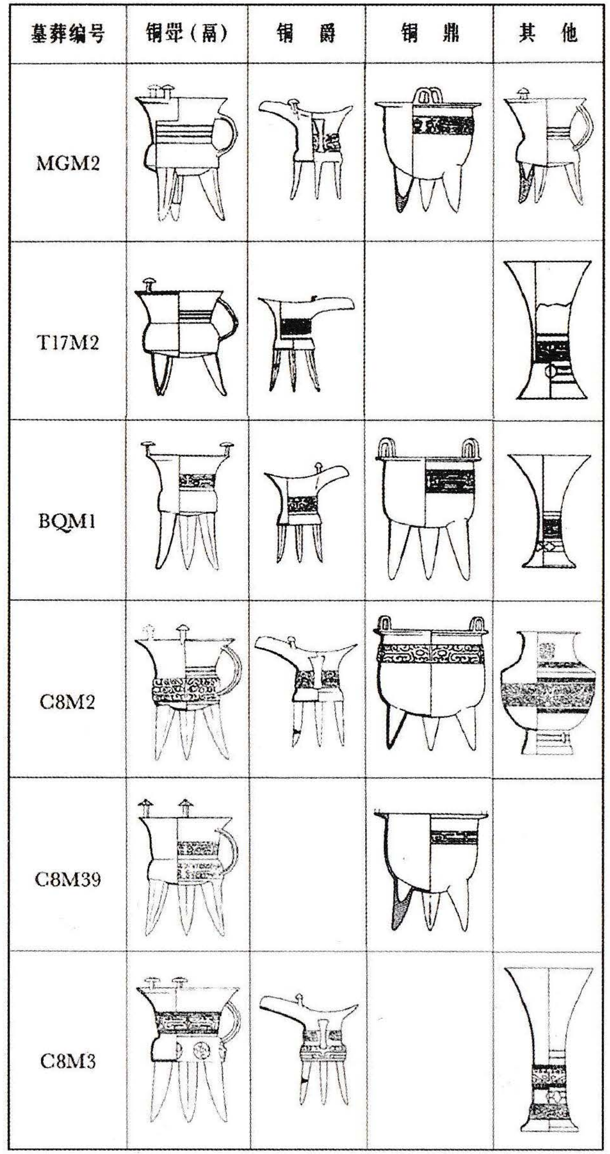
动相关的地点，使用年代均在二里岗文化早期。从这些遗存的分布上看，南关外和紫荆山北两处大规模的铸铜作坊与2处有可能作为铸铜生产活动的地点都在内、外城之间，仅1处生产活动地点位于内城以内的宫殿区核心区域。这表明当时已设立多个有生产任务区别的铸铜作坊。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呈分散布局，但在宫殿区内多保留有一个铸造点，这反映出铸铜工业逐步发展，已不再需要像二里头都邑那样用围垣来刻意保护，但可能在宫殿区设置王室直控的生产场所。郑州商城所发现的青铜器，与南关外、紫荆山北铸铜作坊所见以工具和兵器为主的陶范种类数量比例不相符，因而不排除还存在另外的铸造工坊的可能性。（常怀颖 2013、2018）

南关外和紫荆山北两处大型铸铜作坊在二里岗文化晚期偏晚阶段才告废弃。

随葬铜器的礼制密码

依已刊布的资料，截至约2012年，郑州商城已发掘的墓葬总数约150座，实际发掘数量应该已超过200座。其中，出土铜器的墓有26座，在整个商周时期墓葬等级序列（北大商周组1979）中仅属于中小型墓。（王炜 2013）

在这26座铜器墓中，规格较高，被称为中型墓的墓葬仅有3座，墓室面积在2.5—4平方米，随葬2套觚、爵、斝，这是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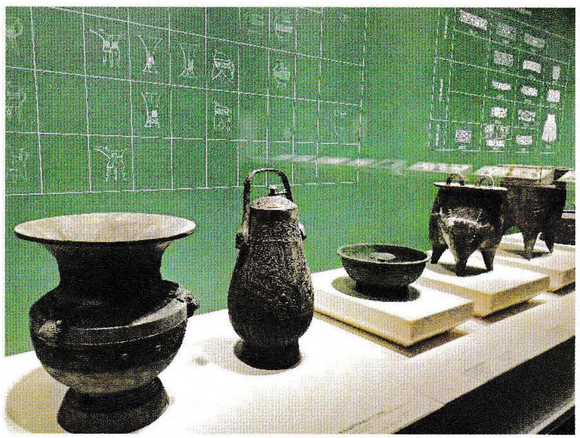


郑州二里岗文化墓葬随葬铜器举例（依王炜2013改绘）

州商城遗址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墓主身份很可能是中层贵族。一座墓的随葬品为爵、斝、盉组合，爵有3件，且伴出有玉器和海贝，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较高，当时以礼器的数量和种类彰显身份的规制应已形成。

其余23座，占墓葬总数的88%，均为小型墓，墓室面积多在1—2.5平方米，随葬铜器以觚、爵为主要组合。小型青铜器墓，又可分为三类：一类墓多随葬一套铜觚、爵、斝，基本不见陶器；二类墓多随葬铜觚、爵、斝中的一种，用陶器补齐一套；三类墓只随葬铜兵器或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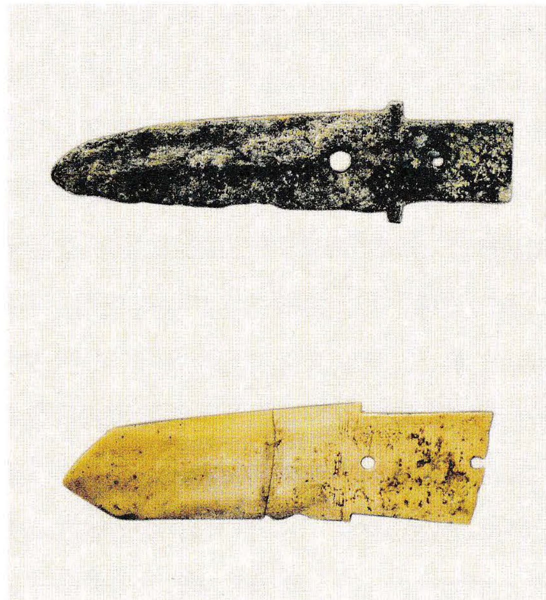
各等级墓葬在随葬器物上的差别清楚地显示出铜器的种类和数量是墓主等级和身份最重要的物化体现：中低级贵族的墓葬随葬一套或多套铜酒器；以铜酒器和陶酒器配合成套的墓葬应属于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铜器陈列

贵族中等级最低者；等级再低的只能随葬铜兵器、工具，墓主身份应已不是贵族。只随葬陶器的墓葬则属于普通平民。

从铜器墓的发现线索看，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墓葬出土铜器有鬲、爵、盉、戈等4种，从器类到形制都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早期晚段的铜器有斝、爵、戈、刀、镞等5种，此时具有浓郁二里头文化色彩的铜盉已基本不见，爵和斝成为铜酒器的核心组合，器形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差别明显；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的铜器有鼎、斝、觚、爵、戈、刀、簪等7种，铜觚在此阶段出现并成为铜酒器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器类，中型墓的出现意味



郑州二里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青铜戈、玉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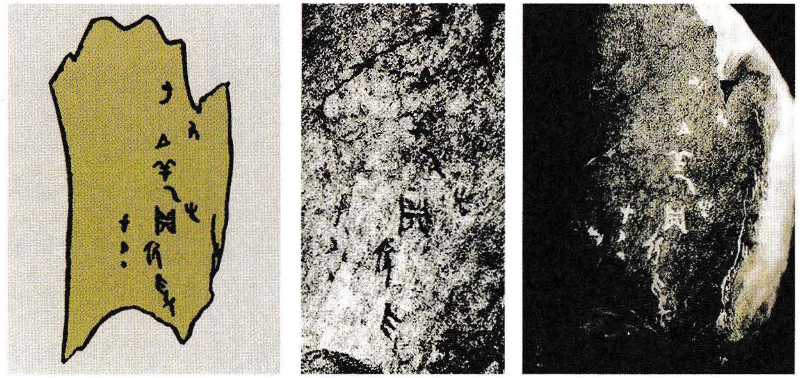
着以铜礼器（特别是爵、斝、觚等酒器）的套数来体现贵族等级和身份的制度已初步确立；晚期晚段铜器有鼎、尊、鬲、罍、簋、盘、斝、觚、爵、盂、钺、戈、刀、锯、镢等 15 种。与此相应，铜器纹饰也显示出相似的发展线索，二里岗文化早期的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饰连珠纹等；兽面纹等复杂纹饰在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开始出现并迅速占据主流，直至晚期晚段，且纹饰主体不断多样、图案不断复杂、面积不断扩大。急剧增加的器类和纹饰的复杂化，都充分显示出青铜工艺趋向成熟。（王炜 2013）

近年，关于郑州商城的墓葬包括铜器墓又有若干新的发现（详后），因最新发现目前仅见于新闻报道，还无法做详细的梳理，上述分析所提供的整体框架仍大致成立。

甲骨文之前的卜辞

在考古学家眼里，二里岗文化是后来的殷墟文化的直接前身。而殷墟文化最大的一个令人瞩目之处，就是甲骨文的发现。那么，二里岗文化中有类似的文字材料出现吗？这是最令学界关注的。幸运的是，二里岗文化发现没几年，这类文字就被发现了，不太理想的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掘品，而只能归为采集品。

1953 年 4 月，河南省文管会（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城区以南的二里岗西北部发掘区外被推土机翻动的土上，拾得一片刻字的牛肋骨。上文所说的采集品，



二里岗出土的牛肋骨刻辞

就是指的这类非经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已从其原生环境“移位”的遗物，由于无法确认它具体的出土情况（包括地层关系和共存器物特征等），所以难以给出确切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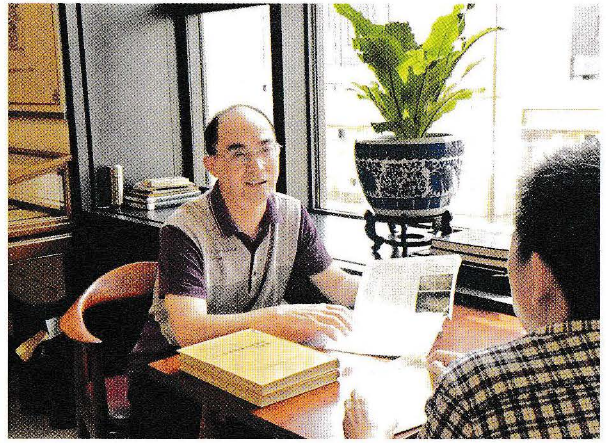
这片肋骨两端缺失，残长约 7.3 厘米，在鼓起的弧面上有三竖行刻辞。如此宝贝当然要慎重对待，于是交来郑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副所长带回北京，请著名学者陈梦家做了鉴定。陈梦家在提交发掘方的“郑州二里岗出土‘习刻字骨’说明”中指出：

> 这是在一片肋骨，刻着练习契刻卜辞的十个字。占卜只用肩胛骨，不用肋骨。……这片肋骨所刻的字，和小屯殷代晚期的卜辞近似，可能也属于这个时期。它的出土，启示着黄河以南很有可能发现殷代的刻辞卜骨。

当年9月，在附近探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灰层内又发现一块牛肱骨的关节部分，上刻一字。（赵全嘏 1953，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裴明相 1985）

如果是与殷墟甲骨文同时期的习刻字骨，那只是一则普通的发现。此后李学勤等学者均依陈梦家的意见，认为此字骨应属殷墟时期（李学勤 1956）。最早将其归为“商代早期”的，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北大商周组 1979），执笔编写者为邹衡。参与当时发掘的裴明相 1985 年撰文，指出字骨所在的“灰层内夹杂有二里岗期和汉、唐以后的遗物，但绝无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即安阳殷墟晚期遗存。同时在铲土机削平后的地面上遗留有商代二里岗期的灰坑和灰层”，而骨料的整治和文字刻划较殷墟甲骨都有一定的原始性，因而提出“郑州字骨的时代，应属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裴明相 1985）。此后研究者大多转而同意这一断代意见。

2003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研究员发现这片肋骨上所存刻辞至少残留 11 个字，而这个被陈梦家以来既往学者疏略的字应释为“乇”，“乇土”应指郑州早期商都举行祭社活动的场所，这应与殷墟卜辞中的“宅土（社）”和“亳土（社）”具有内在的联系。（李维明 2003）2005 年，著名古文字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丸道雄在“纪念郑州商城发现 50 周年座谈会”上，对李维明“卜问在亳社献羊的可否”的释读意见表示认同，指出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研究员（李秀娜 摄）

这就提示了这件字骨不是“习字骨”。而郑州商城应名为“郑州亳城”。（松丸道雄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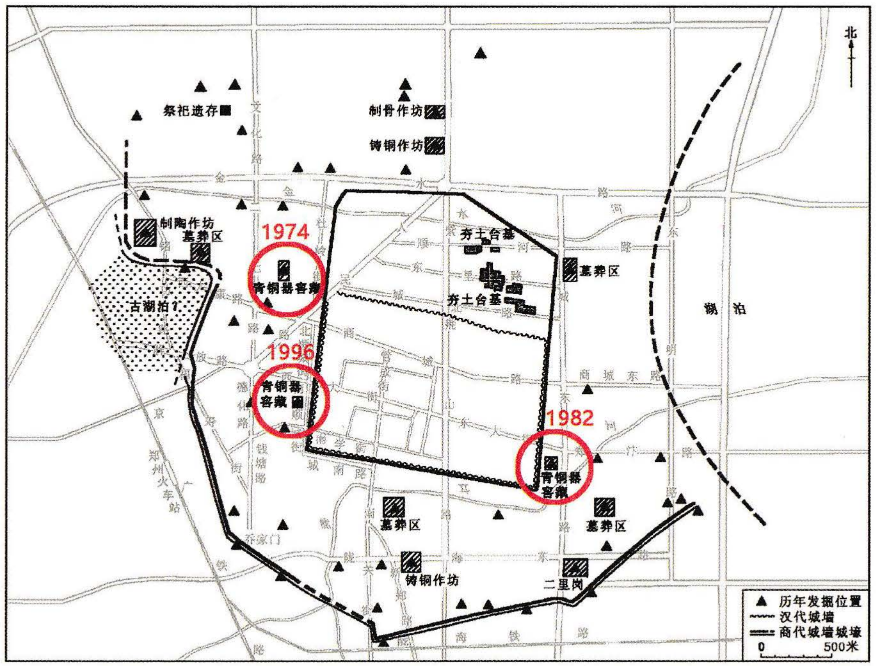
关于这第 11 个字的有无，以及是否可释为“乇”也即“亳”，进而是否郑州商城与商汤都亳有关，都是极具争议的话题，容后文详述。这条卜辞可分为上、下两辞，记录一次在“土（社）”举行用羊祭祀的活动，无论如何，参与讨论的各方就此可达成基本共识。另据统计，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骨刻字符材料不少于 16 件，见于郑州商城内城北墙外、内城内偏东南部及内城南部与外城之间。（李维明 2009）

窖藏重器看王权

到目前为止，在郑州商城范围内，还没有发现像安阳殷墟王

陵区那样的王级大墓，真正能显现“王气”的，要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现的3座窖藏坑内出土的青铜大方鼎等重器。这3处窖藏坑都位于内城城墙外的较高地带，其中2处在西墙外，1处在东南角外。

三个坑分别呈近方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深度均达数米，都应是利用灰坑（窖穴）或水井埋入铜器而形成铜器窖藏坑，但埋藏铜器时应举行了一定的祭祀仪式。三个窖藏坑均出土有



郑州商城3处青铜器窖藏的位置（依许宏2017A、袁广阔2018改绘）

王室重器铜方鼎，共8件，鼎的高度从100厘米到59厘米，依次递减，有如后世的“列鼎”，形成一定的等级规范，同时也暗寓着三坑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三个坑所出方鼎以外的器类基本不共出，而是互为补充，所出器类几乎涵盖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全部青铜器器类。其中出土器物的年代虽略有早晚，但三坑的埋藏年代应都在二里岗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河南省所等1999）

位于内城西垣北段外的张寨南街出土了两件大铜方鼎，即杜岭1号、2号方鼎，2号鼎内还有一件铜鬲。1号方鼎通高100厘米，重达86.4千克；2号方鼎通高87厘米，重约64.25千克。这是迄今所知二里岗文化最大的两件青铜容器，属王室重器，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铜方形器铸件。

位于内城东南角外的原向阳回族食品厂内发现了窖藏铜器13件，其中食器有大方鼎、柱形足大圆鼎、扁足圆鼎，酒器有羊首罍、牛首尊、觚、卣，水器有盘，还有中柱盂。两件大方鼎通高皆为81厘米，重量分别为75千克和52千克。大圆鼎口径52厘米，通高达77厘



杜岭1号方鼎



原向阳回族食品厂内窖藏铜器清理现场

米，重 33 千克，是二里岗文化最大的青铜圆鼎。该器纹饰精美，线条流畅，也颇有王气。

位于内城西垣南段外的南顺城街发现的一处窖藏，利用废弃的水井埋藏了青铜容器 9 件，其中食器有方鼎、簋，酒器有爵、斝，此外还有兵器若干。4 件方鼎大小相次，但似并非同时铸造，最大的一件通高 83 厘米，重 52.9 千克。其中三件与前述两处窖藏出土的方鼎相比，制作简陋。在三处窖藏中，该窖藏的年代最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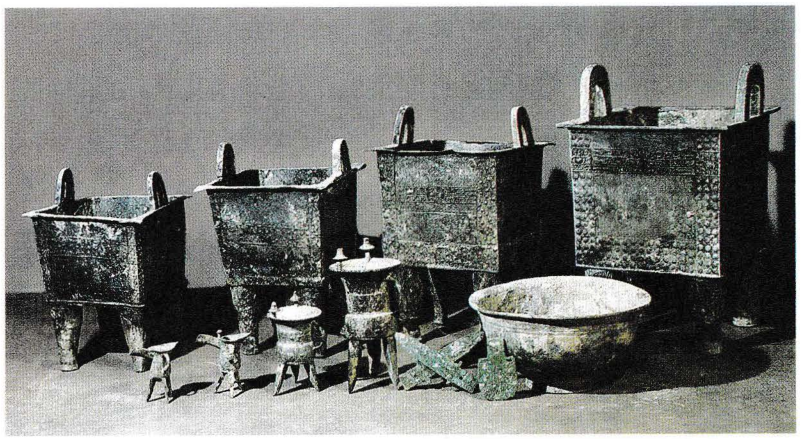
这些窖藏青铜器器类多样，形制复杂，且铸造讲究，纹饰精美。杜岭 1 号大方鼎是迄今所知二里岗时代最大的青铜器，其他器类

如圆鼎、簋、斝等大多数器物也是同类器中最大者。多数青铜器成对出土，或大小有别，或形制近同。其中，方鼎、提梁卣和中柱盂是仅见于窖藏坑而不见于墓葬的青铜容器。这些特点，表明这批青铜器应是当时王室专用的青铜重器，它们可能来源于都城内的宗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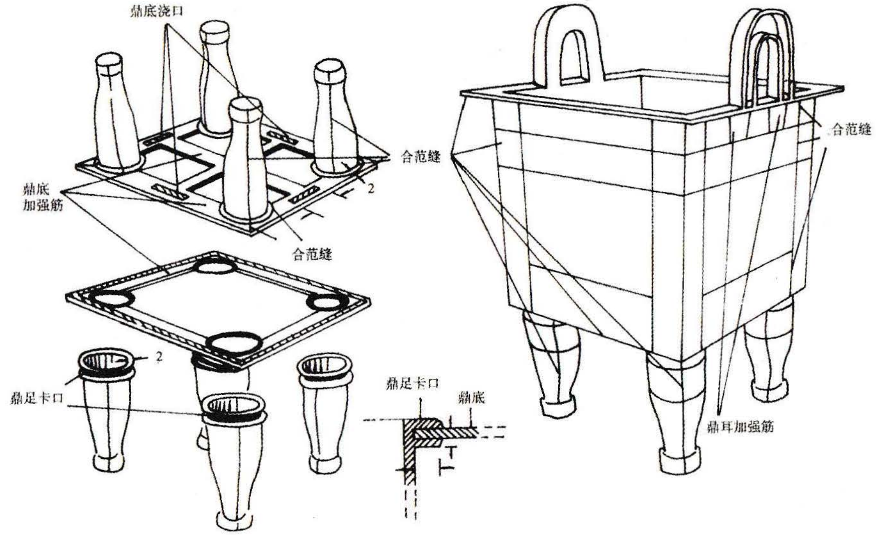
这里所谓的王气，要纵横比较一下，才能有深切的认知。我们看图中的青铜爵、斝之类，与当时的一般贵族墓所出相类，器高在 10 余厘米至 30 余厘米。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也与其类似，颇显单薄，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但仅仅过了约 200 年，作为二里岗文化最大的青铜器，杜岭 1 号大方鼎的器高已达 100 厘米，重达 80 多千克。尽管它与殷墟文化中司（后）母戊大方鼎的器高 133 厘米、重 830 余千克尚有距离，但已可纳入“重器”的范畴。二里岗国家最重要的殖民据点盘龙城，出土了郑州商城以外最大的青铜器群（详后），其中最大的器物是青铜圆鼎，通高 55 厘米，仍远不及郑州商城所出。王权对于青铜重器的独占，由此可见一斑。

据研究，大方鼎是用多范分铸、嵌铸、分次浇铸等多种方法铸造而成的。鼎腹由四块完整的外范铸造，铸鼎时，先铸造留有鼎足位置的腹底，然后把倒置的内范四周合上四块外范，再把铸好的腹底放在内范之上合铸而成，而四个鼎足是倒置嵌铸于鼎底上的。八个方鼎铸造技术的进步程度，与铜鼎由小到大的体量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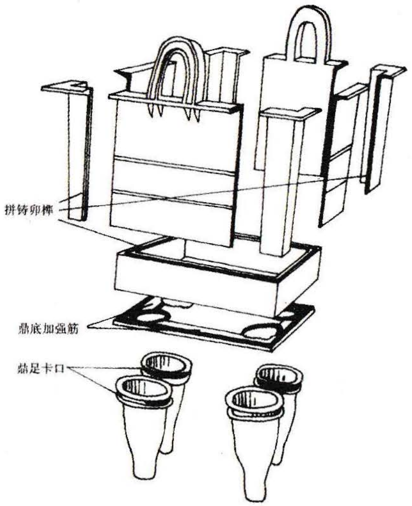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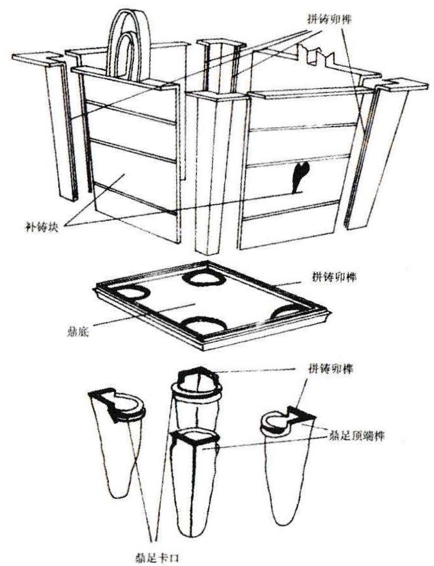
南顺城街窖藏坑及出土青铜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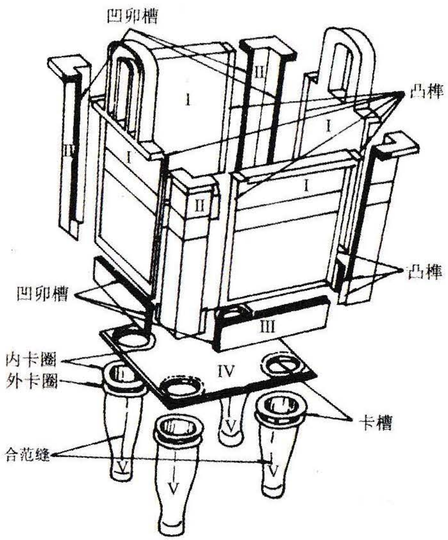
南顺城街 H1 : 1



南顺城街 H1 : 2



向阳回族食品厂 M1 : 4



南顺城街 H1 : 8

郑州窖藏青铜器的铸造（河南省所等 1999）

正比，即最小者最原始，最大者最进步。从最大的鼎鼎腹上的兽面纹与乳钉纹衔接情况看，铸造工序似乎是先整体设计，以花纹为个体，分块制模与翻范，最后组成六大块范合铸起来的。（河南省所等 1999）

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迈向“重器时代”的第一步，而殷墟时代已是典型的“重器时代”，那么二里岗文化在青铜重器制造上的尝试，则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黄铭崇 2015A）

四　细说最新发现

如此“富”墓，不在都内？

2022 年 9 月 16 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披露了 2021 年至 2022 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书院街发现并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的新成果，其中包括著名的出有“金覆面”的 2 号墓（李瑞 2022，桂娟等 2022），一时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巨大关注。该区域距郑州商城南城墙约 200 米，距东城墙约 450 米，属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2 号墓等 3 座随葬有青铜器的墓，被推定为属“白家庄期”。“白家庄期”也即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已如前述。

既往的认识大致可总括为：到了这一阶段，郑州商城遗存的数量急剧下降，整个聚落呈现衰落态势。由于内、外城垣，以及内城垣东北部的夯土基址遭到了废弃，城市不再像以往那样围绕城垣布局，而成为几个零散的聚落点。与高等级人群活动相关的铸铜生产也不见于这一时期。在内城以外的铭功路、二里岗发现了这一时期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几处窖藏发现的部分青铜器亦晚至此时，表明该时期的聚落仍存在高等级人群活动的迹象。然而，城市内部缺乏高等级的中心，手工业作坊迅速消亡，不同地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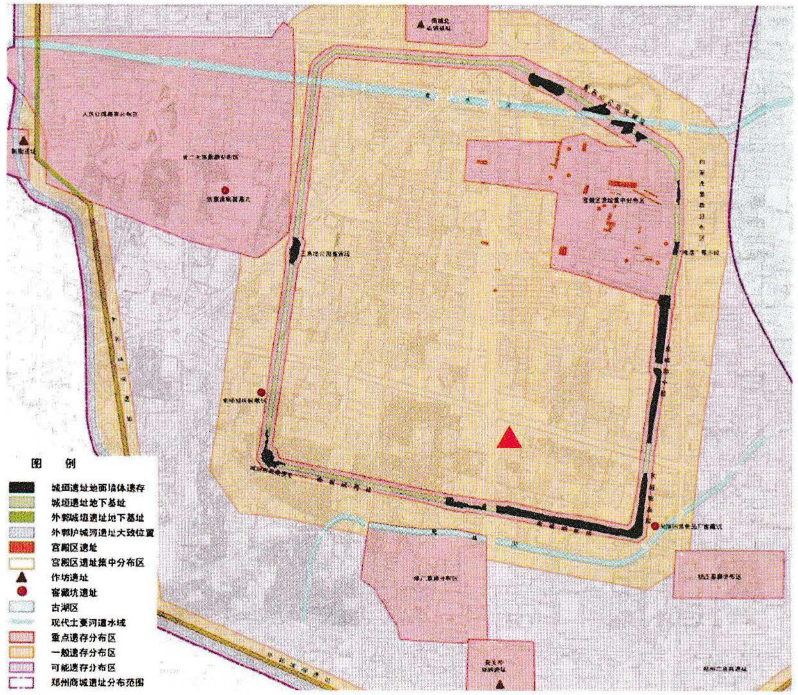
未见功能相对单一的区划布局，这些都表明城市功能的逐步退化。与此相呼应的是，体现高等级社会活动和部分手工业生产的遗存集中出现在西北部的小双桥遗址。郑州商城衰落之后，聚落的中心开始向西北转移，原先城市的核心地带逐步变成了边缘地区。（孙卓 2018A，图见 46 页“郑州都邑的布局演变”）

这一发生于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的现象，被不少学者解释为商王仲（中）丁由郑州的亳都迁至 20 千米以外的小双桥隞都。（陈旭 1991、1995，邹衡 1998）发掘者在正式考古报告中也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就整个小双桥遗址而言，其宏大的规模，重要且高规格的文化内涵等都是除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洹北商城



发掘区位于内城近东南角处（紫荆山路以东、书院街以北区域）

和安阳殷墟以外的其他商代前期遗址所无法比拟的，结合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征伐蓝夷这种特定历史事件在遗址中的体现等，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小双桥遗址即商王仲（中）丁所迁之隞都”（河南省所 2012）。但即便是坚持二里岗文化末期商都迁移至小双桥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郑州商城彼时仍存在高等级人群活动的迹象，至于出土大型铜方鼎等的窖藏坑，或被解释为与在故



书院街墓葬所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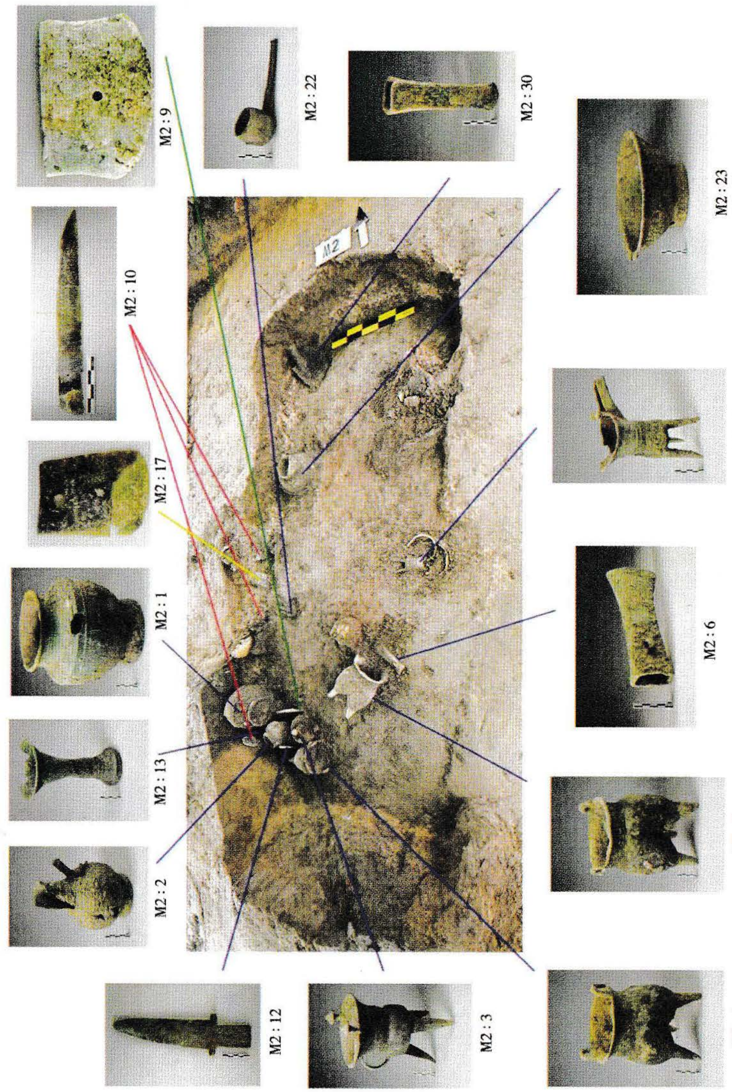
都的祭祀等活动有关。无论如何，昭示王权和二里岗青铜文明最高水准的器物仍在郑州商城范围内现身，这是令人瞩目的。

据统计，截止到约 2016 年，可确认的郑州商城区域白家庄期的遗迹有 40 余处，其中建筑基址 4 座、壕沟 2 条、随葬青铜器的墓葬 9 座、青铜器窖藏坑 3 处、手工业作坊 2 处。其中建筑基址、壕沟位于内城，墓葬和手工业作坊多位于内、外城之间，青铜器窖藏坑位于内城外的近城墙处。（张新耀 2017）

既往发现的白家庄期铜器墓，不仅见于内、外城之间，还见于内城西南部（河南省所 2003A）。新发现的书院街墓葬近于内城东南角，填补了此期铜器墓分布的空白。内城东北部长期沿用的建筑、内城以外近旁的青铜器窖藏，以及散见各处的随葬青铜礼容器的贵族墓葬，都表明郑州商城此期已衰落甚至废弃的认识难以成立。

殷墟之前无王陵

此次书院街发现的“明星墓”——2 号墓，被誉为郑州商城目前发现的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据前述报道，该墓底长 2.6 米，宽 1.1 米，共出土随葬品 200 余件。另据最新统计，其中青铜器 21 件、玉器 11 件、金器 7 件、铜箭镞 50 枚、贝币 123 枚，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铜器有鼎、爵、斝、盉、鬲、觚、罍、盘、斗、戈、斨、刀、箭



书院街 2 号墓及其随葬器物（陈茁等 2022）

镞等。玉器有钺、柄形器、玉猪、玉鱼等。金器有金覆面、金泡、金箔等。在最新报道中还首次披露了该墓“金铜覆面同出”。（黄富成等 2023）绿松石有管、片、牌饰等。墓葬底部有 6 处殉狗坑，分别位于墓主人的头部、腰部及四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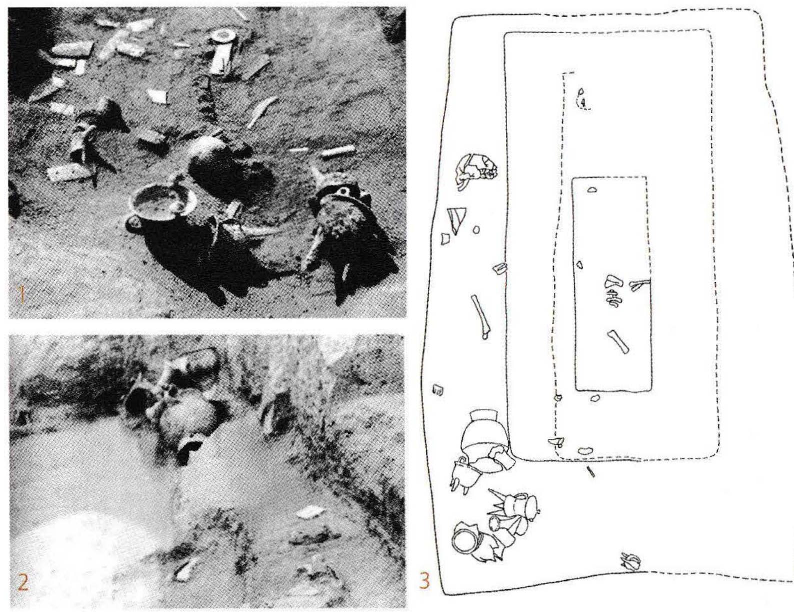
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当天，即有题为《探寻郑州商代王陵》的万字长文配合刊出（齐岸青等 2022）。该文作者认为“几代考古人追寻几十年的郑州商王陵的梦想，出现希望的曙光”，提出书院街 2 号墓的墓主人“或许是某一代高级贵族、王室成员甚至不排除是特殊时期的商王”的推断意见。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推想呢？还是要从既往的发现与研究史上找答案。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邹衡执笔的《商周考古》教材早已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商代墓葬等级的划分标准，书中将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商代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类，各类中又细分为二、三小类，编为由甲种至庚种 7 个层级。（北大商周组 1979）这套尺度充分考虑了墓葬面积、葬具、随葬品和葬俗等因素，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殷墟遗址西北冈王陵区的两座大墓在书中被列为商代早期大型墓的墓例，现在通常将这两座墓葬归属商代晚期。（王炜 2013）

准此，墓室面积在 30—100 平方米以上，带 2—4 条斜坡墓道，随葬品丰富，多见殉人的甲、乙两类大型墓，就完全不见于

前殷墟时代。中型墓中稍大的丙类墓只有一座，即湖北武汉盘龙城的李家嘴 2 号墓（详后），墓室面积逾 10 平方米，随葬大量器物，仅铜器就达 60 余件，其中礼容器 23 件。而郑州商城迄今所知最大规模的贵族墓，墓室面积仅达 4 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容器约 10 件左右，属于《商周考古》分类中的中型墓偏小的丁种。

新发现的书院街 2 号墓，墓口长 2.93 米，墓底长 2.6 米，宽 1.1 米，推测墓室面积在 4 平方米左右；从报道中披露的信息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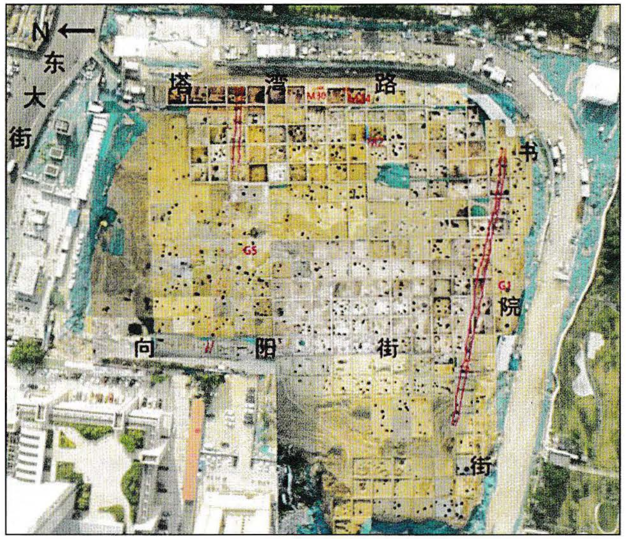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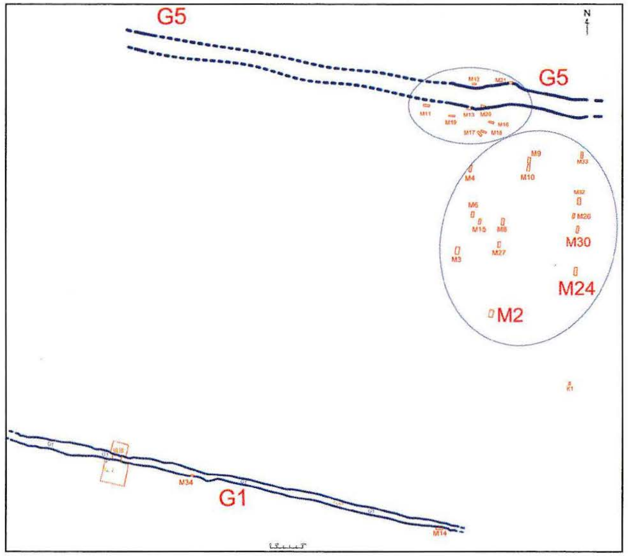
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高等级贵族墓（河南省所 2001）
1. 北二七路 BQM1 局部（墓室面积 4.05 平方米，随葬铜礼容器 7 件）
2、3. 白家庄 C8M3 局部及平面图（墓室面积 3.4 平方米，随葬铜礼容器 10 件）

确认的随葬铜礼容器的数量至少为 9 件（报道中提及 8 个器类，由上图可知，其中鬲为 2 件）。如是规格，该墓确属目前所知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最高等级的一类墓，列入前五名应没有问题。而在上述墓葬分类框架下，该墓也只能属于中型墓中偏小的丁种墓。如果我们以殷墟王陵区的商王大墓作为比照标准看，2 号墓距离王陵有多大的层级差，是可以显见的。

无独有偶，不惟二里岗时代的主都郑州商城没有发现“王陵”，考古工作者曾宣称在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发现的“大墓”，后来也被证明是夯土井（许宏 2017B）。这样，在进入广域王权国家的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的四百多年时间里，第一等级的贵族墓没有超过 2—6 平方米者，即没有发现复杂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今后发现王陵的可能性，但就现有材料而言，对这一时期存在“贵族共和”体制的推测，都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面积超过 6 平方米（3 米 ×2 米）甚至 20 多平方米且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开始登场，如浙江杭州良渚、山西襄汾陶寺、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所见。这类早期国家形成期的贵族甚至王族墓葬，考古学界认为就可以称为“大型墓”或“大墓”，有些甚至可以称为“王墓”。（严文明 1996）与此形成对照，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社会金字塔的塔尖——“王陵”的付诸阙如令人瞩目。而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盛行“居





书院街发现的沟壕与墓葬（陈茁等 2022）

葬合一”的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李宏飞 2019），缺乏集中而长期延续的墓地，以君王为中心的独立的“王陵区”在殷墟时代前尚未出现，是可以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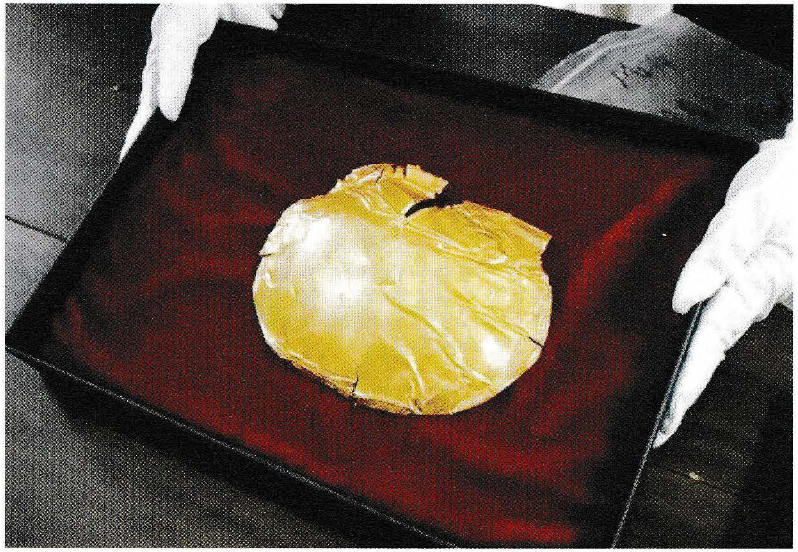
回到郑州书院街的发掘现场。据报道，综合分析 2 号墓的居中位置、出土遗物、墓葬区结构组成及功能性质等，可以认定该墓为墓葬区的主墓。整个墓地残存面积约 1 万平方米，由壕沟、通道、墓葬和祭祀坑等组成。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东西走向的壕沟，间距约 130 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 25 座，其中 3 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 座疑似祭祀坑，其余 16 座推测为陪葬墓，均无棺椁葬具和陪葬器物。

据报道，两道沟壕目前暂未发现转角合围的迹象，且二沟之间尚有大量空白地带。发掘者推断其“很可能具备了商代最早的‘兆域’结构雏形”，尚有待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在专家论证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雷兴山即指出，书院街墓葬区的兆域结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证实，考虑到墓葬区在城内的位置，以及当时居葬合一的习俗，目前南北两条沟也有可能是聚落功能分区的界标，而不单纯是陵园界线。这种功能性的界沟，在同时期的考古遗址上也有发现，加深聚落研究后可能会对这一区域有更深的认识。（齐岸青等 2022）这实际上是含蓄地指出了另外的可能性。

是“金覆面”吗？

在“明星墓”书院街 2 号墓中，最亮眼、最引发大众关注的“明星器物”，当数“一件被掩埋数千年依然金光闪耀的金覆面”（覆面是为死者在面部遮盖面罩的一种丧葬习俗，这种面罩也称为“覆面”）。这件器物是所有媒体都不会放过，甚至被不少记者列入醒目标题的。

据测量，这件锤揲而成的薄胎金器长 18.3 厘米、宽 14.5 厘米，重约 40 克，含金量 88%。其四边略微向内弯曲，专家推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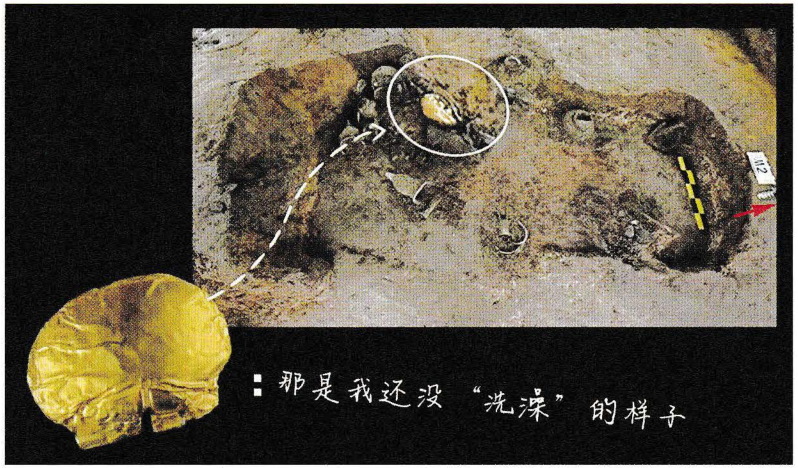
郑州书院街 2 号墓出土的“金覆面”（桂娟等 2022，袁月明 摄）



四川广汉三星堆 5 号坑出土的金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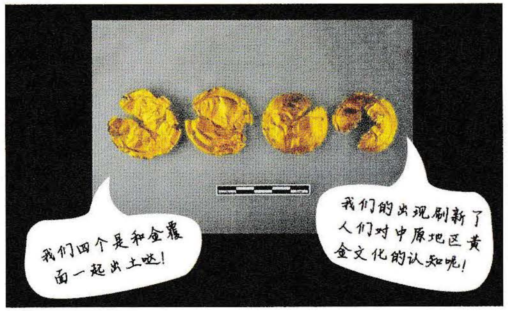
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覆面



“金覆面”及出土状态（袁月明等 2022）

下钩挂有机质的衬托物。不少网友提及第一眼的印象：感觉就是个大贝壳，具体说就像个大扇贝。是的，它被推定为“金覆面”，但却是全球范围内出土覆面（面罩）中唯一一个没有表现出五官的。据报道，之所以被推定为“金覆面”，是因为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脸上”。这是论定该件金器性质功能的最重要的依据。据发掘者介绍：“发掘出土时，金覆面贴在墓葬 M2 西侧的墙壁上，正位于墓主人头侧，大小基本能覆盖一个成人的面部。”

据报道，书院街 2 号墓为南北向，方向为 198 度，也就是头向南。注意上图最右“M2”的标牌旁有一个小箭头，那是指北针的标识，墓主人的头在其相对的一侧。而这件金器“贴在墓葬 M2 西侧的墙壁上”，处于长方形墓室的长端，由是可知它被放置在墓主人的左臂一带，而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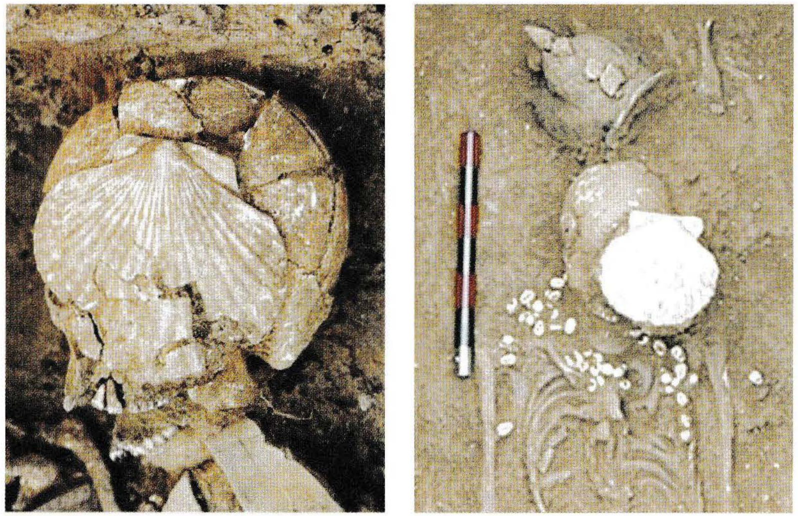
书院街 2 号墓出土的金泡和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饰件（袁月明等 2022）

“正位于墓主人头侧”。也即是说，这件金器不是出土于覆面应该在的头部。

或有读者朋友会问是否有器物移位的现象。按考古资料的记录和刊布规范，目前公之于世的关于该墓的照片，都应是清理了上部扰乱堆积之后的墓葬的“原生态”，而绝不应是扰动后的状态。所以这些器物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都应是原位。

与这件“金覆面”同时出土的还有 4 个金泡、金箔，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饰件等。

上面谈及贝壳状金器被推定为“金覆面”，但其出土位置并不在墓主人的面部。不过在早于二里岗文化的河南登封南洼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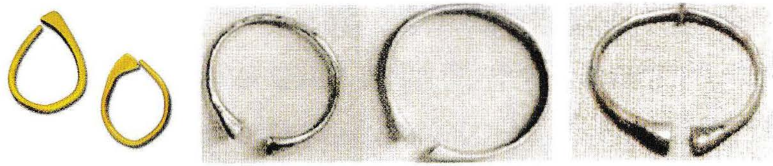
河南登封南洼、河北邯郸南城村墓葬中的贝壳覆面

二里头文化墓葬（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2014）、被认为属“先商文化”的河北邯郸南城村遗址下七垣文化墓葬（石磊等 2012）中，的确发现过以贝壳覆面的葬俗。因而郑州书院街 2 号墓出土的这件金器是否就肯定不是“覆面”，仍难遽断。

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晚期的墓葬中，还见有一件铜质仿贝壳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0），发掘者称之为“鍪”，似不确。“鍪”的释义，一为炊器，一为头盔。但这件铜器在墓主人头旁而不在面部，且上下两端各有 2 个小孔，应非覆面。

东亚早期金器扫描

在东亚地区，目前考古发现可确认的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四坝文化的甘肃玉门火烧沟、瓜州鹰窝树、民乐东灰山等几处遗址和墓地出土的金耳环、耳饰和金鼻环（甘肃省博物馆 1979，甘肃省所等 1998、2011），年代约当公元前 1700—前 1500 年。（许



1　　2　　3

甘肃玉门火烧沟（1、2）、民乐东灰山（3）出土的金耳环、金鼻环

宏 2021B）再向西，属于中亚的新疆西天山地区温泉阿敦乔鲁墓地出土的包金铜环，年代约为公元前 19 世纪至前 17 世纪（考古所等 2013），与欧亚大陆中西部更早的黄金饰品文化相接。

向东，金耳环也见于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晚期（甘肃省所 2009）、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北京昌平雪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考古所 1998，北大商周组 1979），金臂钏见于河北香河庆功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 1999）。这些黄金饰品的形制和当时的青铜饰品基本相同，应是当地青铜技术的一种延伸。就年代而言，有的可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的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许宏 2021B）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东亚大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以来，对美玉的拥有和展示也逐渐成为一种炫耀身份或彰显社会地位的手段。用玉制作的首饰几乎覆盖了人体适于装饰和炫耀的所有部位。即便进入青铜时代的早期王朝时期，在人体装饰领域，玉器仍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考古发现中少见精美的金属首饰。（许宏 2021B）相比之下，中亚和更北的西伯利亚始终以黄金为贵，一直流行以黄金来制作首饰，黄金的应用也远早于东亚。"在中国北方诸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黄金还是青铜的首饰中都不时能够看到来自西方的影响，所以中国北方文化集团流行使用黄金首饰的观念无疑同它们与西方具有较多的联系有关"（乔梁 2007）。



1955 年郑州商城出土的金箔饰

郑州商城在既往的发掘中就发现过金器。如 1955 年在内城北城墙东端的一处狗坑内，曾出土了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之后是一件夔龙纹金叶，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器物上的装饰。这件金饰属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河南省博等 1977），早于新发现的"金覆面"等金器。

此外，郑州郊外的小双桥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二里岗文化遗存中也曾发现过金箔。（河南省所 2012，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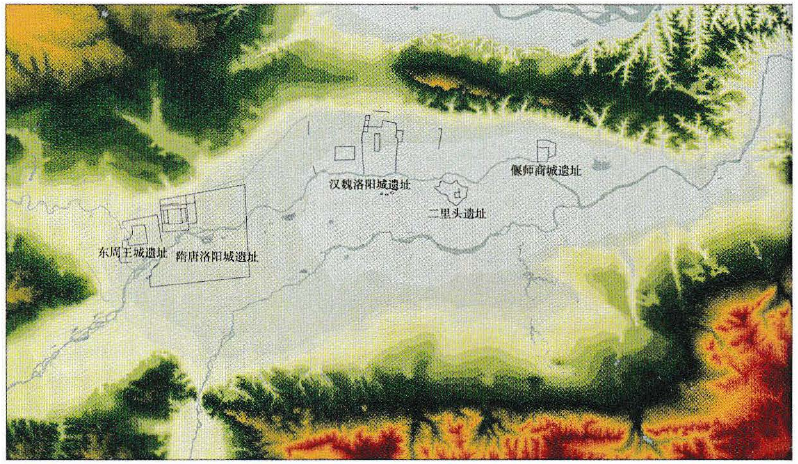
与郑州书院街 2 号墓镶绿松石金箔饰件类似的器物，还有湖北武汉盘龙城二里岗文化贵族墓中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镶金饰件（详后）。该遗址也是前殷墟时代东亚大陆金器分布的最南端。

综上，东亚地区的金器最早见于二里头时代西北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晚期，随后分布到北方地区的内蒙古、北京、河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它与东亚青铜潮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大致同步。而首饰应是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此后，独特的黄金

首饰更成为北方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种标识。金器尚不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但为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所吸收，又由于二里岗文化的大幅度扩张，散见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等地，且以金箔、金片与绿松石片的组合为多见。至于其分布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和广泛应用，则已晚至殷墟时代及西周时代，三星堆—金沙文化的金器，显然是这一波更大的金属文化潮——青铜潮的产物。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在郑州书院街考古新发现座谈会发言中指出，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这样的论点：商王朝自郑州地区向安阳地区的迁移，是由于和北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造成的，这在书院街 2 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中可以寻找到相关的线索。（齐岸青等 2022）

五　辅都现伊洛

如果在郑州商城这个硕大无朋的主都之下，就是一系列作为其股肱的二级中心或据点，那么这种社会结构颇好理解，因为它是以定居农耕为基础的古代国家聚落形态的常态。但偏偏与郑州商城大体同时，其西数十千米以外的洛阳盆地东部，二里头都邑的近旁又兴起了一座仅次于郑州，但又远高于其他中心聚落的二里岗文化大型城邑——偃师商城。围绕它的身份，其与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及洛阳盆地中的其他古代都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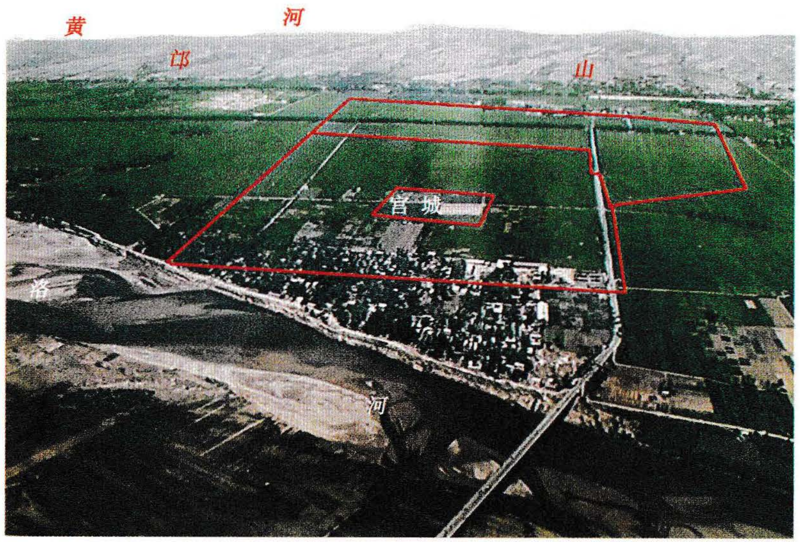
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我们还是先耐着性子，看看这里究竟发现了什么，然后再梳理论争的焦点。

电厂给古城让了路

1982 年，国家“六五”计划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之一的首阳山发电厂，将厂址选在了洛阳以东约 30 千米的邙山南麓，现洛阳偃师区首阳山镇一带。文化部下属的国家文物局会同负责统筹审核考古业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建厂选址问题进行了审核。同年 7 月，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联合复函给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不同意在偃师洛阳故都保护区兴建大型火力发电厂。经过博弈，文物考古部门同意电厂厂址较原选地点稍东移，以避开当时已知的重要遗址。据说，电厂厂址为避让文物古迹而东移，还是国务院主要领导拍的板，一时成为文物保护的佳话。

位于偃师市区以西的新址在动工前，要进行考古勘探以摸清地下文物分布情况，而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考古队在 1983 年春季的初步钻探中，发现了一处早期城址的夯土城圈，进一步勘察试掘的结果，确认了该城西、北、东三面城墙的位置、走向、长度、结构及保存状况。由此可知这是一座保存颇为完好的城址，整体略呈长方形，唯其东南部因受城外大面积水域的限制，东城墙南段有拐折。在

城区北部和中部各发现道路一条，沿着道路的走向，在北城墙上发现城门基址一处；城外东南部发现古代水池；在城内勘探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4 处，其中有 3 处坐落于城区南部，居中者规模较大，推测当为宫殿遗址，而城址南部应为中心区域。至于年代，勘探发掘者初步推断“商文化的二里岗期当是该城历史上的兴盛时期之一”，进而认为“像这样规模大、内涵丰富的商代城址或都邑，在迄今的考古发现中，只有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这意味着，偃师商城绝非一般聚落，也非方国小城，而应是一代王都”。（考古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 1984）



1983 年发现的偃师商城

这一考察结果，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文物管理部门的认可，他们以此为依据，妥善处理了城址保护和首阳山发电厂的选址问题：电厂为给城址让路，又西移了 200 米，其主要设备都避开了保护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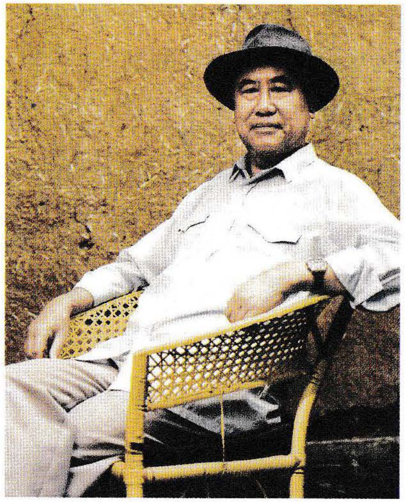
当年秋季，已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赵芝荃受命率领新组建的偃师商城考古队（正式名称为河南第二工作队）开始开展进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搞清城址的始建年代和基本布局两个方向上，成绩斐然。1984 年春，偃师商城的重要考古发现正式公之于众。学界普遍认为，偃师商城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内涵丰富、布局相对清晰，便于全面深入研究



偃师商城西墙及其外的电厂厂区

的一座大型都邑级城市遗址，是二里岗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和中心遗址，是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的珍贵标本。1988 年，偃师商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名“尸乡沟商城遗址”。

关于“尸乡沟商城遗址”的定名，还有一段趣话。这一称谓到目前为止仍常见于学术论著和各类读物中。“尸乡沟”一词最早见于偃师商城发掘者的文章中，其中援引《汉书 · 地理志》河南郡偃师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而“城址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低凹地带，穿城而过，老乡世代相传称之为尸乡沟或尸乡洼”，这“与文献记载如此符合，绝非偶然之巧合。据此，我们认为这座城址即是商汤所都的西亳，殆无疑义”（赵芝荃等 1985）。后有学者经调查指出，这大概是发掘者证史心切，而将当地老乡所言“石羊沟”（该地曾有在古墓前安置的石羊等动物塑像）解读为发音相似的“尸乡沟”（王学荣 1996）。一个旁证是国人讲究吉祥寓意，而当代汉语中“尸”则为不



偃师商城考古队第一任队长赵芝荃（20 世纪 90 年代）

祥之词，因而不应见于地名之中。由于“尸乡沟”并非当地正在使用的小地名，不符合考古遗址的定名标准，因而我们不使用“尸乡沟商城”一词。（许宏 2016B）“偃师商城”的命名虽不甚理想（譬如偃师境内再有一商代城址发现，就较为尴尬），但属于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城建规划看偃师

偃师商城遗址南临伊洛河故道（现洛河），北依邙山，位于黄土丘陵和伊洛河河谷平原之间的冲积扇上。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 6 千米，东距郑州商城约 80 千米。

与郑州商城不同的是，由于发现之初城址范围内绝大部分区域是农田，因而偃师商城的保存状况颇佳。尽管在城址区域内发现有零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型聚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城址基本上是平地起建的，具有极强的规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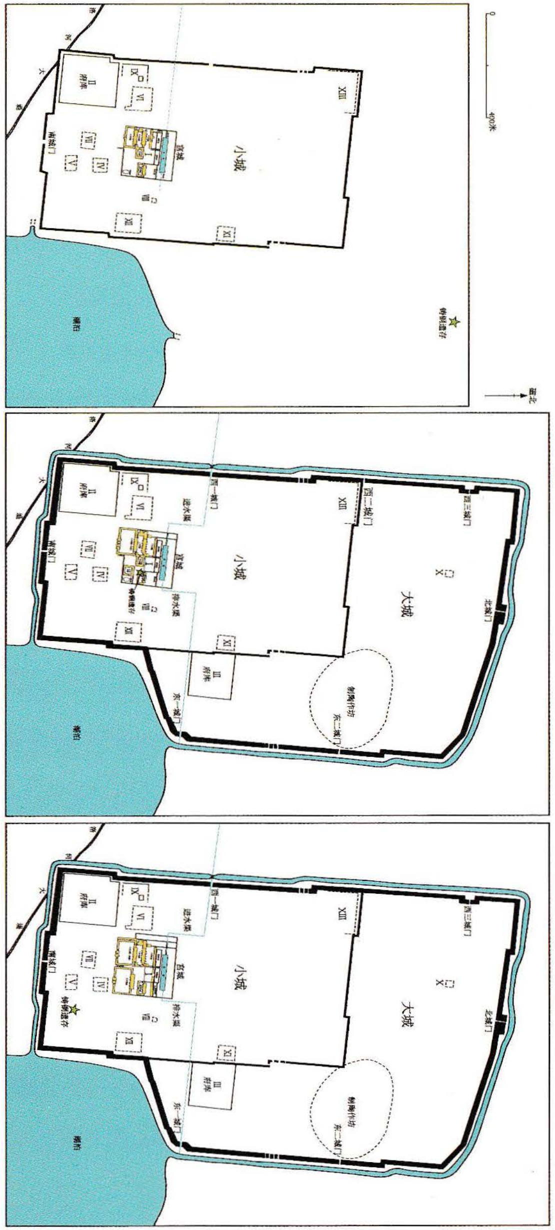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郑州、偃师两座城址年代关系的结论，在最新刊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因执笔的首席科学家的不同而表述各异。负责考古方面的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在其执笔的“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一章中认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商代都邑遗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如果郑州商城的始建也以宫城和早期宫殿的始建为标准，则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的年代就基本一致了”。“现参考前

述其他数据和研究成果，将商代始年估定为约公元前 1600 年。”而负责测年方面的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在其执笔的“夏商周考古年代的 ^{14}C 测定与研究”一章中则指出：“二里岗期上限不早于公元前 1540 年”，“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年代测定结果，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最早期的商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跨越了夏代中、晚期和商代早期”。（专家组 2022）

诚如有学者在该工程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专家组 2000）刊布后不久即指出的那样，“对二里头遗址各期的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年代也落在这一时间段内，即公元前 1610 年—前 1555 年。如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岗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刘绪 2001）。看来，在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这一问题仍未解决。

依《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给出的最新测年数据，偃师商城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 1560—前 1320 年。（专家组 2022）这座城址由兴至废经历了约 200 年时间，其间的布局结构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发掘者将偃师商城的文化遗存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约当郑州二里岗文化早、晚期。

第一期，始建和初步使用时期。偃师商城建起了纵长方形的夯土城圈（小城），东西最宽约 776 米，南北最长约 1153 米，城垣宽约 6 米，圈围面积约 90 万平方米，已发现多处疑似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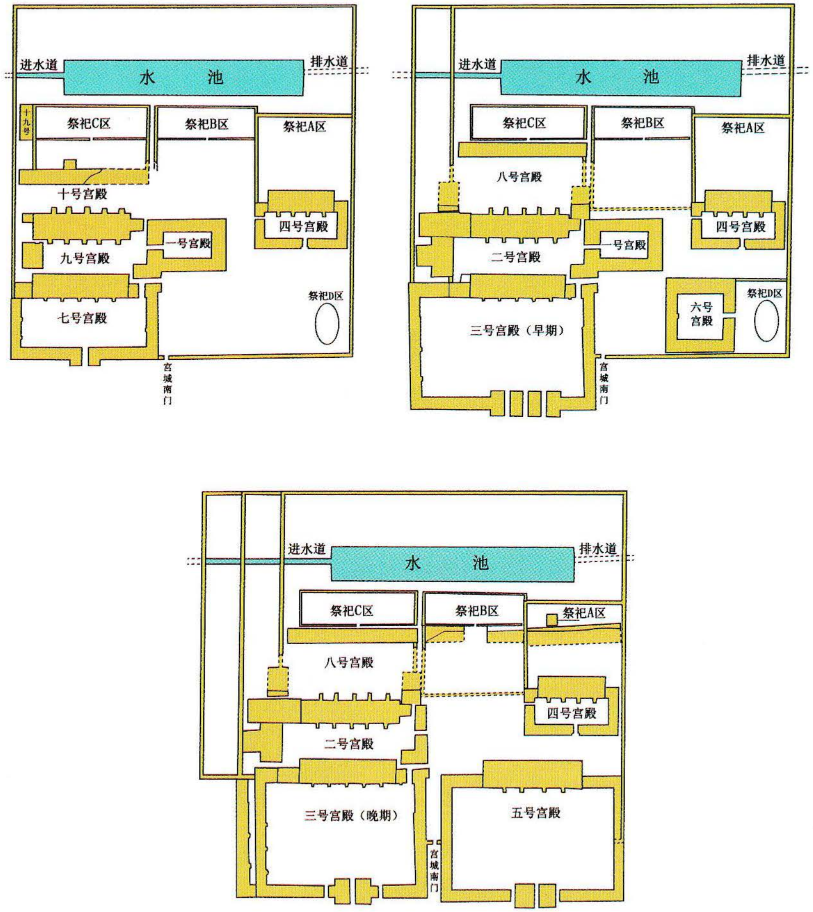


偃师商城总体布局变迁示意（谷飞等 2019）

左：一期　中：二期　右：三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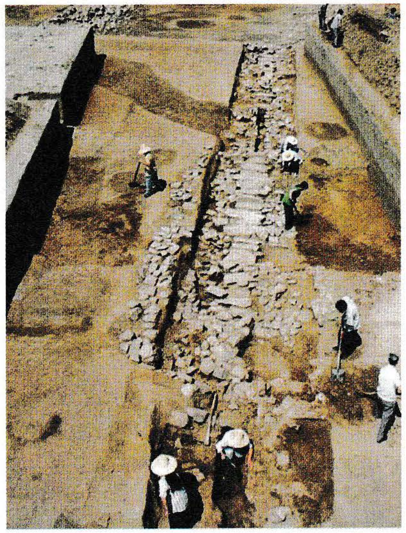
的遗迹。（陈国梁 2021）城内南部集中发现建筑遗存，居中有被称为“宫城”的第Ⅰ号围垣建筑群，大致呈正方形，长、宽均约 190 米，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其内发现若干大中型建筑、祭祀场和水池，由南向北初步形成宫室建筑区、祭祀区和池苑区并存的格局。第Ⅱ号围垣建筑群位于城圈西南角，略呈方形，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此时兴建了下层基址，包括百余处建筑基址和 1 处大型水池，被认为属于府库遗迹。城外东北部出现与青铜冶铸作坊相关的遗存。至本期晚段，偃师商城已初具规模。

第二期，大规模扩建时期。在小城基础上向北和东北部外扩，修筑了大城城垣和护城壕，城墙内外均有环城路。城外东南部已探明有水泊遗迹，东城垣南段应为避开该水泊而向西拐折。据最新的勘测结果，大城南北最长约 1753 米，东西最宽约 1198 米，城垣以内的面积为 1.83 平方千米，护城壕以内的面积约 2.05 平方千米。城墙上已通过发掘确认城门 6 座，经勘探推断另有城门 3 座。（陈国梁 2021）“宫城”向西、向南扩建，长、宽均超过 200 米，总面积近 5 万平方米。其内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建和扩建了若干建筑，西垣的一部分也相应西移；祭祀场进一步扩大为三个区域；挖建了“宫城”北部的长方形水池，石砌水道贯通大城东西，进水道源自护城壕西侧的古河道，护城壕上有桥梁和渡槽。第Ⅱ号建筑基址群经过全面翻修、改建，形成该建筑群的中层基址，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第Ⅲ号建筑群可能始建于此



偃师商城“宫城”的布局演变（谷飞等 2019）
上左：一期　上右：二期　下：三期早段

期，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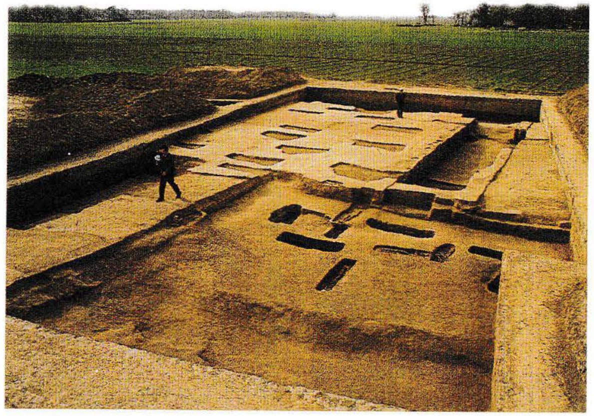
偃师商城池苑进水道发掘现场

第三期，继续使用和衰败、废弃时期。本期早段是偃师商城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大城城垣有修补迹象；第Ⅱ号建筑群局部得到修缮；“宫城”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规模更大的两座建筑基址兴建起来，突破了“宫城”西、南墙的范围，使得第Ⅰ号建筑群的面积进一步扩大至约 4.5 万平方米。与此同时，若干建筑基址已废毁，宫城北部的水池逐渐淤塞废弃。

进入第三期中段，“宫城”范围内的建筑基址和主要祭祀场及作为府库的第Ⅱ、Ⅲ号建筑群已基本废毁。未发现在此段及其后新建的大型建筑基址。鉴于此，偃师商城作为都城的下限应是第三期早段，即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

第三期晚段的遗存很少，仅见零星灰坑。此时城址应已完全废弃，沦为一般聚落。（考古所 2003，陈国梁 2021）

小城城垣宽在 6 米左右；大城城垣墙体顶部残宽 16—18 米，基部宽 18—19 米左右。大城城垣外还有宽约 20 米的护城壕。总



偃师商城西二城门发掘现场（1983）

体上看，偃师商城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一般宽仅 2 米余），城内设置府库类建筑，都体现了较浓厚的战备色彩。

不比无以窥高下

多年的发掘与研究，使学界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座城址的兴废年代和过程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从考古学层面看，可以肯定它们是大体同时存在的两座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都邑级遗址。以最早的宫殿和宫城的营建为标志，两城始建年代接近，都约当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二者的兴盛期大体并存，或有交错。由小城的修建、宫殿基址群的改扩建、府库的营建和大城的出现等现象看，偃师商城最主要的使用时间是二里岗文化早期。至二里岗文

化晚期早段时虽有夯土建筑的兴建，但已开始衰落，不久即告废弃，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已沦为一般聚落。如前所述，郑州商城宫殿区大型夯土基址群和内、外城垣，以及大型铸铜作坊和多处墓地的出现，表明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时，该城已进入兴盛阶段；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时，该城持续繁荣并达到鼎盛，而此时恰值偃师商城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时，偃师商城已彻底荒废，而郑州商城内一些夯土建筑和两处铸铜作坊在本期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使用，且发现有青铜器窖藏坑及最新发现的高等级贵族墓，说明该城至少在此期仍有王室或贵族活动，仍应属都邑级的遗址。可知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大体同时兴起，而后者的废弃时间要早于前者。

就遗存分布范围而言，郑州商城为 10 平方千米以上，偃师商城则基本上限于大城城垣以内（不足 1.9 平方千米）。从城址规模上看，郑州商城在建城之初即建有 3 平方千米的内城和规模逾 10 平方千米的外城；偃师商城早期小城约 0.9 平方千米，后来扩建的大城不足 2 平方千米。郑州商城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和青铜器窖藏坑，以及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偃师商城则仅见有个别随葬少量青铜礼器的墓葬，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遗存中绝无铸造青铜礼器的迹象。偃师商城几乎平地起建，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以及城内府库类建筑的设置，都显现出较浓厚的战备色彩，这与郑州商城的全面繁


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尊

盛也形成较鲜明的对比。总体上看，这两座城址在聚落层级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二者的城市功能也很可能有较大的不同。鉴于此，郑州商城为主都，偃师商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刘莉等 2002）或双都制下的辅都（张国硕 2001）、副都（松丸道雄 2009）等意见应是较为妥当的。

有学者通过对城市布局和陶器风格的历时性分析，指出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有着不同的城市发展进程。郑州商城体现为普通聚落逐步向城市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向城市会聚。这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印纹硬陶、原始瓷等，展现了城市获取资源和吸纳外域文化的能力。偃师商城聚落形成之初，展现出以“宫城”为核心的营建过程；文化特征单一，外来文化因素较缺乏。偃师商城的设立和营建明显带有更多自上而下的控制或行政权力的因素，反映出早期城市营建过程中强烈的规划意识。（孙卓 2018A）

偃师商城的独特价值

尽管我们倾向于偃师商城应为二里岗政权的辅都或副都，但

由于偃师商城的保存状况较其前的二里头都邑和同时的郑州主都为好，它所提供的都邑级聚落的信息更为丰富，有些甚至极具震撼力。试举几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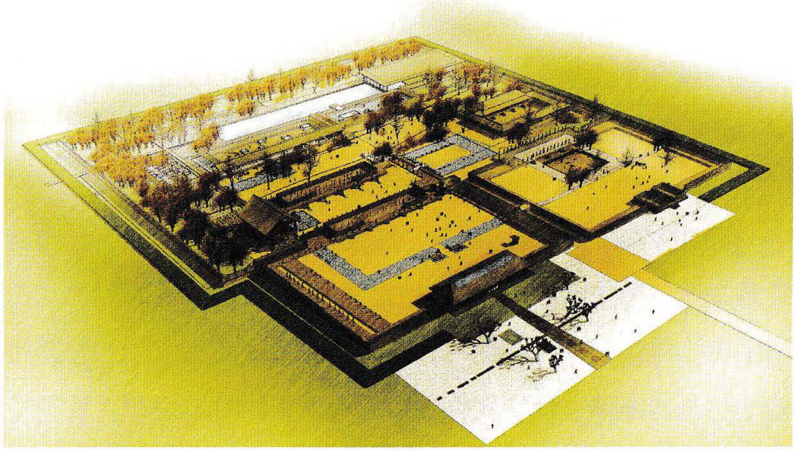
其一，承上启下的宫室建筑群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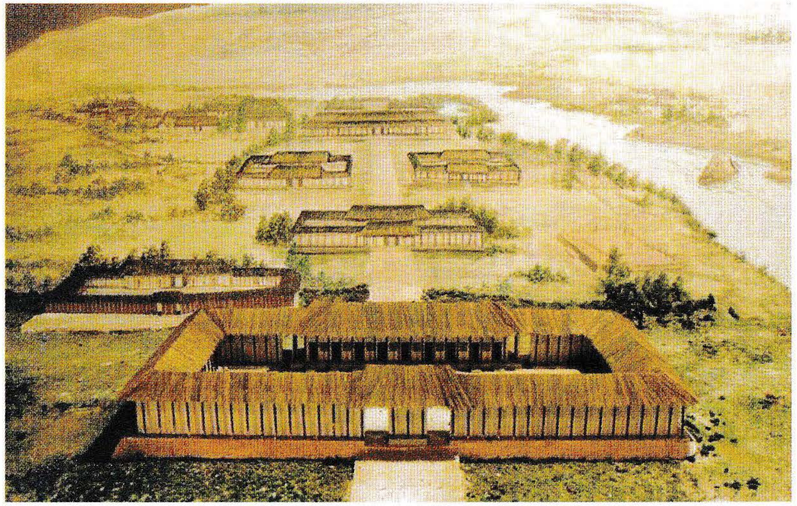
偃师商城早期小城南部的“宫城”内，仍是东、西两组宫室建筑并立，这显然是二里头都邑宫城中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并立布局的余绪。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南殷墟宫殿区宫室建筑的格局不清，保存较好的洹北商城（1999 年发现，位于洹水北岸，故名。主体年代早于洹南殷墟。详后）宫城内，已形成南北单一轴线布局的大型宫室建筑群（何毓灵等 2011）。偃师商城在夏、商、周三代宫室建筑和都邑规制的演变中，居于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

其二，大规模的国家级祭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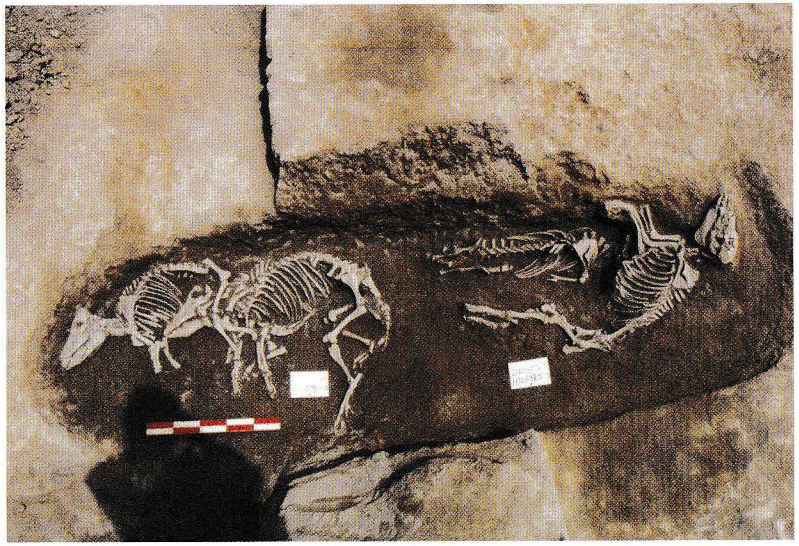
我们曾论及二里头都邑宫城东北部的 1 号巨型坑，用若干排列有序的幼猪祭祀，是研究二里头早期国家祭祀制度的重要资料。（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 2015）但相比之下，这只是萌芽阶段，而在偃师商城，大规模的国家级祭祀场已经形成。

位于池苑区和宫殿建筑群之间的祭祀区包括三个区域，三个区域各自独立，自东向西分布。其中二区逾 2000 平方米，由东、西并列的两个长方形沟状遗存组成，其外围被夯土墙包围，另一区近千平方米，由若干祭祀场和祭祀坑组成。该区祭祀的内容比





偃师商城“宫城”（上）与洹北商城宫城（下）复原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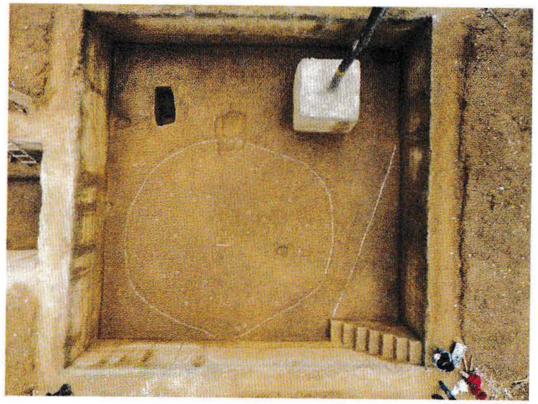


偃师商城祭祀区的猪牲

较多，牺牲有人、牛、猪、羊、狗、鱼等，粮食祭品有水稻和小麦。这两个区域的祭祀以猪为主要牺牲，用牲形式多样。

其三，大规模的府库仓储设施。

偃师商城最令人瞩目的，与其说是“宫城”及其内的大型宫室建筑，不如说是其中的大型府库仓储设施。据早年的勘察结果，第Ⅱ、Ⅲ号基址群都是大体呈方形，外有围墙的封闭式建筑基址群，面积分别为 3.5 万和 3 万平方米。近年的勘探发掘工作确认二者的面积应较此为大，而第Ⅲ号建筑基址的外围并无围垣。（王胜昔等 2022）两处大型基址群内都分布有密集而成排的建筑基址，



偃师商城新发现的囷仓遗迹

据统计，分别有106座和77座之多。发掘者认为两者均为府库设施。2007年又在西二城门内发现了第XIII号基址，近年的勘探发掘表明其内分布着若干圆形建筑基址，或为先秦文献所载的囷仓遗址。在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推测成排成行分布着100—120座圆形建筑。如储存的是粮食，100个囷仓的容量可达4.9万—5.9万吨，供养人口可达19.6万—23.4万人。（陈国梁 2015、2020）

无论它们储藏的是粮食、食盐还是武器等，都是东亚大陆前所未见的一种大规模的物资集中储备，这是只有高度集权、广域控制的王权国家才能够做到的，显现了早期王朝巨大的控制力。有学者指出，在殷墟时期，甚至后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遗存中，都没有发现过如此规模的仓储设施，直到洛阳战国粮仓遗址被发掘，堪与偃师商城相比的大型粮仓遗址才得以面世。也就是说，在之后的一千年里，偃师商城的仓储区规模都没有被超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李硕 2022）

贰

争鸣篇



如果说“发现篇”是对关于二里岗物质文化遗产述而不作的介绍，那么本篇要介绍的就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不同阐释，也即围绕相关问题的百家争鸣。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中心展开的夏商王朝历史剧，存在着不同的脚本和演绎风格，这是上古史和考古学探索的常态。

一 说“原史” 道争鸣

上古探索 贵在争鸣

读者诸君应该能够从对前文的阅读中，感知到本书与其他关于上古历史的论著间在话语系统上的不同。在“发现篇”中，笔者对于相关的考古发现，尽可能地做了相对平实的叙述，尽可能避免做历史编纂学的“对号入座”或夹叙夹议，从既往论著中“郑州城”“偃师城”而非“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提法（许宏 2016B、2017A）也可见一斑。但二里岗文化毕竟处于原史时代向历史时代的转捩期，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和浓厚的重史传统，规定了我们既往的探索路向和关注点。这是需要从逻辑和学理上加以探讨的。

丰厚的文献资源这笔宝贵财富，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弃之不用。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凭传世文献寻“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徐旭生 1959），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但如何利用，却是个大问题。是文献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各自扎实做好自己的本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分进合击、慎重整合，还是在相

关材料仍相当薄弱的情况下，积极做“对号入座”式的证经补史工作，学者间看法不一、做法不同。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数十年来考古学界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这一状况直至今日。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可喜的是，新一代学人已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切关注参与这类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研究，学科的关注点已在悄然转移。正如陈淳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陈淳 2018）

需要强调的是，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中国考古学在传说时代古史探索领域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自警自惕的。如果说“发现篇”是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述而不作

的介绍，那么“争鸣篇”要介绍的就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不同阐释，也即围绕相关问题的百家争鸣。不同学者提出的研究方案，是追述、是建构、是推想，而不可能是唯一的和排他的。这是上古史和考古学探索的常态。就此，我们得以梳理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而展开的关于夏商王朝历史剧的不同脚本和演绎风格。

“原史时代”的特质

在本书的开头，笔者提及“这数百年，也是从无文字的史前时代，经文字虽萌生而尚未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史时代’，步入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标志的历史时代的关键期”。其中的“原史时代”及二里岗文化在这一时代框架中的位置，这里再稍作解释。

在人类历史研究中，史前时代、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是着眼于研究材料上文字和文献的有无及发挥作用的程度而提出的阶段划分方案。“原史时代”被定义为由于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Glyn Daniel 1981），但在中国考古学界逾百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未普遍采用国际同行所使用的“原史时代”的概念。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一介于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重要时期。

就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仰韶时代及以前的诸考古学文化，大致属史前时代。而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诸文化，则属原史时代。这一阶段的遗存中已发现了零星的当时人们使用的直接文字材料，相关人群又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材料，属口传历史而非编年史）所追述，但这些文字与文献材料还不足以确认当时人们共同体的“历史身份”，主要靠考古学材料来研究。这就是典型的“原史时代”的特征。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一阶段的殷墟文化、西周文化等则已有了直接的文字材料来“自证”其族属或王朝归属，由是进入历史时代。因此，目前可确认的中原地区“原史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大致在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许宏 2008）

法国《史前大辞典》对“原史”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转引自刘文锁 1998）这些“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就是解读原史时代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史前、原史、历史时代的阶段划分与对应史料

<table>
<tr><th colspan="2"></th><th>直接文字材料</th><th>间接文字材料</th><th colspan="2">文献史分期</th><th>历史阶段</th></tr>
<tr><td colspan="2">秦汉及以后</td><td rowspan="5">较系统的记录</td><td rowspan="9"></td><td rowspan="5">书写历史</td><td rowspan="3">编年史</td><td rowspan="5">历史</td></tr>
<tr><td colspan="2">战国</td></tr>
<tr><td colspan="2">春秋</td></tr>
<tr><td colspan="2">西周</td><td rowspan="2"></td></tr>
<tr><td>殷墟</td><td rowspan="2">商</td></tr>
<tr><td>二里岗</td><td rowspan="4">零星或无</td><td colspan="2" rowspan="4">口传历史
神话</td><td rowspan="3">原史</td></tr>
<tr><td>二里头</td><td rowspan="3">夏
五帝
三皇</td></tr>
<tr><td>龙山</td></tr>
<tr><td>仰韶及前仰韶</td><td>史前</td></tr>
</table>

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在 70 多年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来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徐旭生 1985，此书初版于 1943 年）。此后关于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而使得前殷墟时代无法进入信史时代。这里的“传说时代”，

可以说就是“原史时代”的代名词。

在不采用“原史”概念的学者口中笔下，这个时代一般被归在缺乏文字材料的“史前”。如“先于晚商殷墟（约1250BC—1046BC）的早期国家，确切地说是文字系统尚未出现的史前国家”（刘莉等2017）。而由于当时的“自证性”文献材料的阙如，后世文献又仅为追述，这段历史的模糊性、阐释的多歧性和结论的不确定性就显而易见：“对于早期国家的研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历史文献资料，然而这些文献资料却是在国家出现大约一千年以后才编撰完成，因此，学者们对于如何将这些文献资料用于考古研究争论不休。”“古代文献经常简略而模糊不清，况且在晚商之前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中并没有发现能够说明遗址性质的文字。这样的话，引用各种古史传说就会导致一个考古遗址可能对应多个古代城市或地方。因此，对于哪个遗址对应哪个古代都城，考古学家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只有安阳殷墟除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使它毫无争议地成为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刘莉等2017）可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才是“原史时代”研究的常态。

“原史”终结在武丁

细究起来，上引文中所说的“毫无争议”之处，还不能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般称为晚商文化）的相交处算起。绝大

多数学者认为，甲骨卜辞叙事的最上限，是商王武丁时期，更早的盘庚、小辛、小乙诸王时期的内容尚未确认。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殷墟文化分期与诸位商王的对应关系是：

洹北花园庄早段遗存早于第一期。

殷墟一期　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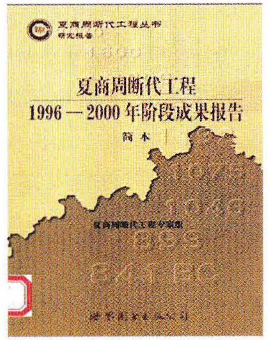
殷墟二期　本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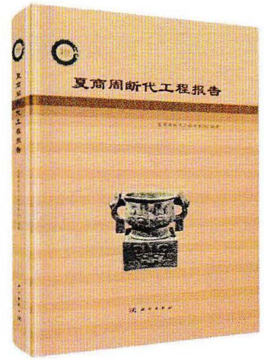
殷墟三期　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　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专家组2000）

从测年结果可见，殷墟一期的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1320—前1239年，二期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1255—前1195年，殷墟三期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1205—前1080年，四期年代范围





相隔20余年、简繁两个版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约为公元前1090—前1040年。

（专家组2022）

其中，盘庚（迁殷后）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1298年（取整为前1300年）；商王武丁在位时间，被推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计59年。（专家组2000、2022）

也有将洹北花园庄期遗存划为殷墟文化一期，而将武丁时期也即甲骨文分期的第一期划为殷墟文化第二期的。（范毓周2010）殷墟文化第二期始于武丁，是邹衡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邹衡1980）

无论如何，殷墟一期包含介于郑州商城和大殷墟之间的洹北商城存在的时期，也即至少洹北花园庄期晚段应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由于没有武丁及其后那样的甲骨文献相比照，传世文献所载“盘庚徙殷”事件等，都不能作为进入信史时代的前提条件。洹北商城依然不能被确认究竟是盘庚迁殷还是河亶甲迁相，论争持续不断，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它还处于扑朔迷离的“原史时代”。关于洹北商城与郑州商城、小双桥的关系，且待后文分解。

武丁始于殷墟第二期的分期方案（范毓周2010）

<table>
<tr><th colspan="2">殷墟文化分期</th><th colspan="3">殷墟各遗址、墓葬区（陶器）分期</th><th>甲骨文分期</th><th colspan="2">青铜器分期</th><th>历史年代</th></tr>
<tr><td rowspan="3">殷墟文化一期</td><td>早段</td><td colspan="3">花园庄期早段</td><td rowspan="3">0期</td><td colspan="2" rowspan="3">第一期</td><td rowspan="3">盘庚、小辛、小乙</td></tr>
<tr><td>中段</td><td colspan="3">花园庄期中段</td></tr>
<tr><td>晚段</td><td colspan="3">花园庄期晚段</td></tr>
<tr><td rowspan="3">殷墟文化二期</td><td>早段</td><td>大司空村一期</td><td colspan="2">苗圃北地一期</td><td>一期早段</td><td rowspan="3">第二期</td><td>早段</td><td>武丁前期</td></tr>
<tr><td rowspan="2">晚段</td><td rowspan="2">大司空村二期</td><td colspan="2" rowspan="2">苗圃北地二期</td><td>一期晚段</td><td rowspan="2">晚段</td><td>武丁后期</td></tr>
<tr><td>二期</td><td>祖庚、祖甲</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殷墟文化三期</td><td rowspan="2">大司空村三期</td><td rowspan="4">苗圃北地三期</td><td rowspan="2">苗圃北地墓葬三期</td><td rowspan="2">三、四期</td><td rowspan="2">第三期</td><td>早段</td><td rowspan="2">廪辛、康丁、武乙、文丁</td></tr>
<tr><td>晚段</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殷墟文化四期</td><td rowspan="2">大司空村四期</td><td rowspan="2">苗圃北地墓葬四期</td><td>五期</td><td colspan="2">第四期</td><td>帝乙、帝辛</td></tr>
<tr><td></td><td colspan="2"></td><td>西周初年</td></tr>
</table>

不同学者商文化分期方案对照（部向平 2011）

邹衡	先商	早商						晚商						
		二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六段		七段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安金槐	二里岗下层		二里岗上层										
	一期	二期	一期		二期								
郑振香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偏早	偏晚	偏早 偏晚			偏早	偏晚
王立新	一期		二期			三期							
	一段	二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六段						
《夏商卷》	早商				中商			晚商					
	一期	二期	三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邹著	第 I 阶段		第 II 阶段			第 III 阶段		第 IV 阶段		第 V 阶段		第 VI 阶段	

二　何以称“商”？

开篇提及的三位著名考古学家的铜像，伫立在郑州商城内城的东南角。千余米外就是韩维周发现的二里岗遗址；安金槐、邹衡的对面就是他们发现、确认并毕生研究的3000多年前的城垣。关于考古发现，他们应可无憾，而围绕都邑主人身份的论争，以安金槐和邹衡为代表的各派学者当仁不让，甚至从对考古发现的报道开始，关于朝代名称“标签”的提法、写法都有微妙的变化，这不光让考古圈外围观的朋友一头雾水，即便是圈内同人，也如在云中。

先“殷”后“商”为哪般？

梳理郑州商城早期的考古报告简讯，我们注意到，关于二里岗文化遗存所属时代的提法，有从“殷代”到“商代”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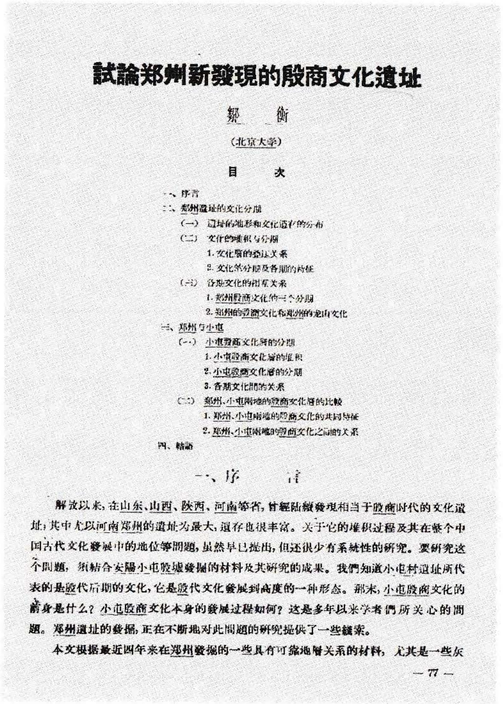
具体而言，1951—1954 年上半年，主要用“殷代”“殷商”，罕见“商代”。

前文提到韩维周于1950 年秋在二里岗发现“类似殷代的陶片和遗址”（赵全嘏 1953）。1951 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发掘团确认郑州南关外废碉堡地点属于“殷商遗址”

（考古所河南调查团 1951）。看当时的一些标题即可知，如《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介绍郑州发现的古遗址及殷代墓葬概况》《郑州市郊区及市区发现古代遗址及殷商墓葬》等。

大致从 1954 年年中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描述这处遗址时更多的是使用“商代”，偶见“殷商”，罕见“殷代”。

如《郑州发现的商代制陶遗迹》《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等，趋向统一。时任北京大学助教的邹衡发表了他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就的力作《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首次对郑州的“殷商文化”做了系统分期。（邹衡 1956）系统刊布郑州二里岗遗址 1953—1954 年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郑州二里岗》，除在序言中提及文献记载时有“如果传说属实，郑州在



試論郑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

鄒　衡

（北京大學）

目　次

一、序言
二、郑州遺址的文化分期
（一）遺址的地形和文化遺存的分布
（二）文化的堆积与分期
1. 文化層的叠压关系
2. 文化層分期及各期的特征
（三）各期文化的相互关系
1. 郑州殷商文化的三个分期
2. 郑州的殷商文化和郑州的龙山文化
三、郑州与小屯
（一）小屯殷商文化層的分期
1. 小屯殷商文化層的堆积
2. 小屯殷商文化層的分期
3. 各期文化間的关系
（二）郑州、小屯兩地的殷商文化層的比較
1. 郑州、小屯兩地的殷商文化的共同特征
2. 郑州、小屯兩地的殷商文化之間的关系
四、結語

一、序　言

解放以来，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曾經陆續發現相当于殷商时代的文化遺址；其中尤以河南郑州的遺址为最大，遺存也很丰富。关于它的堆积过程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發展中的地位等問題，虽然早已提出，但还很少有系統性的研究。要研究这个問題，須結合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的材料及其研究的成果。我們知道小屯村遺址所代表的是殷代后期的文化，它是殷代文化發展到高度的一种形态。那末，小屯殷商文化的前身是什么？小屯殷商文化本身的發展过程如何？这是多年以来学者們所关心的問題。郑州遺址的發掘，正在不断地对此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綫索。

本文根据最近四年来在郑州發掘的一些具有可靠地層关系的材料，尤其是一些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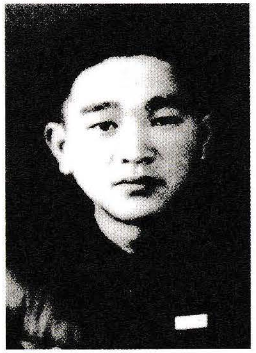
— 77 —

邹衡 1956 年所发论文首页

殷代应属隞”的推断外，全书统称“商代遗址”。（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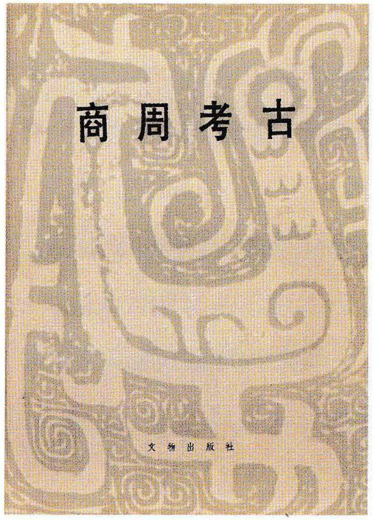
这一对郑州商城从“殷代”到“商代”叙述概念变化的缘由，没有人确切地说明过。从当时刊布的简讯简报看，考古工作者最初的认识是，“郑州二里岗和小屯的殷代器物是大致相同，而也有小异的地方”（赵全嘏 1953），而后逐渐意识到“二里岗的殷代遗址，属于殷代文化的系统”，“它的年代也可能早于安阳的小屯期”（安志敏 1954），“郑州商代文化的中、下两层可能比小屯‘殷墟’早些”（河南省文工队第一队 1955）。从中可知，从“殷代”到“商代”叙述概念的变化，是和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岗文化早于殷墟文化这一年代序列的把握大体同步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编写组在《商周考古》





邹衡在郑州实习时（1953 年 12 月）的留影和当年在训练班佩戴过的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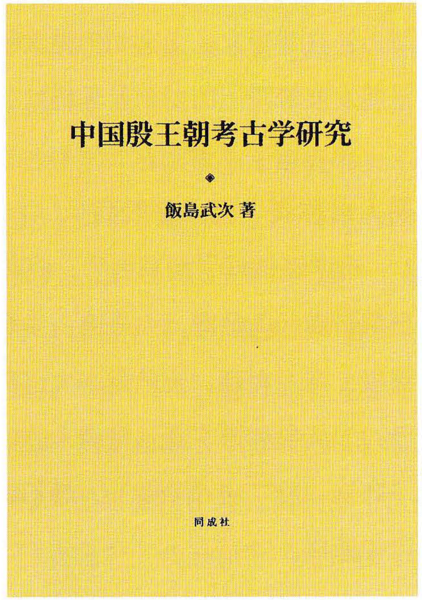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教材《商周考古》（1979）

的编写说明中回顾到，在 1952 年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先生讲授了“殷周”考古。1953—1955 年，他编写了《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 年油印本）。从 1956 年开始，“殷周考古”更名为“商周考古”，由邹衡讲授；并根据郭编《殷周考古》和邹编兰州大学《考古学通论》讲义中的“商周”部分（稿本）加以补充和修改，编成《商周考古》讲义（1956 年油印本）。（北大商周组 1979）

看来，北京大学讲义从“殷”到“商”的名称变化，与郑州商城考古文献中提法的变化是大体同步的。邹衡于 1953—1955 年作为郭宝钧教授的研究生参加了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并整理材料、撰写学位论文（邹衡 1956，李维明 2010），所以应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受郑州商城发掘者的影响，他在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时就将“殷”改为了“商”，比北京大学对“商”的提法还要早些。

1961 年出版的集成性专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述及“商代早期的文化堆积被压在含有典型的殷墟遗物的商殷晚期地层下面”，“商代”“商殷”杂用，而全书使用最多的概念是“商殷”（考古所 1961）。在此后的考古文献中，关于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族属与朝代定性，就基本上统一为“商代”了。

给人的感觉是，最初，二里岗文化被纳入了“殷代”文化系统，随着考古界逐渐确认它早于殷墟文化，就开始用“商代”文化来形容它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殷代”的概念要小于“商代”，“商代”可以涵盖整个商王朝时期，而“殷代”仅限于对商代晚期——殷墟时期的表述呢？



日本学界仍将商王朝称为“殷王朝”、商代称为“殷代”

梳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殷代”的论著，的确基本上“殷代”是指殷墟文化及与其同时的商代晚期。上引邹衡 1956 年的论文，在总体用“殷商”概念的同时，仅于文末谈及商末周初史事时提及“殷代”：“郑州在殷代后期必定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否则武王是决不会封其弟于此以监视殷人的。”（邹衡 1956）这

里的“殷代”，应该就是特指殷墟时期的。近年刊出的《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郑州市院2015），其中的“殷代”，指的也是殷墟时期。集成性著作《商代史》总结道：“从文献学角度论，商积年应称商殷积年，可分作成汤伐桀到盘庚迁殷为商，盘庚迁殷到帝辛（纣）之亡为殷两个阶段。考古学界称前者为商前期，后者为商后期。”（宋镇豪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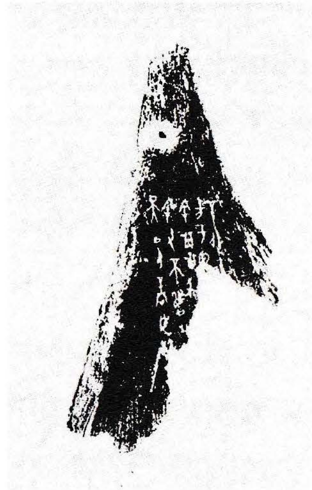
中国学界普遍称成汤建国后的整个王朝时期为“商代”，而日本学界则延续《史记·殷本纪》的传统，称整个王朝时期为“殷代”。而这样的学术选择和传承，是建立在对古典记述怎样的理解上？在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商”和“殷”就有指代王朝发展阶段上的如此差异吗？

商人自称商　周人称殷商

有学者梳理了殷商名号，将其分为自称和他称两大类。其中自称有商、天邑商、大邑商、中商等，他称有戎殷、大国殷、大邦殷、商、大商、天邑商、大邑商、商邦、殷商、殷等。（彭华1999）从中可知“商”是商人的自称，而周人对商的他称则包括“商”“殷”和“殷商”，颇不统一，多可互用，其中“殷”只用于他称。

作为商人自称的商、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均见于殷墟甲骨文。传世文献多记述商族始封于商，至于具体地点、时间，

则颇多争议，见于《左传》《国语》《诗经》《荀子》《史记·殷本纪》等；关于甲骨文中的“商”也聚讼纷纭，一般认为有多重含义（详后）。“大邑商”“天邑商”，既是商人的自称，又是周人对商人的他称，此称除甲骨文外，还见于西周金文和《尚书》等。


甲骨卜辞中的“天邑商”

作为他称的“戎殷”，即大殷，见于《尚书》《左传》《逸周书》等。“大国殷”“大邦殷”，见于《尚书》等。“殷”，见于《尚书》《诗经》《战国策》《逸周书》《国语》《孟子》《韩非子》《礼记》等。“殷邦”见于《尚书·无逸》等。《史记·殷本纪》篇名为“殷”，但正文中“殷”“商”杂用。“殷商”“大商”，见于《诗经》等。“商邦”“商国”，见于《逸周书》《史记·周本纪》等。“商”更习见于《左传》《国语》《诗经》《尚书》《逸周书》和古本《竹书纪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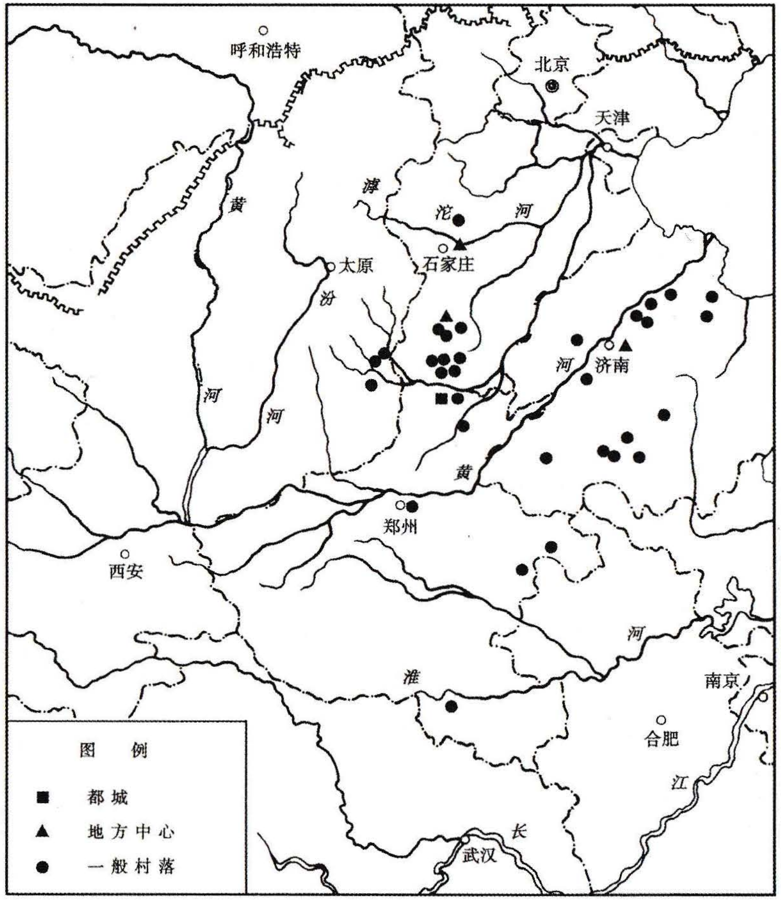
著名学者、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教授论及：周灭商不久后的西周金文中，就有“征商”“克商”“伐商邑”“殷东国”等用例。其中周成王时期的保卣、保尊中的“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尤其引人注目。在现存史料中，或许这是“殷”作为国

名（或广域控制区域）的最早用例。到了周初，在必须称呼被灭对手的场合，才首次出现了殷这样的称呼。这里意指前代，也即国名，属于他称。

可以推知，作为最早编写通史著作《史记》的中国史家，司马迁对上述“商”“殷”原初用法的不同是了解的，所以其第三卷题为“殷本纪”。此后，在史书中，“殷”作为王朝名被长期使用。周将其作为对前代的美称和尊称，即“殷赈”之殷，有丰饶、富足之义。殷是作为他称的唯一的国名，因而非其莫属。（松丸道雄 2003）此即日本学界坚持“殷王朝”而不用“商王朝”概念的缘由。

甲骨文中的“商”究竟何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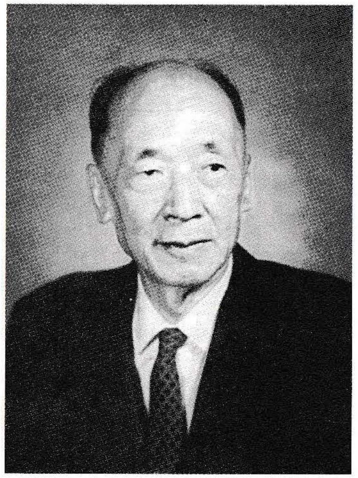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在殷墟卜辞中，“商”字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或用法。其一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如作为商的王畿或国族名来使用；其二是作为一个地名王都、国都来使用的“商”。然而，由于与“四方四土”并贞的“商”，含有中央的意思，所以，即使作为王畿或王国来使用的“商”，也还是以王都为其依托的。因而尽管甲骨卜辞中的“商”包含有作为区域范围和地名两个层面的用法，但这两个层面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即当时王所居的商都，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都即王都是卜辞“商”的含义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至于“中商”实即“商中”，



殷墟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张渭莲 2008）

指的是由王都所代表的商王国的中心区，说的也是安阳殷都，如著名学者胡厚宣、陈梦家等所论。至于“大邑商”，指的是包括国都在内的王畿，并以国都为核心。（宋镇豪 2011）

松丸道雄教授的认识与上文接近又有不同。他认为，“商”是作为邑名来使用的，而作为邑名的“商”有不同的前缀，它们究竟指何处，众说纷纭，迄无定说。松丸教授认为，甲骨卜辞第一至四期的“商”“中商”、第五期的“大邑商”“天邑商”，都是指包括安阳、朝歌、淇县一带在内的半径约 20—30 千米的王都范围，第五期的“商”，或指今商丘市。它们都是邑名（包含周边），指当时殷王朝的支配控制范围所及，而不是指国名。商，是武丁至帝辛在位的殷后期，特指其首都的用语。这属于殷人的自称。殷人没有必要硬造出一个专有名词来表示它自身控制范围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国名），概因没有用此话语的对象和必要。（松丸道雄 2003）注意，松丸道雄教授不认为卜辞中的“商”代表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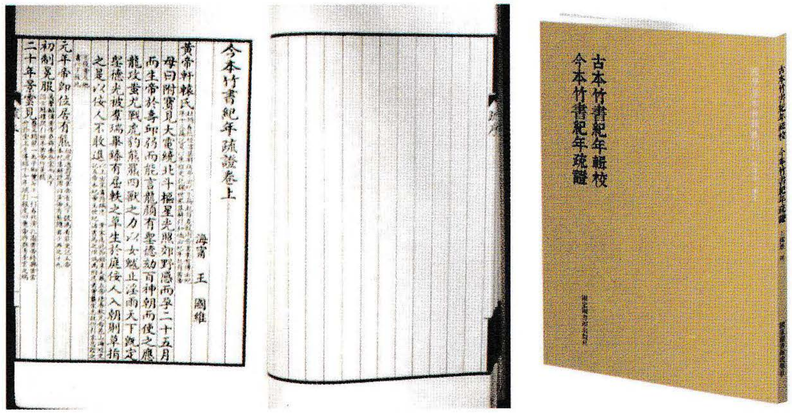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对相关称呼有言简意赅的总括：“以朝代的名称说，照司马迁的记录，是称为‘殷’的；《史记》的《殷本纪》就是记录这一朝代的历史。但‘商’这一名字，却见于比司马迁更早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称它为商；不过今本《竹书纪年》则称为‘殷

商’。在甲骨刻辞中‘殷’字没出现过，但‘大邑商’却见了不止一次。很显然地，盘庚迁殷后，这个朝代的人仍以‘商’称自己。‘殷人’，是商朝时代的外国人对于商人的称呼。一般的推断，是这个朝代最后建都的地方，地名为殷，如《尚书·盘庚》三篇所记，所以远方的人就把它们首都所在的地名，用来代替原来这朝代的名称。”（李济 1990）

“殷”“商”难以论短长

依文献记载，商人早期居地中就有“殷”。王国维据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有“殷王子亥”“殷王甲微”的提法而不称商，断定帝芒时迁于殷的记载是可信的。（王



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论著

国维 1959）金景芳则进一步论证，认为“殷实为商的先公旧居”（金景芳 1983）。如是，殷与商人的关系，并非始自所谓商王盘庚迁殷或安阳殷墟。“殷”的概念，不能限于商代晚期。

松丸道雄教授指出，商，虽为甲骨文时代也即殷后期的首都名，但上溯到殷中期、殷前期是否也如此，却是要存疑的。依据各类文献，尽管中期王城在迁徙时有各种称谓，但其中却并无“商”这一称呼。殷前期长期为都者，称“亳”，但无“商”。因而，如果“商”是殷前期、中期的王朝名，而到了殷后期却被作为都邑名来称呼，倒是难以理解的。（松丸道雄 2003）随后，他在 2005 年郑州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商”这个名称应是殷代晚期的名称，换句话说，是殷都迁到安阳以后的名称。殷都在郑州的时候，连“商”这个词很有可能都没有用过。“郑州商城”的名称是后来的说法，应该改称为“郑州亳城”。“亳”和“商”均是当时王城所在的城市的名称而并不是国名。他说：“我想连‘国名’这样的概念在当时也许还没存在。因此，从亳到商


东京大学松丸道雄教授

的一段时期应该被称为殷。”（松丸道雄 2005）李维明也指出，一般认为“商地是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滴）声地域”（李维明 2014）。

二里岗文化时期尚处于中原地区的“原史时代”，缺乏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该文化人群族属与王朝归属的文书材料。“虽然传世东周文献，如《诗经》《国语》对商史记载可及传说中的先公与商的联系。考古学意义的商文化，据殷墟晚商文化特征，依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向前追溯至郑州二里岗上、下层遗存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但迄今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文献所记盘庚迁殷之前是否称商，仍是学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有待相关材料补充发现，深入探究。”（李维明 2014）

回过头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学界在对二里岗文化年代推定上由“殷”转“商”，将“殷代”限定于殷墟时期，与日本学界坚持以“殷代”“殷文化”指代整个殷商王朝及其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的学术底蕴，是颇令人回味和思索的。文献记述之扑朔迷离，导致现代人的认识和结论，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确定。

三　“亳都”还是“隞都”？

“隞都说”一统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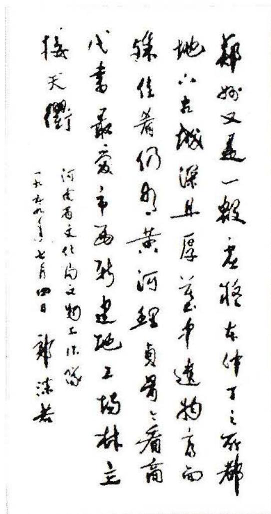
再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郑州商城发掘现场。

1954 年，关于二里岗文化最早的一篇正式考古发掘报告问世。在发掘工作刚刚开始、遗存分布与所属年代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执笔者即做了如下推想：“郑州殷代遗址的范围广大，延续的时代也比较长久，当是殷代的一个重要的城邑。至于《史记·殷本纪》上所说：‘帝仲（中）丁迁隞’，《古本竹书纪年》也说：‘仲（中）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隞嚣是一个地方，过去的考订多主张和郑州相近，但郑州是否确属隞地，还不可遽加肯定。”（安志敏 1954）

随后，邹衡在长篇论文中论及：“就遗址的范围而言，郑州的殷商文化遗址，尤其是其早、中两期，其分布的面积比起安阳小屯的殷商文化遗址来要大，而其包含内容亦很丰富。尤其是炼铜遗址、骨工场遗址和陶器窑址，以及有铜器、象牙器随葬墓和用人殉的墓葬的发现，说明郑州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提示郑州的发现“又新添了一个范围广大与小屯同样重要而又有密切关系的遗址”（邹衡 1956）。他虽列举了传世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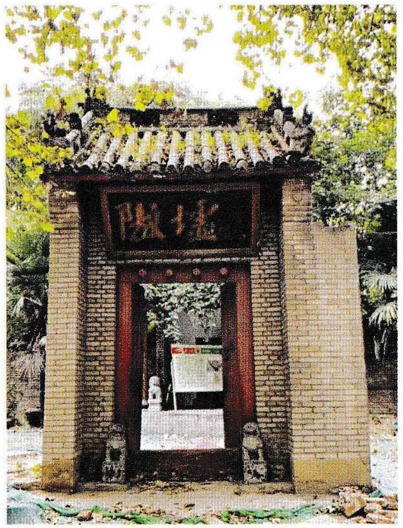
中关于仲（中）丁迁隞（嚣）的相关记载，以及唐至清代关于附近的荥阳故城、敖（隞）山一带为“殷时隞地”等传承性记述，但未做进一步的整合阐发。

1957 年，郑州商城发掘主持人之一的赵全嘏在论文中指出，“很有可能郑州就是文献上所说的仲（中）丁迁徙的商代京城”（赵全嘏 1957）。安金槐也在当年的简讯中，提示“究竟郑州在商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过去曾有人认为可能是‘仲（中）丁迁隞’的隞都。我认为可能性是很大的”（安金槐 1957）。上文提及的安金槐参与执笔的发掘报告因学界对郑州商城年代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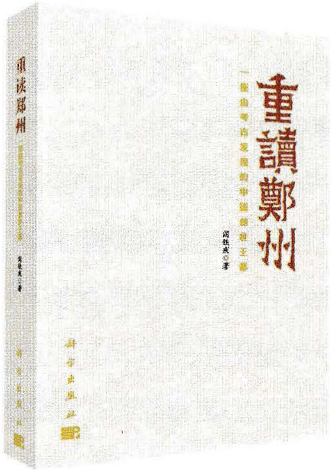


颂郑州

郑州又是一殷墟，
疑本仲丁之所都。
地下古城深且厚，
墓中遗物富而殊。
佳肴仍有黄河鲤，
贞骨今看商代书。
最爱市西新建地，
工场林立接天衢。



郭沫若 1959 年题诗与原“隞墟”景点


阎铁成《重读郑州》（2015）

最后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撰文发表，1961 年才面世的这篇论文在系统介绍包括内城夯土城圈在内的最新发现的基础上，正式提出郑州商城“很可能就是仲（中）丁迁隞的都城遗址”（安金槐 1961）。

其间的 1959 年 7 月，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来郑州视察，在参观郑州商代城址，听取汇报后亲笔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中）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而殊。佳肴仍有黄河鲤，贞骨今看商代书。最爱市西新建地，工场林立接天衢。”现郑州城东路、城北路交叉口西北角有一处景点名“隞墟”，郭沫若题诗的石碑仍竖立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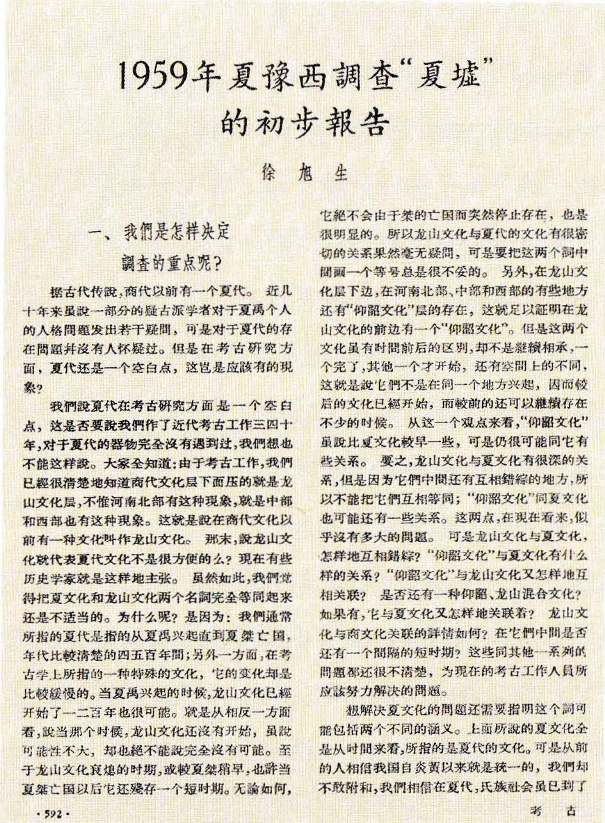
知名学者、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当然加重了郑州商城为仲（中）丁隞都说的分量。但随着郑州商城为成汤所都亳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意见（详后），这处景点也渐冷落。当地知名学者的书中所附“郑州历史大事记”中，竟未收录郭沫若题诗一事，书中也无围绕郑州商城性质问题的讨论（阎铁成 2015），似乎商汤都亳于此已成定论。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郑州商城都邑定名的标签该如何贴，还是仁者见仁的事儿。

扑朔迷离汤都亳

依文献记载，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都于亳。“汤居亳”或类似的表述，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如《孟子》《墨子》《荀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尚书》中有“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记载，《史记·殷本纪》所述与其略同。所以商王朝在早期建都于亳，是可以肯定的。“亳”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从字形上看，该字就是对高台建筑的摹写，大致相当于“京”。古代以“亳”为名的地方很多，早期文献并没有指明汤都亳在何处，这就给后世留下了阐释甚至想象的空间。

先秦文献与司马迁《史记》上语焉不详的记述，在汉代及以后被阐释得越来越详细，地望等细节愈来愈清楚，汤都亳的传说四处开花。到了西晋时代，糅合相互矛盾的诸说，出现了殷商王朝有“三亳”（南亳、北亳、西亳）的说法。此说出自皇甫谧这位勤于笔耕的老中医的笔下，西晋之前从未有此说。尽管如此，当代学者还是大费笔墨加以引用考证，这其中以缺乏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训练的考古学者为甚。

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文献功底深厚，他在系统梳理成书年代偏早的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于 1959 年率队在豫西踏查可能的“夏墟”，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得以发现。他们的初步断代结论是：“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



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徐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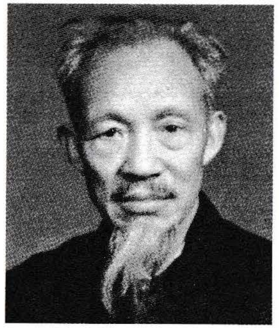
一、我們是怎样决定調查的重点呢？

据古代传說，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近几十年来虽說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問題发出若干疑問，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問題并沒有人怀疑过。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該有的現象？

我們說夏代在考古研究方面是一个空白点，这是否要說我們作了近代考古工作三四十年，对于夏代的器物完全沒有遇到过，我們想也不能这样說。大家全知道：由于考古工作，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知道商代文化层下面压的就是龙山文化层，不惟河南北部有这种現象，就是中部和西部也有这种現象。这就是說在商代文化以前有一种文化叫作龙山文化。那末，說龙山文化就代表夏代文化不是很方便的么？現在有些历史学家就是这样地主张。虽然如此，我們觉得把夏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名詞完全等同起来还是不适当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們通常所指的夏代是指的从夏禹兴起直到夏桀亡国，年代比較清楚的四五百年間；另外一方面，在考古学上所指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的变化却是比較緩慢的。当夏禹兴起的时候，龙山文化已經开始了一二百年也很可能。就是从相反一方面看，說当那个时候，龙山文化还沒有开始，虽說可能性不大，却也絕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至于龙山文化衰熄的时期，或較夏桀稍早，也許当夏桀亡国以后它还殘存一个短时期。无論如何，它絕不会由于桀的亡国而突然停止存在，也是很明显的。所以龙山文化与夏代的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果然毫无疑問，可是要把这两个詞中間画一个等号总是很不妥的。另外，在龙山文化层下边，在河南北部、中部和西部的有些地方还有“仰韶文化”层的存在，这就足以証明在龙山文化的前边有一个“仰韶文化”。但是这两个文化虽有时間前后的区別，却不是継續相承，一个完了，其他一个才开始，还有空間上的不同，这就是說它們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兴起，因而較后的文化已經开始，而較前的还可以継續存在不少的时候。从这一个观点来看，“仰韶文化”虽說比夏文化較早一些，可是仍很可能同它有些关系。要之，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因为它們中間还有互相錯綜的地方，所以不能把它們互相等同；“仰韶文化”同夏文化也可能还有一些关系。这两点，在現在看来，似乎沒有多大的問題。可是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怎样地互相錯綜？“仰韶文化”与夏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怎样地互相关联？是否还有一种仰韶、龙山混合文化？如果有，它与夏文化又怎样地关联着？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关联的詳情如何？在它們中間是否还有一个間隔的短时期？这些同其他一系列的問題都还很不清楚，为現在的考古工作人員所应該努力解决的問題。

想解决夏文化的問題还需要指明这个詞可能包括两个不同的涵义。上面所說的夏文化全是从时間来看，所指的是夏代的文化。可是从前的人相信我国自炎黄以来就是統一的，我們却不敢附和，我們相信在夏代，氏族社会虽已到了

·592· 考古



徐旭生及其“夏墟”调查报告

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而关于遗址性质，则因《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以及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所言“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推断二里头遗址“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徐旭生 1959）。本来是寻找“夏墟”，但却得出了该遗址应是最早的商王朝都邑的结论，这本身就暗寓着这类推论的或然性和不确定性。

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二里头为商王朝初期开国之君成汤所都，而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中）丁所迁隞都、安阳殷墟为商代晚期商王盘庚至帝辛之殷都的观点一时成为学界的共识。邹衡的导师、著名学者郭宝钧在其写就于 1965 年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就述及“（二里头文化）在传说中是汤所都的西亳地，大家都默认此地为早商文化……我们把二里岗文化，规定为中商文化的分界标尺”（郭宝钧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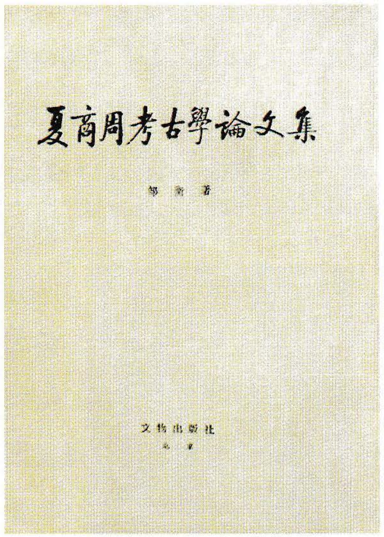
“郑亳说”引起大震荡

所谓“郑亳说”，指的是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创建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的假说。

1977 年，在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年届半百的邹衡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了他积 20 余年的思考与研究得出的新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与此同时，

他还透露出郑州商城应为商汤都亳的想法。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颠覆性的论断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已成定说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郑州商城隞都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众人遂群起而攻之。有学术史论著称其为“搅局者”（孙庆伟 2015）。

1978 年，邹衡正式发表了论文《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1979 年，由其主笔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义《商周考古》提出，“郑州的早商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早商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可能早于商代，而属于夏代的年代范围了”（北大商周组 1979）。1980 年，邹衡教授的个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正式出版，这是他 20 余年潜心钻研的结晶，其中《试论夏文化》《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等数篇系首次发表。（邹衡 1980）这本厚积而薄发的扛鼎之作，一举奠定了他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崇高威望。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

在《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一文中，邹衡举出四大证据，论证郑州商城绝非隞都，而是成汤所居的亳都：其一，古代文献所见东周时期郑地之亳；其二，郑州商城出土的陶文证明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亳城或亳丘；其三，汤都亳的邻国及其地望与郑州商城相合；其四，郑州商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居郑地之亳相合。

此后，邹衡秉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信念，笔战群儒，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大讨论围绕着夏商文化的认知体系蓬勃展开。论争的焦点集中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的亳都还是夏都，郑州商城究竟是隞都还是亳都。（郑杰祥 2002，李伯谦 2003）在考古材料还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参与论战的学者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发现的历史学解释上，集中于大型聚落与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城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族属、王朝发展阶段的比附对应上。同时，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学者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数据的不断推出而校正，甚或改变观点展开新的论战。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 20 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许宏 2009）

究竟是“亳”还是“亭”？

在上引邹衡“郑亳说”的四大证据中，第一、三、四项均属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整合层面的推论，郑州为“亳”没有文献上的确证，是最为“郑亳说”反对者指责的一点。相比之下，第二项郑州出土东周时期“亳”字陶文，可极大地加重“郑亳说”立



郑州出土的战国陶文“亳”（李安等 2022，李安 摄）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亳”字陶文墙（李安等 2022，李安 摄）

论的分量，因而也最为邹衡先生及其他“郑亳说”论者所看重。他们认为，郑州出土数以百计的东周时期“亳”字陶文，与郑州商城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所存“乇”字，构成商代至东周时期“乇（亳）”声地名链。（李维明 2010）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针对邹衡“亳”字陶文集中出土于郑州商城北部和东北部可知“郑州商城在东周时期名亳或亳城，就此成了铁案”（邹衡 1980）的提法，石加（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郑光）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家浩、俞伟超等都主张所谓的“亳”字应改释为“亭”字（石加 1980，俞伟超 1985）。此后古文字学家曹锦炎在其论著中也改“亳”为“亭”（曹锦炎 1996）。

古文字学家吴振武从齐国陶文入手，进一步论证“将此字释成‘亳’字后，相关资料均难讲通”，而从字形上看，郑州出土韩国陶文“释‘亭’说要比释‘亳’说更加合理”。至于齐国陶文中的类似字，李先登、李学勤等均释为“亭”。（吴振武 2012）另一位古文字学家赵平安，虽认为吴振武所释的“亭”字中部分应释为“京”，但他也认为“把‘京’字的异体释为‘亳’，



吴振武考证该战国官玺印文为“左掌客亭”，可知旧释“亳”字应为“亭”

除了字形上的障碍外，主要还是文例讲不通”。郑州出土的“这批陶器为京地制造，故标示‘京’”，所以“颇疑郑州商城就是东周京的故地”（赵平安 2013）。这类近年古文字研究上的新认识，甚至被认为是对“郑亳说”论者认定的东周“亳”字陶文辨识的否定。（陈民镇 2020）

夏商分界问题的胶着

最初，“郑亳说”单挑二里头“西亳说”，而 1983 年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二里头“西亳说”的阵营产生分裂，大部分学者从原来坚持的二里头为“西亳”，转到了认为偃师商城为西亳，这可以称为新“西亳说”。然后，围绕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孰早孰晚、谁更像是“亳”或肯定是“亳”，又是一轮新的论战。二里头遗址分别被推定为夏都斟寻、夏桀所都、商汤都亳，郑州商城则被推定为商汤都亳、仲（中）丁都隞，而给新发现的偃师商城贴的历史标签更是五花八门，从商汤都亳、名相伊尹居城（松丸道雄持此说）、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的桐宫（邹衡持此说）、商王太戊新都、盘庚都殷等，不一而足。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许顺湛曾描述其“观战”的热闹景象：“偃师商城上空飘荡着西亳说和桐宫说两面大旗，郑州商城上空飘荡着郑亳说和隞都说两面大旗，旗鼓相当各不相让，直到今日，两军对峙仍未取得共识。”于是，他提出了商代早期的郑亳、西亳并存，这是中国最早出现


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

的“两京制”的调和说法。（许顺湛 1993、1996）后来又有了夏商时代存在主辅都制的认识（张国硕 2001），显然，这是以“郑亳说”为前提的。

2000 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并通过验收。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在给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年代框架的基础上，认为两处遗址“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西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确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分界的界标”。（专家组 2000）这个初步结论也属调和折中的产物。其实，“郑亳说”的支持者并不认可主都之外所谓“西亳”的存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双界标说”也引来了诸多争议。由于各路专家对年代等相关问题意见不一，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距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的出版已逾 20 年，正式成果报告（繁本）才得以面世。在最新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负责考古方面的首席科学家仍认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商代都邑遗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两者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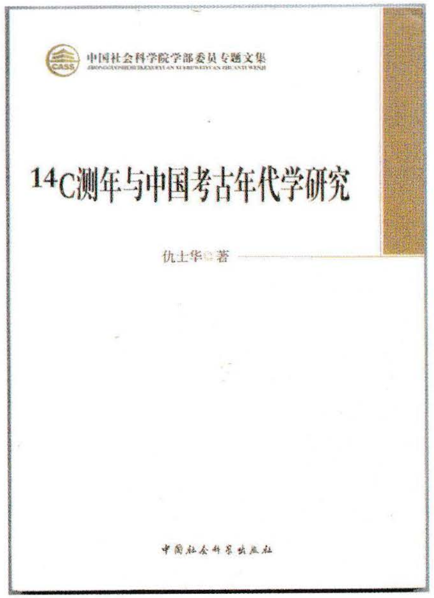
偃师商城考古队里的“亳庐”匾额，与郑州的“隞墟”题字相映成趣

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而负责测年方面的首席科学家则持不同的意见，明言“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最早期的商代文化”（专家组 2022），已如前述。

考古学界先是因徐旭生的推测而认同二里头文化的主体（至少是其晚期）为商王朝的遗存，此后又逐渐形成了以邹衡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对国家级大工程的结论，邹衡志得意满，他早年提出的二里头夏都说和郑州商城“郑亳说”以弱胜强，得到了基本的认可，成为学界的新共识，他也从少数派成为多数派的“领袖”。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阶段性的所谓“共识”或“主流观点”，总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断地变化，“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老话也不能认为就过时了。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主流观点”或“共识”的取得，都不

是建立在获得决定性证据——即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的基础之上的。问题的症结恰如邹衡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邹衡 1978）。准此，则持不同论点者都是把今人依据传世文献而提出的推论和假说当作争论的主要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主流意见”或“共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是无从验证的。据最新的测年结果，测年专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并非如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仇士华最新著作

原来推定的那样在公元前 1900 年左右，而应不早于公元前 1750 年。（仇士华 2015）这一结论似乎又支持了曾经的“主流”意见，也即现下的“非主流”意见，论争也在持续进行。

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接受了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而郑州商城应为汤都亳的观点，却修正了他坚持只有二里头文化才是夏的观点，将夏文化的上限上推到了龙山时代晚期。而这恰恰又是邹衡极力反对，不能接受的。的确，进入王国时代的二里头文化被认为仅属于夏朝后期，而一般认为仍属邦国（古国）时代的中原龙山文化诸遗存，只是因进入了后世文献（以夏亡千年后的战国汉晋文献为主）追述的夏纪年而被认为属早期夏文化。一个被认为统一兴盛的第一王朝，居然前、后段有如此巨大的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所谓夏后期才进入王国文明阶段，那么，这个被称为“夏王朝”的政治体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何在？人们不禁要问。

客观地看，当一个议题多年来聚讼纷纭、久议不决时，是否就要考虑该命题的合理性、可行性或方法论上出了什么问题。显然，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自证性文书材料参与互证，这类狭义史学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

四　三大文化，几大集团？

器用与人群

众所周知，除了更为扑朔迷离，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不见王朝气象的所谓“早期夏文化”（许宏 2016），关于夏商王朝的考古学遗存，被锁定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三大考古学文化之间。

考古学上的“文化”，简单地说就是过去的一群人留下的一套东西及其蕴含的信息。这套东西区别于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另一群人的另一套东西，它包括“不动产”，如房子、墓葬、垃圾坑等，也包括祭祀、生产、饮食、日用等一应物品。考古学家借此解析古代社会，他们最想做的就是“透物见人”，看看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又是怎样留下了这些东西，甚至想探究他们是怎么想的。

上面说的考古学家要解决的事都是考古学的强项，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存在丰富的文献资源的地区，考古学者还不满足于此，基于浓厚的证史传统，他们会花费大量精力，企图参照文献，从这些盆盆罐罐中分辨出原史时代使用不同东西的人群族属和王朝归属。在本书叙述的领域，就是从中区分出夏族、商族，夏王朝



透物见人：从考古学文化看人类社会

还是商王朝，以及商王朝统治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遗存，这就使得问题复杂起来了。

注意这里“文化”的组合是物而不是人，区分一堆东西简单，辨识背后的人群难。因为族群的成立在于其成员的主观认同，而与他们使用的东西并不正相关。虽然某个族群的人会主要使用一套东西，但绝不能认为一套东西只能由一个族群使用，或一个族群只能使用一套东西。这是显而易见的。加之，尽管我们列出了一堆构成考古学文化要素的不动产和动产，但考古学家在区分不同文化的实际操作中最看重的、拿来当作某文化的排他性标志的，还是作为炊器的锅碗瓢盆。显然，这些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更远。

这样，新的问题也就来了。在关于考古学文化背后所属人群身份推断的纷纭众说中，每一观点的持有者都认为自己有过硬的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因素分析上的证据。也正因此，才让我们对这种证据的可信度及其立论前提产生怀疑。显然，其立论前提是，日用的锅碗瓢盆的风格是以改朝换代为转移的。

譬如，认为只有二里头文化才是夏文化者，多认为该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未曾共存、前后相继。持此说者以一支考古学文化只能属于一族一王朝为立论前提，在两支文化间“切刀”，分割夏商，干脆利落。此说将物质层面的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王朝之类人群或其发展阶段等量齐观，而这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都需要加以深入论证。绝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

和殷墟文化同属商王朝文明，即是反证。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材料也不支持这样的推论。（王明珂 1997）

在二里头文化以内“切刀”的学者应该不认同上述观点，但持不同“切法”者的看法又有差别。持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分界，或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分界说者，可以认为是对上述认识做了修正，他们多视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其晚段）遗存为进入商纪年的夏遗民的文化。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由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早期和二里头文化末期都存在下七垣、岳石和二里头三种文化因素可知，它们具有“共时性”。对于偃师商城崛起于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近旁，时间上又大体出现“一兴一废”这些现象，一般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理论，解释为若非夏商更替，断无可能。（考古所 2003）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能自圆其说的一种解释。有利于此说的现象还有，鼎、斝这类二里头文化纯日用陶器，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居然被作为青铜礼器铸造使用。这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铜爵、盉仿自同类陶礼器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这应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可以提升到礼制大变革的层面（许宏 2020），因而最易被认为是改朝换代的物化表征。

但这种从物质到精神文化上的显著变异，却并非发生于两个考古学文化兴替之际。前述铜鼎和圜底铜斝同出一墓，相当于二

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被认为是迄今所知青铜器铸造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而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甚而，这座墓所处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最早期阶段”（宫本一夫 2006）。另有学者也指出，此类圜底铜斝的制器风格一直延续到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李朝远 2006）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件铜器已“属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系统”（高



宫本一夫推定的二里头与二里岗青铜文化的分界

江涛 2014），或干脆将这两件铜器划归“早商一期青铜器”，认为“早商一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除此墓出土的两件外，还包括出有著名的乳钉纹铜爵的贵族墓。这些器物上“开始出现简单纹饰”（袁广阔等 2017），而这些纹饰，的确可以被看作二里岗文化青铜器装饰风格的肇始。

至于二里头宫城和 1 号宫殿的兴建、在彻底平毁二里头文化二期宫室后于其遗墟上另建格局不同的 2、4 号基址、青铜礼容器的铸造使用等，也应是礼制变革的产物，又都可作为有利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说的证据。

再往前追溯，二里头文化二期都邑大建设开始，初现大型宫室建筑群，地域上的势力大扩张也随之展开，陶器群从具有浓厚的龙山、新砦风格到形成自身特色，又可以作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分界说的证据。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哪一家持有决定性证据。故我在《何以中国》一书中，就发出了“难哉，一刀断夏商”的感慨。（许宏 2016）

二分法 vs 一分法

正因为器用甚至建筑之类“不动产”在其所属人群归属上的模糊性，考古学家围绕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大考古学文化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大量推测性研究，几十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已如前述。

最初，“一分法”占据主流。这源自徐旭生踏查“夏墟”中对二里头遗址的基本定性，二里头既然被推断为“商汤都城”，那较其为晚的郑州商城当然就应该属于商代中期，这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学界的共识。而殷墟属于商代晚期，殆无异议。三大文化均属于商文化，是同一人类共同体的三个发展阶段。此即所谓的“一分法”。“一分法”在中国考古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达 10 余年之久，直至 1977 年，邹衡提出二里岗文化应为商代早期文化，郑州商城为汤都亳。多年论战的结果是，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属于商文化的观点占了上风，此即所谓的“二分法”。（郑杰祥 2002，李伯谦 2003）但至今仍有学者坚持二里头文化的晚期为商或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商的观点，如资深学者、亲身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仇士华、殷玮璋、郑光等，中青年学者李锋、毕经纬等，或如本人这样的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无文书证据则暂时无法确知论者。（许宏等 2019A）

需指出的是，以物质遗存为标识的考古学文化，与以社会心理认同为主要特征的族的共同体，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这种认同会在物质层面有一定的反映，但在复杂的人类社会，精神与物质层面的不吻合往往存在甚至会成为常态。就本质而言，“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于物质的活动，和能揣测到物质遗存所能



两部文集收集了众多学者与夏商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

体现的人们的关系及其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张忠培 1999）。“揣测”当然已进入了无从验证的范畴。因此，将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画等号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上的问题。

在以往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夏、商、周三代是不同的族群建立的王朝，它们只能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而一个王朝在同一时段内只能对应于一种考古学文化。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等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王朝归属，大都被认为是排他的。

从对古典文献的梳理上看，夏族应“是以夏后氏为首的夏王朝治下众多氏族部落的统称”。比照商周两个王朝的情况，其王都周围“还居住着一批与两个王朝的王室同姓的贵族及其所属的氏族，如商都大邑商周围的‘多子族’，宗周地区内与周王同姓的……姬姓贵族”，甚至包括“商代甲骨卜辞中与‘多子族’对称的‘多生（甥）族’，以及西周金文所见与诸姬贵

族保有婚姻关系的非姬姓氏族”。所以，“按照商周两个王朝的氏族构成对夏进行考察，所谓夏族主要便是各个夏后氏的同姓及姻亲氏族，是他们构成了夏代国家的主体”。“根据文献记载，组织成夏代国家的那些氏族部落（即所谓‘夏族’）确实很难被编织进一个单纯的考古文化谱系。既然说夏已进入文明社会，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复杂社会是绝不会与一单纯的考古文化相对应的。”（沈长云等 2009）这都是整合研究中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此外，如果我们认可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这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同属于商王朝的文化，王朝存续的不同时段会有重大变化，那么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人类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稍列举后世的例子。秦文化由春秋到秦代，随社会剧变与文化交流而面目全非，但考古学上仍统称秦文化；田氏代齐，王族彻底换人，但考古学上仍统称齐文化；明代因王朝内部集团的更迭而由南京时代进入北京时代，巨变发生于同一王朝之内……学理层面，问题多多。由近推远，应会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进而虑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就考古学而言，除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许宏 200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肯定地排除其他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呢？

“商”之内的再分

前已述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学界共识的商文化三阶段划分，指的是二里头文化=早商、二里岗文化=中商、殷墟文化=晚商的方案。邹衡在其定稿于1977年的力作《试论夏文化》一文中，正式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并给出了细密的关于商文化的分期意见。（邹衡 1980）邹衡教授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日隆的学术声望，导致其观点在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把商文化分为三大期。其中第一期是与夏文化并行的“先商期”，约当成汤灭夏以前。由于郑州商城被认为属成汤的亳都，压在郑州商城之下的文化堆积，和更早的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就被推定为“先商期”的文化，或径称为“先商文化”。


邹衡教授考察二里头遗址（2005）

第二期为“早商期”，或称商代前期，约当成汤灭夏前后至武丁以前。又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以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下层文化”和“二里岗上层文化”偏早阶段遗存为代表；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也即白家庄期）与河北石家庄藁城区台西遗址（河北省所1985）发现的同期遗存，以及随后的“殷墟文化第一期”，被邹衡归到了早商期的第三段。

第三期为“晚商期”，或称商代后期，约当武丁至帝辛，直至西周初年。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至四期。

我们会注意到邹衡的早商与晚商的分界与一般认为的在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不同，而是划在了殷墟文化一、二期之间，其所划分的殷墟文化二期自武丁始，与前文介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分法（将武丁时期一分为二）也小有不同，这是学术观点上的差异。甲骨文的记述自武丁始，中原地区的原史时代至本期也宣告结束。因此，邹衡对早商期和晚商期界限的划定，是有其合理性的。

说起来，关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尤其是青铜器之间无法紧密衔接，存在“晚二里岗阶段”或“过渡阶段”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被美国学者张光直、贝格利和杜朴等注意到。[张光直 2002（英文原著出版于1980年），Bagley 1980，Thorp 1985] 此后中国学者根据新的发现也提示了此阶段独立出来的可能。后来发现的郑州郊外的小双桥遗址和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的主体，恰属这一时期，可作为邹衡划出的“早商期”最后一段的代表性遗存。正是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新的商代中期文化也即“中商文化”被提出（董琦 1998，唐际根 1999，

考古所 2003），新的三分法浮出水面。

所谓“中商文化”，应是考古学文化分期与文献史学分期的混合概念。“商代中期”是王朝史分期中的一个阶段，它不必与考古学文化的起讫密切对应。目前尚没有学者能够同意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白家庄期）不属于二里岗文化，即便采用“中商文化”这一提法的学者也把这一阶段划为二里岗文化的最后一期（考古所 2003），也没有人把洹北商城时期看作独立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之外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如是，则出现了二里岗和殷墟这两大考古学文化被划分成了三部分的情况。

两大考古学文化内的二分法与三分法

<table>
<tr><th>绝对年代（BC）</th><th>阶段划分</th><th>考古学文化</th><th colspan="2">核心遗址</th><th>分布地域</th><th>三段分期</th></tr>
<tr><td></td><td rowspan="5">商前期？</td><td rowspan="5">二里岗文化</td><td colspan="2" rowspan="5">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td><td rowspan="5">郑洛地区</td><td rowspan="4">早商</td></tr>
<tr><td>1500</td></tr>
<tr><td></td></tr>
<tr><td>1400</td></tr>
<tr><td></td><td rowspan="2">中商</td></tr>
<tr><td>1300</td><td rowspan="6">商后期</td><td rowspan="6">殷墟文化</td><td rowspan="6">殷墟遗址群</td><td>洹北商城</td><td rowspan="6">豫北冀南地区</td></tr>
<tr><td></td><td rowspan="5">洹南</td><td rowspan="5">晚商</td></tr>
<tr><td>1200</td></tr>
<tr><td></td></tr>
<tr><td>1100</td></tr>
<tr><td></td></tr>
</table>

在这一编年框架中，商代中期的偏早阶段，“郑洛一带尤其是郑州地区，可能仍是商王朝的都邑所在”；而偏晚阶段，“中心北移至豫北冀南一带”。（唐际根 1999）由是可知，“中商文化”的上、下限都被划定于商王朝在同一都邑及中心区持续发展的时期，而跨地区的远距离都邑迁徙、中心区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商文化人们共同体的人口大移动，则未被作为商代考古大的阶段划分的依据。

鉴于此，由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末期和以豫北冀南为中心的殷墟文化初期组合而成的“中商文化”，只是大体相当于文献所载商王朝自仲（中）丁以来“比九世乱”的特殊时期，只应是对王朝史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概括。（许宏 2006）依这一划分方案，“商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与商王世系有着相应的契合关系。其中早商文化时期大体相当大乙（成汤）至大戊时期，中商文化约相当仲（中）丁至小乙时期，晚商文化则相当武丁至帝辛时期”（唐际根 1999）。

也有三分的可能性？

史载，成汤以前商“先公”时代八迁其居，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的商“先王”又五迁其都，此即所谓的“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前，文献史家经梳理追索，认为“殷人屡迁”的范围大体不出河南、河北和山东三



张光直在偃师商城考察陶器（20 世纪 80 年代）

省。（王国维 1959）考古学家通过遗存来探寻，也不出这一区域。如梁思永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推测："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分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其余不是从龙山文化承继来的那部分大概代表一种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文化。这文化在它没有出现于小屯之前必定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要解决殷代青铜器、文字、兽形装饰的问题，还有待于（小屯文化前身的）文化遗存的发现。"（梁思永 1933）此后，最初认为文献所载商王朝自二里头始，后来认为郑州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是构成商王朝完整系列的考古遗存的观点，成为

无可置疑的定说。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由于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一脉相传，二者在城邑形态、宫室建筑、埋葬习俗、器用组合、艺术趣味等方面都相同，殷墟文化既然已经被证明是后期商王朝的遗存，二里岗文化也有理由认为属于前期商王朝的遗存，将其称作商文化应当是恰当的。"（孙华 2009）

著名学者张光直尽管认定"二里岗期属于商是确定无疑的"，但他敏锐地指出："人们也许注意到文献和传说已成为有力的证据。这在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证据以及人们力图寻找综合性的解决途径——而不是纯粹的考古学方法——的情况下是必然的。""判定一种考古遗存是否为'商'，在过去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只须把新发现的遗存与安阳一类的遗址作个比较就行了。现在看来，文化性质的判定是越来越难，也越来越没有把握。"（张光直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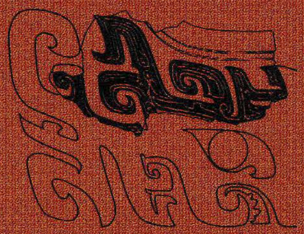
是的，另外的可能性能否完全被排除，还是要做具体分析的。"就考古资料而言，如果两个年代相衔接的遗址间的文化现象关系密切，则通常总是将曾经在这两个遗址生存并留下这些文化的'人们'视为有承袭关系。一般地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不过是否可以视为一般规律却从来没有讨论过。在讨论一个'族'征服另一'族'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考虑到例外的情况。张光直先生倡导商丘项目，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唐际根 2002）另有学者提示，在勾画商王朝政治版图和商代国家政体时，

应注意混淆物质文化与商王朝政体关系的倾向。例如认为与中心文化面貌保持高度一致的山东地区属于商王朝的统治区域时，不能忽略商代晚期尤其是商代末期甲骨文中大量有关商王向东和东南方向用兵的记录（如“十祀征人方”卜辞）；在讨论晚商国家时，应注意受到商王朝控制的周人集团，在文化面貌上与商有别，但却是传统文献明确记载服从于商王朝的政治团体。（刘亦方 2019B）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考古遗存整合分析结论的局限性，由是可见一斑。

回到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大文化的国族推定上。在简述了一分法和二分法论争后，我们再看看三分法的可能性。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应不属于同一人群的论证卷帙浩繁，这里不再赘述。如是，所谓“三分法”，是指不认可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同属商文化，从而提出二者属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的假说。如前所述，郑州商城甫一发现，就被推定为“殷代”“殷商”“商代”遗存。此后，二里岗文化为殷墟文化前身的观点成为定说，众口一词，几无异议。在如此认知背景下，郑州商城不属于殷商的观点就显得格格不入。这一假说，我们留待下篇介绍。

叁

别解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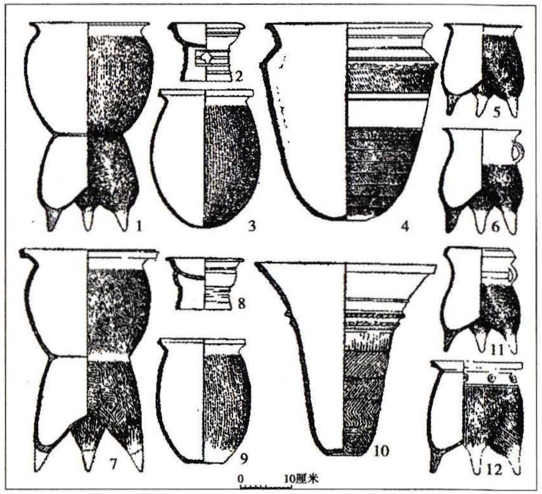


世界考古学近 200 年，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也百年有余，在从传世文献中给不会说话的遗存寻找“标签”之外，更探索出了一整套释读无字地书的“绝技”。充满野心的考古人的视野也从盆盆罐罐，扩展到了人群的生产生计、社会组织、人地关系等方方面面。而这，恰恰是这个学科对大历史探究的最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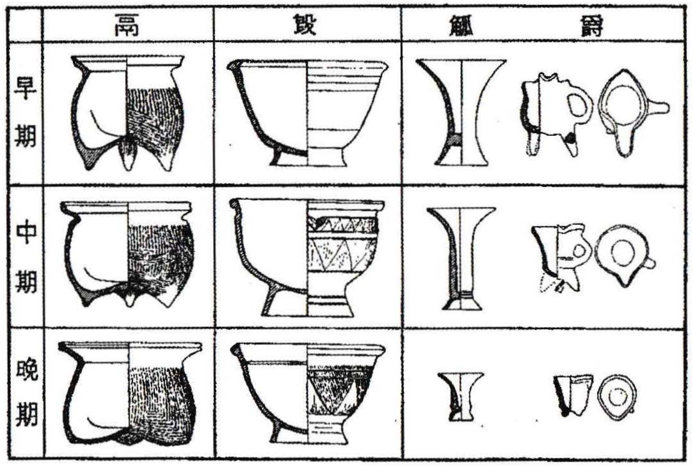
一 郑州、安阳间的变局

被淡化的差异

关于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间的关联，张光直有言简意赅的表述：“最为有力的标志是年代和地域。我们认为郑州二里岗期正好位于传统的商人统治地域的中心”，“在年代上，二里岗期可定在传统的商代纪年的前半个时期内”，“在器型方面，二里岗介于小屯的王朝和河南龙山文化之间，这在青铜器和陶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张光直 2002）



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陶器（1—6 为早期，7—12 为晚期）



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陶器

北大教材《商周考古》（1979）介绍的商代早、晚期陶器演变

在认可二里岗文化系殷墟文化的前身的前提下，多有学者注意到郑州商城与安阳殷墟间文化面貌上的差异，但显然，这种差异性在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同属于商王朝遗存的主流认知的思维中，存在有意无意被淡化的倾向。

张渭莲博士的《商文明的形成》（张渭莲 2008）一书，是系统梳理研究商文明的专著，作者在提炼出二里岗文化与晚商文化特征的许多相似之处后介绍道：

> 但也应当看到，二者间也存在些微的差异。

> 1. 二里岗文化的埋葬习俗中有在墓底铺朱砂、随葬涂朱圆陶片的习俗，在晚商没有看到。
>
> 2. 青铜器中酒器的组合不如晚商规整，青铜器的纹饰与晚商相比较为简单。
>
> 3. 陶器中虽均以鬲和甗最有特色，但二里岗文化中有些器类在晚商未能见到。
>
> 4. 祭祀活动中使用人牲的数量不及晚商多。
>
> 这些差异有些与两个文化所处的地域不同有关，有些则是时代早晚不同所致，属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还有些与现有资料的多寡有关，总体而言是同大于异。因此可以说，二里岗文化与晚商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属于同一民族，二里岗文化确是殷墟文化的前身，即早商文化。

这大体上代表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但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间的差异，远不止上述这些（详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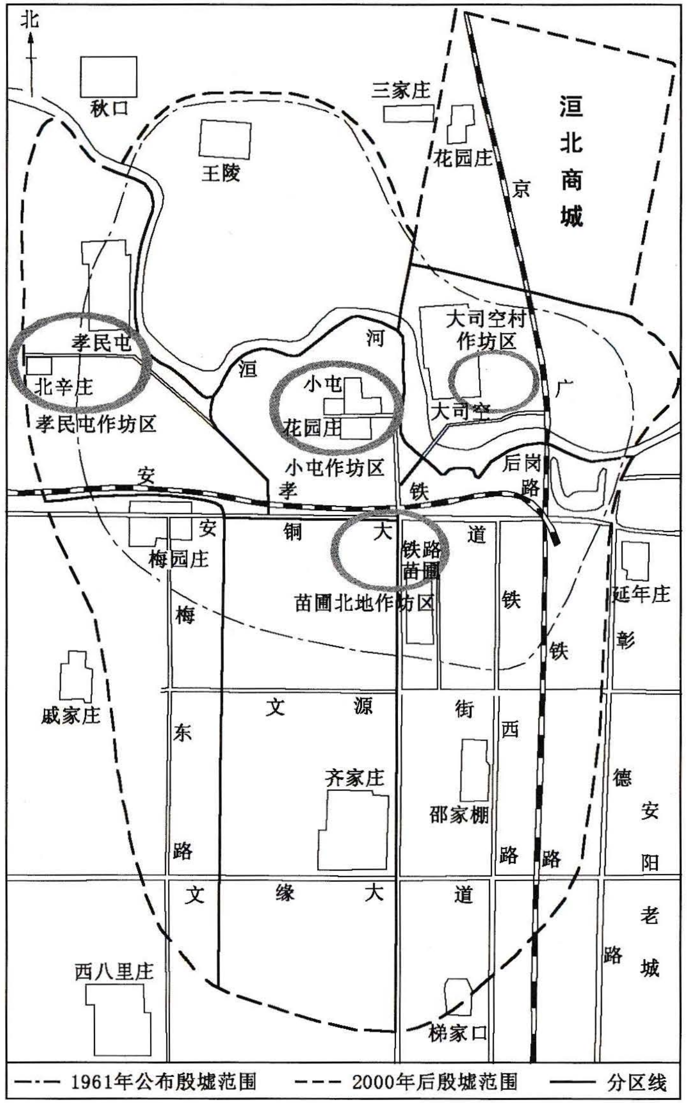
洹北商城与殷墟之别

1996—1999 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开始在洹河以北发现过“殷墟一期偏早阶段”遗存的三家庄至花园庄一带进行钻探和重点发掘，发现了若干夯土建筑基址和圈围面积达 4.7 平方千米的大型方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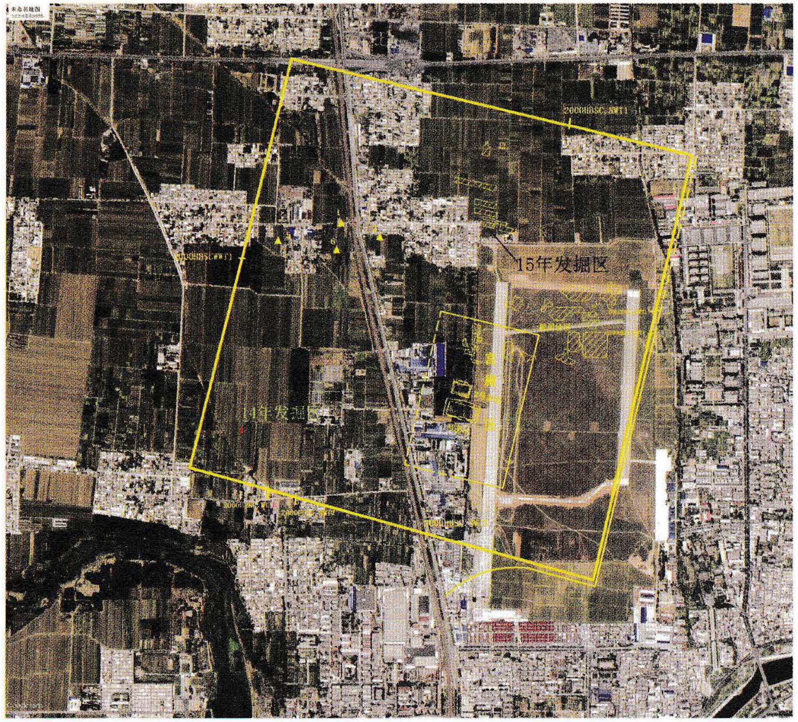
定名为洹北商城。随后开始在城内进行系统钻探，于中南部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已确认夯土基址 30 余处，并发现了铸铜作坊等重要遗存，在其外围发现了面积约 41 万平方米的宫城。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大片宫殿建筑在兴建不久即被火焚毁，刚刚挖就的方壕很快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发掘者认为此处本想筑城墙，但可能并未全部建成），都城的重心就移到了洹南，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的“大邑商”开始兴盛起来。（何毓灵等 2011，许宏 2016B，考古所安阳工作队 2020）

在殷墟遗址群的范围内，发现了这样一处年代较早（约当邹衡分期中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大型城邑，包括发掘者和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是把它当作殷墟遗址群的一部分和殷墟文化的最早阶段来看待的。但参与田野考古工作的加拿大学者荆志淳教授认为洹北商城与洹南殷墟之间很可能有“时间断层”，没有直接的连续性，这有利于解释两座都邑在城市构建、性质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王炜 2014）

据上文，荆志淳论述到，殷墟遗址的布局以王族的居民点为中心，非王族的居民点散布于外围。这样的布局结构与洹北商城差异明显，后者拥有双重城圈、宽厚城墙、巨大宫室和整齐布局，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早期城址更为相像。而考虑到商文化从洹北商城到殷墟在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改变，洹北商城的废弃应该意味着一场危及商王朝存灭的严重危机，武丁成功地解决了这



洹北商城与洹南殷墟全图（孟宪武等 2014）



洹北商城

次危机，他的应对措施在迁居洹南后的一系列变化中可见端倪。至于这场危机究竟是什么，现有的线索也不过是“帝小乙立，殷复衰”（《史记·殷本纪》）等只言片语。

荆志淳通过全面比较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1）物质遗存方面，马车、铜镜、系统文字和大型墓葬都

是在殷墟时期出现的，占卜、人殉和人牲在殷墟时期发展到空前规模，青铜器的生产也达到了商文化的顶峰。

（2）城市布局方面，洹北商城的布局中自上而下的组织发挥了更大作用，殷墟遗址的布局中自下而上的组织（即“自组织”）发挥了更大作用。

（3）文化构成方面，商文化陶器在殷墟一期时变化很大、特征多元，出现了很多来自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类似的现象在铜器等器类中也有表现。

（4）人群来源方面，外来陶器的出现，与殷墟本地居民使用的地面建筑明显不同的半地穴建筑的集中发现，显示了殷墟早期人群来源的复杂；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数量众多的贞人名字也反映了同类现象；此外，出土人骨的骨化学研究也得出了殷墟遗址，尤其在其早期存在较多外来人群的结论。

这种文化和族群上突然出现的多元现象还发现于商代早期早段和西周早期。商代早期早段，带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出现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包括商文化本身都源自位于中原地区东北方向的下七垣文化，偃师商城墓葬中发现的石质葬具表明墓主可能来自北方，暗示南下的族群不仅仅是商人。这些现象表明文献记载中的“改朝换代”在现实中往往意味着文化的大范围交融和人口的大范围移动。由此逆推，如果不是具备明确的文献记载，我们很可能将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视为

一次“改朝换代”。通过比较分析可知，“武丁中兴”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化及其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中兴”。

文化和人群的多元性使得如何团结一致、共建都城这些问题在殷墟早期成为十分尖锐和迫切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包括人祭和人牲、大型墓葬、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提高和规模扩大、系统文字的应用（文字可能就是为了方便不同族群的交流而推广的）等。武丁时期的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商道复兴”（《史记·殷本纪》），商文化臻于鼎盛。（王炜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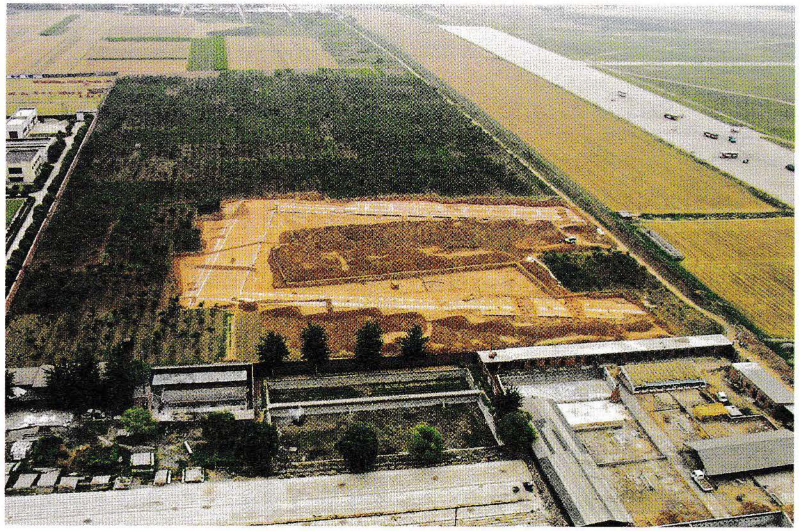
洹北：二里岗基因存续者

我们注意到，荆志淳教授上述解释框架，都是建基于历史文献的。他提及从洹北商城到殷墟在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改变，洹北商城的废弃应该意味着一场危及王朝存灭的严重危机，如果不是具备明确的文献记载，很可能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之间的巨大差异会被视为一次“改朝换代”。而二者间的巨大变化，都可归因于王朝内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如果文献记载不一定就是“明确”的呢？有没有可能，在保有了二里岗文化“文化基因”的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之间的如此差异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呢？

现在我们再回想邹衡教授把“殷墟文化第一期”划归于早商文化而非晚商文化，学界长期以来多不解其意。而后来发现的洹

北商城，恰是这一期最重要的都邑遗存，其文化面貌迥异于以洹南为中心的殷墟文化，已如前述。在考古材料还极为缺乏的当时提出如此卓见，难能可贵。依据邹衡的分期意见从中剥离出“中商文化”的学者，也肯定“邹衡的研究成果是极富预见性的”（唐际根 1999）。

从洹北商城形成的宏观政治背景来看，二里岗文化在广域范围内达到扩张的高峰，在地处豫北冀南的漳河、洹河流域却没有显著影响。郑州商城失去都邑地位之后，小双桥都邑对人群和资源的整合似乎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部分精英北上至洹北商城所在



洹北商城 1 号宫殿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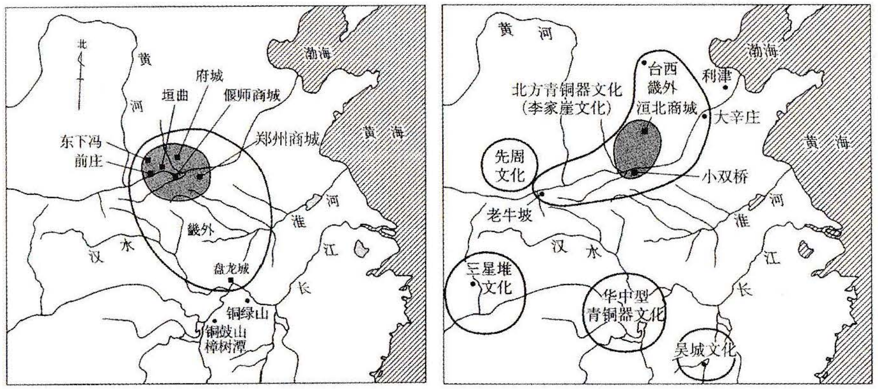
地再次进行人群和资源的整合，二里岗文化在洹北商城所在地域及周围呈现出重新整合的面貌。小双桥都邑代表的国家在极度扩张状态下似乎比较脆弱，某个时间二里岗文化传统突然大规模集聚至洹北商城及其周围区域，明显与人群迁徙有关。（侯卫东 2019）洹北商城作为二里岗文化基因的存续者，而与后来的洹南殷墟文化有较大差异，其历史背景耐人寻味。

另据郑州大学李民教授考析，盘庚始迁漳南、洹北之地，有的文献称其为漳南之商丘，或称亳。洹北、漳南之殷墟与洹水之南的殷墟二地关系密切，合则称之为殷，后世称为殷墟，析则分别称为亳、殷。（李民 2007）洹北的城居然可称为“亳”，亦可旁证其与洹南殷墟的关系，远不如与郑州商城密切。

扩张与“收缩”的反差

关于二里岗文化的扩张与殷墟文化的“收缩”之间的强烈反差，我们可以引《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对二者的比较分析：

> 早商时期，商文化的分布与商族势力的扩张有极大的关系。在早商时期不同阶段，商文化的分布态势有所不同。……到早商二期之时，随着商王朝的巩固，商族势力大规模扩展，北到冀南的磁县下潘汪，南到黄陂盘龙城，东到豫东的鹿邑栾台等地，都有早商文化分布。早商三期之时，商族势力进一步扩张，遗址点数量急剧增多。往西进到陕西耀县、铜川一线；往东整个豫东地区，商文化开始代替原有的岳石文化，甚至泰沂山脉以北的济南大辛庄都是商族的势力范围；往东南方向，在江淮地区，商族势力已达巢湖以东的大城墩一带；南部逐渐形成以黄陂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往北，商文化重返太行山东部一带……大体覆盖了原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的主要分布区，甚至远至太行山以北的壶流河流域。
>
> （早商文化的）八个类型均为早商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共性远远大于个性。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超过了夏文化及以前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至中商文化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比晚商时期还要大。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应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应是政治组织的完善和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



二里岗期（左）至殷墟期（右）商文化的分布态势（宫本一夫 2014）

> 晚商时期全局范围内的文化大动荡，使得各地商文化遗存以新的面貌出现，从而改变了中商时期的文化分布格局。……与中商时期不同的是，晚商诸类型中，殷墟类型的遗存最为丰富，一直在所有晚商类型中居于核心地位。……一部分中商类型至晚商时期已不复存在，如盘龙城类型、高皇庙类型等。一些类型本身的文化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如泰沂山脉北侧，中商时期以鲁西北、济南一带遗址密度较高，是文化的繁荣地带，但至晚商时，青州地区的商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形成苏埠屯类型。……与早、中商相比较，晚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商文化在西、南两面大大收缩。今湖北、陕西、山西、江苏境内许多原早商和中商文化分布带，至晚商时期不复为商文化的滞留地，而为性质不同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所取代。惟山东境内商文化向东保持着微弱的进取势头。（考古所 2003）

如上所述，在相当于郑州商城至洹北商城存续时段的早商文化和中商文化，与以洹南为中心的殷墟文化（殷墟二至四期）之间，对外文化分布态势也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在这两段文化均属于商王朝文化遗存的认知框架下，这种反差被解释为伴随王朝中期的频繁迁都和最后定都“河内”地区安阳的国势所致。但郑州与安阳间大变局的考古线索还远不止于此。

二　难解的殷墟“新生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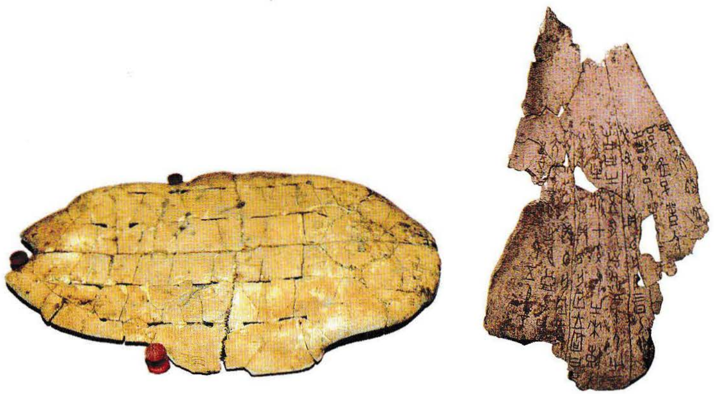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不妨依照邹衡教授的分期方案，先列表看看“晚商文化”（洹南殷墟所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二至四期）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是此前的“早商文化”（郑州商城和小双桥所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和洹北商城所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一期）所没有或罕有的。

“早商文化”与“晚商文化”要素比较

	郑州商城—洹北商城	洹南殷墟
都邑布局	方正宫城＋外垣（壕）	以王族宫庙区为中心散居
派出据点	多有。望京楼、府城、东下冯、古城南关、盘龙城等	罕见
控制与影响范围	扩张，区域广	收缩，区域狭
王陵区	—	有
斜坡墓道大墓	—	有
大规模杀殉	—	祭祀坑约 3000 座，殉人至少 3 万
文字	郑州采集牛骨刻辞少量，小双桥朱书陶文若干	甲骨约 15 万片，单字近 5000 个
马车	无家马，发现小型车车辙	马拉车，车马坑 100 余座
北方系铜器	少	多
铜兵器比例	礼容器 80%，兵器 15%	礼容器 25%，兵器 53%

生而早熟的甲骨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阳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书写系统。尽管这样的假说受到新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片上可能是书写证据的挑战，然而，甲骨文发现的早期阶段尚未被发现这仍旧是一个事实。”（李峰 2022）是的，成系统的、高度发达的甲骨卜辞，是殷墟文化第一、二期之间，也即邹衡所划分的早、晚商之间最大的“新生事物”。这种刻写于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内容以商王及其宗族的占卜记录为主，少量为记事刻辞。殷墟遗址共出土约 15 万片刻字甲骨，其中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有 3.5 万余片。迄今所见单字近 5000 字，可识并公认者 1000 余字，是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



刻辞卜甲与刻辞卜骨

中国文字起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作为记录历史事件的文字功能看，早期文字经历了从“文字性符号”“文字画”到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正式文字产生过程。从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和图案，特别是出土器物与殷墟甲骨文形体比较情况来看，中国早期文字性符号的起源在距今 8000—7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大溪文化时期，距今约 5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是文字性符号大发展的时期。汉字体系的正式产生在距今 4500—4000 年之间的龙山时代。（王晖 2011）

此后的二里头时代仅发现了零星的陶器刻符。尽管郑州商城发现了少量牛骨刻辞，小双桥遗址发现了若干朱书陶文，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部分青铜器上有铸铭，但这些零星文字，仍无法与殷墟甲骨文“无缝衔接”，如此规模的甲骨“档案库”的出现，颇显突兀。

殷墟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语言文字系统，有一定的刻写形式及行文规则，能代表当时社会所公认的意义与发音，肯定也合乎当时人的说话顺序且不易发生语意上的混淆。（宋镇豪 2005）“象形、象意及形声的造字法都在甲骨文中出现……最进步的形声字大致占有可识字的百分之二十。”（许进雄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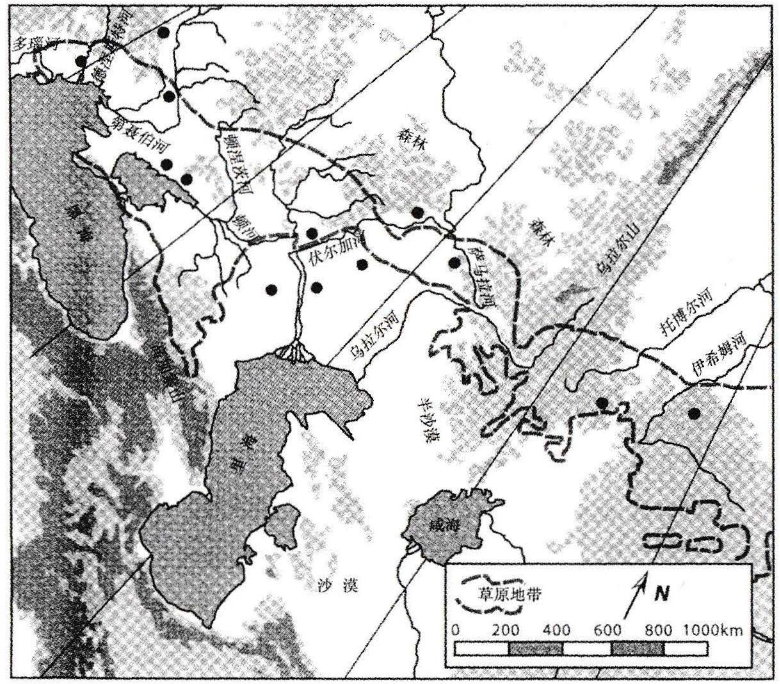
马车的突然出现

马的驯化和轮车的发明情况，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展开而

不断明晰起来。21 世纪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太遗址发现了家马驯化的痕迹，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500 年。参与研究的学者认为这里的居民已经开始驯化和管理马匹了。（蔡大伟 2021）从公元前第 4 千纪开始，马逐渐从南俄草原南传至安纳托利亚和伊朗地区。至迟在公元前 2100—前 1800 年，伊朗地区已开始使用家马。在此之前，苏美尔人至晚在公元前 2500 年便有了驴拉板轮车。当马约在公元前 2200—前 2000 年传到中东时，它们被作为拉车动物使用。约公元前第 2 千纪早期，欧亚草原和小亚细亚半岛几乎同时出现了马拉辐式双轮车。（郭物 2004）如在公元前 2000—前 1750 年间，被认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前身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的遗址中，墓内随葬有车马，与其他殉牲和青铜器等随葬品伴出。（杨建华 2007）到公元前 17—前 13 世纪时，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草原逐渐兴起并向东扩张，以发达的冶金业、轻型战车和大量驯养马匹的应用为文化特色。（邵会秋 2009）

要之，关于马车的最早起源地，学术界还存在着欧亚草原和西亚两大起源地之争。但无论最早的马车起源于何地，西亚与欧亚草原都具备了发明马车的必要条件：（1）家马的驯化、引进和使用；（2）无辐车的广泛应用；（3）揉木技术与金属工具的熟练应用等。（王海城 2002）

最新的基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早期的家马并非起源于普氏



欧亚草原中西部铜器时代及此前与马相关的遗址分布（大卫 · 安东尼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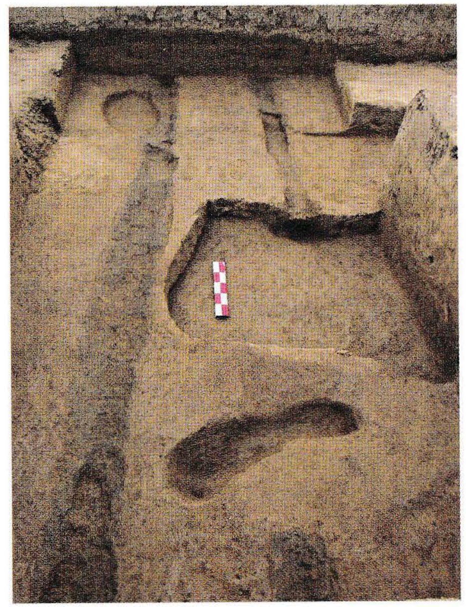
野马。英国学者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 17 个地点的 400 多匹马的 DNA 分析，指出欧亚大陆东部马群的遗传结构的形成与古代贸易路线密切相关。（Warmuth 等 2013）中国学者对陕西省神木县石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进行的古 DNA 分析表明，它们所属世系最早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青铜时代遗址，欧亚大陆西部的马群应是经新疆、西北地区被引入中国。（蔡大伟 2021）另外

的研究表明，约 4000—3600 年前，在中国甘青地区已经存在驯化的马。甘青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可能是家马传入中原地区的通道。现阶段还是应把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定在商代晚期，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利用。（袁靖 2015，菊地大树 2019）

在早于殷墟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都没有发现马骨的证据。（袁靖 2015）但在河北省内丘县小驿头遗址二里岗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幼体马骨骼与铜镞、少量陶器碎片共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998），这一现象引人注目。目前中国最早家马的出现地殷墟遗址位于河北平原，家马从北方草原地带进入中原的可能性很大，而小驿头遗址恰位于殷墟以北约 120 千米处。“通过出土状况，推测小驿头遗址出土的马以何种形式与人类产生了关联，或许可以将家马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从商代晚期追溯到商代早期。”（菊地大树 2019）

总体上看，新石器时代至晚商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并不适宜马的生存，当时的人们虽已识得家马，但只能与家马保持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不太具有大量引入家马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文化接纳是域外动植物本土化进程最终完成的标志。只有某一种动植物在社会文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喜爱、崇拜的对象，才能说明这种动植物已完全融入迁入地并完成本土化进程。家马在晚商以后，逐渐在北方地区被赋予社会功能、文化意涵，标志着其本土化进程的完成。（赵越云等 2017）那么，为什么家马到了殷墟时期才被“文化接纳”并完成了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本土化，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车。在东亚大陆，已知最早的车辙见于龙山时代的河南周口淮阳区平粮台遗址，距今约 4200 年。（秦岭等 2020）稍后的洛阳二里头（考古所 2014）、偃师商城（考古所 2013）、新郑望京楼（郑州市院 2016）等遗址都曾发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车辙痕，轨距在 0.9—1.2 米间。这些车辙一般被推定为双轮车，但也不能排除这些辙印是类似雪橇那样的无轮车辙的印痕，故其是否属双轮车的辙印，尚无法遽断。如前所述，鉴于二里头、二里岗时代的中原尚无家马发现，即便这些辙痕是畜力车的遗痕，这些车也应该不是马车。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车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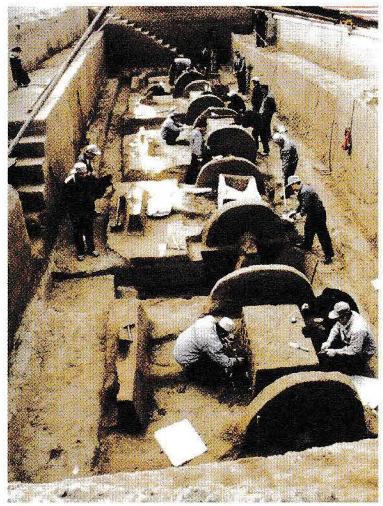
郑州商城的发掘者曾认为紫荆山北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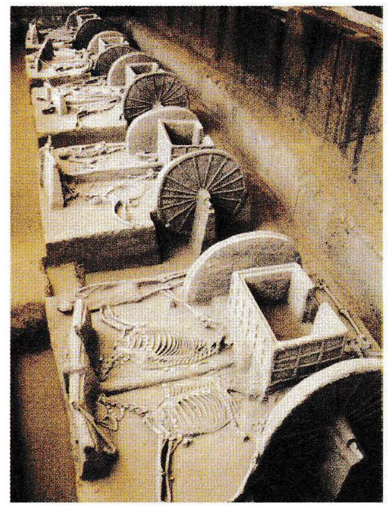
铜作坊出土的2件陶范为“车轴头（车軎）范”（河南省所2001），后经学者实物检视，并非车軎范（常怀颖2017）。另，偃师商城大城东北隅曾出土1件青铜车軎，正式报告《偃师商城·第一卷》明确说明，“后经有关专家鉴定青铜车軎和辖为东周时期器物”（考古所2013）。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早于殷墟的车马器出土。

20世纪30年代，安阳殷墟遗址的大墓和车马坑中已有零星车马器发现，但囿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还无法将马车的全貌清理出来。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首次成功剔剥出仅存痕迹的木构车，随后的1953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又成功清理出了马车的残迹，搞清了车子的大体结构。（考古所1994）据近年统计，已发掘的殷墟时期车马坑达100余座，见于报道的就有80余座。（何毓灵2020）与高等级墓葬的陪葬或墓祭有关的车马坑和车坑、马坑，主要分布于洹北的西北冈王陵区、大司空村区域，洹南的小屯宫庙区一带、殷墟西区墓地以及梅园庄、戚家庄、郭家庄等处。（常怀颖2017）一般一坑埋1车2马，也有埋1车4马、2车2马和6辆车的。在吴晓筠博士统计的26个马车埋葬的单位中，可辨车23辆、殉马46匹、殉人21人。（吴晓筠2009）

这些车均属王邑高级权贵的陪葬品或祭祀品，出自王陵区、小屯宫庙区内和一些贵族墓地。往往两两成组，埋于墓内、墓道

中或墓道旁。这种车马葬的双车制，正再现了当时等级礼制的车服制。多数车马坑中，有陪葬人1—3人不等，生前身份可能是御者、卫士或保养车马者等。这些车的制造工艺和装配机构，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为政权利益直接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亦仅限于少数人使用。由卜辞记载可知，车行所抵地域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宋镇豪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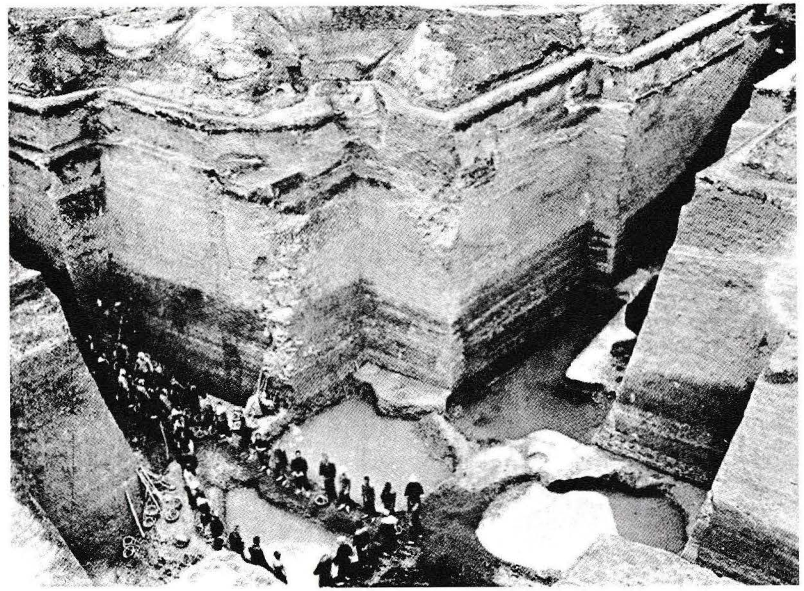


殷墟车马坑

多墓道大墓的现身

大型墓葬，当然是社会复杂化之后，贵族甚至是王才能拥有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曾梳理过中国王墓的出现。（严文明 1996）他列举了浙江杭州良渚、山西襄汾陶寺和山东临朐西朱封三处所发现的龙山时代大墓，认为它们“即使不能确定就是王墓，也应很接近于王墓了”。大量的随葬品自不待言，就墓葬规模而言，最大的西朱封大墓在 27—28 平方米，其余均在 10 平方米以下（2002 年发现的陶寺文化最大规模的墓葬 M22 也不足 20 平方米）。随后的二里头都邑二号宫殿基址中曾被认定为“大墓”的 M1，面积为 22 平方米，已被确认为“夯土井”（许宏 2017B）。在二里岗国家的主都郑州商城和辅都偃师商城，都没有发现王墓和高等级的贵族大墓。整个二里岗文化时期，最大规模的墓葬面积为 12.8 平方米，见于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湖北省所 2001）。至于形制，上述这些早期大墓均为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没有墓道。

再往下，就是安阳殷墟所见的超大规模的王陵和高级贵族墓了。显著的变化发生在邹衡所分“早商期”（《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早商、中商）和“晚商期”之间。据郜向平统计，在从郑州商城至洹北商城的“早商期”，几乎仅见 10 平方米以下、包含两个等级（第三、四等级）的墓葬，而从洹南殷墟的“晚商期”开始，超大型墓葬突然出现。其中第二等级的墓室面积在 8—150 平方米之间，多数带有一或两条墓道；第一等级墓葬都位于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共 9 座，墓室面积在 200—400 平方米之间，其中 8 座大墓各有四条墓道，另 1 座无墓道，可能是未建成的墓葬。（郜向平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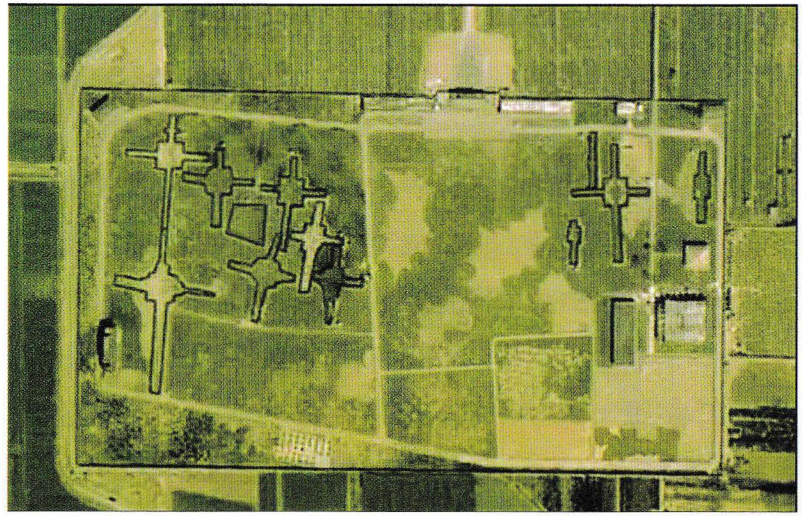
带有长墓道的殷墟商王大墓

商代墓葬等级分类表（郜向平 2011）

等级／面积（平方米）／阶段	一	二	三	四
Ⅰ			3-1（含 1）	1 以下
Ⅱ		12 左右	4-1（含 1）	1 以下
Ⅲ			8-1.3（含 1.3）	1.3 以下
Ⅳ	200-400	150-8（含 8）	8-2.5（含 2.5）	2.5 以下
Ⅴ	200-400	150-8（含 8）	8-2.5（含 2.5）	2.5 以下
Ⅵ	200-400	150-8（含 8）	8-2.5（含 2.5）	2.5 以下
主要特征	四墓道、规模宏大；皆位于殷墟西北冈王陵区	多数带有一或两条墓道；未被盗者随葬品极为丰富，常有殉人、人牲	较多出有青铜或陶礼器；铜、玉、石、骨、贝、蚌等器数量也较多；常有殉人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或者没有随葬品；玉石器和铜、陶礼器都很少见；兵器也相对较少；基本不见殉人
墓主身份推测	一般认为是商王	高级贵族	中小贵族	平民

注：第一等级墓葬均为口部面积。表中第Ⅰ—Ⅲ阶段，相当于邹衡的“早商期”，第Ⅳ—Ⅵ阶段，相当于邹衡的“晚商期”。

西北冈王陵区的范围，东西长约 450 米，南北宽约 250 米。可分为东、西二区：西区是大墓区，有四墓道大墓 7 座，未完成的大墓 1 座，8 座墓分为 4 排，仅见有少量小墓。最新发现王陵





殷墟王陵区与新发现的围沟

区有围沟环绕，已探明北段190米，东段超过230米。东、西区围沟相距40米。东区围沟东西长约246米（以围沟四面中部的沟中心为基准计算），南北长约236米，近正方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2022）其内以祭祀坑为主，但也有几座大墓，其中四墓道大墓1座。墓道最长逾60米。这9座大墓均应是商王的墓葬，自武丁至帝乙，未修成的墓应是末代商王帝辛的。（考古所1994）

大规模的人牲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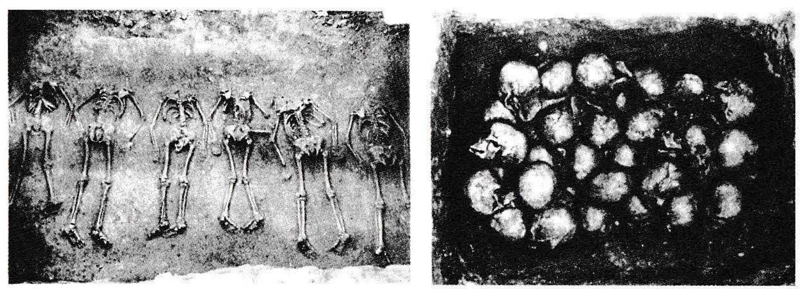
人牲（也称“人祭”），是用活人做牺牲，杀之以祭神灵或祖先，属于供“食”的供祭品，所以用的是俘虏、“仇人”。人殉，是用活人去为死去的有权势者殉葬，属于从死者，因是供“用（役使）”的，所以要避仇敌，用亲近者，殉者与被殉者的关系是二者生前关系的继续。

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二里岗时代，人牲（又分祭祀类和奠基类两种）和人殉规模较小，所用人数多为一至数人。与殷商王室高度重视的占卜行为大致同步，其祭祀活动也极为频繁，尤其是祭祖的仪礼活动最为隆重，使用人牲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相比，仅用于陪葬的殉人数量要少得多。有学者评价，在商代，“商王统治区及其四邻方国，实行着极为残暴的人牲制度”（黄展岳2004）。其实，这种极为残暴的、大规模使用人牲的现象，集中见于殷墟时期，而罕见于其前的二里头时代、二里岗时代和

其后的西周时代。

在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东区，众多的祭祀坑组成了殷商王室长期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经勘探和多次发掘，推测祭祀坑和少数陪葬墓的总数不少于2500座（近年，又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考古所安阳工作队2022）。已发掘近1500座，其中人牲坑近千座，采集人牲标本3460例。如果把这批人牲作为祭祀王陵区迄今已发掘的14座大墓墓主的人牲，平均每座大墓约占66座人牲坑，牲人数约247人。殷商王室不但要在祖先埋葬时杀祭一批人埋放在墓室内、填土中和墓道附近，还要在王陵区祭祀场定期杀人追祭祖先。

据甲骨刻辞记载，商王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每次祭祀所用的牺牲，有牲畜也有人，“伐人”“用人”之数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据统计，殷墟小屯宫庙区发现牲人遗骨702具，侯家庄王陵区祭祀场发现牲人遗骨3455具，其他地点发现牲人遗骨362具，



商王大墓墓道中的无头肢体（左）和王陵区祭祀坑中的人头（右）

合计 4519 人，而甲骨刻辞所见人牲总数为 13052 人。（黄展岳 2004，考古所 1994）李峰推断至少有 30000 个殉人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李峰 2022）

关于祭祀坑中人牲的人种问题，大致有异种系说和同种系说两种意见。持异种系说的杨希枚根据对 20 世纪 30 年代发掘的头骨研究，认为"西北冈殷代的殉葬墓中的头骨所代表的人群，大体上说，可能主要包括北亚的类蒙古人种和次要的海洋类黑人种，以及最少类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持同种系说的韩康信、潘其风则认为"实际上更为可能是由蒙古人种主干下的类似现代东亚、北亚和南亚种系组成的一大组头骨，其中仍以接近东亚类的占多数。体型上的这种多种类型，可以用殷人同四邻方国部落的征战中，虏获了不同方向来的异族战俘来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 1985）

与殷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自然崇拜祀典偶尔用人之外，周人先世没有用活人祭墓的传统，也不存在宫殿宗庙的建筑中使用人牲的习俗。西周立国后，似乎也不继承殷人的这两种恶习。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西周贵族墓里和墓地上，罕见用人祭祀，宫殿宗庙建筑中，也未见奠基牲。（黄展岳 2004）由殷墟时代及其前后的情况看，殷商集团大规模的人祭、人殉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北方因素大汇聚

安阳殷墟考古领队何毓灵，近年刊布了他系统梳理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的成果。其中，相较于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文化因素，比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北（西北）方的文化因素。（何毓灵 2020）我们且看看他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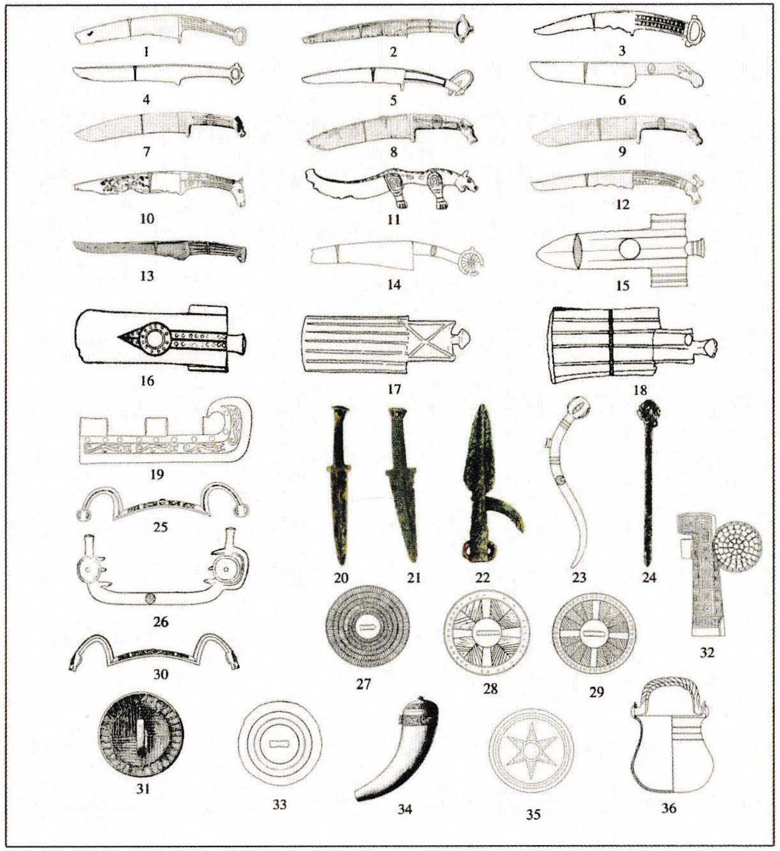
首先，具有北（西北）方文化特征的青铜工具、兵器甚多，此外还有青铜车马饰件、镜、錾刻圆盘形器、角杯、鍑形器等。

环首刀：出土较多，系北方草原地区常见。大体自二里头时代、二里岗时代就被中原地区所接受。殷墟出土的环首刀很大可能是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殷墟本地制作的。其中的三凸环首刀，环首外有三凸纽，多见于晋西陕北一带的李家崖文化（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

兽首刀：有龙首、马首、牛首、羊首、鹿首和虎形柄等，制作精美。北方地区同类器多为马首，少见牛首、羊首。殷墟的牛、羊甚至鹿的造型，极可能是模仿马首刀制作的。

蕈首刀：柄首呈鸡心形，下端有枣核形小孔。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山西柳林高红遗址曾出土有类似铜刀。

铃首刀、铃首短剑：铃首是北方青铜器特色装饰。殷墟出土的铃首刀与河北青龙抄道沟遗址出土的北方系统同类器的形制略有不同，可能为仿制。



殷墟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铜器

1. 环首刀　2、3、4. 三凸环首刀　5. 龙首刀　6、9、10. 马首刀　7. 羊首刀　8. 牛首刀　11. 虎形柄首刀　12. 鹿首刀　13. 蕈首刀　14. 铃首刀　15—18. 管銎斧　19. 管銎刀　20、21. 铃首短剑　22. 带钩铜矛　23、24. 铃首锥形器　25. 铃首弓形器　26. 马衔　27—29、31、33. 铜镜　30. 马首弓形器　32. 铜杖头　34. 铜角杯　35. 錾刻圆盘形器　36. 鍑形器

铃首锥形器：柄端呈铃形，镂孔中空，内有铜丸，下端呈锥状。此类铜器多见于北方草原，可能用于缝制皮具等生产活动。

管銎斧：在晋西北的李家崖文化青铜器中经常出现。殷墟出土管銎斧形制与其略有不同。

管銎刀：其上所饰夔龙纹是典型的殷墟文化元素，这表明该刀可能受北方影响，在殷墟当地铸造而成。

带钩铜矛：殷墟出土了一件带钩铜矛，属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风格，但与该文化的铜矛相比，殷墟出土的带钩铜矛叶面很窄，形体也较小。（高江涛 2015）由成分检测也可知此铜矛的金属成分与殷墟青铜器的成分基本一致，可见此器应是在殷墟青铜作坊内铸造的，属仿制器。

此外还有以“弓形器”为代表的车马饰件。殷墟出土 80 余件弓形器，多数出自墓葬或车马坑，偶见于祭祀坑。多数学者认为其应是车马器的一种，极有可能是驭手束于腰间，拴挂马缰之用。弓形器最早出现于北方地区。与马车一同传到殷墟的还有马与车上的配件和饰件，其中青铜 C 形马衔应与源于草原地带的骑马技术有关。（黄铭崇 2015B）这些器物很快就在殷墟铸铜作坊中生产。此外还见有玉质 C 形马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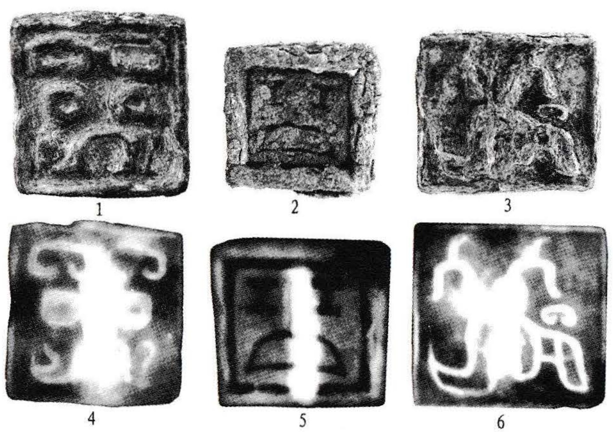
镜：共出土 6 面。是迄今所知中原地区最早的圆板带纽铜镜，一般认为与内亚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有关。（吴晓筠 2017）有的铜镜饰有殷墟特有的龙鳞纹。

角杯：器身外设有一贯耳，用以悬挂，饰有殷墟特有的夔龙纹。此类器主要见于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

錾刻圆盘形器：用途不明。其錾刻工艺和六角星形图案，被认为是北方草原青铜器特征。

鍑形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体现了中原殷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只是器底有铭文，可能是仿北方鍑形器铸造的（郭物 2003）。

此外，殷墟发现的 3 枚铜印章，呈方形或近方形，引文内容可分为文字、文字 + 肖形及肖形三类。其主要功能与青铜器铭文类似，用以标识主人的私名或氏族。（何毓灵等 2012）这是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铜印章。河南渑池郑窑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的陶戳形器，应具备印章的徽识功能。（河南省所等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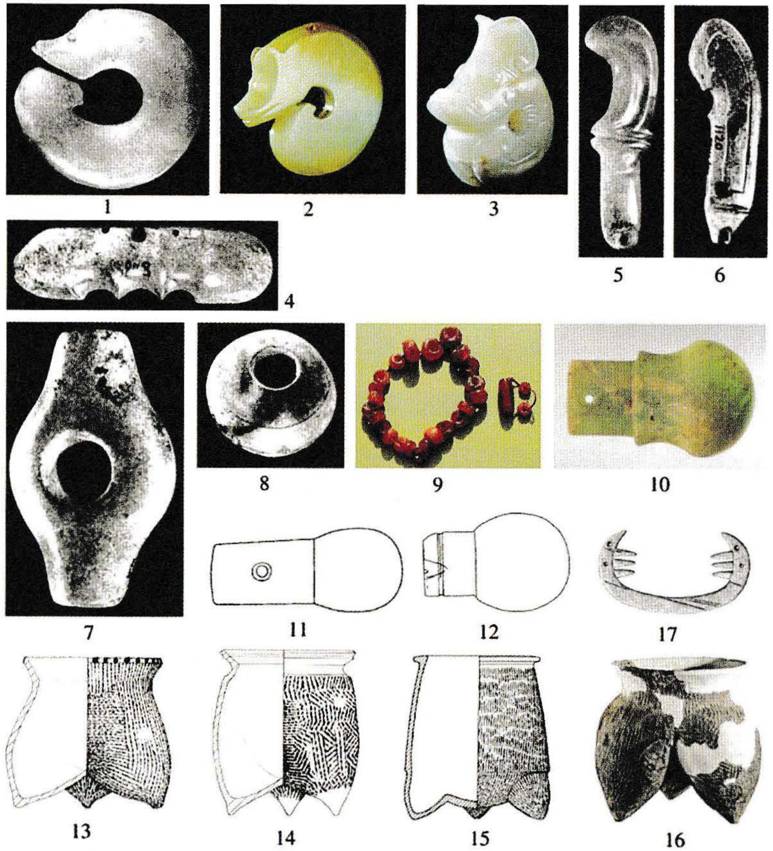


殷墟出土铜印章（下为 X 射线透视照）（何毓灵等 2012）
1、4. 水利局兽面纹印　2、5. 亘印　3、6 冂印

再往前则无迹可寻。早在公元前 6000 年前后，地处衔接欧亚非大陆特殊地理位置的叙利亚—两河地区就率先发展出复杂的“戳印 + 封泥 + 陶筹”贸易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贸易系统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并催生了文字和书写系统的出现。（覃春雷 2021）此后西亚、中亚和南亚各地又出现了青铜及其他质地的印章，这些印章为探索殷墟青铜印章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其次是出土玉石器。殷墟玉器以妇好墓、花园庄东地 M54 出土最多。见于妇好墓的红玛瑙串珠，一般认为应是从中亚和西亚辗转传播到中国的。（杰西卡 · 罗森 2011）权杖应为西亚地区首创，后逐渐向四围扩散。（李水城 2021）殷墟出土的权杖头形制虽与西北地区相异，但其实质是相通的。妇好墓出土的石球应即北方地区常见的权杖头。（韩金秋 2008）见于妇好墓的石锤，则应是卡约文化的典型器物。

殷墟文化时期突然出现的文化因素还包括石质容器和各类动物形象的石质雕像，这也是不见于二里岗文化和更早的中原及左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新生事物”。据统计，殷墟遗址发现的可复原和可辨识个体数的石质容器达 70 件。这些石容器多为大理石制成，主要发现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尤以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出土者最为精美。各类动物石雕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既已出土 100 余件。（董好 2020，考古所 1994）而更早的制作和使用石



殷墟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玉、石、陶器

1—3. 龙形玦　4—6. 勾云形玉器　7. 石锤　8、11、12. 石权杖头　9. 玛瑙珠饰　10. 玉权杖头　13、14、16. 陶鬲　15. 陶三足瓮　17. 玉马衔

质容器的现象，均见于北方地区，如兴隆洼文化、阿善文化、红山文化（石阳 2012）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考古所 1998）等，发现的地点集中在长城沿线、燕山南北地带。（郭京宁 2008）

再次是殷墟陶器。陶器基本都是普通的生活用器，如果我们把部分铜器、玉石器，甚至马车等器物看作是以战争、贸易、传世等形式进行流动的话，那么陶器显然不具有如此的流动性，其更可能代表着使用这些陶器的主体人群的流动，从中可更直观地了解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与殷墟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目前，殷墟遗址出土的明确具有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主要来自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花边口沿袋足鬲、三足瓮）、晋中地区的杏花村文化（鬲）以及京津地区的大坨头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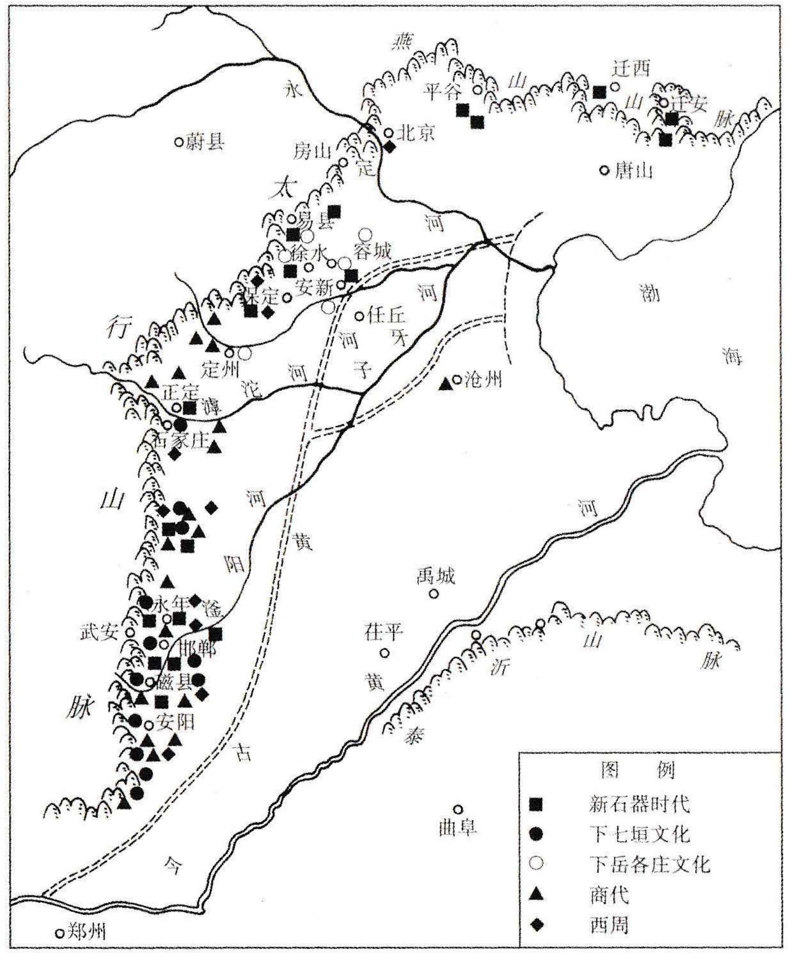
殷墟文化深受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影响，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实属罕见。从时间上来看，殷墟文化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在殷墟文化早期都是最为显著的，甚至可以与商王武丁时期对应起来。殷墟文化二期之时，马车及其配件开始迅速在殷墟得到普及。相较于中商阶段，商王朝政治中心往北移动近 200 千米后，一下子拉近了与北（西北）方群族的距离，缓冲地带已经消失，战争成为必然。甲骨文献大量记载对北（西北）方的战事便是在此情境下产生的。（何毓灵 2020）

北迁“河内”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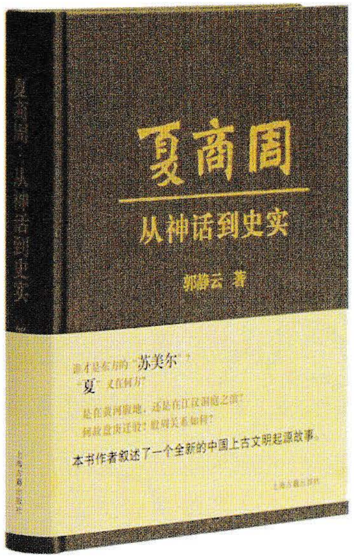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学界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这么多的“新生事物”集中出现于安阳殷墟，只是商王朝的都邑从郑洛地区北迁后王朝内部的新举措、新面貌，对此，也几乎无人提出异议。这里的疑问是：仅仅向北迁移了不足200千米，文化面貌的差异竟如此之大？如果这些巨大变化是与“商人”和某支“北路军”的会合有关，那么这支“北路军”的来头是什么？它究竟是主角还是配角？这些问题就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了。

的确，从地理形势上看，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以前，黄河频繁决溢改道，河北平原沼泽密布，洼地连片，古人只能选择靠近太行山东麓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平原居住。被认为属于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遗址就集中分布于这条宽度仅为70—120千米的走廊上。（张渭莲 2008）

狭窄的“河内”地区的生态与农耕条件，显然无法和丰饶的“河南”郑洛地区相比。针对先商文化从这里出发，先在郑洛地区发展出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再绕回到走廊上形成晚商的殷墟文化的主流观点，郭静云（Olga Gorodetskaya）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从自然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应的生活方式来看，我们完全无法理解造成这种弯曲路径的理由何在”，“居住在中原的民族恐难有意愿朝黄河下游或往河北平原移动”；而“殷墟考古的很多



太行山东麓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址分布（张渭莲等 2015）



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现象，尚未见于殷商之前的辽河、漳河、黄河流域文化中”。（郭静云 2013）

她注意到，据既往学者研究，与二里岗文化相比，殷墟文化墓葬出土青铜兵器的比重大幅度提升，达全部铜器的半数以上，远超礼容器（张渭莲 2008）；而出土的兵器类型涵盖中原、东北地区的兵器特色，也有很多草原兵器的类型。从出土兵器看，殷商时期有专职军事的特殊贵族阶级，殷商之前则看不出有这类贵族存在的迹象。草原兵器应是经过蒙古草原或贝加尔湖、黑龙江草原一带，从东北流传到中国。

郭静云还指出，除了郑州、偃师地区二里岗文化以夔龙为母题的造型，殷墟青铜礼器纹饰中还经常蕴含着羊、牛、象、犀牛、鹿、猪、凤、鸮、鹰等其他禽兽的特征。来源不同的多类神兽，代表当时社会已有多元化的崇拜对象。混合性的造型取代了独特崇拜对象的造型，这涉及革命性的信仰变动。

驯马民族，入主殷墟?

殷墟马车发现不久，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就根据东西方马车结构和系驾方法、车的结构及其社会作用的相似性提出了中国马车应来自西亚的推断意见。（林巳奈夫 1959）此后西方学者多有类似的推断，除西亚外，还有持中国马车来自欧亚草原、中亚地区的观点。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马车起源于草原并随印欧人的迁徙而向四处传播的观点得到更多的支持。（王海城 2002）

鉴于以十为基础的战列队形似乎是商代军事组织的特征（张政烺 1951），而殷墟车坑周围都有徒兵环绕，美国学者夏含夷同意马车来源于中亚，且主要是被当作具有机动性的指挥高台来使用的观点，认为“这也和它作为权威之象征而与王室墓葬紧密相关基本上是一致的”。（夏含夷 1997，英文原文发表于 1988 年）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公元前 1500 年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了掌握和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能。……发生在以后入侵者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商朝入侵者的身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最终反被当地文化所同化，而中国人则仍旧保持其传统特色。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物品丰富了中国文化，但这些发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明传统”。（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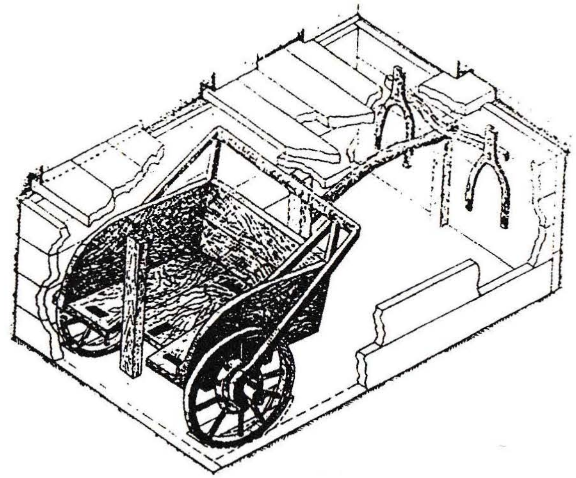




殷墟车马坑与马车复原

塔夫里阿诺斯 2005，英文原著出版于 1999 年）美国艺术史学家贝格利教授在《剑桥中国上古史》中也分析到，殷代的马车暗示出中原与北方地区曾存在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不是外族“入侵”，也不是偶然的边界冲突。偶然俘获的战车和马匹并不能带来使用、维护和再生产战车的一整套技术。（Bagley 1999）

王海城在对欧亚大陆东、西部的马车进行了系统比较的基础



辛塔什塔墓地出土马车复原（王海城 2002）

上，指出中国马车（或者是马车的制造技术）传自西方。尽管目前还不能确指这个“西方”具体是何处，但西亚、埃及、欧亚草原和中国发现的马车所体现的共同特征昭示出，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这个源头在中原地区以西。（王海城 2002）

在此基础上，郭静云认为，在中国境内各地的文化之外，殷商文明还具有原来不属于中国境内、非常关键的文化元素，显示殷商时期有新的族群进入中国，并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内涵。这些全新的事物包括发达的兵器所代表的军事贵族、草原兵器，以及大量人牲祭祀坑所见大规模杀人斩首礼。此外还出现大量的大理石制大型礼器、马车、一至四条墓道的大冢，以及甲骨金文文字系统、独特的老虎造型等。

殷墟考古中有几项文化内涵与殷商王族脱不了干系，且是从事远地战争的族群才有的特征。安阳考古发现，使用马车者多为王族，马车可说是王室的象征，应是殷商王族由其发祥地带来的文化元素；有大量被杀之人的人头骨坑也是王族的遗址；大理石礼器仅出现在王族的宫殿和大冢墓遗址；老虎造型则主要出现在王族墓葬里；现今所见的甲骨文，主要出自王或王族的占卜和祭祀活动。这都是殷商王室和高级贵族的标志。“草原游战族群的生活才是殷商王族的背景。”

她进一步论述到，殷商是成熟多元的国家文明，并非单一族群的发展结果。统治殷商的王室当然也是众多族群里的一个支脉，有其本身的特殊生活方式、祭礼和葬礼，也有王族特有的礼器和其他标志物，唯有追索探讨这些标志物的来历，才能对王族的来源和属性有所了解。反之，诸如陶器、建筑类型、平民的生活状态等，虽然也是殷商文明的一部分，但都不能当作殷商王族的属性标志，更不可能用以说明殷商王族的起源。


殷墟大理石虎首人身玉雕

郭静云指出，那些认为马车在殷商文化中只是外来现象

和单纯的文化传播，不牵涉到人群移动的看法，违背了文化传播的实际过程。所有的外来文化只能以人为传播媒介，而且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世界史上从没有一个完全不认识马的农耕民族，在未曾遭受外来驯马民族统治的情形下，会突发奇想地自行引进马匹，变成驯马民族；也没有一个王朝会让外族驾着战车长驱直入，却能够继续保留自己的统治权。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曾经历过被外来游战族群统治的历史，然后才习得、掌握马车技术。殷墟之前未见有马车，殷墟时期突然有一个民族开始重视马、会用马车、以随葬马车作为自己的标志物。这样的现象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此族，即殷商王族，是从外地引入马车技术的民族。过了 200 余年后，各地中原贵族才学会习用马车。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传播过程。

说到文字，郭静云指出，在殷商之前，中国肯定已经有数种不相关的文字系统产生。在西亚文明中，阿卡德、巴比伦等文明，在苏美尔文字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巴比伦文，使得后来的巴比伦文得以拥有足够广泛的使用率和影响力，成为能够跨语言、广泛被使用的记录工具，最终也造成了两河流域南方地区原始苏美尔文字的消失。同样地，殷商文字系统也是建立在借用别族文明文字的基础上构成了跨族群和语言属性的文字系统。

至于洹北商城的历史角色，她指出，在其中尚未找到殷商王族的重要标志，遗址内还没有见到马骨。洹北应非殷商王族留下

的遗址，而是本土城邦。殷商王族毁灭了这些城邦，进而建立自己的王朝。他们可能继续使用本地石工、金工、陶工，或许也让洹北国的军兵、官僚为新王朝提供服务。所以殷墟与洹北商城考古显示了不少传承关系，却缺乏一致的关联性。

鉴于上述，她认为“郑偃城址的统治者和殷商的殷墟王族，恐怕不能视为同一个王室的延续，两个遗址也不宜视为同一王朝的先后国都”，“殷商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文明内容，与殷商之前的中原地区的文明有许多差异，反而与东北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十分明确”，“既然以殷墟为都城的国家自称为‘商’，而中国境内在殷墟之前的城址都与殷墟差异很大，故它们都不是‘商’，而是殷商建国之前的各个古国”。（郭静云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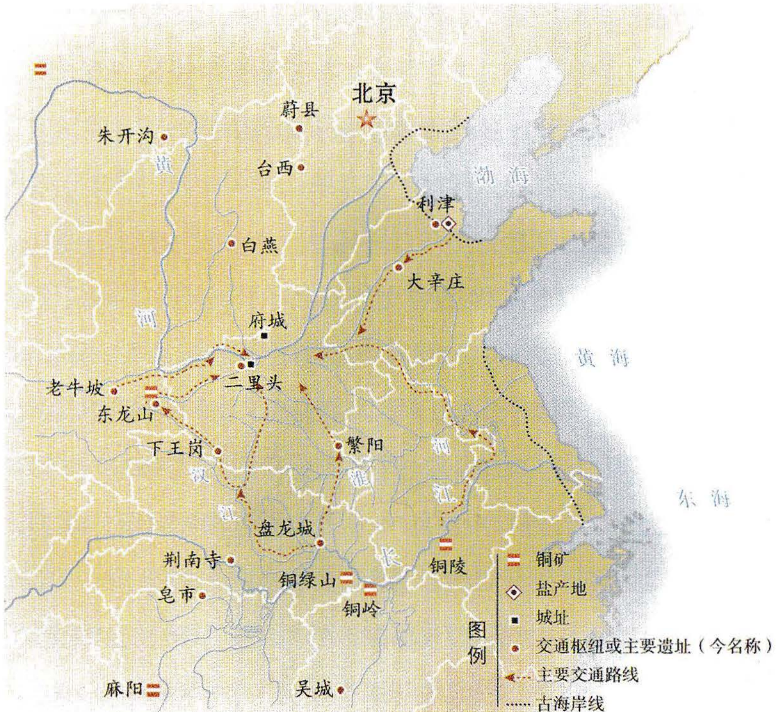
郭静云教授提示的这些差异和比较文明史视角下的推想思路很重要，具有启发性。遗憾的是，她给出的殷商文明近源（部分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和远源（亚洲草原驯马族群）证据并不充分，尤其是作为近源的东北地区考古遗存的年代及其所规定的文化传播的方向性，无法支持其观点（相关问题容另文探讨）。因而这一假说，仍有待验证。

三　高度集权 强势辐射

史上空前冲击波

关于二里岗国家的膨胀性态势，学者多有论述。“从总体分布态势看，早商文化在其昌盛时期，遗址点在西起岐山、东至潍河、北抵张家口、南达长江沿岸的广阔范围内都有分布。……这一广阔空间不仅包括了由中原地区兴盛起来的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两支夏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而且在张家口、豫东、山东潍河以西和安徽江淮地区分别取代了大坨头文化、岳石文化和斗鸡台文化的分布。甚至可以说是周代以前中原及其邻境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所达到的最大的统一局面。这是夏代及其以前的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所无法比拟的。”（王立新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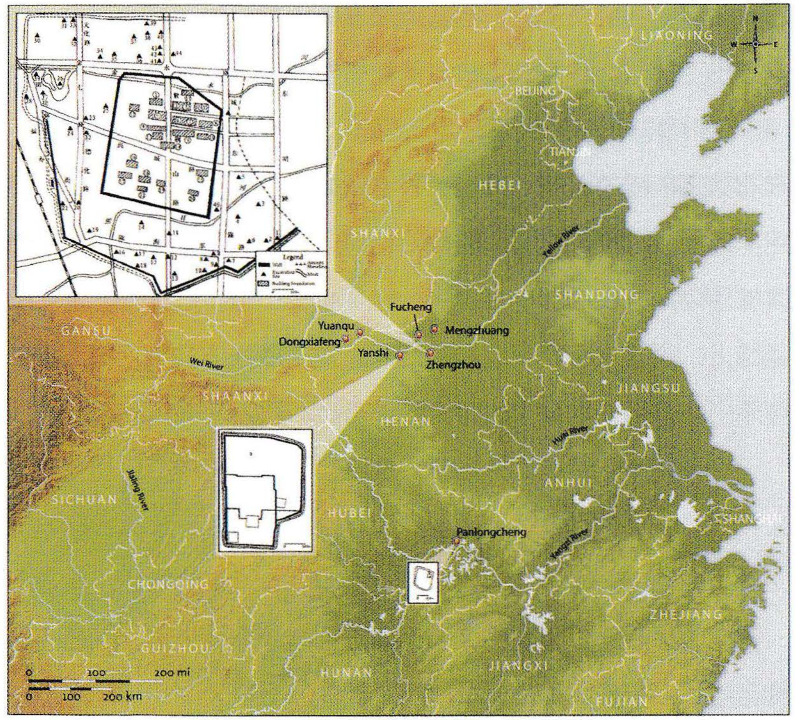
从更长的时间范围看，最初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此起彼伏、争奇斗艳，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夷夏”集团东西对峙，而真正结束这一局面，中原核心地位最终得以确立的，就是二里岗时代。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先秦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从二里岗文化圈之广大和文化面貌之统一等方面来分析，这个时期无疑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商王朝的最强大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力可能超过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孙



早期王朝时代资源与重要遗址分布（刘莉等 2002，《中华遗产》改绘）

华 2009）“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岗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刘莉 2009）

有的学者在对全球早期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甚至认为二里岗文明的扩张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出现（Bagley 1999，王海城 2016）（详后）。二里岗文明的上述特



“二里岗帝国”的扩张态势与郑州、偃师、盘龙城三级聚落的体量比较（Campbell 2014）

征及学界的相关思考，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二里岗文化形成强力冲击波的历史背景。

“畿内”“畿外”的城邑群

在二里岗时代，具有都邑性质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围以

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而其近旁及外围又分布着若干城邑，都应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而有计划设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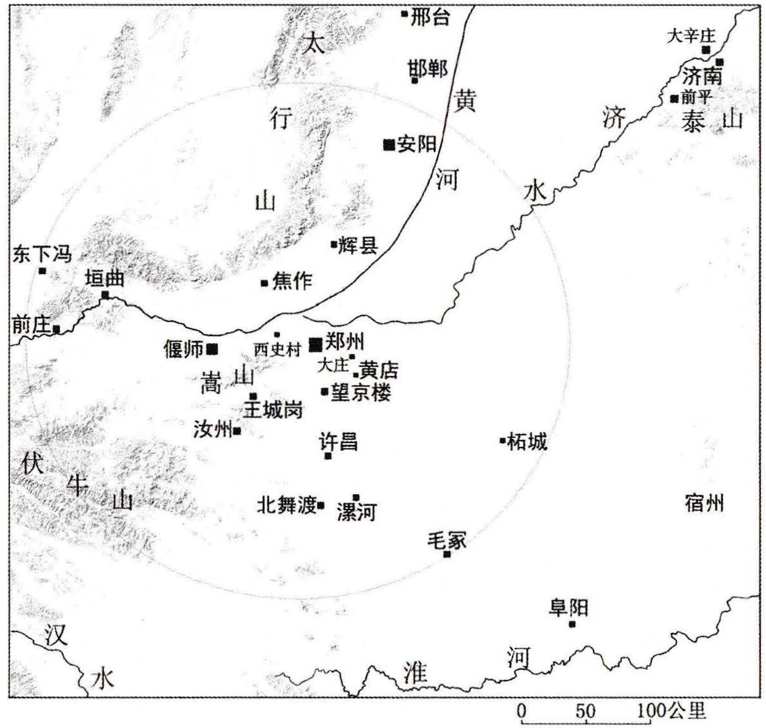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所处的郑洛地区，地处中国地形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宜性和较强的环境承载能力，是当时文化和政治地理的“天下之中”。其中郑州商城地处太行山山脉—嵩山山脉—伏牛山山脉一线东侧南北主交通线上，是从古至今南北和东西两大主交通线的交会之处，从都邑集中地洛阳盆地东出虎牢关后的重要门户。

位于最内一圈的郑洛地区，是原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和二里岗文化中心区，或可称为“畿内”地区（西江清高 2003，宫本一夫 2014）或“王畿”地区（侯卫东 2018）。如前所述，始建于二里头时代的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荥阳西史村（环壕）等城邑还都存在并续有增建或改造，此外还有进入二里岗时代新出现的荥阳唐垌（环壕）、郑州梁湖（环壕）城邑。其中望京楼城邑北距郑州商城约 30 千米，在 37 万平方米的内城之外，由东、南、西三面天然河沟和人工壕沟围成的闭合空间，面积达 168 万平方米。大师姑城邑东南距郑州商城约 20 千米，二里头文化期城邑面积约 51 万平方米，二里岗文化期又在城圈和环壕之间清淤和开挖了新的环壕。这一区域也是以青铜礼容器为核心的青铜器群密集出土之地。

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再向外半径约 200 千米的区域，也是二

里岗文化中小型城邑和青铜礼容器出土地点分布密度极高的区域，可称为当时的中原腹地（侯卫东 2020），大致相当于日本学者提示的二里岗国家的“二次区域”和“畿外”地区（西江清高 2003，宫本一夫 2014）。这些中小型城邑大都位于高敞之地，临河筑城、靠山向水，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并具有相似性。

与“畿内”地区相接的近畿地区，是位于太行山东南麓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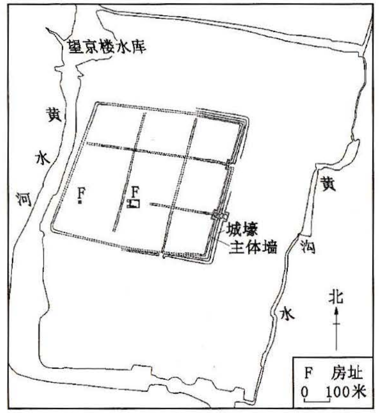


中原腹地二里岗文化重要遗址分布（依侯卫东 2020 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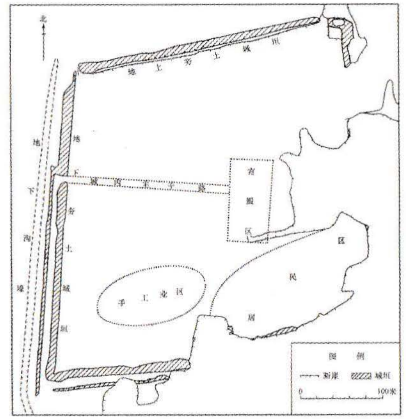
前平原。这里在二里头时代属于辉卫文化（一般认为属“先商文化”之一支）分布区，这是郑洛都邑区与晋西南和豫北地区沟通交流的重要孔道。已发现辉县孟庄城（河南省所 2003B）和焦作府城（袁广阔等 2000）两座城邑。其中辉县孟庄城西南距郑州商城 70 余千米，始建于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修补沿用，最后的使用期原报告订为殷墟文化期，后被改订为二里岗文化期（侯卫东等 2020）。该城城圈内的面积 12.7 万平方米。焦作府城东南距郑州商城约 60 千米，为二里岗文化期新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

然后是位于黄河以北、晋南地区的原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或认为应独立为“东下冯文化”）分布区，已发现垣曲古城南关（历博考古部等 1996、国博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 2014）和东下冯城（考古所等 1988）两座城邑。两城分处中条山南北侧，在二里岗文化城邑修建前，都曾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其中垣曲古城南关城邑东南距郑州商城约 160 余千米，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夏县东下冯城邑更在垣曲古城南关城邑西北 50 余千米处，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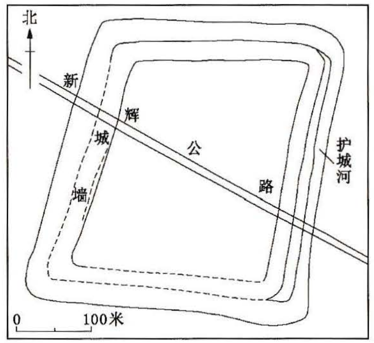
这三类区域对于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政权而言，都是新征服的区域，并且都有着深厚的本地文化传统，二里岗政权对这些空间及土著人群的镇抚和管理最初应当是最重要的任务。在相应的关键位置选址营建城邑、承担镇抚和管理的重任是当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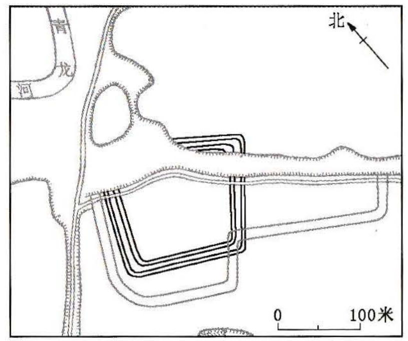
新郑望京楼



垣曲古城南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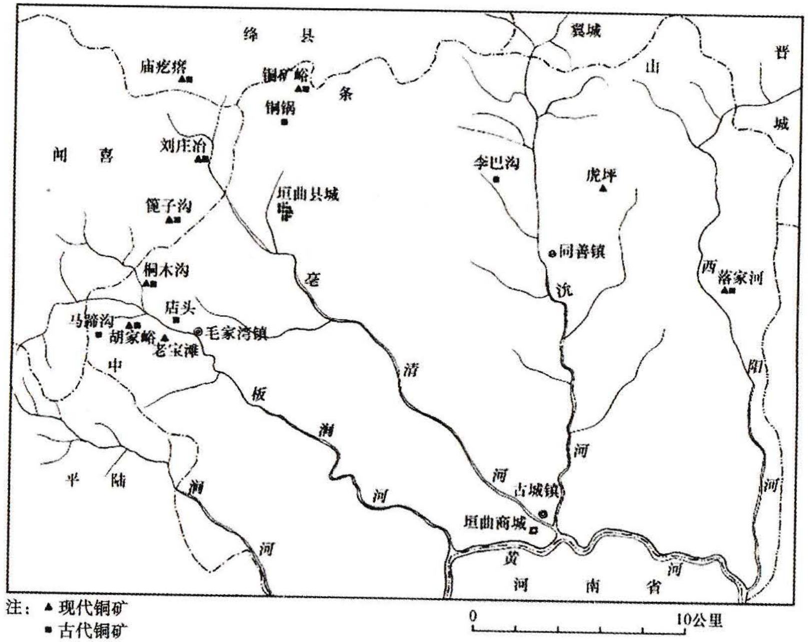
辉县孟庄



夏县东下冯

二里岗文化城邑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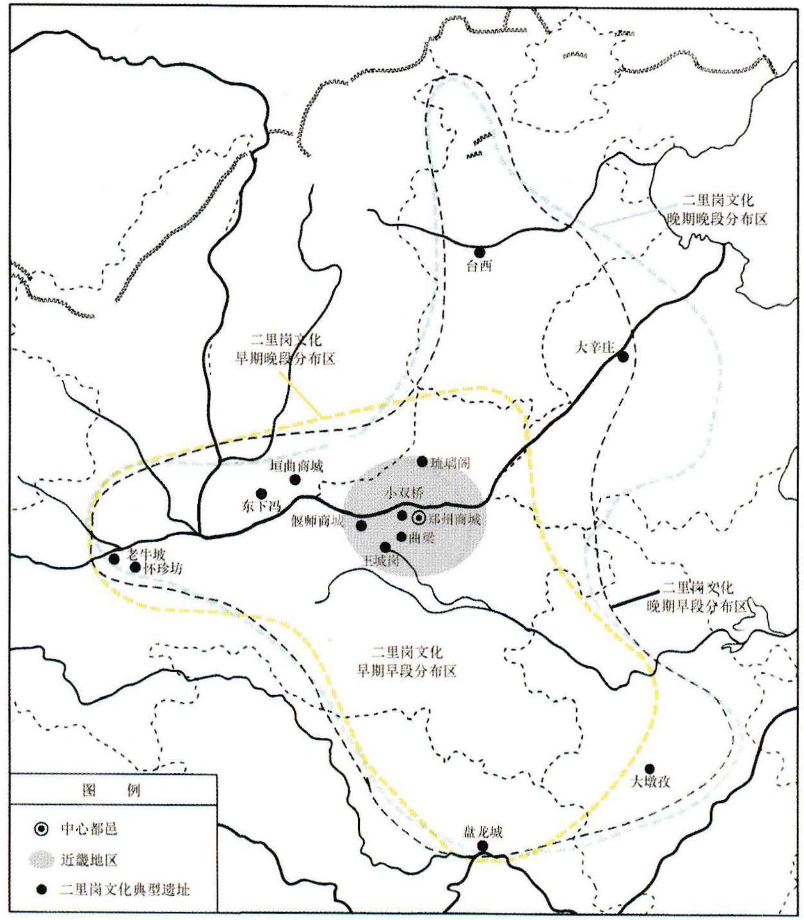
重大问题，而这些中小型城邑恰好营建在交通要道或二里岗文化的边缘地带。此外，三类区域与郑州主都的空间关系有别，其选址还应当另有要因。新郑望京楼城在郑州商城南部的王畿之内，



垣曲商城与中条山古今铜矿的分布（国博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 2014）

拱卫都城的南方门户应当是营建此城的重要原因之一；辉县孟庄城与焦作府城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北方不远的黄河彼岸，应当承担着拱卫都城北方门户的重任；垣曲古城南关与夏县东下冯在中条山铜矿带和运城盐池附近选址营建，应具有控制和经营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侯卫东 2020）

在上述城邑中，新郑望京楼、辉县孟庄和垣曲古城南关遗址（多用其简称“垣曲商城”）分别发现了出土二里岗文化早期青



二里岗文化“近畿”地区及各期段的大致扩散范围（依王立新 1998、司媛 2020 改绘，司媛制图）

铜礼容器的墓葬。此外，在郑洛地区的荥阳西史村、高村寺，登封王城岗、袁桥也发现了同时期墓出土或零星采集的青铜礼容器。众所周知，在二里头时代，二里头都邑是唯一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地点，可谓一花独放。随葬青铜礼容器的墓葬，也仅见于二里头都邑，表明它不仅独占了高等级青铜器的生产，而且基本独占了对它们的政治性消费。青铜礼器从二里头时代仅为二里头都邑内的贵族使用到二里岗时代见于主都郑州商城附近的其他聚落，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许宏 2021B）

殖民城市盘龙城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湖畔，地处长江支流府河北岸的高地上。它北距郑州商城的直线距离约 450 千米。整个遗址群由夯土城址及其周围矮丘和湖汊间台地上的若干一般遗址组成，总面积逾 1 平方千米。（湖北省所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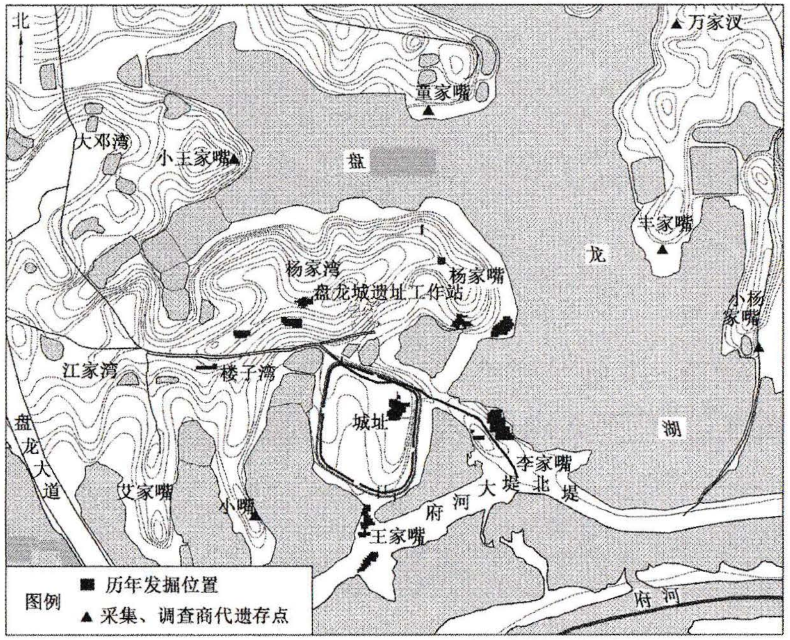
城址坐落在遗址群东南部的一小山丘上，城墙随地势之起伏而修筑，残宽 20—40 余米，为版筑而成，这应是长江流域最早的版筑城垣。版筑技术本系中原先民在黄土地带因地制宜的创制，在土质易凝结、仅堆筑即可起墙的长江流域，版筑城垣无疑是一种显著的文化 DNA。

城址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即城门。城外挖有护城壕。城内东北部发



盘龙城遗址俯瞰

现面积约 6000 平方米的人工土筑台基，宫室建筑群即分布于其上，已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3 处。其中 1 号基址的主体为四间横列的居室，隔以木骨泥墙，四周则绕以回廊。有学者将其复原为一座“茅茨土阶”、四坡顶重檐的大型木构建筑物。其与 2 号基址前后平行排列，具有共同的中轴线。三座建筑应属带有三进院落的一个大建筑群。（杨鸿勋 1976）在基址的西侧还发现有由相互连接的陶质水管组成的排水设施。城址内的西南部为低洼地，当时可能为池塘。发掘者推测该城址具有宫城的性质。盘龙城城



盘龙城遗址遗迹分布（张昌平等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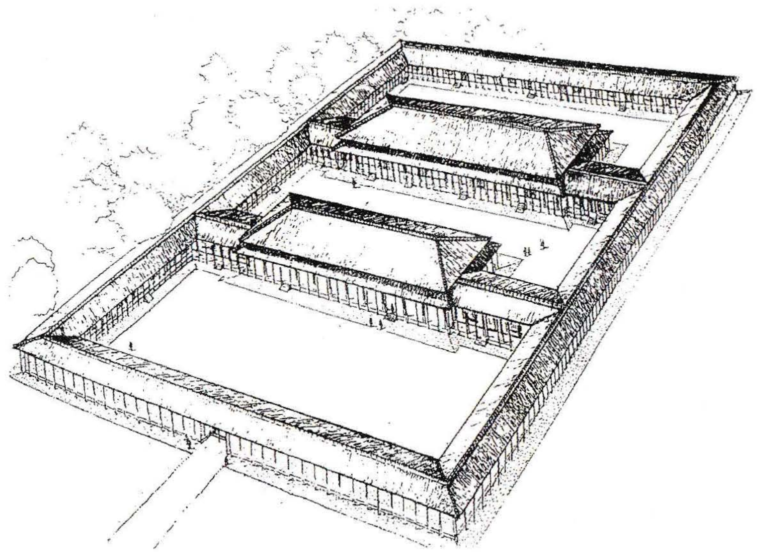
址与宫室建筑，无论从结构布局还是建筑技术上看，都与二里岗文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在城外四方的多处地点，都发现有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堆积，应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其中在三个地点发现了众多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墓葬，李家嘴一带集中发现有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

遗址中最早的遗存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尚属一般聚落。城

垣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而最晚阶段遗存的年代可至殷墟文化的最初阶段。（考古所 2003）二里岗文化晚期是该城址的兴盛期，城内的宫殿基址即修筑于此期。最新的研究表明，二里岗文化晚期该聚落的面积至少超过 2 平方千米，是当时南方地区最大的城市。（张昌平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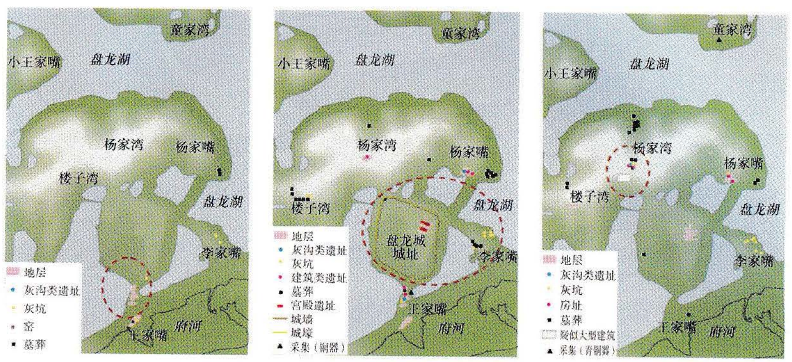
盘龙城遗址在城墙的夯筑技术、宫室的建筑手法、埋葬习俗及遗物特征等方面，都同二里岗文化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而，一般认为，盘龙城遗存是以一支南下的中原商文化为主体，融合本地及江南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商文化的边地类型——盘龙城



盘龙城大型建筑复原（杨鸿勋 2001）

类型（邹衡 1980）。盘龙城与郑州商城所代表的人群间的社会认同，显现了二者“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一致性”（施劲松 2016）。有学者进而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郑州贵族阶层的一部分在二里岗文化晚期迁徙到盘龙城并在此建城定居。二里岗殖民地与土著群体的关系，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以军事征服而达成的统属关系。盘龙城与郑州铸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被视为母国严密操纵属地的一个证据。（王海城 2016）无论如何，盘龙城在二里岗文化晚期应已成为一座规模较大、城市功能分区与布局均较为清晰的中心城市，表明郑州政权的统治者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力达到顶峰，也为其能向更远的西南方或南方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

研究表明，盘龙城在其延续的 300 多年时间里，一直都在保



初始阶段　　兴盛阶段　　衰退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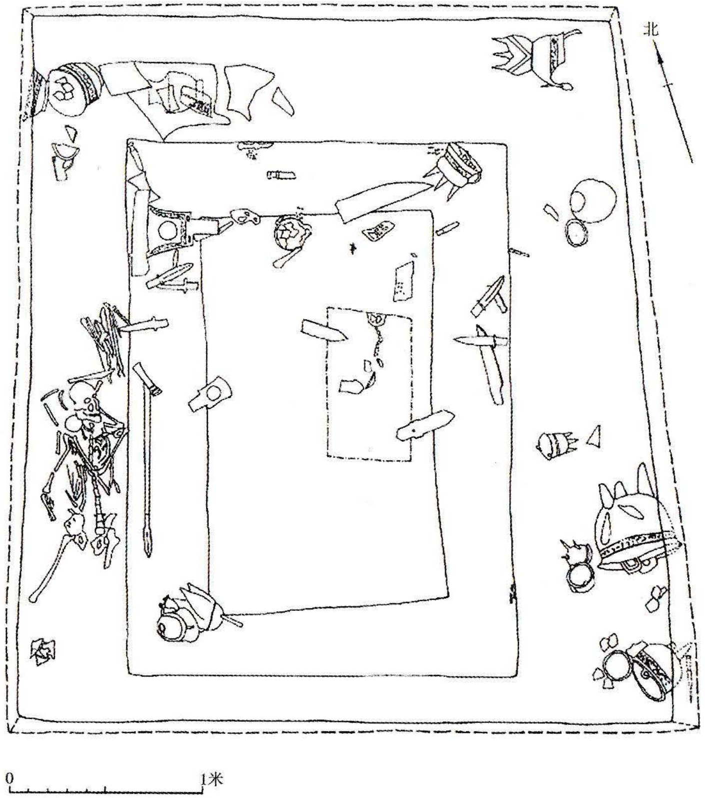
盘龙城聚落核心区的演变（武汉大学等 2018）

持与郑州地区文化同步的更新，二者的关联是持续不断的。从长江中游当时的聚落形态看，盘龙城之下还设有二、三级聚落，由此形成垂直管理系统，显示出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的强势控制。盘龙城通过长江干流交通“构成了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带，在长江沿线分布着荆南寺、铜鼓山、意生寺、薛家岗等以中原文化面貌为主体的遗址，这些遗址基本与盘龙城的兴废同步，可见盘龙城中心的区域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外的张力”。（张昌平等 2017）鉴于此，盘龙城应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人群应主要来自中原地区。（张昌平 2020）盘龙城在文化面貌上与郑州的高度的一致性，强有力地暗示了它可能是二里岗国家的一个远方殖民地。（李峰 2022）

盘龙城的青铜工业

距郑州商城最远的随葬成组铜器的二里岗文化墓葬，就发现于前述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遗址，该地距郑州直线距离达 450 千米。据最新的统计，截至 2020 年，郑州商城发现的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礼容器总数为 140 件，郑州商城以外发现的同时期青铜礼容器近 400 件，而其中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即达 191 件。（司媛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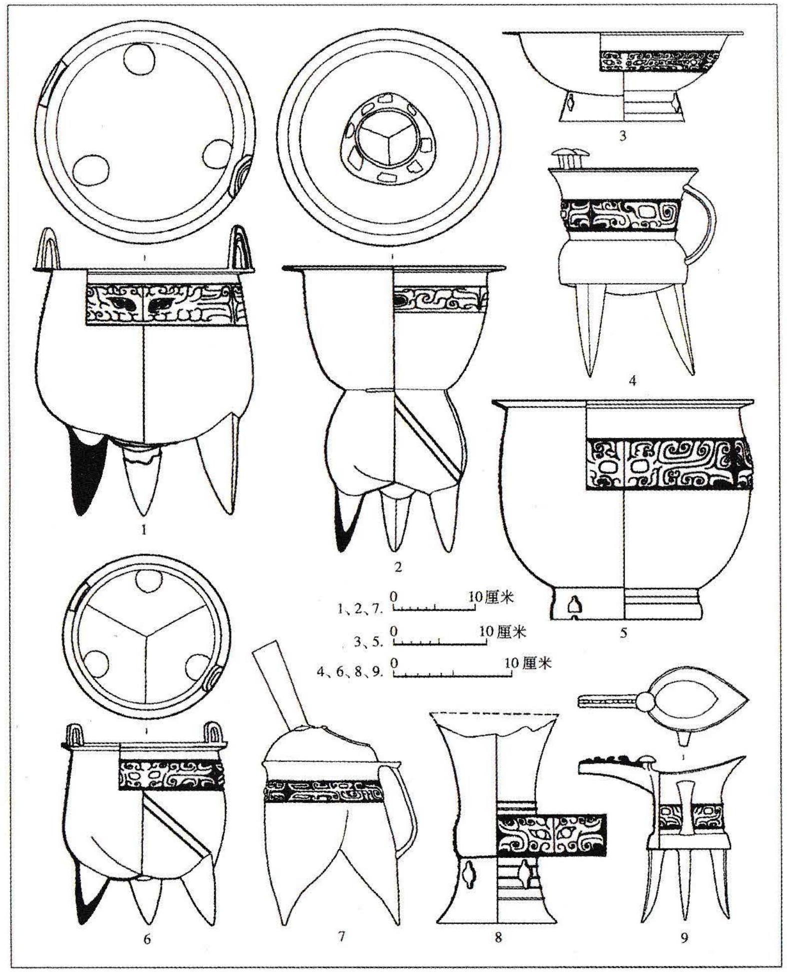
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是盘龙城城邑开始营建的初始阶段，最早的铜器墓也出现于此时。这些青铜礼容器的所有者应为二里



盘龙城李家嘴 2 号墓平面图

岗文化经略长江中游地区的先头部队。此期尚无铸铜遗存发现。

二里岗文化晚期是盘龙城聚落的兴盛期。历次发掘出土青铜器及采集品达 350 件以上，绝大部分属于此期。可确认属二里岗文化晚期前段的墓葬有数座。其中李家嘴 2 号墓规格较高，随葬



李家嘴 2 号墓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容器（考古所 2003）
1.鼎 2.甗 3.盘 4.斝 5.簋 6.鬲 7.盉 8.觚 9.爵

器物种类齐全，数量较多。食器有鼎，除锥足鼎外，开始出现扁足鼎，还有鬲、甗、簋；酒器有爵、斝、盉、觚、尊；水器有盘。一种多件甚至各种器物以等量相配的组合方式开始出现。甗、簋、尊、盘等新出的器种都是同类器中最早的。新出水器仅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表明水器似乎也开始具有身份等级象征物的功能了。

看到这个庞大的青铜器群的规模和品类，我们能否说盘龙城的“行政级别”甚至比郑州还要高呢？不能。要知道郑州商代都邑整个被压在近现代郑州市区以下，被破坏得相当严重，而原来地处农村的盘龙城保存则相当完好。就遗存中的“不动产”而言，郑州商城的内城面积是 300 万平方米，盘龙城城圈（相当于内城或宫城）的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存相对集中分布的范围约 160 平方千米，盘龙城聚落最兴盛时的面积仅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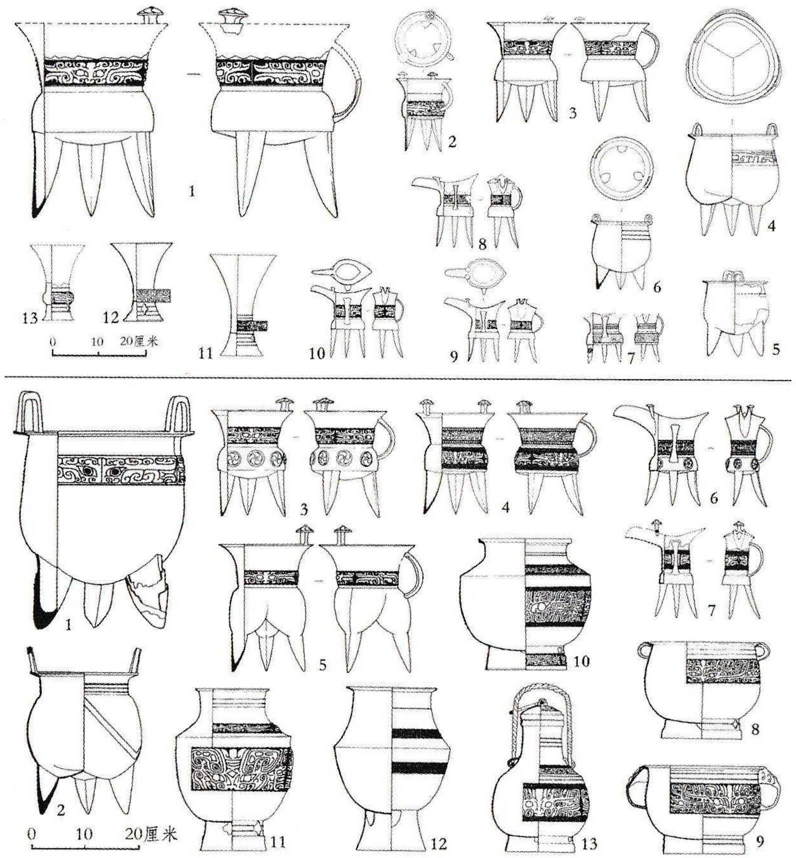


盘龙城出土铜器举隅
1. 鼎 2. 爵 3. 罍 4. 觚 5. 斝

2 平方千米。回到青铜器，仅比一个最大值：盘龙城出土最大的铜圆鼎，通高 55 厘米；郑州商城出土最大的铜方鼎，通高 100 厘米。而就当时的礼制而言，方形器显然较圆形器为重且层级高。

近年，盘龙城小嘴遗址发现了包括石范、陶范、陶坩埚、铜渣、炉壁等在内的冶铸遗存，铸铜作坊面积可能大于2000 平方米。科技分析的结果表明，盘龙城有可能存在独立的青铜铸造业。（南普恒等 2008，刘睿良等 2017）所出陶范较细碎，个别可能为青铜鼎、簋类器物的陶范块，表明除小型工具外，不排除当地铸造青铜容器的可能性。如是，这是二里岗文化时期都城地区之外铸造青铜礼容器遗存的首次发现。

贝格利教授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关注流散于海外的二里岗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并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价值，他对这批当时不受海外收藏界和学界青睐的铜器以及后来盘龙城出土铜器的评价是：“即使安阳从来没有存在过，二里岗也应该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盛名。然而，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揭示出了一幅更加宏伟的画面。”他指出：“盘龙城正在铸造与郑州一样的铜器。盘龙城不像是一处临时的聚落，从郑州来到这里的精英阶层不是住在帐篷里的旅客，他们是殖民者或入侵者，相信自己会在湖北常住。当贵族创建城市或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把所需要的一切都带来，以便重建他们在家乡的贵族生活。他们带来会筑城墙的工匠，建造宫殿的工匠、铸造青铜器的工匠。我以前就确信盘龙城有能铸



盘龙城其他遗存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容器（依司媛 2020 改绘，司媛制图）
上（晚期早段）：1—3. 斝　4. 鬲　5、6. 鼎　7—10. 爵　11—13. 觚（1—6、9、10、12、13 出自楼子湾墓葬，7、8、11 出自王家嘴北区）
下（晚期晚段）：1. 鼎　2. 鬲 3、5. 斝　6、7. 爵　8、9. 簋　10、12. 尊　13. 卣（1—3、9、13 出自李家嘴其他墓葬，4、6、8、12 出自杨家嘴墓葬，5、11 出自王家嘴墓葬，10 出自西城垣南段墓葬）

出这里所发现的铜器的工匠。我知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今天我比以前更加坚信这一点。”（贝格利 2016）

考虑到盘龙城青铜器形制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相同，青铜器生产作坊的技术人员应该是来自中原政治中心。青铜器生产则说明在高端技术和金属资源组织上，盘龙城还有着进行复杂的社会运作能力。（张昌平 2020）更有学者认为，郑州与盘龙城容器铸造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技术，还是器物种类、造型、纹饰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其背后反映的是在统一王权管理下的组织生产。以二者为代表，构成了商代早期南北两个青铜容器铸造中心。（何毓灵 2020）

一般认为，盘龙城遗址最晚的遗存相当于安阳洹北花园庄晚期，那也正是洹北商城终结而狭义殷墟文化开始的时间节点。彼时的殷商集团“执行了一个不同于盘龙城的控制模式，这一模式似乎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很可能给南方带来了青铜文化的独立发展。在此之后，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域青铜文化崛起，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张昌平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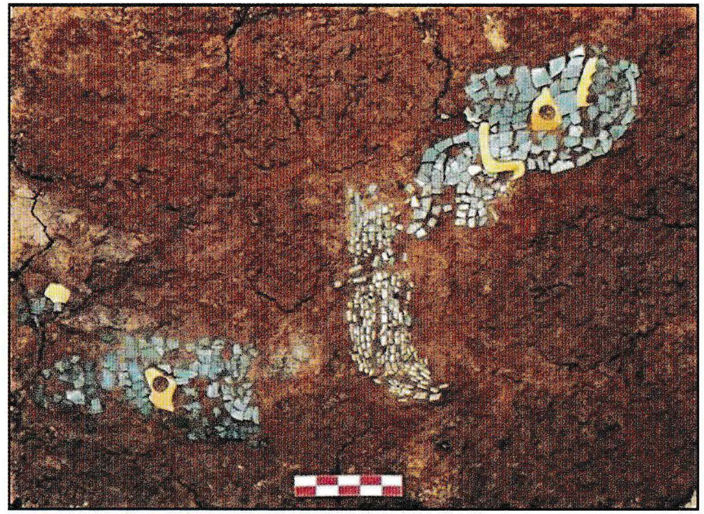
绿松石器的中原基因

在第一部分“细说最新发现”一节，我们曾述及武汉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这是东亚大陆出土早期金器最靠南的一个地点。随葬该器的杨家湾 17 号墓，墓室面积为 4.64 平方米，

除了绿松石镶金饰件，还出土有残大玉戈、青铜牌形器以及铜带鋬觚形器等重要文物。绿松石镶金饰件由 500 多个绿松石片和 6 个金箔片组成，经检测金箔片的含金量 84.4%，另有散乱的绿松石管珠 117 颗。（武汉大学等 2017，盘龙城院等 2022）无论墓葬的规格，还是出土物所显现的墓主人的社会层级和所处年代，该墓与郑州书院街 2 号墓都极为接近。

墓中随葬的绿松石镶金饰件和青铜牌形器，复原后应属于两件兽面纹装饰的器物。其中绿松石镶金饰件表现为夸张面部、大曲角状的兽面纹，可能属于镶嵌在有机质上的面具；残断的青铜牌形器可能为宽幅面的曲尾状兽面纹，大致长 80 厘米、宽 30 厘米，为这一时期所见尺寸最大的兽面纹牌形饰品。两件器物都暗寓了使用者较高的社会等级。（孙卓 2018B）

位于杨家湾 17 号墓不远的杨家湾 11 号墓、13 号墓也曾发现大型鼎腹、鼎耳残片和绿松石器物。13 号墓更出土有大量的绿松石片，形态和大小与 17 号墓绿松石片相近，并且还发现一处由数十个绿松石片和贝壳拼接的图案，应为在有机质底托上镶嵌器物的一部分。三座墓中的器物尽管因碎器葬俗而散乱难辨，但仍可以看出存在绿松石片和蚌片、绿松石片和金箔片，以及绿松石片和管珠等组合镶嵌类型。盘龙城杨家湾 11 号墓、13 号墓正为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规模最大的两座墓葬。相关线索表明青铜残器和绿松石镶嵌品可能为这一时期盘龙城墓葬中的一种葬器习







盘龙城贵族墓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



盘龙城贵族墓出土的青铜牌形器

俗，并直接指向了当地最高等级的人群，绿松石器应与玉戈、青铜礼容器等同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盘龙城院等 2022）

另一方面，尽管青铜牌形器和绿松石镶金饰件在整个二里岗文化期颇为罕见，但是其文化源头应在中原地区。其中牌形器上的纹饰，无论是整体的装饰风格，抑或细部特征，都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别无二致。而镶金的绿松石器此前不见于中原地区，但郑州商城狗坑内曾发现的金片饰件，部分金片的形状与盘龙城绿松石镶金饰件上的目、眉等装饰颇为类似，应同样原为兽面纹或夔纹装饰的一部分。（孙卓 2018B）现在，由于郑州书院街贵族墓的发现，我们又知道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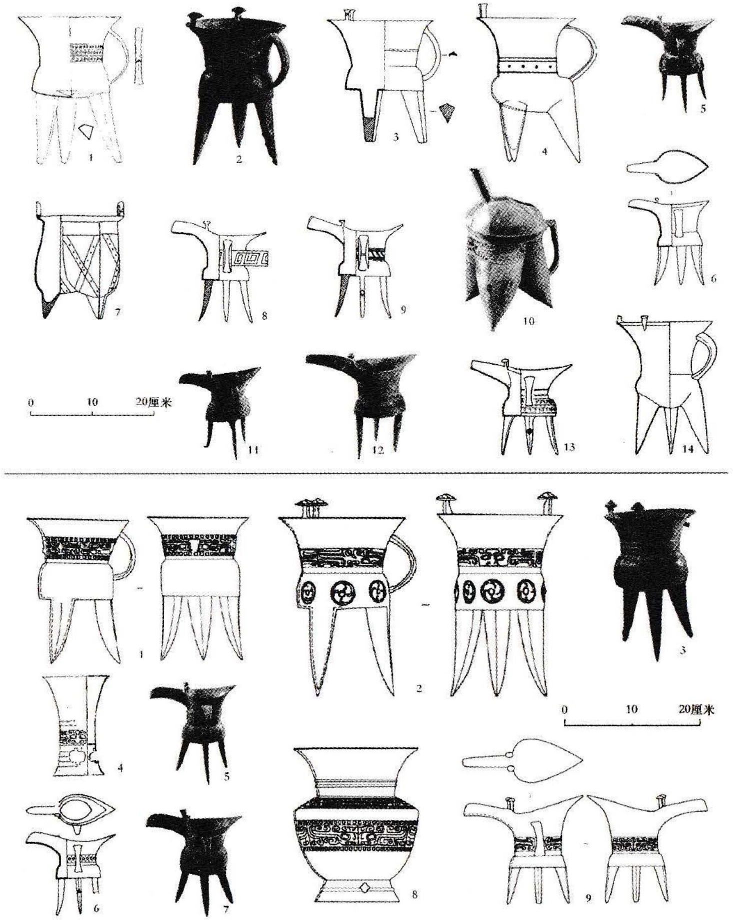
的绿松石器也见于当时的主都郑州商城，这就串联起了东亚大陆早期金器的传布线索。金器与青铜礼器一道，昭示了二里岗文明冲击波的强大力度。

青铜礼容器大扩散

二里岗文化晚期是商文化分布范围最广、大幅对外扩张从而产生强势文化辐射的阶段。（王立新 1998）这在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上也可窥见一斑。（司媛 2020，许宏 2021B）

距郑州数十千米至 200 千米左右的近畿地区，在黄河以南的新郑望京楼、陆庄村、陵岗村，新密曲梁，荥阳张片庄，洛阳偃师区二里头，灵宝东桥村，中牟黄店、大庄村，汝州李楼村，许昌大路陈村，漯河郾城区拦河潘村，舞阳北舞渡，项城毛冢和黄河以北的焦作南朱村，武陟大驾村，获嘉东张居村、照镜，辉县琉璃阁等地都出土了青铜礼容器和兵器，多可判定为墓葬所出。前述晋南地区的垣曲古城南关、夏县东下冯城邑遗址，此期续有铜器墓发现。再向北的山西隰县庞村，还出土有零星的青铜容器。

黄河北岸黄土丘陵二级台地上的山西平陆前庄遗址，出土了包括大方鼎、圆鼎、爵、罍在内的 6 件青铜礼容器和石磬等遗物，应属窖藏地点。大方鼎通高 82 厘米，口边长 50 厘米，形制与郑州杜岭大方鼎和原向阳食品厂内出土的方鼎近同，年代大致同时。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二里岗文化青铜器之一，也是郑州以外发



二里岗文化兴盛期近畿地区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容器（依司媛 2020 改绘，司媛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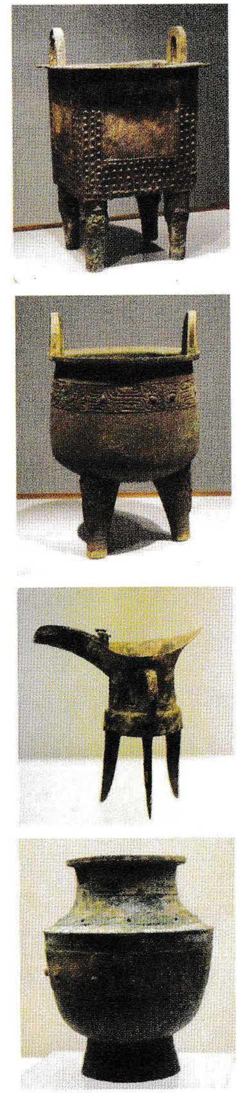
上（早期晚段）：1—4、14. 斝　5、6、8、9、11—13. 爵　7. 鬲　10. 盉（1 出自二里头，2、11 出自登封袁桥，3、4、7—9 出自辉县孟庄，5、10 出自中牟黄店，6 出自偃师商城，12 出自获嘉东张居，13、14 出自登封王城岗）

下（晚期早段）：1—3. 斝　4. 觚　5—7、9. 爵　8. 尊（1、2、8、9 出自偃师商城，3 出自荥阳张片庄，4 出自武陟，5 出自辉县，6 出自焦作南朱村，7 出自获嘉照镜）

现的唯一的大方鼎。（卫斯 1992，陶正刚 2005）在都邑以外出土如此体量、规格的青铜器，表明与豫西隔河相望的晋南地区是中原王朝向西北伸展的重要区域。

向东，海岱地区西部的济南一带，是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容器分布最靠东的地点。其中的济南大辛庄遗址是二里岗文化东渐的重要据点，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岗文化晚期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方辉 2013）类似器物还见于济南长清区前平村等地。鲁南地区的滕州大康留、轩辕庄和再偏东南的江苏连云港大村、淮安茭陵等地点也有少量发现。

向北，距郑州商城近 400 千米远的河北石家庄藁城区台西遗址（河北省所 1985），是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分布最北的一处地点。而更北的河北满城要庄和河套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还有二里岗文化风格的青铜器零星出土。在朱开沟遗址，鼎、爵残片与北方特色鲜明的青铜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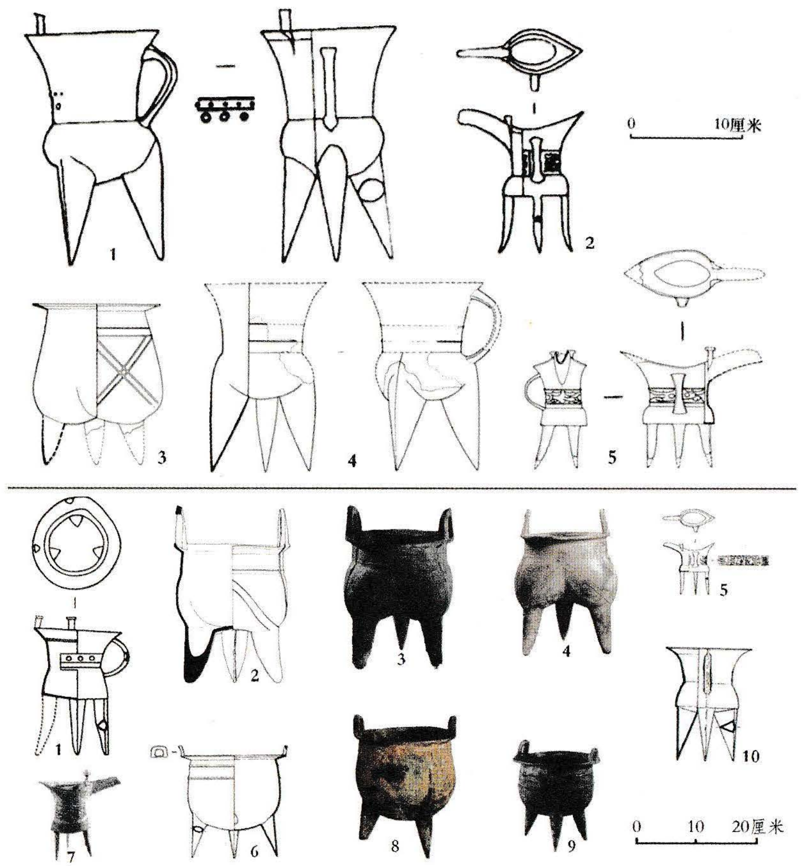
平陆前庄出土的铜方鼎、圆鼎、爵、罍

和石范同出，应属“舶来品”。

向西，以泾河、渭河流域为主的陕西关中地区零星出土了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晚期的青铜容器，如西安、铜川、岐山等地所见。再向南，秦岭以南汉中地区的汉水流域，如城固的若干地点，出土最早的青铜器有可早到二里岗文化晚期者（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 2006，曹玮 2006）。这批铜器大部分与郑州商城同期墓葬和窖藏所出近同，表明此地在二里岗文化晚期时应与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有接触。但从青铜器群具有一定的特色、存在一定变异的情况看，这种接触应是间接的和辗转的。（朱凤瀚 2009）

向南，除武汉盘龙城遗址外，其近旁的黄陂鲁台山、荆州荆南寺、黄冈黄州区下窑嘴等地均出土有青铜礼容器，应与盘龙城青铜器群同属一个文化类型。长江下游北岸的霍山、南岸的铜陵都出土有青铜礼容器，后者是江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容器。（安徽大学等 2006，孙卓 2019）

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容器的大扩散，与殷墟文化的收缩以及各地青铜文明的“土著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二里岗时期，即商人占据郑州的时代，统一的青铜铸造风格从中原地区扩散，覆盖了华北和华中的大部分地区，显然远远超出了任何城邦或广幅国家的边界。到晚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四川和中国的其他地区都发展出显著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工业。”（布鲁斯 · G.



二里岗文化兴盛期周边地区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容器（依司媛 2020 改绘，司媛制图）

上（早期晚段）：1、4. 斝　2、5. 爵　3. 鬲（1、2 出自垣曲商城，3—5 出自武汉盘龙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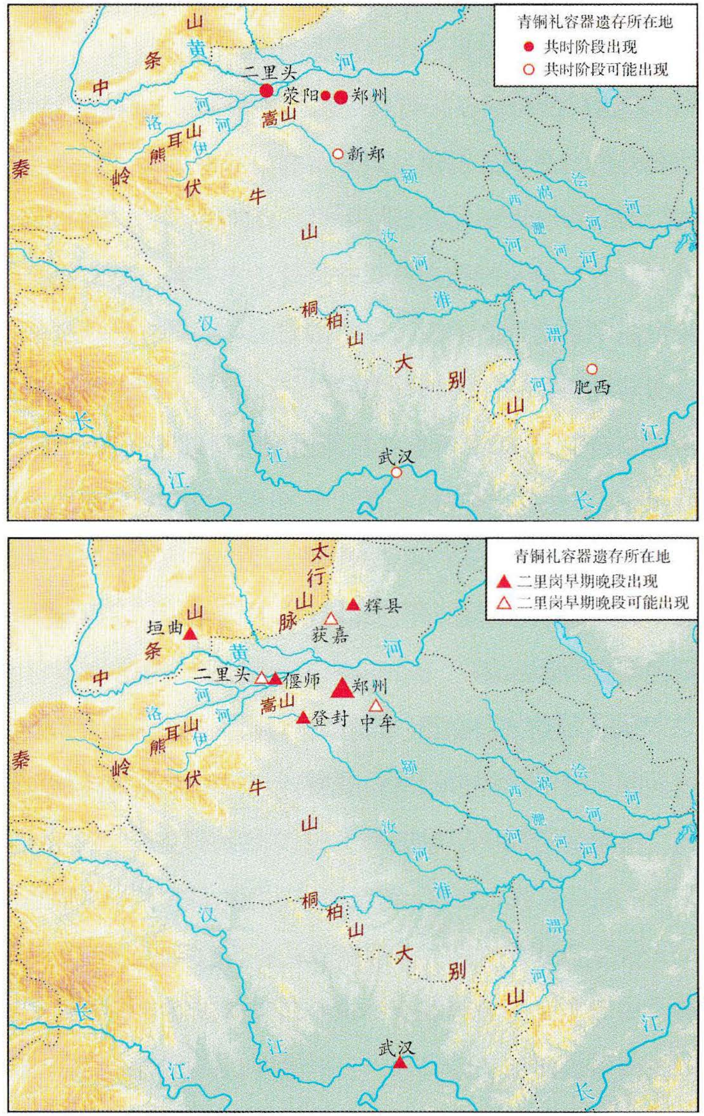
下（晚期早段）：1、10. 斝　2—4. 鬲　5、7. 爵　6、8、9. 鼎（1 出自湖北荆州荆南寺，2、4 出自陕西城固，3 出自陕西西安田王村，5、6、10 出自垣曲商城，7 出自河南项城毛家，8 出自山西隰县庞村，9 出自陕西蓝田怀珍坊）

崔格尔 2014）崔格尔教授引用既往研究（Bagley 1999）所做概括，是允当的。

礼容器散布的背景

二里岗文化一改二里头文化相对温和的扩张方式，其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利用近畿地区严密的防护，一直保持稳步向四方推进的态势。在进行军事占领与控制的同时，利用青铜礼容器有选择、有规划地分配给重点地区的高等级人群，使其成为他们维护稳定与统治的助力。这种快速有效的扩张模式使得二里岗文化很快就突破了二里头文化原有的疆域范围，控制了更广阔的地域。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了一个空前广阔的青铜礼器文化圈（徐良高 1998），昭示着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在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空前控制力。

如前所述，自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过渡期，青铜礼容器开始出现在中心都邑以外的其他聚落。到了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时，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显示了二里岗国家开疆拓土的进程正式启动。继上一阶段二里岗文化占领了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之后，这一时期的西部前沿维持在关中东部地区，向北仅覆盖了下七垣文化分布区域的南部地区，相比之下，这种进程向南方和东南方向的推进力度更加明显，向南拓展到湖北盘龙城地区，向东南方向不但取代了河南周口地区东部的岳石文化，并进一步向皖



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早期早、晚段）（依司媛 2020 改绘，湖南地图出版社制图）

西北地区扩展，直抵江淮地区巢湖以西。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铜礼容器的分布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紧邻其外的近畿地区发现地点开始密集起来，北、西、南、东四个方向均分布有青铜礼容器发现地，环绕其四周隐隐形成包围拱卫之势。武汉盘龙城城邑在这一阶段正式被纳入分布版图，同时地处晋南中条山地区的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城邑也已被覆盖。可见此时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情况与二里岗文化向外扩展的分布态势是相吻合的，发现有青铜礼容器的聚落遗址均属二里岗文化遗存。

到了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二里岗文化向外扩张的力度大为增强。在东方与东南方，整个豫东地区均已纳入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鲁西地区的济南大辛庄遗址也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江淮地带已突进到巢湖以东，此时在南方长江中游的盘龙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二里岗文化聚落群，且已不仅限于武汉盘龙城城邑周边地区。向北扩张是本阶段新的着力点，北易水河流域以南地区均为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太行山东麓地带及以北的壶流河流域也有这一时段的遗存发现。西部边缘依旧维持在关中东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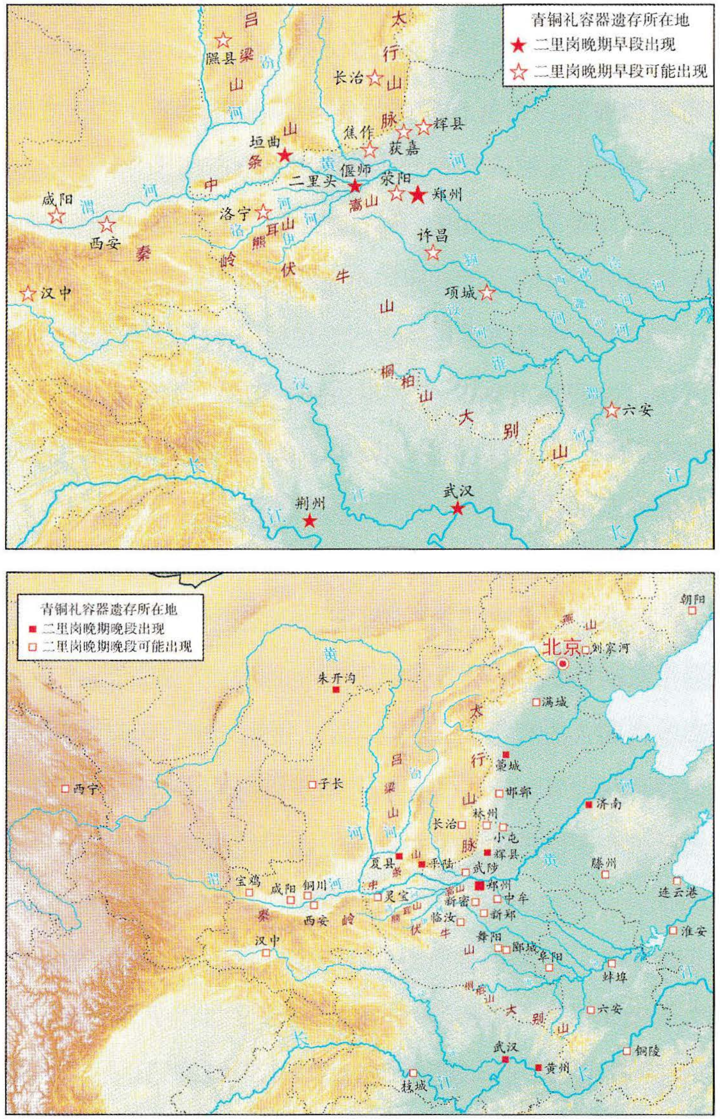
结合前文所述这一时期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区域可知，随着二里岗文化的扩张加剧，铜容器空间范围的拓展同步加速。本阶段太行山西麓长治盆地的长治地区、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隰县、汉江流域的汉中地区均有青铜礼容器出现，已突破了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

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该文化基本维持了上一阶段的分布范围，未有明显收缩，并且在鲁西地区仍有扩张趋势。（王立新 1998）本期青铜礼容器的分布地点激增，尤其在周边地区，除十分边远的西南边陲、东南沿海、青藏高原深处及天山南北地区外，几乎所有区域均有本阶段的中原风格青铜礼容器出现。

这一时期众多发现青铜礼容器的地区中，非二里岗文化分布范围的区域大为扩展。往西关中平原西部及黄河上游的湟水谷地，往北黄河中游的陕北地区、河套地区及东北方向的燕山南北地带，东南部苏北地区及长江下游的皖南一带均有发现，这些区域则分布着各具地方特色的其他考古文化遗存。（司媛 2020）

在对青铜礼容器扩散的分析中，王海城提示到，有些二里岗城市的选址可能的确是出于商业或军事上的考虑，但统治者还受其他野心的支配。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统治者扩张的意图或想象有时与经济利益毫无关系，如埃及新王国时期向努比亚地区的扩张、汉武帝在西域的扩张等，都不是纯粹出于经济动机。（王海城 2016）

一个例子是，上引平陆前庄遗址的大方鼎、罍等青铜和玉石礼器出土于山西平陆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型窖藏而非墓葬中，窖藏的附近也并没有重要的同时期居址，一座小型城邑的具体年代尚待确认。（卫斯 2007）那为什么把如此庄严的铜器群埋在这里呢？王海城提出了另一种可能：二里岗文明的扩张给统治者带来了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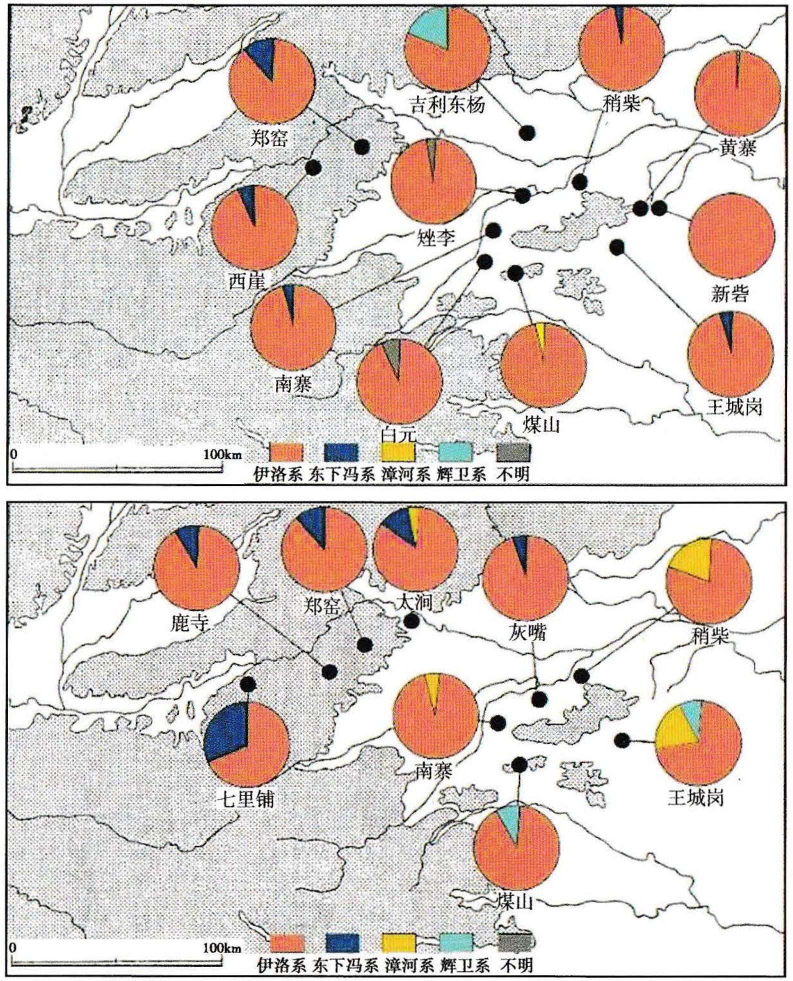
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晚期早、晚段）（依司媛 2020 改绘，湖南地图出版社制图）

制大山大河的机会，而这些名山大川在宗教礼仪上至关重要，所以才在此瘗埋中原的祭祀重器。他提示到，帝国的缔造经常存在着我们觉得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动机。我们一定要尝试像一位二里岗的统治者那样去思考。（王海城 2016）

陶器的“体制美学”

制作工艺简单而不便携带的日用陶器，往往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传统上的保守性，如非人群迁徙和政治上强势干预等因素，很难达到广大地域内制器风格的高度一致。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就总体显现出这种自然状态，即便在二里头都邑，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据初步统计，二里头文化的器类达到 30 余种，各器类的形制、尺寸、装饰风格等，看不出大致统一的规范。（许宏等 2019B）但这种情况，到了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化。

秦小丽博士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此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秦小丽 2019）：比较二里头时代与二里岗时代陶器风格的地域变化动态可以看出，其相同点是两个时期都以伊洛—郑州地区为中心，陶器的风格也都由中心地区向周边扩张与蔓延。然而，在二里岗时代，中心地区的陶器风格一旦确立，便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与扩张，其影响力度也较前期大得多，使当地系统陶器消失殆尽，呈现出二里岗文化陶器的一元化、整齐化的特征。因此



伊洛地区陶器系统构成的比例变化（秦小丽 2019）

二里岗时代中心势力对地方的影响力更为强大，考虑到地方性城址的设置与规划，可以解释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系统得到了极大

的加强。秦小丽认为，这是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两个不同阶段。

这种整齐化，甚至可以从普通炊器的形制、尺寸上表现出来。譬如，二里头时代的主要炊煮器为深腹罐，进入二里岗时代，这类炊煮器在普遍小型化的同时，其口径与器高均逐渐呈现规格化的倾向。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另一种炊煮器鬲，在进入二里岗时代后代替深腹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炊煮器，进入二里岗文化晚期后，其与深腹罐一样，也呈现着明显的规格化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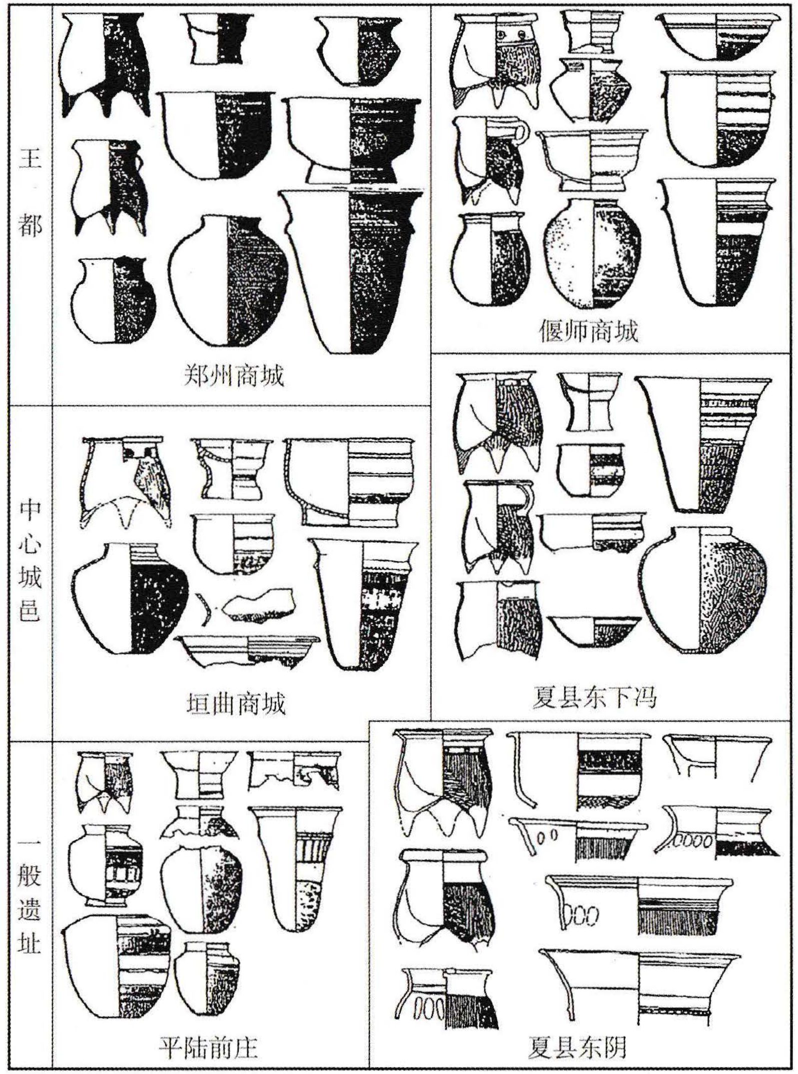
与二里头文化相比，二里岗文化陶器生产在手工业专业化与专业内部分工上进一步细化。

首先是郑州商城内的两处制陶作坊表明陶器生产已经脱离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出现了明确规划的手工业作坊区域，以及有专业内部分工的陶窑与单一化产品，譬如专门生产陶盆类泥质陶的作坊和生产夹砂陶类炊器的作坊。以制陶为专业的工匠群体开始出现，陶器生产有了向专业化、以流通为目的商品化、供给化发展的可能性。另一项研究表明，偃师商城制陶作坊的大口尊在尺寸上表现出的高度标准化，符合作坊区陶器生产组织模式上所显示出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制陶作坊内部，不仅存在陶器成型区与烧造区的空间划分，在工匠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工。（邓玲玲等 2022）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早期郑州政权的建立与经营，二里岗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已经成为一个以经济成分作为主要功能的社会，其陶器制作水平也达

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其次，主都郑州商城周边地区逐渐出现具有专业性质的制陶作坊。例如陶鬲作为二里岗时代最常用的日常生活器类，邢台、邯郸一带应该是其生产的中心之一。也许随着业内分工的细化，日常用粗陶类的生产从城内转移到了远离中心区域的豫北冀南一带，但礼仪性陶器的生产是否还在中心城区或者近郊有待探究。某一作坊只生产某一种器类，就必须有相应的原材料供给源和产品的流通渠道予以配合，陶器专业化的进展还可能预示着生产的指令性计划的存在，专业工匠的管理、流动和职业保证及产品消费的保证，这一切都与社会组织的管控能力相关。

秦小丽的研究还表明，伊洛—郑州系陶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不是呈面状分布的，而仅仅是在一些较为特殊的遗址中才构成主体因素。这种点状的分布表现的不是地区间一般性的交流行为，而是反映了某种特殊原因，比如战争或政治性影响等。在这一地区的中心据点盘龙城，不仅用于随葬的青铜器、玉器和釉陶等器类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而且日常生活用陶器构成中的50%以上也是中原的“伊洛—郑州系”陶器，并以此构成这一时期陶器群的主体成分，这暗示着中原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连炊煮器这种反映地域传统习俗及生活习惯的器具，都不是当地的圜底釜或釜形鼎，而是中原地区的传统炊煮器——鬲、甗、斝等空三足器。因此可以说在盘龙城中心据点存续期间，中原地区对这里的



二里岗文化各级聚落陶器一体化示意（秦小丽 2019）

影响力不仅仅限于贵族及以上级别的上层社会，甚至生活在城内外的一般社会阶层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要之，二里岗时代的陶器组合风格呈现广泛的齐一性。晋西南、伊洛地区、豫北、长江中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各自具有不同的陶器组合风格的地区，然而进入二里岗时代之后，陶器风格呈现出高度的共通性，而且这种共通性不仅限于器类构成的类似，在陶器的细部特征和制作技法方面也可得到确认。因此，可以认为在二里岗时代陶器的这种高度一元化的背后，不仅仅是陶器的简单模仿，可能还反映了某种强烈的支配性制度的存在。这种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在中心都邑、地方城邑和一般聚落三类性质不同的遗址中均可得到确认，由此可以推测其背后存在着某种严格的陶器生产制度和规则。

如前所述，二里岗时代的周边城邑是根据中心都市统治者的意图和计划而设计建设的地方性据点或功能性城址。而与中心都邑密切相关的地方城邑的出现，正好与二里岗文化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向周边地区扩大的时期一致。因此可以认为二里岗文化陶器风格在地域的一元化，正是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中心的势力向周边地区的强势扩张和对地方影响的具体显现。王海城的研究也表明，二里岗类型的陶器在各地的广泛分布是二里岗国家扩张的结果，而陶器的集中生产构成了其不同于西亚两河流域乌鲁克等早期政体的鲜明特色。（王海城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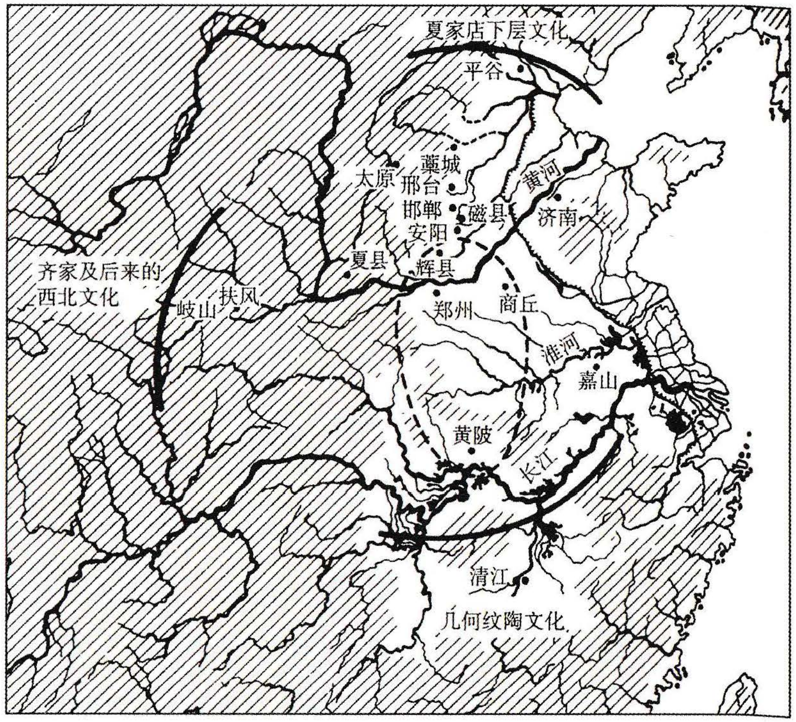
四　何以“帝国”？

行文至此，铺陈多多，居然还没有对书名中的“帝国”作一解题。二里岗文明，堪称“帝国”？如是，那究竟何为“帝国”？这应是大部分读者心怀的狐疑。这里就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

“二里岗帝国”说的提出

殷商的青铜文明，最大限度向四方强力冲击渗透的时段并非殷墟时期，而是二里岗时期，它大体完结于武丁、妇好之前。这一现象，至少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就逐渐被注意到，被称为二里岗大冲击或二里岗扩张。［张光直 2002（英文原著出版于 1980 年），浅原达郎 1985］

贝格利教授从铜器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二里岗扩张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进而提出了“二里岗帝国”的论点。（Bagley 1977，1999）而后，他的门生王海城教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二里岗扩张在东亚考古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种新近发明的金属制作工艺甚或文明本身传播到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从此由一个局部现象变成了覆盖辽阔区域的整体现象”，而“这种特征鲜明的物质文化大规模扩散现象并不为二里



二里岗文明的扩张（张光直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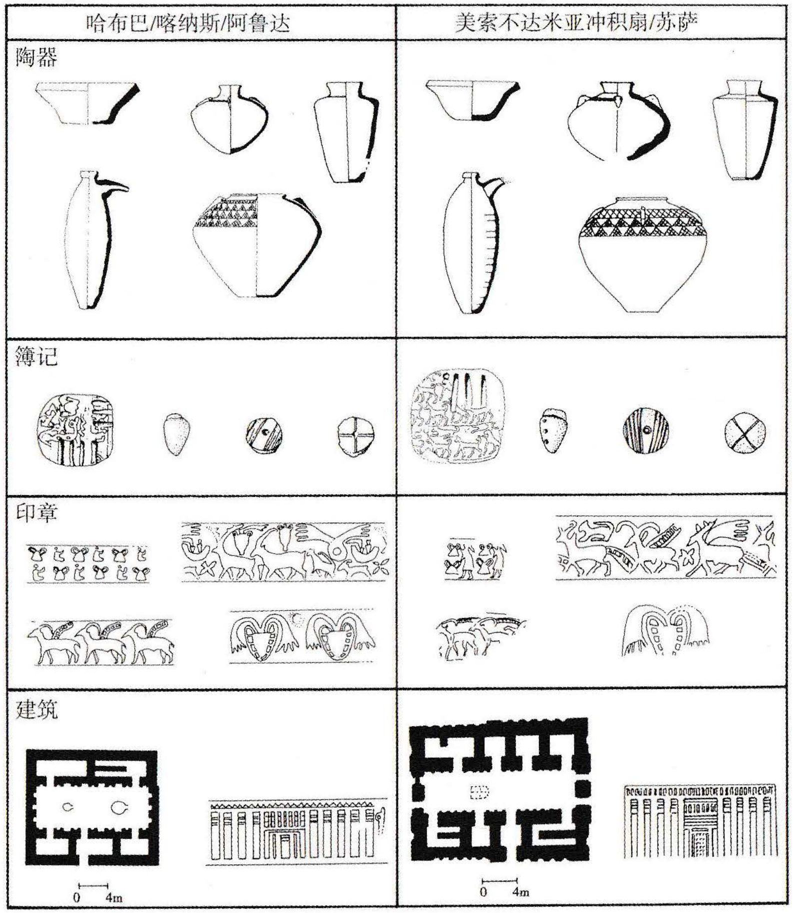
岗文化所特有。恰恰相反，这似乎是文明初始阶段的一个普遍现象”。

王海城列举的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最早阶段的所谓的乌鲁克扩张（Uruk Expansion），突兀并且爆炸性的城市增长发生于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段，具有乌鲁克物质文化典型特征的遗存广泛分布于伊朗西部、两河流域北部

以及安纳托利亚半岛东南部，包括建筑格局与建筑技术、滚筒印章及其纹饰主题，以及特殊的陶器类型。其他的例子还包括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Harrappan civilization）和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Olmec civilization）。哈拉帕文化的度量衡工具、陶器、建筑以及其他手工艺有着惊人的统一性和标准性，尽管陶器和城市布局仍存在着很多差异。如若再考虑到这一文化的分布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千米（大于现代的巴基斯坦），那这种统一性就越发显得非同凡响。奥尔梅克风格的遗存包括宏伟的石雕像、便携的石质品、形塑的陶制品及陶容器，它们广泛但不均匀地分布于整个中美洲地区。

和二里岗文明一样，可以认为这类同一物质文化大面积分布的现象绝非出于偶然的文化交流。尽管上述四个古文明可能都已有了文字，但是已知的铭文都非常稀少、简短、难懂，所以我们只能寄希望从物质文化来理解这类考古学现象，设想一些传播物质文化的可能机制：模仿、交换、贵族集团的迁徙、宗教的皈依、殖民和赤裸的征服。

王海城指出，考古学家习惯于以日用陶器作为反映古人行为的最可靠证据，可这主要是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陶器是遗物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我们研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却对其贵族阶层所定做和使用的器物不予重视的话，就会严重扭曲我们的认识。假设我们没有二里岗铜器，没有乌鲁克建筑与印章，没有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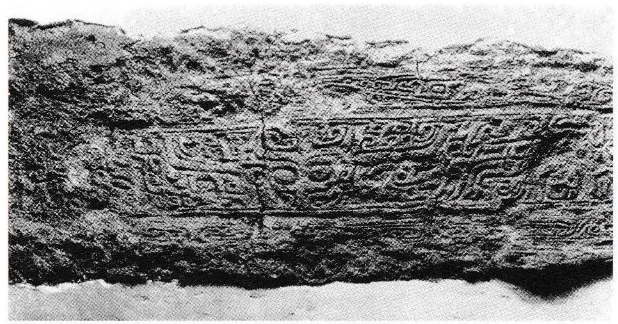
乌鲁克文化时期西亚各遗址的相似遗存（依 Wang 2014 改绘）

尔梅克的巨型石雕或者玉器，没有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的城址，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些分布广泛的文化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吗？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其成员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会得到区别

对待，因而我们也应该期待考古材料能反映出这种分层现象。如果某一种陶器组合与某一种铜器组合显示出相关但却不同的分布状态，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们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机制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牵涉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成员。

基于以上考虑，王海城认为对二里岗文化的定义也应该是分层的。在普通大众这个层次上，反复出现的物质因素包括陶器、骨器、石器、房址、葬俗等。在贵族阶层这个层次上，他主张以青铜礼器作为二里岗文化的定义标准。青铜器是贵族阶层求得权力和权威正统性最关键的物质要素。二里岗制铜业的规模与组织的复杂程度，最好地证明了控制这一行业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体。

与二里岗这种铜器面貌一致的现象最接近的例子，是西周早期华北地区的铜器分布，而那正是一个先以军事征服，继之以殖民扩张而建立起来的帝国所留下的物质遗存。历史时期的考古材



武汉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椁板纹样（湖北省所 2001），与郑州青铜器母题高度一致

料告诉我们，帝国的建立扩大了其疆域内的文化多样性，但就贵族阶层的精英文化而言，统一性则是常态。

二里岗铜器所具有的风格与技术上的一致性，强烈地显示它们出自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它们是大型铸铜作坊的产物，而在这些作坊内很多能工巧匠的工作需要监督与协调。真正的困难是持续不断的原料供应，为此需要在采矿、冶炼、燃料和运输上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原材料的控制可能是二里岗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是其扩张的原因之一。而这样一种国家形态，应可称为“帝国”。（王海城 2016）

何为“帝国”：概念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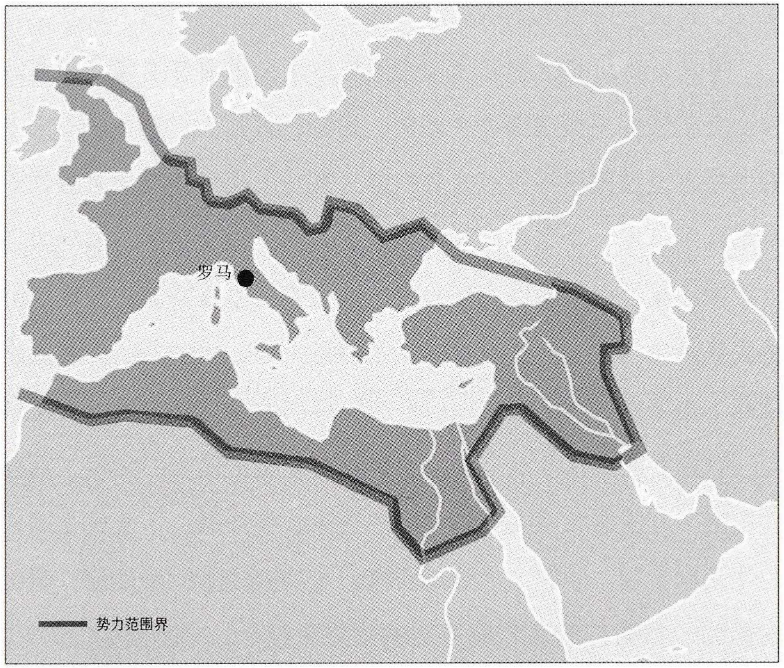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虽有类似意义的“天下”和“王朝”概念，却并无“帝国”概念，汉语语境中的“帝国”概念，是近代以后对英文 empire 的翻译。“大清帝国”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帝国”一词不仅没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消失，反而传播益广，直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流行语和叙述中国政治史的主流话语。说起古代帝国，浮现于我们脑海中的，肯定是自秦汉以迄明清，自波斯、罗马帝国以迄奥斯曼帝国那些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外向型”国家。关于帝国的定义五花八门，学术界迄无定论。“在日常语境中，帝国泛指那些地域辽阔并拥有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的强国和大国。”（俞可平 2022）其中，“拥有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

就把“帝国”的概念限定在狭义的、成熟的帝国范畴。

帝国与此前的国家形态是否泾渭分明，也存在争议。可以认为，无论多大规模的国家（城邦、王国、帝国），都是权力集中的产物，通过控制技术和武装力量来实现。而帝国是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是一个诸如王国或城邦的政体且以其他事物为代价进行扩张的结果。所有帝国都由一个强大的中心来控制这个庞大的多民族政体，还有一个支持帝国行使权力的成功的思想体系。（坎迪斯·古切尔等 2013）

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邦国（古国）、王国和帝国三种不同的国家政权体系。“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震中 2003）多有西方学者把公元前 221 年秦以后的几大王朝统称为“中华帝国”，其中包括 9 个具体的帝国王朝。（帕特里斯·格尼费等 2018）另有极少数学者认为中国自西周以后就进入了帝国时代，而秦统一中国实际上是“解散了帝国”（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2010）。

贝格利和王海城则认为，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一个帝国就是通过集中指挥的侵略战争而形成的一个庞大政体，对不同的族群进行集权统治，而且经常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基于此，他们认为二里岗文化的物质遗存与这个定义相符。（Bagley



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示意图（许倬云 2017）

1999，王海城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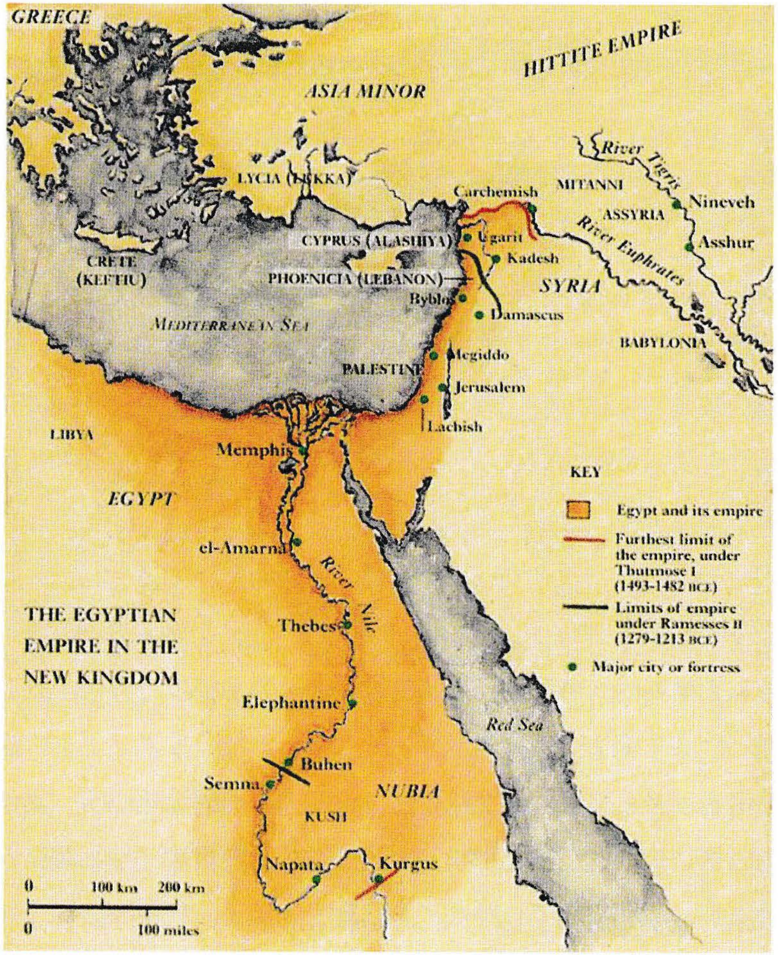
即便未采用“帝国”概念的学者，也都意识到“一个广泛的文化同质化过程发生在二里岗时期，产生了在之前任何新石器文化下都未曾实现过的一个巨大的地域文化整合，并且在二里岗时期以后便不再继续”（李峰 2022）。那么，这个“广泛的文化同质化过程”或“巨大的地域文化整合”，是否昭示着一个类似后世帝国的政体崛起于东亚大陆呢？而指称二里岗文明为帝国是

没有先例的吗？是突兀而不合情理的吗？我们还是看看学者们在历史叙述中是如何运用“帝国”这个概念的。

那些被称为“帝国”的古国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疆域国家，古埃及人最早建立了行省制度，将从尼罗河谷的阿斯旺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广阔领土分为42个行省。古埃及居民大约有100万—150万人，包括从黑肤色民族（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种群有关）到浅肤色民族（与北非和西亚的种群有关）的各色人种。（理查德·W. 布利特等 2020）所以有学者认为埃及帝国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Andelkovic 2011）但一般认为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70年）才“成为一个统治着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部和西南亚的大帝国，这意味着埃及通过领土征服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意志施加给了其他地区”（杰里·本特利等 2018），“这一时期埃及军事强大，文化多元，埃及人具有国际化心态，文化上与周边地区形成互动影响”，“埃及统治南至努比亚，北至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帝国”（托马斯·施耐德 2017）。

关于古代埃及各时期的称谓和起讫时间，一直异说并存，年代越具体越具争议性。此处和后文采用了施耐德教授提供的偏于宽泛，但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古代埃及历史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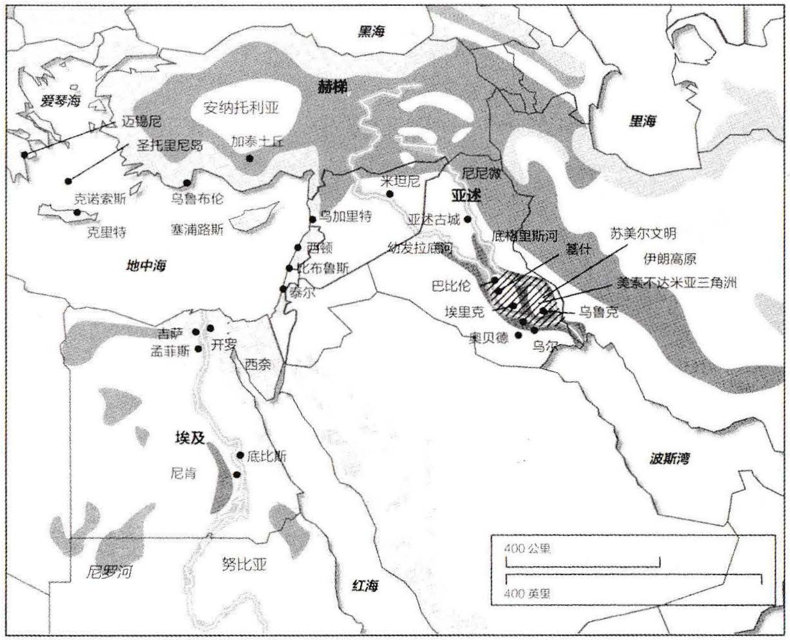


埃及帝国新王国时期的疆域（托马斯·施耐德 2017）

在西亚地区，“帝国”一词最早被用于形容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苏美尔人国家：“苏美尔人的城市很可能占据了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和黎凡特的陆上贸易路线，但是他们的影响并不是长期的，而他们的统治也是虚无缥缈的。卢加尔扎克及其他文明都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融合了贸易、征服、无情的统治，以收取供奉的形式扩大疆域，是形式松散、极不稳定的帝国。”（布赖恩·费根 2020）

更多学者指认阿卡德帝国为史上第一帝国，尽管关于这一帝国建立的时间尚存异议：“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入侵者推动了政治的变化。征服之王，阿卡德的萨尔贡，是古代最伟大的帝国缔造者之一。”萨尔贡的成就“为区域政治史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帝国向度的进路”。（菲利普·费尔南德兹 - 阿迈斯托 2010）“公元前 2350 年，一系列征服者试图通过建立帝国管理大量臣服城邦和臣民的方法来平息这种经常性的冲突。第一个征服者是阿卡德的萨尔贡。”（杰里·本特利等 2018）“公元前 2296 年，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理查德·奥弗里等 2011）“公元前 2250 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各个城邦的相互争战中，萨尔贡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帝国。”（霍华德·斯波德克 2018）这是“历史时代以来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塞顿·劳埃德 1990）

“后世的征服者中最为显赫的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他称自己为‘世界四方之王’。汉穆拉比发展了萨尔贡的统治政策，不再靠镇压和屠杀，而是依靠中央官僚统治和税收制度化来管理帝国”，“《汉穆拉比法典》是涉及范围最广和最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法典”。（杰里·本特利等 2018）“最终，公元前 1792 年执政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逐一征服四周邻国，将帝国的版图向北扩张至马里地区。”（保罗·巴恩 2021）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遗址（布赖恩·费根 2020）

而在《大地与人》这部书中，最早被冠以“帝国”称号的则是赫梯（约公元前 1650—前 1200 年），这是“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民族于青铜时代晚期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建立的一个帝国”。赫梯人在都城哈图沙（哈图萨斯）布置了采用新技术的马拉战车，也率先掌握了用铁制作工具和武器的技术。（理查德·W. 布利特等 2020）著名赫梯学学者布赖斯在新近出版的《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中，就以“一个帝国的环境”“打造一个帝国”和“帝国的灭亡”来命名相关的章节。“我们将看到图塔里亚如何着手为赫梯帝国奠定基础。随后，我们将目睹帝国的胜利、挫折、灾难和复兴的进程，直到它最终崩溃于公元前 12 世纪早期。”（特雷弗·布赖斯 2022）

“早期帝国”在全球主要文明发祥地的分布

公元前	埃及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中国文明
		南部	北部	
3500	前王朝	乌鲁克时期		
	地区性小国			
	早王朝	杰姆代特		
3000		奈斯尔时期		
		苏美尔早王朝		
	古王国			
2500	金字塔始建			
		阿卡德王朝		
		新苏美尔		龙山时代
	第一中间期			诸文化
2000	中王国		古亚述	
		古巴比伦		
		重新统一		新砦类遗存
	第二中间期	汉谟拉比在位		二里头文化
		赫 梯		
1500	新王国			二里岗文化
			中亚述	
				殷墟文化
1000				西周文化

“到公元前1500年时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此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斯塔夫里阿诺斯 2005）“早期的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亚洲见证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帝国之间、军队之间相互绞杀。你可以认为，人类文明会因此退回黑暗时代。大约在 3000 年前，人类文明的摇篮确曾神秘般地陷入崩溃。各地考古学家发现：人口锐减，宫殿废弃，技艺（包括文字体系）失传。但是灾难过后新帝国重新崛起。这些帝国拥有铁制武器，记录了自己的历史和战争进程。”（安德鲁 · 玛尔 2016）这里述及距今 3000 年前后均存在“帝国”。新亚述帝国（公元前 10 世纪至前 7 世纪）被认为是“到当时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范围包括从伊朗高原到地中海西海岸，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理查德 · W. 布利特等 2020）“亚述帝国的崛起”之后，巴比伦尼亚帝国推翻亚述政权，占领西亚全境，最终迎来繁盛。公元前 539 年，迅速扩张的波斯帝国又攻克了巴比伦尼亚。（保罗 · 巴恩 2021）

此后，在欧亚大陆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臻于鼎盛之前，又有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孔雀帝国等纷纷登场。更晚的中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都曾被称为帝国；南美洲则有瓦里、奇穆和印加等安第斯帝国；埃及以南的非洲，阿克苏姆、加纳、穆拉比特、马里、桑海等国家也被不同的学者称为帝国（详上引各书）。以

至于历史学家常常慨叹：世界史就是帝国史。的确，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体系之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各种形式的帝国体系之下。(俞可平 2022)

这些被称为“帝国”的国家，当然同时也被别的学者称为王国甚至城邦等政体。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这是非常正常的。而在述及内政时被认为属王国的国家，如其对外有大范围的扩张，又会被同一位学者称为“帝国”。回想上文所引贝格利和王海城关于“一个帝国就是通过集中指挥的侵略战争而形成的一个庞大政体”的定义，应是合适的。由是可知，“帝国”的概念是相对的，它不应限于以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为先导的狭义帝国时代的政体，而是在国家初起时就已露出端倪。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展开，早期帝国也并不鲜见。正像“阿卡德人帝国的起伏跌落为后继所有两河流域帝国的起落提供了一次完美的预演”（乔治 · 鲁 2022），这些此起彼伏的早期帝国也是后世真正超大型帝国的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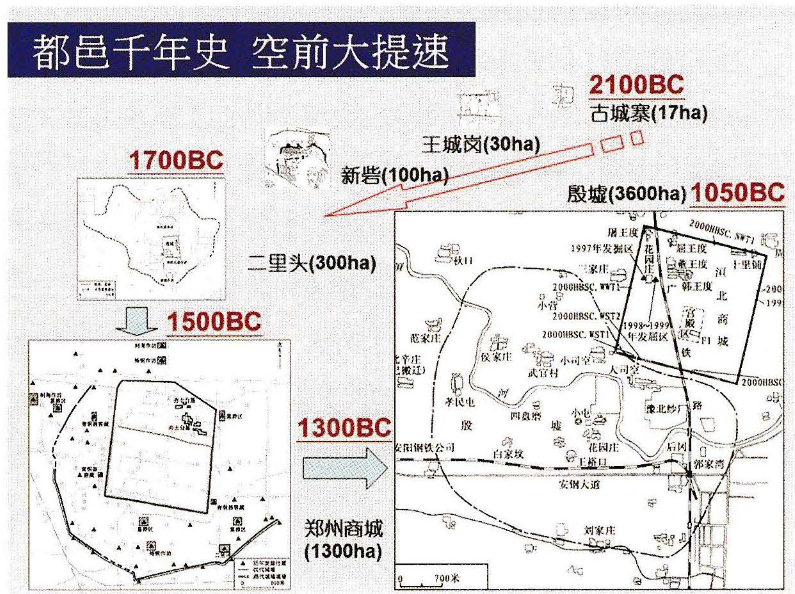
东亚超级大国的体量

最后，让我们把视线再转回东亚大陆。

先看郑州商城。“位于河南郑州的商代前期都城，如果包括迄今尚未完全搞清的外城的话，面积逾 13 平方公里。在其全盛期的公元前 15 世纪，它应当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地方，其

面积是两城镇和丹土面积总和的 15 倍多。它的内城面积达 3 平方公里多，几乎是平粮台面积的百倍。像平粮台一样，这个城圈内也充斥着宫殿宗庙和贵族居所，但其巨大的规模则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罗泰 2012）其中述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和河南周口淮阳区平粮台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心聚落。具有国际视野的美国学者罗泰教授提及郑州商城在全盛期“应当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地方”，他没有展开论证，我们且稍作梳理比较。

有学者尝试粗估商代人口总数，给出的大致数值是“商初为



龙山时代至殷墟时代都邑体量对比（比例尺同）

400万—45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其中，偃师商城的人口约5.5万，郑州商城内城的人口或即有8万之多，殷墟后期的王邑人口达14.6万人以上。（宋镇豪2011）又有学者推测郑州商城内外的总人口或可达到15万—18万人。（王妙发2004）

前文述及的乌鲁克城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大的城市，在第一王朝早期扩展到400公顷(4平方千米)，人口在4万—5万之间。（布鲁斯·G.崔格尔2014）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方圆3.5英里（约5.6千米），可能拥有3.5万居民。摩亨佐·达罗比它大几倍。（理查德·W.布利特等2020）这些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都城规模和人口稍大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的二里头都邑。

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700—前2200年）和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50—前1650年）的埃及控制和利用的土地多达33.3万平方千米，其中只有1.9万平方千米不是沙漠。（布鲁斯·G.崔格尔2014）在郑州商城走向繁盛的公元前15世纪，埃及正处于其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70年），开始向西亚地区扩展其势力范围，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区域进一步碰撞。也是自该世纪始，各古文明区域开始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联。据统计，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农业剩余产品养育了大约400万人口（杰里·本特利等2018），这与前文所引中国学者推定的商代初期（二里岗时代）的人口数近同。

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面积1.8平方千米，全城估计有4万—5万



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的狮子门（颜海英供图）

居民，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覆亡时成为废墟。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占地1800英亩（约7.3平方千米），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时，城内有居民10万—15万人，约为同期巴比伦的两倍。（孙宝国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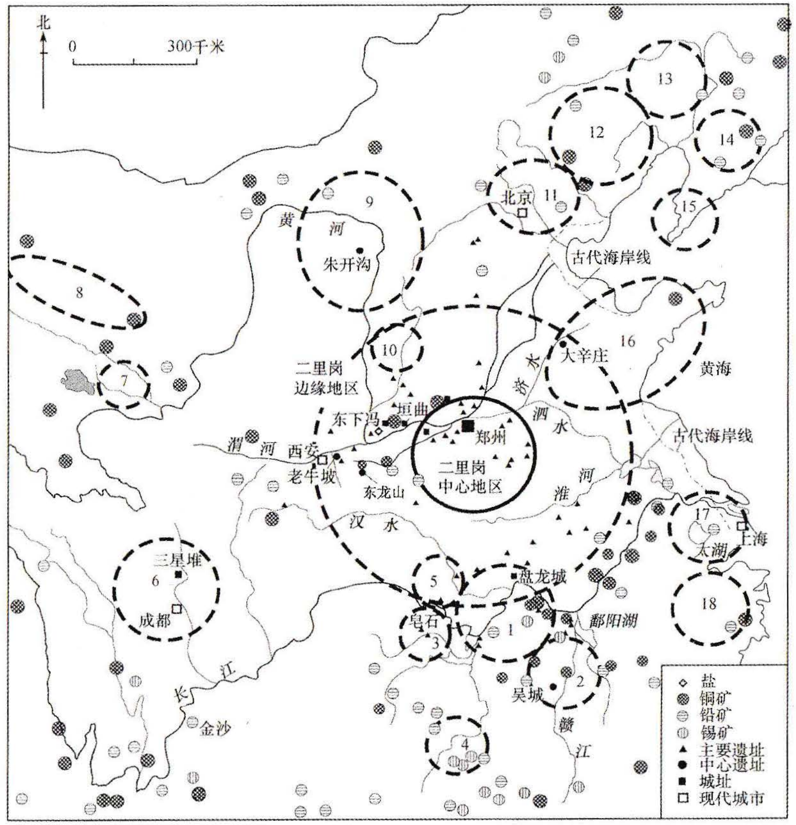
新近出版的权威著作《考古通史》叙述道：

玛雅文明的鼎盛时期，帝国领土面积可达125097平方英里（约32.4万平方千米）。前古典时代末期（公元前300—200年），玛雅帝国的大型定居点开始消失。

桑海帝国（15 世纪末—1591 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非洲政体之一，其鼎盛时期占西非赫萨赫勒地区面积近 58000 平方英里（约 15 万平方千米）。（保罗 · 巴恩 2021）

有学者推测“极盛时期的商王朝控制了 32 万平方千米的肥沃土地，但是它的核心地区可能只有13.2万平方公里”（布鲁斯·G. 崔格尔 2014），这里的“极盛时期的商王朝”应是指殷商时期（商代晚期）。既往认为商王朝只是到殷墟时期才达于极盛，但前已述及二里岗国家的膨胀态势远远强于已收缩了的殷墟时期商王朝。依对既往二里岗文化，尤其是青铜礼容器分布的研究结果，二里岗文化所代表的国家实体的分布范围应在 50 万平方千米左右。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二里岗文明冲击波的观察与研究，使得这一大体量、“外向型”的政治实体的样貌不断清晰：围绕河南中西部核心地区分布的遗址，显示出一个以郑州商城为最大中心和以偃师商城为次级中心的五级聚落结构。这意味着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的存在。与二里头文化相比，二里岗文化的规模更大，后者是前者的数倍，行政管理的层级又多出一级，文化的直接影响范围更大。（刘莉等 2002）二里岗国家外围城邑的设立，完全服务于郑州集团获取资源等政治意图，并与其在存在时间上高度一致，应属二里岗国家的殖民据点。（西江清高 2003）鉴于



二里岗时代的主要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刘莉 2009）

1. 盘龙城 2. 吴城 3. 宝塔 4. 湘江流域印纹陶 5. 荆南寺 6. 三星堆 7. 卡约 8. 四坝 9. 朱开沟 10. 光社 11. 大坨头 12. 夏家店下层 13. 高台山 14. 庙后山 15. 双砣子二期 16. 岳石 17. 马桥 18. 湖熟（文化分布地区根据考古所 2003）

二里岗时代大规模城邑的出现，以及对晋南和长江中游等地的扩张和据点建设，可以认为商周王朝“战士国家”的特质，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无遗（冈村秀典 2020）。

这一阶段 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其后 1000 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比如，它拥有地跨千里的遥远殖民城邑，有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的大型仓储设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漫长历史中，从没有哪一场部族征服和改朝换代能带来如此剧烈的日用陶器的异地汇聚与风格转变。可以这么说，在早期青铜时代，二里岗文明“堪称一场‘现代化’奇迹”（李硕 2022）。

那么，二里岗国家是否可以称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帝国”呢？这当然又属于仁者见仁的事儿。从前文挂一漏万的引述中可知，早于二里岗国家的、小于二里岗国家的，在全球文明史范畴内都有被称为“帝国”的，“二里岗帝国”的提出只是一个提案，一种阐释而已。

无论如何，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大陆青铜文明的星星之火，那么到了二里岗时代，这一不亚于其他早期“帝国”势头的庞大青铜文明的影响已呈燎原之势，从而奠定了中原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向。



注 释

文中所用机构作者简称如下:

北大商周组 =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

甘肃省所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所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省博 = 河南省博物馆

河南省所（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

河南省（局）文工队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湖北省所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历博、国博 =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考古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 年前隶属中国科学院）

盘龙城院 =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武汉大学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郑州市所（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院）

专家组 =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书目注释按刊行年代排序，其下按作者或机构作者首字母排序。

1933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 年。

1951

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科学通报》1951 年第 7 期。

赵全嘏：《河南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报导》，《新史学通讯》1951 年第 1 期。

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 年第 9 期。

1953

赵全嘏：《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新史学通讯》1953 年第 6 期。

1954

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 年。

韩维周、丁伯泉等：《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6 期。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 年。

1955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古遗址、墓葬的重要发现》，《考古通讯》1955 年第 3 期。

1956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1 期。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 年第 3 期。

1957

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8 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通讯组、郑州商代古城发掘小组：《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组文之一，《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 期。

赵全嘏：《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时代关系》，《史学月刊》1957 年第 3 期。

195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 年。

[日]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の馬車》,《東方學報》(京都)29,1959 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 年。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

1961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文物》1961 年第 4、5 期。

安志敏：《关于郑州“商城”的几个问题》，《考古》1961 年第 8 期。

刘启益：《“隞都”质疑》，《文物》1961 年第 10 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 年。

1962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 年第 9 期。

1976

杨鸿勋：《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 年第 2 期。

1977

Bagley, Robert W.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39, 1977(3).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 年。

夏鼐：《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 年第 4 期。

1978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 年第 2 期。

197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

1980

Bagley, Robert W. “The Appearance and Growth of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荆三林：《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1 期。

荆三林:《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答杨育彬同志》,《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3 期。

石加：《“郑亳说”商榷》，《考古》1980 年第 3 期。

赵新来：《中牟县黄店、大庄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2 期。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981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 Hudson, London, 1981.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年。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983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9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 年第 6 期。

198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

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 年。
[日]淺原達郎：《蜀兵探原——二里岡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古史春秋》第二号，朋友书店（東京），1985 年。
Thorp, Robert. "The Growth of Early Shang Civilization–New Data from Ritual Vessel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 Studies*, 1985(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
赵芝荃、徐殿魁：《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 年。

198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2 期。

1988

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1988 年第 4 期。
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1989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俄]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莫润先校：《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990

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
[英]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黄菊元校：《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文物出版社，1990 年。

1991

陈立信、马德峰：《荥阳县高村寺商代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1 年第 3 期。
陈旭：《商代隞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5 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 年第 1 期。

1992

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1992 年第 1 期。
张国硕：《小双桥商代遗址的性质》，《殷都学刊》1992 年第 4 期。

1993

安金槐：《对于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看法》，《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A）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2 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B）
许顺湛：《隞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中原文物》1993 年第 3 期。

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

1995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性质》，《中原文物》1995 年第 1 期。

1996

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 年。

裴明相：《论郑州市小双桥商代前期祭祀遗址》，《中原文物》1996 年第 2 期。

王学荣：《偃师“尸乡沟”小议》，《中国文物报》1996 年 9 月 22 日。

许顺湛：《中国最早的“两京制”——郑亳与西亳》，《中原文物》1996 年第 2 期。

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1 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垣曲商城（一）：1985—1986 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 年。

199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7 年。

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稻禾出版社（台北），1997 年。

1998

董琦:《关于中商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 年 7 月 25 日、8 月 5 日、8 月 12 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邱小驿头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 年。

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

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杨育彬、孙广清:《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殷都学刊》1998 年第 2 期。

邹衡：《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隞（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4 期。

1999

Bagley, Robert W. “Shang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 年。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香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文物春秋》1999 年第 6 期。

彭华：《殷商名号考》，《殷都学刊》1999 年第 3 期。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 年第 4 期。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 年。

200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 1998 年的发掘》，《考古》2000 年第 2 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 年。

宋国定、姜钦华：《郑州商代遗址孢粉和硅酸体分析报告》，《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 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

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4 期。

200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 ~ 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刘绪：《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2001 年第 2 期。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安金槐访谈，大象出版社，2001 年。

2002

何毓灵、胡洪琼：《试论早商城址的性质及相互关系》，《殷都学刊》2002 年第 4 期。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 年。

许进雄：《简明中国文字学》，学海出版社（台北），2002 年。

张光直著，张良仁等译：《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 年。

2003

郭物：《鍑中乾坤——青铜鍑与草原文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 年第 4 期。（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B）

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

李维明：《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新识》，《中国文物报》2003 年 6 月 13 日。

[日] 松丸道雄：《补説 7　殷か商か》，《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1 —先史 ~ 後漢—》，山川出版社（東京），2003 年。

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 年第 5 期。

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7 期。

[日] 西江清高：《先史時代から初期王朝時代》，《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1 —先史 ~ 後漢—》，山川出版社（東京），2003 年。

袁广阔：《关于郑州商城夯土基址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03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2004

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

郭物：《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战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 年第 3 期。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 年。

李维明：《“亳”辨》，《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5 期。

王妙发：《试论中国最早的一批都市》，《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 年。

袁广阔、曾晓敏：《论郑州商城内城和外郭城的关系》，《考古》2004 年第 3 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 年。

2005

舒可文：《迷失在郑州的古与新之间》，《三联生活周刊》2005 年第 36 期。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日]松丸道雄：《对“郑州商城”命名的一点看法》，《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日。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陶正刚：《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及青铜方鼎铸造的研究》，《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006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一卷，巴蜀书社，2006年。
[日]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李朝远：《关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斝——从上博藏一件青铜残斝谈及相关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
许宏：《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07

李民：《安阳洹北商城性质探索》，《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乔梁：《美玉与黄金——中国古代农耕与畜牧集团在首饰材料选取中的差异》，《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卫斯：《山西平陆前庄方鼎的历史归属与年代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
杨建华：《辛塔什塔：欧亚草原早期城市化过程的终结》，《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2008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郭京宁：《略论中国史前的石容器》，《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
韩金秋：《试论殷墟二期中型墓中的北方文化因素》，《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南普恒、秦颍等：《湖北盘龙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铜器铸造地的分析》，《文物》2008年第8期。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0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
李维明：《郑州早商文化骨刻字符浅识》，《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文化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日]松丸道雄著，近藤晴香译：《关于偃师商城和伊尹关系的假说》，《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岗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2010

范毓周:《关于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10 年第 4 期。

[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钱乘旦审读，叶建军等译：《世界：一部历史》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李维明：《考古学家邹衡》，科学出版社，2010 年。

刘彦锋、吴倩等：《郑州商城布局及外廓城墙走向新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 139 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 年第 10 期。

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商代史·卷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011

Andelkovic.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Egypt in the Predynastic Period", in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2011.

陈隆文：《郑州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年。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 年。

何毓灵、岳洪彬：《洹北商城十年之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 年第 12 期。

[美]杰西卡·罗森著，邓菲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

[英]理查德·奥弗里主编，毛昭晰等译：《泰晤士世界历史》，希望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

盛伟：《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1 年第 3 期。

宋镇豪主笔：《商代史论纲》（商代史·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201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 ~ 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 年。

何毓灵、岳占伟：《论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铜印章及相关问题》，《考古》2012 年第 12 期。

李维明:《郑州商代(城)遗址分布范围与“二十五平方公里”数值检讨》，《中国文物报》2012 年 5 月 11 日。

[美]罗泰著，许宏译：《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石磊、王会民等：《河北磁县南城遗址浅析》，《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 年。

石阳:《文物载千秋：巴林右旗博物馆文物精品荟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吴振武:《谈齐“左掌客亭”陶玺——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12 期。

张家强：《隞山、隞地与隞都》，《华夏都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2013

常怀颖：《郑州商城铸铜遗址研究三题》，《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 年。

方辉主编：《大辛庄遗址研究》资料卷、研究卷，科学出版社，2013 年。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美] 坎迪斯·古切尔、琳达·沃尔顿著，陈恒等译：《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格致出版社，2013 年。
Warmuth V M, Campana M G, et al. "Ancient trade routes shap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horses in eastern Eurasia", *Molecular Ecology*, 2013, 22(21).
王炜：《郑州商城铜器墓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 9 期。
徐海亮：《史前郑州地区地貌与水系演化问题初探》，《历史地理》第 28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赵平安：《"京"、"亭"考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3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等：《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 年第 7 期。

2014

[加] 布鲁斯·G. 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高江涛：《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鼎及相关问题探讨》，《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 55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日] 宫本一夫著，吴菲译：《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侯卫东：《试论郑州商城形成阶段宫殿宗庙区的布局》，《夏商都邑与文化（一）：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李维明：《"商"辨》，《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孟宪武、李贵昌等：《殷墟都城遗址中国家掌控下的手工业作坊》，《殷都学刊》2014 年第 4 期。
Campbell, Roderick. "Erligang: A Tale of Two 'Civilization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Erligang Civi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2014.
Wang Haicheng. "China's First Empire?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 Record of the Erligang Expansion," in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Erligang Civi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2014.
王炜：《殷墟研究的新思考——听荆志淳教授讲座有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六十期，2014 年。
张昌平：《盘龙城的性质——一个学术史的回顾》，《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 年。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登封南洼——2004~2006 年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 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垣曲商城（二）：1988 ~ 2003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 ~ 2006）》，文物出版社，2014 年。

2015

陈国梁：《偃师商城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 年。
高江涛：《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南方文物》2015 年第 4 期。
黄铭崇：《迈向重器时代——铸铜技术的输入与中国青铜技术的形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本第四分册，2015 年。（A）
黄铭崇：《从商代的"C 形马衔"与"尖锥策饰"看商代的"骑兵"问题》，《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2015 年。（B）
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2015 年。
仇士华：《^{14}C 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秦文生、宋国定等：《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15 年。
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徐海亮：《〈水经注〉中的郑州水系笔记之一——河水、济水、渠水》，《郑州古代地理环境与文化探析》，科学出版社，2015 年。
阎铁成：《重读郑州：一座由考古发现的中国创世王都》，科学出版社，2015 年。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 年。
张家强：《河南郑州东赵遗址》，《201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5 年。
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文物出版社，2015 年。
郑文：《纪念郑州商城发现 60 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召开》，《中国文物报》2015 年 7 月 24 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黄河路 109 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1 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 年第 12 期。

2016

[英]安德鲁·玛尔著，邢科等译：《世界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
[美]贝格利：《反思盘龙城遗址的意义》，《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 年。
[美]大卫·安东尼著，张礼艳等译：《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李素婷：《郑州市小双桥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施劲松：《盘龙城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考古》2016 年第 8 期。
王海城：《最早的帝国？比较视野下的二里岗物质文化扩张》，《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 年。

信应君：《河南郑州梁湖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6 年。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A）
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B）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2010~2012 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 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郑州市索、须、枯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 10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2017

常怀颖：《殷墟车马埋葬补议》，《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 年。
李宏飞：《二里岗文化形成之际郑州商城诸遗存分析》，《考古学集刊》第 20 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刘睿良、马克·波拉德等：《共性、差异与解读：运用牛津研究体系探究早商郑州与盘龙城之间的金属交流》，《江汉考古》2017 年第 3 期。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
[加]托马斯·施耐德：《古埃及的城邦与帝国》，《南方文物》2017 年第 3 期。
吴晓筠：《商周时期铜镜的出现与使用》，《故宫学术季刊》2017 年第 2 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3 期。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A）
许宏：《二里头遗址“1 号大墓”学案综理》，《中原文物》2017 年第 5 期。（B）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

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张新耀：《郑州商城白家庄期遗存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赵越云、樊志民：《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马引入与本土化历程》，《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2018

常怀颖：《夏商都邑铸铜作坊空间规划分析》，《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侯卫东：《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王畿区域聚落变迁与社会重组》，《江汉考古》2018年第2期。
[美]霍华德·斯波德克著，陈德民等译：《全球通史：从公元前500万年至今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等著，魏凤莲译：《简明新全球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法]帕特里斯·格尼费、蒂埃里·伦茨主编，邓颖平等译：《帝国的终结》，海天出版社，2018年。
孙卓：《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城市发展进程的比较》，《考古》2018年第6期。（A）
孙卓：《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青铜牌形器和金片绿松石器的复原》，《考古》2018年第5期。（B）
袁广阔：《略论郑州商城外郭城墙的走向与年代》，《中原文物》2018年第3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2~2017年盘龙城考古：思路与收获》，《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2019

常怀颖：《殷墟车马器补议》，《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
谷飞、陈国梁：《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郑州小双桥遗址2014年Ⅳ A02区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
侯卫东：《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
[日]菊地大树著，刘羽阳译：《中国古代家马再考》，《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李宏飞：《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再分析——兼论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质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7期。
刘亦方：《试论郑州城垣形态及相关河道的变迁》，《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A）
刘亦方：《读〈商文明〉——商代考古研究相关问题及思考》，《华夏考古》2019年第2期。（B）
秦小丽：《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孙卓：《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科学出版社，2019年。
许宏、贺俊：《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A）
许宏、袁靖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B）

2020

[美]布赖恩·费根著，袁媛译：《考古学与史前文明》，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陈国梁：《囷窌仓城：偃师商城第XIII号建筑基址群初探》，《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
陈民镇：《“二里头商都说”的再检视》，《华夏考古》2020年第2期。
董好：《殷墟地区出土石容器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日]冈村秀典著，陈馨译，秦小丽校：《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侯卫东：《商代早期中原腹地中小型城邑的形成背景研究》，《考古学集刊》第23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侯卫东、张玲：《论辉县孟庄商城的年代》，《江汉考古》2020 年第 1 期。
[美] 理查德 · W. 布利特、帕梅拉 · 凯尔 · 克罗斯利等著，刘文明等译：《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商务印书馆，2020 年。
秦岭、曹艳朋：《平粮台古城遗迹发掘研究的重要成果》，《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5 日。
司媛：《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及其意义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许宏：《二里头都邑的两次礼制大变革》，《南方文物》2020 年第 2 期。
张昌平：《关于盘龙城的性质》，《江汉考古》2020 年第 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铸铜作坊遗址 2015 ~ 201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 年第 10 期。

2021

[英] 保罗 · 巴恩编著，杨佳慧译：《考古通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 年。
蔡大伟：《古 DNA 与中国家马起源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 年。
陈国梁：《都与邑——多重视角下偃师商城遗址的探究（上）》，《南方文物》2021 年第 6 期。
陈隆文：《郑州小双桥商代城址非隞都说》，《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 28 辑，三秦出版社，2021 年。
陈筱：《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古代都城看〈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渊源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李栎栎：《2021 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二）》，“河南考古”微信公众号，2021 年 12 月 17 日。
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刘亦方、张东：《关于郑州商城内城布局的反思》，《中原文物》2021 年第 1 期。
覃春雷：《叙利亚 8000 年：在贸易、交流与冲突中走向城市文明》，《“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文物出版社，2021 年。
许宏：《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A）

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B）

2022

陈茁、温小娟等：《重磅！郑州商城首次发现“金面罩”》，河南日报客户端，2022 年 9 月 16 日。
邓玲玲、曹慧奇等：《陶器尺寸标准化程度的量化分析：以偃师商城遗址的大口尊为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 年第 5 期。
桂娟、袁月明：《河南郑州商城发现首个商文化金覆面》，新华网，2022 年 9 月 16 日。
李安、徐嘉懿等：《走进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新华网，2022 年 7 月 26 日。
李峰著，刘晓霞译：《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
李瑞：《四项考古新成果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国家文物局官网，2022 年 9 月 16 日。
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刘天歌：《试论黄泛平原古城的环形护城堤》，《中原文物》2022 年第 2 期。
刘亦方、宋国定：《环嵩山地区三代城市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出土绿松石器》，《江汉考古》2022 年第 4 期。
齐岸青、卓鹏：《探寻郑州商代王陵》，顶端新闻，2022 年 9 月 16 日。
[法] 乔治 · 鲁著，李海峰等译：《两河文明三千年》，大象出版社，2022 年。
宋国定：《考古所见的殷商文明》，《光明日报》2022 年 11 月 6 日。
孙宝国：《在神圣和世俗之间：西亚城市带的交融与冲突（公元前 7000—公元 192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澳] 特雷弗 · 布赖斯著，蒋家瑜译：《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商务印书馆，2022 年。

王胜昔、梁笑宇：《偃师商城遗址取得多项考古新发现》，《光明日报》2022 年 10 月 25 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科学出版社，2022 年。
俞可平：《帝国新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袁月明、任卓如：《首次发现！比三星堆黄金面具年代还早》，“新华社”微信公众号，2022 年 9 月 1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 2 个围沟、400 余座祭祀坑》，“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 年 1 月 18 日。

2023

黄富成、侯新佳等：《礼器煌煌鉴商都：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M2 出土遗物》，《大众考古》2023 年第 4 期。
袁广阔：《早商都城的规划与布局》，《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21 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 年。

后 记

我的第一本面向公众的小书《最早的中国》，从当了 20 年考古队长的二里头遗址，述及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文明的崛起。随后的《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和《东亚青铜潮》，视角从二里头都邑这个“微观”，到中原中心形成的“中观”，再到整个中国古代都城的“宏观”乃至以青铜潮为主的东亚文明潮的“大宏观”，四本小书后来集成了“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这几本书从不同侧面提到了介于二里头文明和殷墟文明之间的二里岗文明，那是一个较二里头文明更为发达，扩张范围甚至较其后的殷墟文明还广，真正使东亚大陆进入史上空前大提速时代的庞大国家文明。写作计划中的书单排着队，而关于二里岗文明这本，是我最想写的，但由于杂务缠身，一直处于想想而已的状态。

之后，就有了 2021 年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前后，与大象出版社的缘分。可以说，除了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集团文物考古分社，大象出版社应该是国内出版文物考古类图书最多的出版社了。由《溯源中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 年）开始与“中华文脉”出版项目结缘，我这个 20 余年来致力于在“老家河南”

的热土上耕耘的学者，当然希望能继续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出书。在地处中原腹地郑州的出版机构，为大郑州做传，应该就是最合适的选题了。这成了大象出版社团队与我的一个共识。这样的机缘，成就了这本讲述郑州商城和以其为中心的一个庞大文明及其源流故事的小书的面世。

尽管出版方不同，但我仍认为这本书实际上应可归入前述“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是这套书的第五本。它自二里头文明晚期讲起，向下展开了中国早期青铜时代更宏阔的画卷，其中延续了我关于“早期中国”体系建构和方法论上的思考，也在践行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看中国的理念。

然后就该谈谈书名的缘起了。书中已交代，中国乃至东亚大陆“最早的帝国”的概念，不是笔者的原创。这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Robert W. Bagley）教授最先提出的，继而由其门生王海城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做深入阐发。但他们的研究成果，都还仅限于学术圈，甚至到目前为止，还罕有中国学者明确表示认可并推介他们的研究。诚如张光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醉心于把器物类型学和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的确，我们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论证具体考古遗存与古文献中的夏商等族属和王朝归属的对应问题上，商王朝的第一座都城“亳都”及早期商文化，是目前学界贴在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明上的最大的标签，已形成主流观点。相比之下，包括这本小书在内的研究取向和相关

思考，可归为社会考古或人类学取向的考古研究。因而我可以援引、吸纳贝格利教授和王海城教授的观点，并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来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和思辨，进而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如果说王海城教授的中英文学术论文题目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还加了问号以示存疑，那么，如诸位所见，本书的书名中已无问号，这当然表明了一种态度，也可以称为学术上的文化自信。在此，谨向贝格利教授和王海城教授对此概念的提出、开拓性的研究及对本书成书的影响，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谢意。

给全球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新冠疫情已伴随我们三年有余，所幸写作应该是受疫情影响最小的一类工作吧。2021年以来笔者出版的多部作品，都是在疫情的起起伏伏中完成的。2022年更是难忘的一年，本书动笔于年初，夏季完成了初稿，秋季以来开始配图，国庆滞留二里头期间又加以增补，包括对郑州书院街“金覆面”等最新披露的考古发现的评述。2023年春节，则是在紧张的校稿中度过的。

通校全书，忆及在写作过程中曾给予我多方帮助的师友。美国华盛顿大学王海城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研究馆员，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复旦大学秦小丽教授，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兰州大学菊地大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研究员，陈国梁、赵海涛、常怀颖副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副研究员，河南大学侯卫东、

贺俊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陈北辰博士，南开大学刘亦方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温静博士，台湾大学黄川田修博士，河南日报社张体义先生、温小娟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司媛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高级技师赵静玉女士，独立学者覃春雷、周行康先生等，或答疑解惑，或帮助查找资料，或提供优质图片、改绘插图等。各位师友施与本书的诸多助益，我都感铭于心，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出版，都离不开大象出版社张前进副总编辑及其团队的敬业精神和辛勤付出，责任编辑杨兰等尽心尽力编校把关，才有了今天这部“成品”的面世。尤其感恩的是他们对书稿框架、观点内容的最大宽容，使笔者得以系统阐发己见。学者探研历史，其作品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供当下和未来的人去品味、探研、指谬。诚望得到各方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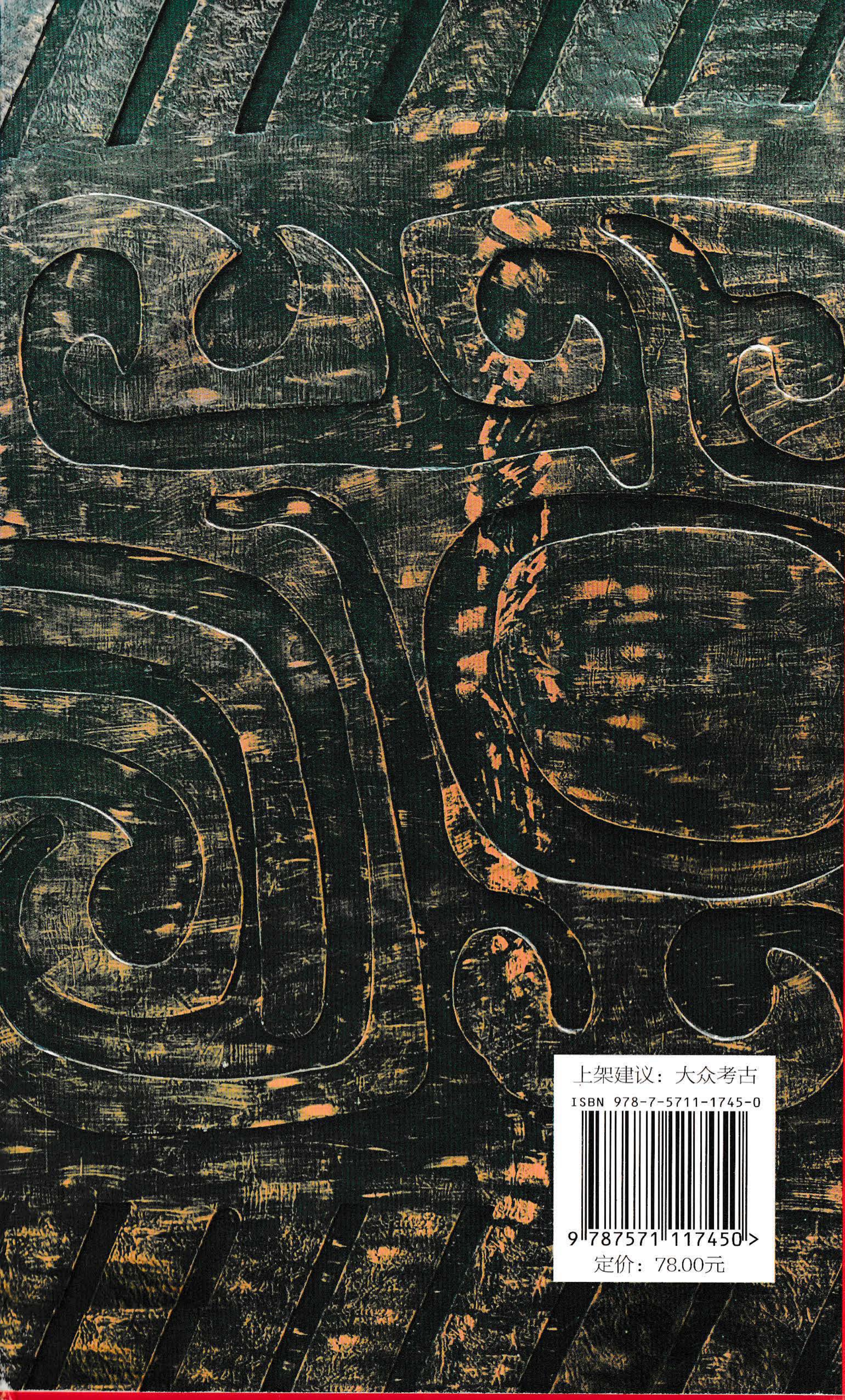
搁笔之际，已入兔年，这是我的第五个本命年，也即花甲或耳顺之年。而本书则是笔者 20 余年来从学术专著到普及读物的第十五部作品，可以看作是迎来退休这一学术“第二春”的小小的里程碑吧。

許宏

2023 年 5 月于京西门头沟



上架建议：大众考古
ISBN 978-7-5711-1745-0
9 787571 117450 >
定价：78.00元



上架建议：大众考古

ISBN 978-7-5711-1745-0

9 787571 117450 >

定价：78.00元